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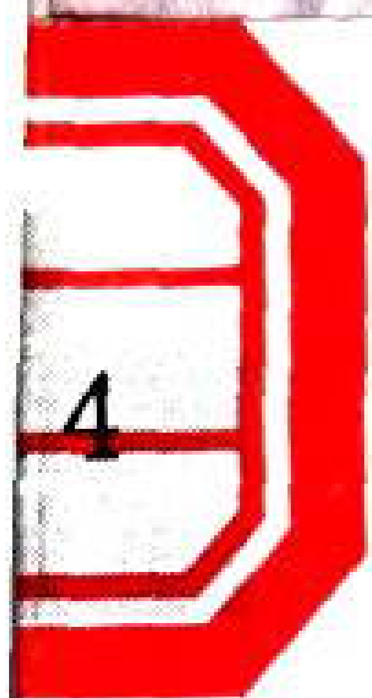
巨匠丛书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

狂人玛依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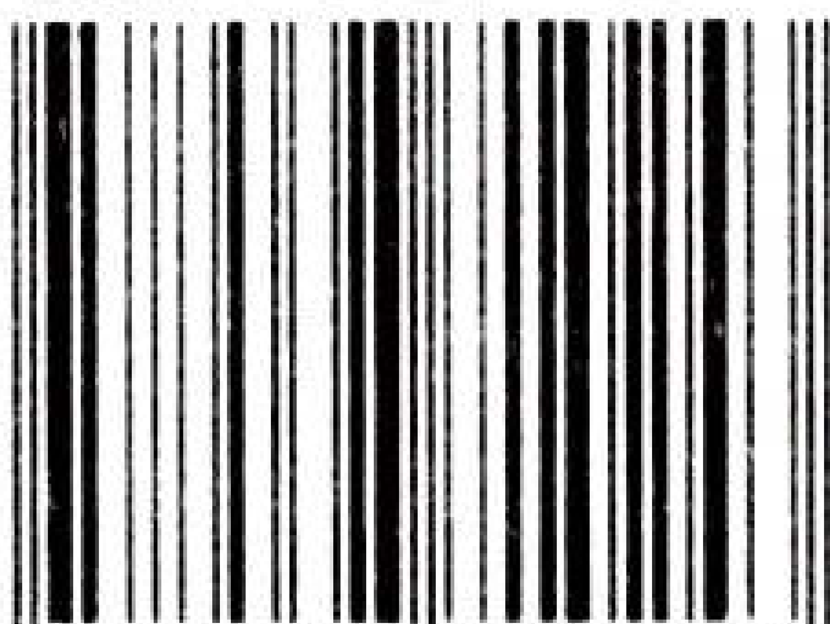
时代文艺出版社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目录



ISBN 7—5387—1024—8
I·981 定价:17.00元

(吉)版权登字07—1996—82号

"巨匠丛书"第三部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之七

狂人玛依塔

KUANG REN MA YI TA

狂人玛依塔

HISTORIA DE MAYTA

作　者:〔秘鲁—西班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译　者:孟宪臣　王成家

责任编辑:安春海　　**版式设计**:安　然

封面设计:章桂征　　**责任校对**:王文季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本　　**字数**:250千

印张:10.75　　**印数**:5 000册

版次:1996年1月第一版　　**印次**:1996年1月第一次印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书号:ISBN 7-5387-1024-8/I·981　　**定价**:17.00**元**

巨匠丛书编辑出版委员会

他为什么写这样的作品？
——代译序

赵 德 明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名字，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爱好者中间，已经不是陌生的了。他的长篇小说《城市与狗》、《绿房子》、《世界末日之战》、《胡利娅姨妈与作家》、《潘上尉与劳军女郎》和《酒吧长谈》，在短短的五六年中间，已先后有中译本问世了，并且总印数高达近三十万册之多。一个外国作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竟有如此之多的作品被译介过来，这在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上，恐怕也是鲜见的。

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创作之所以受到中国读者的瞩目和作家的关注（已有中国作家按照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如王剑的《纵深地带》），大约与他作品的思想深度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是分不开的。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作品大都以社会、政治生活为题材，而且带有明确的政治、哲学观点。这与他的文学主张有关。他认为：作家应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就是因为他要抗议、揭露和批判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以便加速旧世界的崩溃。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的小说“像兀鹫啄食腐肉”一样，揭露和批判了现行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正，如：《城市与狗》和《潘上尉与劳军

女郎》揭露了反动军事独裁的腐败与残暴；《绿房子》暴露了秘鲁劳苦大众（尤其是下层妇女）被压迫与被侮辱的悲惨处境；《胡利娅姨妈与作家》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压迫与偏见对于无辜群众的危害；《世界末日之战》一方面讴歌了巴西腹地农民起义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揭穿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伪善面目，暴露了他们残暴与凶恶的嘴脸；《酒吧长谈》则反映了奥德里亚反动政府给整个秘鲁带来的动乱与浩劫，这个军事独裁政权血腥镇压工人和学生的革命运动，但是他们内部又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并且个个过着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

在艺术技巧方面，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以奇特的情节、新颖的结构、明快而流畅的语言、复杂多变的表现手法而见长。他在师承萨特和福克纳的文艺思想、福楼拜的创作经验和西班牙骑士小说成就的基础上，在探求艺术真实的道路上另辟蹊径。他提出："我要创造'总体小说'，即：通过客观与主观世界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度来反映现实。"具体地说，他要抹去文学创作中客观与主观、理性与非理性的界线，试图将"客观、原始与自然"的现实与"主观、想象、梦幻与抽象"的现实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现实——艺术的现实。为达此目的，他首先打破传统小说直线、单一的叙述结构，创造出一种多层次、多角度、多维空间的立体结构。它要求读者"积极参与创作"，即：读者需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去填补作品中留下的空白。比如，在《潘上尉与劳军女郎》的第一章中，以潘达雷昂上尉受命组织劳军队为主线，以多组对话的形式，将这次任务的背景、性质、组织方式交待得一清二楚。但是出场对话的人多达二十三人，上至国防部的将军、军区司令、市长……下至酒吧侍者、妓院老板……他们各自以谈话方式穿插

到潘达雷昂接受任务这条主线上来。但是，在“穿插点”上却无任何解释和说明，全凭读者根据想象和推理联结起来。试看下面一例：

“每天都有不少的通报、控告信，像炸弹一样向我们飞来，”维多利亚将军搔着下巴上的胡子，“连最偏僻的小镇都派了代表团来抗议。”（这是将军在给潘达雷昂介绍情况，但紧接着就出现了派瓦·鲁努伊镇长的抗议，形成不经作者说明的“穿插点”。）

“您的士兵在奸污我们的妇女，”派瓦·鲁努伊镇长手里揉着帽子，声音也变了，“几个月以前，我的一个弟妹被糟蹋了，上星期本人的妻子也险遭侮辱。”

随后，连续出现这样的“穿插点”，先是贝尔特兰神甫的插话，继尔是莫雷市长的控诉，陶乐德娅小姐指认强奸犯，巴卡柯尔索中尉的揭发，木匠拉尔克为妻子被强奸而发出的抗议，克里斯蒂娜太太的控诉，潘达雷昂的妻子整理行装、准备与丈夫赴任而发出的怨言，弗兰西斯科兄弟会的礼拜仪式，直到此时，这些情节才归回到维多利亚给潘达雷昂介绍任务这条主线上来。

类似这种力图表达“总体现实”的技巧还有许多，如电影式的多镜头对话与独白、故事中套故事的套盒术、由流苏式的小故事汇总成一个大故事的“连通器法”，等等。这些技巧大大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

巴尔加斯·略萨从1962年成名到现在创作了十余部长篇小说，其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拉丁美洲。1976年，鉴于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被推选为第四十一届国际笔会主席。

但是，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巴尔加斯·略萨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也面临着“超越自我”的问题。具体地说，进入八

十年代以后，他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对拉丁美洲“左派”组织犯下的错误要不要批评？要不要以文学形式揭露出来？批评了，揭露了，社会舆论会不会认为这是“背叛行为”？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勇气的，更需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经过两年的酝酿，他毅然决定写一部批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文学作品。这就是《狂人玛伊塔》（原名《玛伊塔的故事》）。这部长篇小说叙述了一个名叫玛伊塔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冒险生涯：这位秘鲁“革命家”的思想既不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又不在实际行动中依靠和发动工农群众，更不准备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而是异想天开地借助一名现役军人和七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去攻打监狱，企图通过释放犯人扩大队伍，然后发动武装起义。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当然要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那名现役军人被军警击毙，玛伊塔被捕入狱，几个少年也被父母揪着耳朵拉回家中。巴尔加斯·略萨在处理这一题材时，没有丝毫的指责与嘲讽，而是把玛伊塔的个人品质、性格特征和生活、思想作风置于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加以描写，进而揭示出产生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因此令读者信服地认识到它们的危害性。1984年12月2日，《狂人玛伊塔》出版后的第二个月，他在接见哥伦比亚《时代报》记者时说：“我认为当文学艺术再现暴力的时候，它可以剥夺这种暴力的合法性。我最近写的这部长篇小说《狂人玛伊塔》，可以看做是许多拉美人对自己政治立场的修正，其中也包括我的立场。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许多拉美人认为，暴力可以解决我们大陆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实际情况表明，正如这部小说中的情况一样，其结果都是空想的破灭，除去某些个人的英雄精神和果敢行动之外，留下的只是牺牲和毁灭。小说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我认

为也就是以艺术的方式否定了暴力的合法性。”这可以看做是这部作品的创作主旨。那么，巴尔加斯·略萨是不是反对一切暴力行动呢？不是的。他在这次接见记者时说：“我认为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使用暴力也是必要的。比如，人民要是生活在极端严厉、不允许任何变革的专制统治下，那么使用暴力推翻它，也许就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了。但是，我认为在民主制度下，尽管这种制度有它不尽完善和过火之处，它总会给人民以争取自由和正义的机会。”无疑地，《狂人玛伊塔》说明了巴尔加斯·略萨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从单一揭露和抨击极右势力的恶行，转向同时也批评“左派”的错误。这种有右批右、有“左”批“左”的做法，表明了他实事求是的态度，更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的成熟。当然，同时也表明了他在文学创作中的勇气和骨气。他在接见《时代报》记者时说的一番话，可以说明他这一思想转变的过程：“重要的是每天要给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找到切实可行的答案。这就是我现在的思想与二十年前思想的区别。1965年，我被一种先入为主的思想模式所辖制。每当我采取的立场与左派发生矛盾时，我就感到自责。如今我没有任何偏见，我不在乎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是否同左派或右派保持一致。现在，我是讲求实际的，我赞成改革，主张社会必须变革，但是这些变革只有在不扼杀个人自由的民主制度下进行才能达到目的。”巴尔加斯·略萨摒弃了从概念或某种思想模式出发去图解社会问题的做法，转而从实际出发去研究社会问题。这一转变使他的文学创作更加逼近了生活，更能够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狂人玛伊塔》的创作就说明了巴尔加斯·略萨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部作品的基本格局就是按照调查研究的方式来安排的。小说中的“我”一一调查、采访了玛伊塔的亲朋好友，并且最后千方百计找到玛伊塔

本人，亲耳听到他对武装暴动的看法。作品以大量事实论证了这一“极左”行动失败的根本原因：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加上“左派”内部的分裂，必然使任何行动都带有盲目性，并最终导致失败。

巴尔加斯·略萨既坚持文学应“介入”政治，同时也坚持文学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说：“我重申，我是介入政治的，我经常对拉丁美洲的各种问题发表政见，但是，发表政见和担任政府职务有很大不同。我认为当上政府官员会剥夺作家批评的独立性。我的看法是，作家的工作和政府官员的工作是不可兼任的。如果一个作家当上政府阁员，那么他就陷入这样一个窘境：他就不能像作家和知识分子那样自由发表政见了，而是要成为这个官方机器的组成部分了。再说，当贝拉翁德总统请我出任总理的时候，我是考虑过他的建议的。但是，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的工作对共和国的政治生活有着本质的意义，我是可以接受这一职务的。我也可以为此做出牺牲，但是眼下的情况并非如此，因此我也就不能接受。”

作家应该深入生活，甚至“介入”政治，但是作家毕竟是作家，他只能以文学创作去影响社会。对于这种“影响”，巴尔加斯·略萨的看法是这样的：“在当代，一部文学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不会再像十九世纪那样，当时雨果和巴尔扎克的小说能够影响许多人的思想和行动。”今天，人类已进入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时代，人类观察、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已经空前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许多传统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生活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们在自身发展中提出的问题往往突破了传统学科彼此划分的界限，涉及到不同学科、不同领域。过去那种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孤立地提出

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已不可能全面地认识和解决这种问题了。在文学创作方面，作家必然要摆脱原来的狭小天地，而要用更全面、更接近客观规律的方法去看待世界，指导创作。传统的单一、直线地描述生活和自然的手法，必然要为多元、多维、多角度的方法所替代。巴尔加斯·略萨正是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文学创作的，他既认识到文学的局限性，又认识到突破这种局限性的必要性。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巴尔加斯·略萨在艺术技巧方面做了许多改革。在《狂人玛伊塔》里，他对全书的总体结构做了精心的安排：每一章都以作者采访玛伊塔的一位亲戚、或朋友、或同志作为开头，分别从玛伊塔的童年、少年、青年、老年、党内生活、社交生活、家庭生活以及武装暴动的策划、发生及结局等角度刻划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直到最后一章，作者与玛伊塔晤面，通过这个被社会扭曲了的悲惨角色之口，给无政府主义者们的“革命实践”做了结论。但是，在每一章之中，读者会发现，不能像读传统小说那样按情节发展的脉络一行行、一字字地读下去，而是需要去“猜”，因为对白与独白、对话与叙述、过去与现在、此地与彼地……常常像多层立交桥那样，不经作者解释和说明就穿插在一起。这种像电影镜头转换式的跳动，虽然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一定困难，但是只要读者肯于动脑，理解起来并不困难；因为无论哪种“穿插”和“跳动”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当第一者和第二者对话时，如果有第三者插入，那么这必定是换了场景的，况且第三者插入的起因必定与前面对话的内容有关。这种“立体交叉”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作者可以驾驭的时间、空间大大扩展了，再也不必像传统小说那样，“一张嘴不能同时表述两件事，只好暂时按下不表。”只要与总体结构有关，作者可以把任何时间、地

点、人物、事情安排到眼前，而无需赘言说明，这样就大大地节省了笔墨。其次，这种表现手法会给人以“立体感”，凡是与玛伊塔有关的一切人和事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牵连进来。比如，玛伊塔由于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而发生了性欲衰退和性倒错现象，在严肃文学里，这类事是较难处理的，写过头了，容易导致“格调低下”；回避开来，又难于揭示人物性格的某一侧面，但是，在《狂人玛伊塔》中，作者只安排了一两个镜头，事情就说明白了。这种多镜头、多角度的结构并不会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感觉，因为它像太阳一样向四面八方幅射光和热。太阳这个中心只有一个，玛伊塔也只有一个，不同的是，凡与玛伊塔有关的一切，由四面八方向他这里集中，不是幅射出去，而是汇集到一个点上。另外，由于巴尔加斯·略萨十分重视人物的对话要突出他们的个性，所以只要听听他们说话的口气，也就大概可以猜出他们的身份了。这一点也能够帮助读者及时从一个场景转换到另一个场景。

巴尔加斯·略萨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不断探索新的艺术技巧。从《城市与狗》到《狂人玛伊塔》，每部作品的结构、语言、表现手法都不雷同。意识流式的内心独白，多角度、多镜头的电影蒙太奇手法，报刊、公文、书信剪辑而成的记录体小说，多线索构成一个总线索，又名曰“连通器”式的小说……创作小说的手法与技巧之丰富、之新奇是令人惊叹不已的。这除了说明巴尔加斯·略萨的艺术才能之外，更说明他身上有股奋强不息、刻意求新的创造精神。艺术贵在创新，艺术家贵在有创新精神。

第　一　章

清晨，当夜间的湿气还未散去，马路上还是滑溜溜、亮光光的时候，沿着巴兰科海堤长跑是开始一天生活的好方式。虽然时值夏令，天却是灰蒙蒙的，十点钟以前，这个区从来也见不到太阳。雾霭重重，物体的轮廓都模糊了，天上盘旋的海鸥、飞越悬崖的鹈鹕却隐约可见。大海忽而灰黑，忽而黛绿，海面上烟雾袅袅，波浪夹带泡沫，后浪推着前浪向海滩涌去。海面上时而跳出一叶扁舟，而当大风骤起，阴云驱散，远处的布恩达海角、圣洛伦索和弗隆东那些土黄色岛屿便历历在目了。如果把视线仅仅集中在大海、岛屿以及海鸟，那么自然景色倒也称得上美丽。可是，人们创造出来的这一切，却那么不堪入目。

那些房屋就很难看，全是相互模仿的劣等之作。矮小的栅栏和围墙令人窒息；尖叫的汽笛、暗淡的灯光显得阴森恐怖。屋顶上电视天线林立，虎视眈眈的如恶鬼把门。大堤后面堆积如山并且一直散布到悬崖边上的垃圾更是丑陋不堪。这一带原是本市风景最优美的居民区，是什么使它变成现今这藏污纳垢的地方呢？是懒惰。实际上房主人就让他们的佣

人把垃圾倒在自己的鼻子底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即使自己不倒，邻居的佣人或者巴兰科区的花工们也会往这里倒的。我跑步时，就看到满载垃圾的卡车将垃圾卸在这里。他们本应将这些东西拉到市郊垃圾站去的。因此，人们对来这里觅食的兀鹫、蟑螂、耗子以及这些垃圾散发出来的恶臭已习以为常。我是看着它们一点一点地堆积起来的。早晨跑步时，我总能看到成群结伙的饿狗在苍蝇堆中寻觅食物。最近几年，我还看到与那群野狗一起的还有一些无家可归捡破烂的孩子、老人和妇女。他们在那里扒来扒去，无非是想发现点能够果腹的东西，即便不能吃，能穿能卖也行。

这种贫困景象，往日只有在贫民窟才能见到，后来蔓延到市中心，而今已经遍及全市了，甚至像观花埠、巴兰科、圣伊西德罗这些富人区也无一例外。一个人住在利马就得习惯于贫困和肮脏，否则就会变成疯子或者被迫自杀。

不过，我敢肯定玛伊塔是不会习惯的。我们在萨莱西亚诺学校门口等公共汽车时（它把我们俩带到我们居住的玛格达莱娜区），玛伊塔常常跑到圣母玛丽亚教堂门口，把在学校最后一次休息时神父分给他的那块夹奶酪的面包送给守候在那里的一位瞎子，他衣衫褴褛，拉起小提琴连音也对不准。星期一，玛伊塔送给他一个里亚尔①，这是他星期天省下来的零用钱。有一次，我们一边准备第一次受圣餐仪式，一边聊天，这时他突然提了个问题，把神父弄得无言以对。他问道：“神父，为什么有穷人、富人之分？我们不都是上帝的孩子吗？”他总喜欢谈论穷人、盲人、残疾人、孤儿、流落街头的疯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圣马丁广场旁边的一家小吃店里和

① 旧时西班牙及拉丁美洲货币单位，约合四分之一比塞塔。

他一起喝咖啡。那时我们俩早就成了萨莱西亚诺学校的学生，他又谈起这个老问题：“你看见利马有多少乞丐？成千上万！”早在他那次有名的绝食之前，我们班的同学都以为他会去当神父的。那时，谁要是关心穷人，大家便以为他有心献身宗教，倒不会认为他要当一个革命家。那时，我们脑子里装的多是宗教，很少有政治，全然不懂革命道理。玛伊塔胖乎乎的，卷发，平足，牙齿的缝隙很大，走路甩着外八字。他总是穿一条短裤和一件带绿点的毛衣，上课时依然系着围巾。我们常拿他开心，讥笑他关心穷人，帮助作弥撒，祈祷时那种虔诚的神态，足球踢得那么差，尤其取笑他取了个女人的名字——玛伊塔。“吃你们的鼻涕去！”他常用这句话回敬我们。

虽说玛伊塔家境贫寒，但并非是学校里最穷的一个。我们萨莱西亚诺的学生与公费学校的学生往往混淆难分，因为我们学校跟圣玛丽亚和纯洁圣母学校不同，那儿全是白人，我们两个学校多是中产阶级下层的子弟，职员、官员、军人、一般专职人员的子弟，甚至还有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的子弟。然而，我们当中更多的是白人和印第安人混血儿、黑白混血儿、黑人与印第安人混血儿、华裔、日本人后裔、接近于白人的混血儿以及众多的印第安人子弟。虽然我们萨莱西亚诺学校很多学生有一身古铜色的皮肤，颧骨突出，鼻子扁平，头发直而硬，但是取印第安人名字的只有玛伊塔一个。除了名字之外，他身上的印第安血统并不比我们任何人的多，他的肤色白中带青，头发卷曲，一个典型的秘鲁人的五官，显然他是个印欧混血儿。他住在玛格达莱娜教堂后面的一栋又矮又小的房子里，墙上的白粉都已脱落，门口连个花坛也没有。我非常熟悉那里，因为有近一个月我差不多每天下午都到他家去。我们俩一起高声朗读《基督山伯爵》，这本书是我过生日

时人家送给我的。我们俩简直着了迷。他母亲在妇产医院当护士，也出诊打针。我们从公共汽车的窗户上看着她给玛伊塔开门。他母亲是一位身体强壮的太太，灰白色的头发，一开门便给她儿子飞去一吻，仿佛没有时间似的。他爸爸，我们从来没见过。那时我就断定他没有爸爸，不过玛伊塔发誓说他父亲是工程师，总在外东跑西颠。那时工程师可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

我跑完了。从萨拉萨尔公园到我家来回二十分钟，运动量正合适。在我跑步的时候，我好像常常忘记自己是在长跑，这时，在萨莱西亚诺学校上课时的情景，玛伊塔那张严肃的面孔，走起路来左右摇摆的样子，还有他那尖嗓子，便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仿佛就在那儿，清晰地站在我眼前，连他的说话声都听得见，甚至当我恢复了正常呼吸，翻报纸、吃早点、淋浴、工作的时候，都还能听到他的话音，看到他的身影。

我们上初三年级的时候，玛伊塔的母亲去世了，随即他便去跟他的姨妈也就是他的教母住在一起。他说，过圣诞节时或者过生日时，姨妈总给他送点儿礼物，有时候还带他看电影。想必他姨妈为人很好，因为后来玛伊塔独立生活以后，还常和姨妈何塞法太太保持联系。虽然他生活中倒霉的事接二连三，可多少年来，他一直定期去看望姨妈，而那次与巴列霍斯的会见恰恰就是在他姨妈的家里。

自从那次家庭舞会以后，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此时此刻，何塞法太太怎么样了呢？我曾和她通过一次电话，并且在电话中好歹说服了她，求她见我一面。自那以后，我一直这样扪心自问。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已来到共和国大道和安加莫斯街交汇处，我从小公共汽车上跳下来，跨进了苏尔基

约区。对这个区，我十分熟悉。从青少年时代起，我就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玩耍：来这里的胜利酒馆喝啤酒；来这里修皮鞋，改西装；到那些设备简陋而臭气难闻的下等影院去看美国西部牛仔电影，如春天影院、雷昂西奥·普拉多影院和玛克斯米尔影院。这个区没有一点变化，像这样的区在全利马市为数极少。这里裁缝、鞋匠遍及每一个街口，手工排字车间、区级停车场、洞穴式的饭馆、巴掌大的酒吧、库房以及一个个破破烂烂的小店，充斥于每条狭窄的胡同。许多无业游民在街角游逛，一群群小孩就在大街上踢足球，汽车、卡车、卖冰棍的三轮车川流不息。人行道上挤满了人群。房子只有一二层，全都黯然失色。街上到处是一滩滩油渍渍的水坑，一条条饿狗东游西窜，跟当年一模一样，然而，昔日这些充斥流氓、无赖、妓女的街巷，而今又增加了大麻、古柯这类毒品。这里的毒品交易比维多利亚区、里马克区、波尔本尼尔区和贫民窟更猖獗。入夜时分，这些麻风病流行的街角、污秽的修道院、难以插足的酒吧就变成倒卖毒品的集散地。警察经常在这一带发现加工毒品的简陋作坊。在改变玛伊塔人生道路的那次家庭舞会流行的时代，这类事情并不存在。那时，利马吸大麻的人寥寥无几，而古柯则更是个别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们的闲情逸致，间或，一些过放荡夜生活的人用它来解酒，或者提神，以便继续寻欢作乐。那时毒品的制作与贩卖还远没有变成这个国家最兴隆的交易，也没有扩散到其它区，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这类东西。我从丹特街朝普拉达街走。那天晚上，玛伊塔到他姨妈——教母家去，倘若乘公共汽车、小公共汽车或者有轨电车，也必定打这儿路过。一九五八年，在现在这条快车道上还叮叮当当地行驶着有轨电车呢。玛伊塔累了，疲备不堪，脑袋有点

嗡嗡作响，他多想把双脚泡在冷水里呀！没有比这办法更能驱除疲劳或提神了，只要把脚往冷水里一泡，脚趾的凉爽感便旋即传到脚面、脚背，身上的疲乏、消沉的意志、沮丧的心情顿时一扫而光。那天他天一亮就起了身，来到团结广场，向那些走下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到阿根廷大街工厂上班的工人们兜售《工人之声报》。尔后，从塞皮塔街区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广场，往返两次，先是带去一份打好字的蜡纸，然后又带了一份达涅尔·古埃林的文章，这篇关于印度支那法国殖民主义的文稿是他从一份法语杂志上翻译下来的。玛伊塔在哥恰卡斯的小印刷厂里足足站了两个小时，尽管困难重重，报纸仍继续印发（因为非法印刷，必须预先付款）。他帮助排字工人检字，看校样，之后便乘车到里马克区皮萨罗大街的一个小屋去。通常他回家得换一次车，这次却是直达。因为每星期三他照例得来这里，跟圣马科斯大学和工程大学的几名学生指导一个学习小组，紧接着便出席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这时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一天里他只在莫盖瓜大学的学生食堂吃过一盘菜炒饭。（他有一张有效期为一年的假证件，就凭它到食堂就餐。就餐证失效后，还得伪造。）会议在索利托斯街的一个车库里举行。会上辩论激烈，会议足足进行了两个小时，会场内乌烟瘴气。经过这样一番奔忙，谁还能有兴趣去参加生日舞会呢？而他本来就讨厌这种聚会跳舞。他的膝关节有点支持不住了，双脚如踏在火炭上。不过，怎么能不去呢？以往，除了不在利马，除了坐牢房，他从未缺席过。而将来不论疲乏不疲乏，脚痛不痛他还得去，哪怕只是对姨妈说一声“我爱你”也好，他决不缺席。屋内人声鼎沸，不等他叫，门就开了：噢！教子。

“喂，教母。”玛伊塔说，“生日快乐！”

“何塞法·阿莉苏埃尼奥太太？”

“是的，请进，请进。”

她是一位保养得很好的太太，已年过七旬，但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她的皮肤并不显得皱皱巴巴的，黄褐色的头发里，有少量白发。体型发胖，但很匀称，臀部有些大。身上穿一条淡紫色连衣裙，腰间系一条红腰带。房间宽敞，略有点阴暗，室内陈设着几把样式各异的椅子、一个大镜子、一架缝纫机、一台电视机、一张桌子、一尊米拉格罗斯神像和一尊圣马丁·德波雷斯神像，墙上挂着几帧照片，一个花瓶，插着蜡制玫瑰花。可能就是在这次生日舞会上，玛伊塔认识了巴列霍斯。

“就是在这儿。”阿莉苏埃尼奥太太点点头，环顾一下四周，然后指着一把堆满了报纸的摇椅说：“我就坐在那儿看着他们说话。”

人并不多，然而室内烟雾腾腾，说话声、碰杯声不绝于耳。唱机放着华尔兹舞曲《宠儿》，音量已放到最大。只有一对年轻人在跳舞，其他人有的拍巴掌，有的哼曲子。在这种场合下，玛伊塔总是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从不介入。他一向拘谨，不合群。为腾出地方跳舞，桌椅全部堆在角落里。有一个人弹着吉他。出席者多是常客，只有几位稀客。有几位表姐妹和她们的男朋友，有邻居、亲戚以及其他一些常来为太太祝寿的朋友，然而，那个喋喋不休、略显瘦削的青年，老太太则是第一次见到。

“他不是我们家的朋友。”阿莉苏埃尼奥太太说，“究竟他是我大女儿索伊莉塔的女朋友的对象呢，还是她的亲戚，我也说不准。是她把他带来的，谁也不了解他。”

不过，没过多久大家便熟悉他了。他对人和蔼可亲，能唱能跳，爱说爱笑。玛伊塔向几位表姐妹问过好之后，一只手拿着火腿三明治，一只手端着啤酒，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唯一的一把空椅子，紧靠着那个瘦青年，他站在那里，双脚踏着节拍，注视着围成一圈的三个人：玛伊塔的两个表姐索伊莉塔和阿莉西娅，以及一位脚登便鞋、年纪稍大的人。玛伊塔挨着他们坐下，他并不想惹人注目，只想稍待一会儿，便不失礼貌地回家睡觉。

“他从来不久待。”阿莉苏埃尼奥太太一边说，一边在一条方巾后面的几个袋子里翻来找去，“他不喜欢聚餐跳舞，不像别人那样。从小就不喜欢，年轻时也是这样，一向严肃而正派。她妈说他生下来就老气横秋。她母亲是我的姐姐，你知道吧？玛伊塔的出生就意味着她的不幸，因为她刚发觉自己怀孕，她的未婚夫就溜之大吉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您认为玛伊塔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他没有父亲？只是在我过生日时，他才出于礼貌，光临一次。我姐姐死了以后，是我把他带过来的。我把他当成上帝赐给我的一个儿子。我只有女儿，索伊莉塔和阿莉西娅。她们俩都在委内瑞拉，已经结婚，并且也都有了孩子。她们在那边混得不错。我本想再婚，可是我的两个姑娘坚决反对，只好守着她们过。我说呀，这是我的一个大错。您瞧，现在，我孤苦伶仃，就像一株蘑菇没有依靠，小偷说不定哪天就闯进来。我的两个女儿每个月都给我寄钱捎东西。要不是她们，我连锅都揭不开，您不知道吧？”

她一边讲着一边偷偷地打量我。她讲起话来声音沙哑，玛伊塔的语调很像她，她的手就像玉米棒子一样长，虽然偶尔也露出笑容，但眼神是忧伤的，眼圈里充满着泪水。她埋怨

日用品的价格逐日飞涨，抱怨街上的抢劫层出不穷。“我们这条街上的妇女们没有一个不被抢的。”说着说着她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什么偷盗呀，抢劫信贷银行呀，持枪杀人呀等等，直抱怨自己去不了委内瑞拉，好像那里的钱多得花不完似的。

“在萨莱西亚诺上学时，我们都以为他长大以后会当神父。”我说。

“我姐姐也是这么看的。”她点点头，擤擤鼻涕。“我也这么看。他打教堂前面走过的时候总是虔诚地划十字。星期天也总去教堂受圣餐。谁能料到他会成为一个共产党人呢？那时候，一个虔诚的教徒变成共产党人似乎不大可能。当然，这种情况现在也发生了变化，现在不是也有许多神父变成共产党人了吗？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他就是打那个门进来的。”

他腋下夹着书本走到她跟前，握紧拳头好像要打人。突然，他向她宣布一项他通宵未眠而酝酿成熟的决定：

“教母，我们吃得太多了，我们没有想到那些穷人。你知道他们吃什么吗？我告诉你，从今天起，我每天中午只喝一碗汤，晚上只吃一个面包，就像瞎子堂·梅达尔多一样。”

“可是他这心血来潮的举动，结果是住进了医院。”阿莉苏埃尼奥太太回忆道。

节制饮食没有几个月，他便消瘦下来，我们班的同学也猜不出什么原因，直到他住进洛阿伊萨医院，希约瓦尼神父才十分敬佩地向我们揭露了这个秘密。“出于人道主义和基督教义，这段时间，他节制饮食，誓与穷人同甘共苦。”神父感叹地告诉我们他的教母是怎么来向学校诉苦的。这种做法把我们弄得不知所措。他在医院靠打针吃补药才恢复了健康。回

到学校后，我们再也不敢开他的玩笑了。神父希约瓦尼说，这个孩子难免要被人议论。是的，对他议论是少不了的，然而并非在您说的那种意义上，神父。

“他来我家那天很不是时候。”阿莉苏埃尼奥太太叹息道，“他如果不来的话，也就认识不了巴列霍斯，也就不会发生以后那一桩桩的事。巴列霍斯是他的领路人，这个，人人皆知。否则，玛伊塔来看看我，拥抱一下，一会儿就会走的。可是那天晚上他一直待到最后，坐在角落里跟巴列霍斯没完没了地谈啊谈的。大约已经过了二十五年吧，可我还觉得就像昨天一样。他们这里革命、那里革命的谈了整整一个晚上。”

革命？玛伊塔转过身去看了看他。是瘦青年还是那个穿便鞋的老人谈起来的呢？

“是的，先生，就在明天。”那个瘦青年举起了手中的杯子说，“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明天就会发生，如果我们乐意干的话。就像我对你说的那样明白无误，先生。”

玛伊塔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感到周身发痒。瘦青年讲起社会主义革命来头头是道，就像刚才他讲奥托·弗利兹①的笑话，讲我们国家的拳击代表弗隆达多的最后一次比赛，讲得那么风趣。虽然玛伊塔很累，还是打起精神听着：“现在古巴发生的这事没法和我们秘鲁将要发生的相比，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只要安第斯山一动，全国都会震动起来的。”他是美洲革命联盟党②人？是红萝卜党③人？不过，在他教

① 德国神学家、哲学家（1869—1937）。

② 秘鲁资产阶级政党，后改称人民党，简称阿普拉党。

③ 秘鲁共产党的俗称。

母家过生日时遇到一个共产党人，根本不可能。玛伊塔在这个家里还从未听到任何人谈论过政治呢。

“那么古巴发生了什么事？”他的表姐索伊莉塔问道。

“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誓，不推翻巴蒂斯塔，就不刮胡子。”瘦青年笑着说，“你没看见七·二六运动①分子在世界上干的什么吗？他们在纽约自由女神像上挂起了一面旗子。巴蒂斯塔快完蛋了，已经是过街的老鼠。”

“巴蒂斯塔是谁？”阿莉西娅表姐问。

“一个暴君，”瘦青年激动地解释，“古巴的独裁者。那边发生的事和我们这边可能发生的事不能同日而语。我是想说多亏我们的地形，这是上帝赐给我们革命最好的礼物。印第安人一旦起来造反，全秘鲁将成为一座火山。”

“好了，不过现在还是跳舞吧。”索伊莉塔表姐说，“来这里不就是为了跳舞吗？我去放个节奏快点的曲子。”

“革命是一桩严肃的事情，至少我不赞成乱来。”玛伊塔听见那位穿便鞋老人的沙哑声音，“一九三〇年美洲革命联盟党在特鲁希略市发动了一场起义，杀了多少人呀！美洲革命联盟党人攻下兵营，我也说不准他们消灭了多少个军官。桑切斯·塞罗派了飞机、坦克才把起义镇压了下去，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仅在昌昌文化遗址那里就枪毙了一千多名美洲革命党人。”

“您在场？”瘦青年睁大了眼睛，颇感兴趣。

玛伊塔想：“对他来说，革命和足球赛是一码事。”

“我那时在瓦努科，在我的理发店。”穿便鞋的老人说，“大屠杀的枪声在瓦努科上空还能听得到。省军区司令把瓦努

① 卡斯特罗革命时创建，后改名古巴共产党。

科为数不多的几个美洲革命党人全部逮捕了，并迫使他们就范。司令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可是爱拈花弄草，他就是巴杜拉盖上校。”

过了一会儿，玛伊塔的表姐阿莉西娅也跳舞去了。这时，瘦青年一看就剩下他一个人和老人谈话，顿觉兴味索然，但环顾左右他发现了坐在背后的玛伊塔，举起杯子说：干杯，朋友。

“干杯。”玛伊塔碰了碰他的杯子。

“我叫巴列霍斯。”瘦青年说着把手伸过去。

“我叫玛伊塔。”

“讲话把舞伴也讲丢了。”巴列霍斯笑了笑，指着一个额前留刘海的姑娘说，她正在与阿莉西娅和索伊莉塔的一个名叫彼波特的远方表兄跳舞，当播放《天涯海角和你在一起》的舞曲时，小伙子几乎把脸贴到姑娘的面颊上。“如果他再抱紧她一点的话，阿尔茜会给他一巴掌的。”

从他那纤细的身材、稚气的脸庞、短短的头发来看，这个人只有十八九岁，玛伊塔想，不过也许不会这么年轻。他的举止，他的声音，他的持重，都说明他也许更大些。满口大而洁白的牙齿，使得他那张棕色的脸挺讨人喜欢。他身穿西服，颈系领带，今晚服饰这么庄重的人为数不多。此外，口袋里还装着一条手绢。他始终笑吟吟的，给人以直爽而热情的感觉。他取出一包印加牌香烟，递一支给玛伊塔，并给他点上。

“要是美洲革命党人一九三〇年那次革命成功的话，现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大声说，嘴巴和鼻孔同时往外冒烟，“就不会有这么多不公道不平等的事情。该杀头的就会被杀掉，而秘鲁也就会是另一副样子。你不要以为我是美洲革命

党人，不过应该实行‘属恺撒者就归恺撒’①的政策。尽管有人说军人和社会主义者水火不相容，可我是社会主义者的朋友。”

“军人！”玛伊塔感到惊奇。

“陆军少尉。”巴列霍斯点点头，“去年在乔里约军官学校授的衔。”

怪不得呢！现在玛伊塔才明白为什么巴列霍斯留了个寸头，为什么他那样好冲动，难道这就是指挥官的气质与风度？一个军人随意议论这类事情，真叫人难以置信。

“那是一个历史性的生日晚会。”阿莉苏埃尼奥太太肯定地说，“因为在那次舞会上，玛伊塔和巴列霍斯相识，而我的侄子彼波特也认识了阿尔茜。自从爱上她以后，他改掉了游手好闲调皮捣蛋的毛病，找了个工作，接着和阿尔茜结了婚。后来，他们也到委内瑞拉去了。不过，似乎现在与阿尔茜分居了。但愿只是传闻而已，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从这张边框发黄的相片看上去，玛伊塔有四十岁光景，或者更大些。相片是街上的流动摄影师给照的，光线不足，分不出是在哪个广场。他站立着，肩上搭着一条围巾，表情很不自然，仿佛太阳光太刺眼，要么就是过往的行人看得他不好意思。他右手拿着个包或是书夹子之类的东西。虽然图像模模糊糊，还是看得出他穿的很旧；像口袋一样肥大的裤子，歪歪斜斜的西装上衣，过大的衬衣领子，领结打得皱皱巴巴。在那些年月，革命者是打领带的。头发又长又乱，脸型跟我记忆中的也截然不同，比以前更胖些，眉头紧皱，表情严肃。

① 语出古罗马，意为原本是谁的就归谁。

照片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一个因负重压而疲惫不堪的人。如果不是因睡眠不足、奔波过度，或者某个更久远的原因而疲倦，那么就是因达到某种界限的生活而产生了疲倦。他虽然没有衰老，但是如果在这种生活后面只有破碎的幻想、挫折、误会、敌视、政治上的背信弃义、经济上的拮据、糟糕的食物、蹲监狱、坐班房、地下活动、毫无胜利希望的失败等等，那么也会未老先衰的。然而，从他疲惫而紧张的表情上，能看得出，他那内在的正直品格，虽屡受挫折而未曾改变。多年来，我对他总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青年时代的这种纯真，使得他不论在秘鲁本土，还是在世界任何角落，面对不公正都会变得疾恶如仇，这种正义感使得他认为改造世界是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这是一张了不起的照片！是的，它把那天晚上巴列霍斯认识的玛伊塔从上到下都记录了下来。

“是我让他照的，”堂娜·何塞法说着又把它放回相框里，“好留个纪念。您看见那些相片了吧？都是亲戚的，有的还是远亲，大部分人都已经死了。你们是好朋友吗？”

“我们有许多年不见了，”我对她说，“后来虽然也见过几次，但间隔时间很长。”

堂娜·何塞法看了我一眼，我知道她想的是什么。我本想说几句宽心的话安慰她，以消除她的疑虑，然而办不到。因为到目前为止，关于玛伊塔，我像她一样，所知甚少，不知该如何描写他。

“您写他的什么事呢？”她吞吞吐吐地说，用舌头舔了舔厚厚的嘴唇，“个人生活？”

“不，不写他的个人生活。”我回答，想找一种能够不至于使她更担忧的说法，“更确切地说，是写一部由他个人生活而得到启迪的书。不是写一本传记，而是写一部小说。一部

关于那个时代，关于他的生活环境，关于发生在那些年月里的事件的故事。”

“为什么写他呢？”阿莉苏埃尼奥太太鼓起勇气问，“有许多人比他更有名气。比方说，诗人哈比尔·埃拉乌，或者左派革命分子，布恩特、洛瓦东，人们议论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要写玛伊塔？人们早已把他遗忘啦。”

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一连串划时代的事件中，他是第一个人吗？因为他最荒唐无稽吗？因为他最富有悲剧性吗？因为他是那幕荒唐悲剧中的肇事者吗？还是仅仅因为他的为人、他的故事对我来说无比感人呢？也许丢开他政治道德的复杂因素，他的历史本身就是秘鲁不幸的写照吧？

“或者说，你不相信革命。”巴列霍斯假装生气，“或者你和某些人一样，相信秘鲁不论到何时世道都永不改变？”

玛伊塔对他笑了笑，摇摇头。

“秘鲁要变，革命会发生。”玛伊塔极其耐心地对巴列霍斯解释，“不过需要时间，并不像你认为的那么轻而易举。”

“实际上很容易。我这么说，因为我有根据。”巴列霍斯脸上的汗珠闪闪发亮，眼睛里尤如冒出火星，就像他讲的话那样，“如果你了解山区地形，如果你会使用毛瑟枪，如果印第安人起来造反，那就易如反掌。”

“要是印第安人起来造反，”玛伊塔叹了口气，“就像中彩，中个头彩那么容易。”

真的，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教母的生日过得这么有乐趣。起初他想：“他是一个挑动分子，告密分子。他知道我是谁，想抓我的把柄。”然而，和他聊了一会儿之后，便坚信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天使，不知道自己歇息在何

方，而且，他感觉到他不是在嘲弄别人。听他讲起革命真是趣味无穷，仿佛在谈论一场游戏，或者是评价一场盛大的体育比赛。他说得那么轻松，只要努一把力，开动一下脑筋，便会获得成功。他是那样自信和幼稚，尽管明知他在那里胡说八道，还是想听下去，哪怕一晚上也不腻烦。他把玛伊塔的倦意赶跑了，他已经在喝第三杯啤酒了。彼波特一直陪伴阿尔茜跳舞。此刻，跳的是马德里双人舞，由阿古斯廷作曲①，其他人伴唱。不过，似乎陆军少尉有点儿不是滋味。他搬过一把椅子，靠近玛伊塔，骑在椅子上对他说，只要有五十个全副武装的敢死分子，用卡塞莱斯②的骑兵游击战术便可点燃起安第斯山这座火药库。“他这么年轻，都可以当我的儿子。”玛伊塔想：“又这么英俊，想要多少姑娘就可以得到多少。”

“你，你做什么工作呢？”巴列霍斯说。

虽然玛伊塔准备回答他，但这个问题一向使他感到讨厌。他那半真半假的答话，这一次听起来比往常更透着虚假。

“从事新闻工作。”玛伊塔说，但心里想，如果少尉听到我这么说：“我干的是你不着边际地谈了半天的那件事，干革命。你认为怎么样？”那么他会是一副什么面孔呢？

“在哪家报社？”

“法新社，我作翻译。”

“这么说你会讲法语。”巴列霍斯做了个鬼脸，“在哪儿学的法语？”

① 墨西哥作曲家，生于1900年。

② 秘鲁将军，总统（1833—1932）。

“他自学的，就凭一本词典和一本法语书，书还是摸彩摸的呢。”堂娜·何塞法对我说，“您也许不相信我的话，可我亲眼看见。他关在他的房间里，几个小时都不出门，念呀念的。他对我说：‘我已经懂点了，教母。’后来真的懂了，我看他成天地读法语书。相信我的话吧，错不了。”

“当然，我相信。”我对她说，“他是自学的，我并不感到奇怪。他要是迷上一件什么事，就不遗余力地干。像他这样有毅力的人，我认识的还不多。”

“他当初要是当个律师或者某种专业人员，该多好啊！”堂娜·何塞法不无感慨地说，“您知道他头一次就考上了圣马科斯大学吧？而且名列榜首。那时，他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哩。要是继续学下去，到二十四五岁就能拿到文凭。多可惜呀，上帝！图个什么？就为搞政治，做这么大的牺牲。上帝不会宽恕他的。”

“他在大学里待了很短一段时间，是吧？”

“几个月以后，至多一年，就把他抓去了。”堂娜·何塞法说，“从此，灾难就开了头。他再也不到这个家来了，独自谋生去了。打那以后，倒霉的事接踵而至。‘你的养子在哪儿？’‘藏起来了。’‘玛伊塔上哪儿去了？’‘抓起来了。’后来把他放了吧？是的，不过，没过多久又到处找他。要是我对您说，每一次警察来这里是怎样把我的家翻个底儿朝天，怎样侮辱我，怎样威胁我，您也许不会相信。我对您说，他们来找过五十次，我五十次都说不知道。上帝给他一个脑袋不就是思考的吗？可他越来越糊涂。那也叫生活吗？”

“是的，是叫生活。”我轻声反驳她的看法，“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说这种生活很艰难，不过，紧张些罢了，但比别的事都有意思，太太。我不能想象玛伊塔怎么能在冷饮店里

养老，每天总是干那么一件事。”

“好吧，也许有道理。”堂娜·何塞法赞同说；不过是出于礼貌，并非真的被说服，“自小就看得出，他长大不会像别人那样循规蹈矩。谁见过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因为世界上有人挨饿就一整天不吃饭的？您知道我是不相信的。中午饭只喝碗汤，别的放着不动。晚饭只吃个面包。索伊莉塔、阿莉西娅和我常讥笑他：‘你肯定背地里吃饱喝足了，骗人呢！’可是，结果是真的，他什么也没吃，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长大成人就不能那样？”

“你看过《雏菊脱叶》这部电影吗？碧姬·芭铎①主演的。”巴列霍斯转了话题，“我是昨天看的。她的腿长极了，从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有机会我真想去巴黎，亲眼看看碧姬·芭铎。”

“别说个没完没了！来，我们跳个舞吧！”阿尔茜刚刚摆脱了彼波特，把巴列霍斯从椅子上拽了起来，“我总不能一晚上都和那个讨厌的家伙跳吧，他贴人贴得那么紧。来，来一个曼波②。”

“曼波！”少尉唱了起来，“曼波真过瘾！”

顷刻间，他们俩就像陀螺一样地旋转起来。随着曼波的节奏，他们唱着，手不停地摆动着，身子轻盈地旋转。这一来，大伙儿都来了劲，也跟着跳起来，先是转圈，接着又一前一后地扭摆，一会儿又交换舞步。霎时间，整个大厅就像阵阵旋风把人搞得晕头转向。玛伊塔站立起来，将椅子靠到

① 法国电影明星，曾主演《上帝创造女人》等。

② 一种古巴舞蹈，节奏较快。

墙根，以便给那些跳舞的人腾出更大的空间。莫非他也像巴列霍斯那样跳舞吗？从未有过。和他相比，甚至连彼波特也可以列为第一流的舞蹈家。玛伊塔情不自禁地笑了。他想起自己不会跳舞的尴尬处境，每当他被迫请阿德莱达跳舞时——哪怕是跳最容易的舞，他一下子就变成了不开化的格罗玛努①人。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体笨，而是因为跳舞时紧靠着一个女人，他感到害羞，难为情，心里不好受，因此，只要不强迫他跳，他是从来不跳的。而此刻，他的两个表姐阿莉西娅和索伊莉塔很可能再一次逼着他跳。列·达维多维奇会跳舞吧？肯定会跳。娜塔莉娅·塞多娃不是说过吗？除了革命以外，他是个最正常的人，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体贴入微的丈夫，爱养花，喜欢喂兔子。正常的人都喜欢跳舞，这是人之常情，他们的看法跟他不同，他认为跳舞近乎荒唐、轻浮，消磨时光，置要事于不顾。“你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记住我的话。”他清楚地记得阿德莱达这样说过。跳完曼波舞之后，大家一齐热烈鼓掌。为了流通空气，临街的窗子是打开的，透过一对对跳舞的人，玛伊塔发现窗沿上趴着许多看热闹的，男人们的目光简直要把舞会上的女人给吞下去。教母说有鸡汤，要大家帮她去端，阿尔茜跑进了厨房。巴列霍斯又坐到玛伊塔的身边，头上汗涔涔的，给玛伊塔递过一支烟。

“实际上，我既是这里的人又不是这里的人。”巴列霍斯调皮地挤了挤眼，“因为，我应该呆在哈乌哈。我住在那里，是那儿的典狱长，不应该擅离职守。不过，只要有机会，我就偷偷溜出来。你熟悉哈乌哈吗？”

“山区的其它地方，我都熟悉。”玛伊塔说，“哈乌哈嘛，

① 法国地名，因发现猿人化石而闻名。意为不开化的人。

不熟悉！”

“它是秘鲁第一个首都的所在地！”巴列霍斯作个鬼脸，“哈乌哈！哈乌哈！不了解它，你不觉得羞耻吗？凡是秘鲁人都该去看一看哈乌哈。”

继而，他又听到巴列霍斯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是关于印第安主义的；真正的秘鲁曾经在山区，而不在海边，在印第安人之中，在神鹰中间，在安第斯山的崇山峻岭中；而不是在这里，不是在利马。利马已经变成了一座懒散的、外国化的、甚至与秘鲁背道而驰的城市。因为自从西班牙人建城以来，人们就把眼光投向欧洲和美国，却把真正的秘鲁忘记了。这些事玛伊塔听说过，并在书本上多次读到过，可从少尉嘴里说出来，仿佛就不一样。新就新在他说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嘴里不时地喷烟吐雾，话语那么沁人肺腑。他讲话的方式自然而生动，因而谈论的内容听起来也就不那么枯燥无味。为什么这个小伙子的话偏偏勾起他心中业已熄灭的愁肠？“因为他纯洁，”玛伊塔想，“他没有惰性。政治并未冲淡他对生活的热爱，他似乎未曾从事过任何政治活动，因而他说起话来那样的不负责任，简直是信口开河。”少尉确实未加细想，他不是别有用心，事前未曾字斟句酌。他还是个青年，他对政治仅仅有些感性认识：愤愤不平，奋力抗争，唯心主义，想入非非，慷慨激昂，神秘主义。是的，这些都依然存在。看见了吧，玛伊塔，这些不都体现在这位青年军官的身上吗？（有谁唱过反调呢？）你听！他说的多么耸人听闻：世道不公平到何等地步！一个百万富翁的钱财比一百万个穷人的钱还多；富人的狗食比山区印第安人吃得还好；一定得改变这种不公平的世道；鼓动人民起来造反，占领庄园，攻打兵营，策动士兵起义，他们本来就是人民的一分子；发动

总罢工；从上到下彻底改造社会，建立公平的世道。真叫人羡慕他！他就在这儿，他年轻有为，细高挑的个儿，血气方刚，笑容可掬，善于辞令，仿佛长了翅膀，以为革命光靠诚实、勇敢、无私无畏就能干起来。他不懂得，也许永远也不会懂得，革命需要坚韧，要从无数平凡的工作入手，这是一件令人可怕的肮脏交易，困难重重，卑鄙无耻，恶行累累……不过，鸡汤来了，阿尔茜已经把鸡汤端到他手上了，他已经闻到了香味，垂涎欲滴了。

“过生日，又费事，又花钱！”堂娜·何塞法回忆道，“我曾欠过一笔债，拖了很长时间。每次都要打碎一些杯子、花瓶，弄坏一些椅子。清晨起来屋子里乱七八糟，就像遭到战争的洗劫，发生过一次地震一样。不过，每年我都心甘情愿地准备，因为这已经成了这个区里的习惯，许多亲戚朋友都在这一天聚会。我是为了他们才过生日的，为了不使他们失望。在我们苏尔基约区，我的生日就像过国庆节、圣诞节那样热闹。不过，现在一切都变了，现在过不起生日了。最后一年给我过完生日，阿莉西娅和她丈夫就到委内瑞拉去了。现在，每逢过生日，我就看一会儿电视，然后上床睡觉。”

她忧伤地朝空无一人的房间瞅了一眼，仿佛要对那些坐在椅子上、站在角落里、窗户前为她祝寿的人，对那些唱《生日快乐》歌，来品尝她美味佳肴的人说点什么。接着，她便叹了口气。现在，她倒像一位七十岁的老人了。

“您是不是知道有人，或者某个亲戚还保存着玛伊塔的笔记本以及他写的文章什么的？”听我这么一说，她的不信任感又萌发了。

“什么亲戚？”她叹了口气，做了个怪相，“玛伊塔唯一的

亲戚就是我，他连盒火柴也不往这里带，因为每次追捕他的时候，我这儿就首当其冲，是警察的必到之地。另外，我从未听说过他还是什么作家，他连边也沾不上。”

是的，他写过东西，有时候我在小报上，确切点儿说是在传单上读到过他的文章，他是小报的撰稿人之一。当然，他们自己写，自己编排，自己印发，而现在即使在国立图书馆，在任何一位收藏家手中也找不到半篇文章了；然而堂娜·何塞法如同全国大多数人一样，甚至包括那些专门的读者，当时并不知道存在着一份《工人之声报》，以及什么别的小报。从另一方面讲，堂娜·何塞法说他不是什么作家，连边也不沾，也不无道理。不过，虽然玛伊塔很悔恨，但他确实是个知识分子。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我们在圣马丁广场聊天时，一提到知识分子，他就流露出的那种冷漠的情绪。照他说，他们成不了大器！

“至少，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是这样。”他明白无误地说，“他们反复无常，没有坚定的信仰。他们的道德观，就值一张去‘世界青年代表大会’或者‘和平大会’之类的机票钱。因而，那些没有被美国佬奖学金收买的人，便被‘自由文化代表大会’收买了，或者被斯大林主义分子、被共产党分子收买了。”

玛伊塔发现巴列霍斯对他讲的这一番话，以及他讲话的语气感到惊奇，正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连就要放到嘴里的汤匙也停在半空中了。玛伊塔的话使他为之愕然，不免引起某种警觉。这样说很不好，玛伊塔，很不好。为什么每每谈论起知识分子你总是情绪反常，缺乏耐心？列·达维多维奇是不是知识分子？他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杰出的知识分子；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也是知识分子，然而，他们首先是革命家。你不该出于怨恨而信口开河地攻击知识分子，似乎在秘鲁，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反革命分子或斯大林主义分子，难道没有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吗？

“我只是想说，革命不能依靠他们。”玛伊塔企图纠正一下刚才的话，提高嗓门以便让对方听到，因为别人正在那里跳《黑姑娘托玛莎》舞，“不论怎么样，首先不能依靠他们。首先得依靠工人，其次是农民，知识分子在最后。”

“此刻正在古巴山区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七·二六运动党人不是知识分子吗？”巴列霍斯反驳道。

“也许是。”玛伊塔同意，“不过，那个革命不成熟。它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两码事，性质迥然不同。”

陆军少尉呆呆地看着他，他越发糊涂了。

“至少，请你想一想，这是两码事。”玛伊塔喝着鸡汤慢慢恢复了平静，咧嘴一笑，“至少，谈论革命你不觉得腻烦。”

“我不腻烦，且恰恰相反。”巴列霍斯说。玛伊塔对他笑了笑。

而他，玛伊塔，我的老同学却从不“耽于声色”。通过这一次短暂的采访，我对他的印象仍是模糊的。虽然久未谋面，但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还是他心甘情愿地节制饮食。他的服饰，他的表情，甚至于他坐在咖啡店里的姿势，看菜谱的样子，点菜的神态，接到别人递给他一支烟时的态度，都流露出一种禁欲主义者的神情。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都四十多岁了，至少已有二十年党龄。那是在他去给教母祝寿前的几个星期，在那次生日舞会上，他结识了巴列霍斯的时候。不管别人对

他的生活怎么挑剔，可就连那些与他势不两立的敌人，也无法指责他有什么以政治捞取好处的行为。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人生道路上，他每迈出一步都受坚定的信念支配。令人可悲的是，每前进一步都给他带来麻烦与不幸。“他这是慢性自杀。”有一次，一个普通的朋友对我说，“他并不是自杀，而是慢性自杀。有人就喜欢这样一点点地杀死自己。”这时我的脑海里立即迸出一个词——“耽于声色”。我敢断定那次他在谩骂知识分子时，我是听到的。

“你笑什么？”

“我笑那个词——‘耽于声色’。你从哪儿学来的？”

“也许是我刚才造出来的。”玛伊塔笑了，“当然，可能有更确切的词语，如‘意志衰退’、‘打退堂鼓’什么的。可是，你晓得我指的是什么吗？我指的是玩物丧志，一次旅行，一个奖学金，任何一件能满足人的虚荣心的事。帝国主义设这类圈套可是老手，反动派同样如此。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不会轻易上当，而知识分子，只要把奶头放在他们嘴里，他们就咂。尔后，他们会创造出稀奇古怪的理论替自己辩解。”

我对他说，他似乎是在引述阿·科埃斯特莱①的话，他曾经说过，“那些愚蠢至极的家伙，面对着淋巴腺鼠疫流行竟能宣布保持中立，因为他们掌握一种妖术，能够左右他们认为一切必要的事物，或者一切事物都能被他们左右。”我等待他的回答，因为我引证的正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科埃斯特莱说的话。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他毅然说：

① 匈牙利作家，生于1905年，后入英籍，著有《西班牙语遗嘱》、《零和无限》等。

“科埃斯特莱？噢，对了。他对斯大林恐怖主义的心理描述，谁也比不上。”

“当心，可别踏上投奔自由世界的路，那是去华盛顿的。”我用激将法激他。

“你弄错了。”他说，“这条路通向不断的革命，通向列·达维多维奇，朋友们称他托洛茨基。”

“谁是托洛茨基？”巴列霍斯问。

“一个革命者，”玛伊塔对他解释道，“已经去世了，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秘鲁人吗？”陆军少尉胆怯地问。

“俄国人。”玛伊塔对他说，“死在墨西哥。”

“别谈政治了，否则我把你们轰出去。”索伊莉塔说，“来，表弟，你连一个曲子都还没有跳哩。来，来，跳一个华尔兹。”

“跳一个，跳一个！”阿尔茜要大家跟着她一起喊，她跟彼波特还是手挽着手。

“我和谁跳？”巴列霍斯说，“我的舞伴没了。”

“和我跳。”阿莉西娅说着把他拉了起来。

玛伊塔被索伊莉塔请了出来，他在大厅中间，一心想跟上舞曲《卢茜·斯密斯》的节奏。索伊莉塔唱着动人的歌词。他也想唱，也想笑，可当时他仿佛觉得大腿的肌肉抽了筋。陆军少尉正在看他跳，他很不好意思，自己跳得也太差了。我想，直到现在，这个客厅也不会有多大变化，家具旧了点，想必还是那天晚上的。不难想象，那天晚上客厅里人山人海，烟雾缭绕，满屋子的啤酒味。人们脸上挂满汗珠，音乐放到了最大音量。不难发现，玛伊塔和巴列霍斯坐在角落里，紧挨着一盆蜡制的玫瑰花，正在那里起劲地谈论着一个对玛伊塔

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革命。他们一直谈到次日凌晨。外部世界——面孔、表情、衣着、家具件件俱在，一目了然。相反，玛伊塔和那个年轻的陆军少尉在几个小时之中，内心所发生的变化却不易发现。难道从第一分钟起，他们两人就彼此产生了好感？变得亲密无间、无话不说了吗？有的友谊，尽管是一面之交，可比爱情还要深。也许，他们俩一开始便接触到政治，这个为之共同奋斗的事业把他们俩连结在一起？不论怎么说，就是在这里他们俩相识的，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便由此开始了，而那些来这里祝寿跳舞的人，对此毫无察觉。

“如果您写书的话可千万别提我。”堂娜·何塞法恳求我，“至少，给我改个名字，尤其是要改一下我家的地址。也许到出书时，已经过了许多年，可是在这样的国家，什么事都得提防点。下次再见。”

“我也希望以后能再次见到你。”巴列霍斯说，“咱们还要继续谈下去。我应该感谢你，因为说实在的，我跟你学了不少东西。”

“以后再见，太太。”我握了握她的手，感谢她那么耐心地接待我的采访。

我走向巴兰科区，不知不觉就穿过观花埠区。祝寿跳舞的情景已在我脑海里消失，而我又记起玛伊塔为体验穷人受苦而绝食的事，那时，他还只有十四五岁哩。从我和他姨妈——教母的谈话中，我知道玛伊塔中午只喝一碗汤，晚上只吃一个面包，一直持续了三个月。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它

把其它的事都冲淡了。

“再见。”玛伊塔点点头，“当然，当然，我们以后继续谈。”

第　二　章

“发展行动中心”的办公室位于观花埠区帕尔多大街的一栋楼房里。这个区的老式楼房所剩无几，差不多均被摩天大楼所取代。原来带花园的砖木结构房屋，掩映在一株株巨大的榕树冠下，微风轻拂，树叶沙沙作响，麻雀嬉戏其间。往昔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这种高大树木，而今也为数不多了。莫伊塞斯（门口的女秘书提醒我应该称呼莫伊塞斯·帕尔维·莱伊巴博士）很注意室内的陈设，他把屋子里全摆上了殖民地时期的家具，这和房屋的格调很一致。房子属于四十年代的建筑，是模仿新总督时期的房屋而建的，阳台带百叶窗式棱条，塞尔维亚式的院落，摩尔式的门拱，镶花砖的喷泉。这座楼房的设计颇为别致，里面光线充足，可以看到屋里的人在忙忙碌碌，每个房间都面对着浇灌得当、修剪得体的花园。两个荷枪的治安警察在门廊外走来走去。我进去时，他们搜查我是否携带了武器。利用等待莫伊塞斯的间隙，我看了看“发展行动中心”摆在玻璃橱窗里的最新出版物（橱窗里装着日光灯）。既有经济研究方面的，也有统计学、政治历史和社会学方面的。书的装璜很考究，封面上全都印着一个史前海

鸟作为标志。莫伊塞斯是“发展行动中心”的顶梁柱。正是由于他的协调才干，加之他为人和蔼可亲，并且有非凡的工作能力，使得“发展行动中心”成为我国文化机构中最活跃的一个。他除了有恒心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持乐观主义态度之外，最出众的莫过于他的协调才干了。这种才干的理论基础是违反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它调和对立面的矛盾。他的这种做法，就像那个让狗、耗子和猫在同一个盘子里吃食，而后来被推崇为神的利马人圣马丁·德波雷斯一样。多亏莫伊塞斯折衷主义的天才，“发展行动中心”得到各方面提供的资助、奖学金和贷款，既有来自资本主义的，也有来自共产主义的；既有最保守政府和慈善机关提供的，也有最革命的政府和团体提供的；既有华盛顿的奖赏，也有莫斯科的支援；既有波恩的赏赐，也有哈瓦那的赞助；既有巴黎的拨款，也有北京的贷金。他们都把它看成各自的组织。自然，他们打错算盘了。“发展行动中心”仅仅属于莫伊塞斯私人所有。他不属于任何人，要是他百年之后寿终正寝，“发展行动中心”肯定也将与他一起消失，因为在这个国家还找不出任何一个人能够接替他。

莫伊塞斯在玛伊塔的那个年代是个地下革命家，而现在则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他聪明过人，不仅仍保持着左派的形象，而且使自己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发展行动中心”日益繁荣，他的名气也与日俱增。例如，他不仅和最顽固的政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且他和近二十年来本国的历届政府都能和睦相处，对谁他也没有投降。他特别精明，知道该按什么比例配制一副药。作为领导，他知道该与对方保持多大距离，讲话讲到什么分寸。他懂得，他骂得越起劲，对方的资助就越多。假如在一个鸡尾酒会上，我听到他大骂跨国

公司掠夺我们的资源或是大骂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腐蚀我们第三世界的文化，我就知道今年美国对“发展行动中心”的资助远比他的对立面大；如果在一个展览会上或是在一次音乐会上，他突然对苏军入侵阿富汗表示愤慨或者对波兰当局镇压工会表示痛心，那么我就知道这一次他从东方国家①得到了某些援助。凭这些装模作样的攻击和诡辩，他向人们证明，他领导的这个组织始终保持思想上的独立性。凡是能够读点书的秘鲁政界人物，并不都认为他是他们的智囊顾问，却肯定“发展行动中心”是直接为他们工作的，从模糊概念上讲，不是没有道理。莫伊塞斯能够使所有的人都觉得，与他领导的这个组织保持友好关系对大家都有裨益。看来这也符合事实。因为这样一来，右派就认为他们是改良派；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他们几乎成了社会主义分子；左派也觉得自己体面些，给他们涂上了一层知识分子的油彩，似乎也不那么左了；军人居然下降为平民百姓；神父摇身一变，成了凡夫俗子；而资产阶级则发觉自己变成了无产阶级，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了。

他取得的成就引起某些人的强烈妒忌，很多人把他骂得一无是处，甚至当他绛紫色的卡迪拉克牌小汽车行驶在大街上被那些人见到时，他们也不放过机会，要嘲弄一番。当然，骂得最起劲的是进步分子，然而事实上，正是“发展行动中心”或者说多亏了他，他们才有饭吃，有衣穿，才能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出席会议、获取奖学金、组织会议、作学术报告，使得他们这些进步分子的档案袋里的材料逐日增多。他们知道，说他什么他从不介意，或者虽然记挂在心，却善于

① 即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掩饰。他在人生道路上之所以能取得成就，得以保持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关键就在于他始终遵循自己一成不变的哲学观。莫伊塞斯也许有敌人，然而，除了那些吓人的空洞字眼，如帝国主义、大庄园主义、军国主义、寡头政治、美国中央情报局，等等，他不跟任何有血有肉的人敌对。他的敌人如同他的朋友（除了敌人以外所有剩下的人）一样，都利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退回三十年，那位难以相处的雅各宾分子①玛伊塔，肯定会说莫伊塞斯是个典型"耽于声色"的革命知识分子。这种论断也许正确。然而，玛伊塔会承认下列事实吗？生活在这样一个该死的国家里，莫伊塞斯不得不作出各种让步，虽然有时只是官样文章而已。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数千名知识分子才改掉了游手好闲的恶习，开始正常的生活、工作，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仅仅关在大学生的小天地里悲观失望，乃至勾心斗角。同样，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另外还有数十名知识分子才能到外国继续学习某个专业，并始终和世界其它地方的同行们保持密切联系。就算是像玛伊塔说的"耽于声色"吧，莫伊塞斯一个人做的一些事，却是教育部、文化学院，或者秘鲁某所大学应该做而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去做的。玛伊塔承认这些事实吗？不，他决不会承认。因为，他认为这些事分散了完成主要任务的精力，眼睛应该盯着的并应该身体力行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革命斗争。

"干杯。"莫伊塞斯把手伸给我。

"干杯。"玛伊塔回答。

①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派，即激进分子。

今天有点特殊，玛伊塔是第二个到达的，每次中央委员会开会时，总是他打开索里托斯库房的门。这个地方同时也是托派革命工人党的办公地。中央委员会的七个成员，每人都有一把钥匙，有时某个委员无处睡觉或者要做什么事，就在这里歇脚。委员会的两名大学生阿纳托里奥同志和梅达尔多同志有时就在这里复习功课，准备考试。

“今天我来得比你早。”梅达尔多感到惊奇，“奇迹。”

“昨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生日舞会，睡得太晚。”

“你？你去参加生日舞会？”梅达尔多笑了笑说：“又是一个奇迹。”

“有点意思。”玛伊塔解释，“不过，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事，现在我就向委员会报告，就现在。”

从库房外面看，根本就看不出这里是在开什么样的会，不过室内墙上挂的一幅招贴画能说明点问题，上面有几个大胡子人头像：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这张招贴画，是哈辛托同志到蒙得维的亚参加一次托派组织会议带回来的。靠墙堆着一堆堆没有卖完的《工人之声报》，还有传单、宣言、支持罢工的声明、揭露文章等。里面有一对扯去布套的椅子、几把三条腿的凳子，仿佛是挤奶娘或是巫师用过的。另外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床垫子堆在一起。上面盖着一条毯子，必要时当座位使用。一个砖架子上支着一块木板，上面横七竖八地堆放着一些书，书上落满了石灰粉沫，墙角里放着一辆没有轮子的三轮车架子。托派革命工人党的党部也实在太小，仅仅来了三分之一的委员就显得拥挤不堪了。

“玛伊塔？”莫伊塞斯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摇椅背上，不信任地打量着我。

“是玛伊塔。”我对他说，“你还记得他，是吧？”他恢复了常态，并且笑了。

“当然，我怎么会记不得他呢？不过，我感到奇怪，在秘鲁谁还记得玛伊塔！”

“不多。因此，我想找那些少数记得他的人，了解了解他的情况。”

我知道他会帮助我的，因为莫伊塞斯具有助人为乐的美德，他一向愿意对所有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不过，我发觉要能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冲破心理障碍，并且要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玛伊塔曾经和他十分接近，而且肯定两人是朋友。他的办公室到处都是装订好的书籍，墙上挂着一张古代秘鲁地图，还有一个放满了古代陶器的橱窗。在这样的场合回忆玛伊塔同志，他不感到难堪吗？他会如实说出他和玛伊塔共同经历的那一段往事，以及他们的幻想吗？也许可能吧。就说我吧，尽管从来未成为玛伊塔政治上的朋友，可是一回忆起他，我就感到某种不安，至于这位“发展行动中心”极为重要的主任……

“他是个好人，”他谨慎地说，同时看着我，仿佛要在我的灵魂深处挖掘出我对玛伊塔的个人看法，“理想主义者，心地善良、天真，上过当，受过骗。我，至少在哈乌哈那件不幸事情上问心无愧。我提醒过他，不要去干那种愚蠢的事，要他三思而后行。当然白费唇舌，他是一头犟骡子。”

“我正在调查他是怎样开始政治生涯的。”我对他解释，“可我所知甚少，就知道青年时代，中学的最后一年或者在圣马科斯大学那一年，他成了阿普拉党人，而后来……”

“后来他哪个党没入过？事实明摆着嘛，”莫伊塞斯说，“阿普拉党、共产党、分裂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所有的派

别帮伙。再没有别的党派了，那是因为当时就这么多。要是现在他可以入更多的党派。现在我们‘中心’正在制作一张全秘鲁所有政党、小组、联盟、左派帮伙和阵线的图表。你猜猜有多少个？三十多个。”

他轻轻敲了敲写字台，尔后若有所思。

“不过，有一件事必须承认。”他忽而变得严肃起来，补充道，“尽管他变来变去，可从未成为机会主义分子。也许他不够稳重，冒冒失失，信口开河，然而，他是世界上最无私的人。我再给你说一点，在他身上有一种自毁的倾向，一种叛逆、造反的性格。刚刚加入一个组织，就唱反调，最终搞起分裂活动。爱闹分裂这个毛病，比他身上的任何东西都根深蒂固。可怜的玛伊塔同志！多么可悲的下场！对吧？”

“现在开会。”哈辛托同志说，他是托派革命工人党的总书记，也是五位在座者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有两个委员缺席：帕雅尔迪同志和卡洛斯同志。等了半个小时他们还不到，就决定开会。声音沙哑的哈辛托同志，首先对三周前举行的上届会议以来的工作做了总结发言。为谨慎起见，他们并没有带会议记录本，不过总书记一边讲，一边翻阅一个满是皱褶的本子，上面记录了每次辩论的主要问题。哈辛托同志有多大岁数？六十，也许多点。他是黑白混血儿，身体壮实，腰板笔直，头发耷拉到前额上，看起来像个运动员，显得很年轻。他是组织内资格最老的一个，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十年代初期。他参加过在诗人门德斯·多里奇家中举行的许多会议，那时，由巴黎回国的几个超现实主义者，如威斯特哈伦、阿布利尔·德贝埃罗以及莫罗等，把托洛茨基思想带到了秘鲁。哈辛托同志是秘鲁第一个托派组织——马克思工人

小组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小组建于一九四六年），又是革命工人党的元老。同时他还是化肥有限公司的工会领导成员，二十年前，他在那个公司做工，那时他的工会是少数派，阿普拉党与红萝卜党跟他们唱对台戏。为什么他没有站到别的组织那边去，而站到托派革命工人党这边来呢？玛伊塔对他的这种做法非常高兴，然而却对他不大热情。因为所有的托派元老以及哈辛托同志的同代人，都站到了革命工人党方面。为什么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到托派革命工人党方面？是不想离开青年人吗？说不定就为这个，然而，玛伊塔不敢肯定，现在国际上开展的这场“巴布洛派”和“反巴布洛派”之间的论战哈辛塔同志是否感兴趣。

“《工人之声报》的问题，”总书记说，“是最紧迫的。

“左派幼稚病，人为地制造矛盾，我也不知该怎么说好。”莫伊塞斯说，“极左病，最革命，最左，最激进……玛伊塔一生就是持这种态度。我们俩同在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青年团待过一段时间，那时我们初出茅庐，阿普拉党尚处在秘密阶段，玛努尔·塞奥阿内曾给我们作过几次关于阿雅·德拉托雷①论时间、空间、历史问题的报告，以及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批判和解释。听后，玛伊塔说，我们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以便学会如何批判和解释它。他组织了一个小组，几个月后，美洲革命人民联盟青年团把我们小组解散了。这样，我们也不知怎样就和红萝卜党人合作起来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也就成为红萝卜党人了。算是我们的洗礼吧。”

他笑了，我也笑了，然而，我们笑的不是一回事。他笑

① 秘鲁政治家、作家，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党创始人，生于1895年。

的是他和玛伊塔早年政治上的那些有趣的往事，借以说服我，要我相信他们那些事无足轻重，就像幼儿身上出麻疹，过后就万事大吉，风卷而去了。我笑的是刚才在他办公室里又发现了两张相片。两张相片相对而视，非常对称，每张相片都有一个银框：一张照片上莫伊塞斯正跟罗伯特·肯尼迪议员握手，是后者为推动实施“进步联盟”计划来秘鲁访问时照的；另一张是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拉丁美洲代表团时照的，莫伊塞斯正好挨着毛泽东。在这两张相片里，他都是笑吟吟的。

“请负责人报告吧！”哈辛托同志补充道。

《工人之声报》的负责人是玛伊塔。他摇了摇头，想把陆军少尉巴列霍斯的形象驱走，还有那纠缠不休的睡意。夜里他仅仅睡了三个小时，从早晨醒来直到现在，少尉的形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他取出一张小卡片，瞥了一眼发言提纲。

“同志们，是这样的，《工人之声报》是最紧迫的一个问题，今天务必解决。”他说着困得打了个哈欠，“实际上是两个问题，我们应该分开讨论。第一个是关于报纸的名称问题，这是由分裂主义分子造成的。第二个是老问题，经济问题。”

这事，与会者都清楚，只不过他更详尽地提出来罢了。经验告诉他，问题阐明得越详细，辩论就越节省时间。第一个问题：党的机关报是否继续称为《工人之声报》，但后面括弧里得加个“托”字，表示托派。这是分裂主义分子造成的，他们已经出了一份报纸，也冠之以《工人之声报》，从而给工人阶级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他们代表革命工人党，而托派革命工人党是分裂主义。当然，这是一种卑鄙的伎俩。不过，我们要正视现实。有两个革命工人党已经够使人糊涂了，再出两种《工人之声报》，他们就更糊涂了，尽管一个带个“托”字，即托洛茨基派。另外，这一期的内容已经排定，就在科

恰卡斯印刷厂里。因此，现在必须作出决定：是用《工人之声报（托）》，还是另改名字？他停了停，点上一支烟，等候哈辛托、梅达尔多、阿那托里奥、霍阿金等同志表态，而他们都一言不发。他吐了一口烟，又继续说：

“另外一个问题：这一期的印刷费还差五百索尔。车间主任对我说，从下一期起，印刷费增加百分之二十，因纸价涨了百分之二十。”

印一千份两个版面的报纸，科恰卡斯印刷厂收他们两千索尔，他们卖一份收三个索尔。假如这一期全卖掉的话，可赚一千索尔。实际上，报亭和报童每给他们卖一份还得抽取百分之五十。（因为报上不登广告。）这样算下来，每卖一份他们还得赔五十生太伏。他们只有自己去工厂、大学、工会亲自兜售，才能赚点钱，然而，除了极个别情况，一千份报纸从未有销售完过的时候。况且，大部分不是卖掉的，而是送掉的，只要看看这间举行会议的屋子里堆放的那些发黄的报纸，就一目了然了。真叫人失望啊！革命工人党托派中央委员会的这次会议，是在索里托斯街的一个库房里开的。《工人之声报》一向赔钱，现在又分裂了，情况更糟。

玛伊塔微微一笑，鼓起勇气说：

“同志们，天并没有塌下来，别这样哭丧着脸。我们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他坐牢的时候，共产党把他开除了。”莫伊塞斯想起来，“不过，也许我记得不准确。他们这些党派一会儿分裂，一会儿又合并，我也搞不清。”

“他在共产党内待了很久吗？”我问，“你们俩都在共产党内待过？”

“我们俩都待过，可又都没待过，这要看怎么说了。我们从未登过记，也没有党证。不过，那时候谁也没有党证。共产党那时不合法，而且人数很少。与其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倒不如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同情分子。在监狱里，玛伊塔开始对别的理论感兴趣，他总是处在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我们就读托洛茨基的书，是他拉着我读的。后来转移到弗隆东监狱时，他已能给囚犯们讲双重政权问题，讲不断革命，讲斯大林教条主义了。有一天忽然得到消息说，红萝卜党把他开除了，指责他是极左分子、分裂主义分子、挑衅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等。不久以后，我就出了狱，流落到阿根廷。当我从阿根廷回来时，玛伊塔已经加入了革命工人党。你不饿吗？那咱们就去吃午饭吧。”

这是夏天一个阳光灼热的中午，白色的阳光直射而下，房屋树木仿佛罩上一层金光，行人熙熙攘攘，兴高采烈。我们坐上他那绛紫色的卡迪拉克牌小汽车，来到观花埠区大街。街上到处是巡逻警察及军队的吉普车，车上的士兵头戴钢盔。在迪亚戈纳尔大街的入口处，有一挺海军陆战队的机关枪架在沙袋上。我们从它对面走过时，那位坐镇哨位的军官正在对着步话机讲话。莫伊塞斯说，这样的天气最好到海边去吃饭。到“绿色海岸饭店”还是马蹄掌海湾的“瑞士饭店”？“绿色海岸饭店”近点，有警卫，不会发生抢劫事件。路上，我们谈起奥德里亚①将军独裁统治后期时的革命工人党，谈起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释放政治犯以及流亡分子返回祖国的事。

① 秘鲁将军、政治家，生于1896年，1948—1950年为军政府首脑，1950—1956年被选为秘鲁总统。

“就你和我，咱们俩之间，我可以对你说，革命工人党的事是一个玩笑。”莫伊塞斯说，“当然，对那些献身于它并且以失败而告终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严肃的玩笑。对于那些被杀害的人来说，这是个悲剧性的笑话。对那些绞尽脑汁印发宣传品，并进行毫无意义的辩论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恶意的笑话。当然，不论怎么说，也是一个无根无据的笑话。”

正像我们预料的那样，“绿色海岸饭店”人多极了。一进门，饭店的安全人员就搜查我们，莫伊塞斯把手枪交给警卫人员，领了一个黄牌子。利用等座位的时间，我们在靠近防波堰处找了个麦秸遮篷坐下等着。我们一边喝冰镇啤酒，一边观赏海景：海浪一个接一个地撞到防波堰上，激起朵朵水花，不时飞溅到我们的脸上。

“玛伊塔在革命工人党时，那个党有多少人？”我问。

莫伊塞斯心不在焉，喝了一大口啤酒，酒沫沾满了嘴唇。他用餐巾擦了擦，摇了摇脑袋，狡黠地笑了笑：

“从来没有超过二十名，”他闪烁其词，声音很低，我只有把头凑近他才能听见。“最多也就是这个数目。我们曾经在一个中国餐馆开庆祝会，那时就是二十个。不久，就分裂成巴布洛派和反巴布洛派。你还记得米切尔·巴布洛同志吧？记得革命工人党和托派革命工人党吧？我们是巴布洛派还是反巴布洛派？我发誓，已经记不得了。正是玛伊塔教我们大家怎样区分这么微妙的理论问题。噢，我想起来了，我们是巴布洛派，他们是反巴布洛派。我们是七个人，他们是十三个人。他们用工人革命党这个名称，而我们被迫在工人革命党后面加了个‘托’字。分裂之后，两个组织没有一个发展壮大的，这一点，我敢肯定。就这样直到哈乌哈事件。打那以后，这两个党都销声匿迹了，又开始了一段新的历史。对我

来说，那是件好事，我不得不流亡到巴黎，在那里我攻读博士学位，写出了论文，并且做了一些正经的事情。”

“立场很明确，讨论可以结束了。”阿纳托里奥说。

“你说的对。”总书记大声说，“现在举手表决。谁同意？”

玛伊塔的提案——把《工人之声报（托）》改为《无产阶级之声报》，以三票对两票被否决了。哈辛托同志的那一票起了决定作用。玛伊塔和霍阿金的理由是：同时存在两份互相攻击而又名称一样的报纸，容易把工人阶级搞糊涂；而梅达尔多和阿纳托里奥反驳他们说，这样一改，分裂主义分子倒认为自己有理了，就等于说是他们革命工人党，而不是革命工人党（托）维护党的路线。把组织的名称让给他们还不算，再把报纸的名字让给他们，这不等于鼓励变节分子吗？梅达尔多和阿纳托里奥又说：名称相似这只是个过渡性问题。当文章的内容、社论、报导、理论的连续性逐渐深入工人阶级人心时，他们就会分清，哪家报纸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官僚的；哪家是假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得非常激烈，持续的时间很长，玛伊塔又想起那个单纯而又有理想主义思想的青年，头天晚上跟他的谈话多有意思呀！他转念又想，“我的提案未通过，是因为我的脑袋昏昏沉沉，太困了。算了，没有关系。如果保留原名分发《工人之声报（托）》遇到障碍，在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会议上还可以再提出来，修改原决议。”

“你肯定玛伊塔认识巴列霍斯的时候，只有七个中央委员吗？”

“你也记得巴列霍斯？”莫伊塞斯笑了。他看了看菜谱，点了柠檬泡生虾肉和蛤蜊肉炒米饭。我让他替我点菜，对他来说，像他这样一个感觉敏锐的经济学家比我会点菜。“是七个。

我记不起每个人的名字了，但化名还记得。哈辛托同志，阿纳托里奥同志，霍阿金同志……我那时化名梅达尔多同志。你注意了没有？自从实行定量配给以后，‘绿色海岸饭店’的菜单也简化了。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利马城的所有饭馆都得关门。”

我们被安排到最里面的一张桌子上，从那儿几乎看不到大海，顾客们的头挡住了视线。他们中间有旅行家，一对对夫妻或恋人，还有一个商号的职员在给什么人庆寿。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个重要的政界人物或企业家，因为就在我们身边的一张桌子上，我看到坐着四个身穿便衣的保镖，冲锋枪就横在他们的腿上。他们默不作声地喝着啤酒，并不时地东张西望。谈话声、笑声、刀叉声淹没了来回翻滚的海浪声。

“算上巴列霍斯，可以说八个人。”我对他说，“你记错了。”

“巴列霍斯从来也不在党内。”莫伊塞斯立即反驳我，“一个党只有七个党员，听起来真像笑话，是吧？他从来没有在党内。更确切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报纸上。”

他讲话的语气十分肯定，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呢？无论怎么说，使我更加吃惊的是托派革命工人党，只有那么几个党员，我早就预料它是个小党，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小得不能再小了。我原来胸有成竹地猜想：玛伊塔把巴列霍斯带到了索里托斯街的库房，介绍给他的同志们，他们任命巴列霍斯为军委书记……现在看来，这纯粹是我的主观臆断。

“我对你说七个，是指七个专职的。”停了一会儿，他进而说，“此外还有同情者、大学生和工人，我们把他们组成学习小组。我们在某些工人中还是有影响的，例如化肥有限公

司工会，还有土木建筑工会。”

柠檬泡生虾肉给我们端上来了，虾肉湿乎乎的，看起来很新鲜。菜散发着辣味，香气扑鼻。我们边喝边吃，一吃完我又提起那个老问题：

“你肯定没有见到巴列霍斯吗？”

“唯一见得到他的是玛伊塔。至少，好长一段时间是这样。后来，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就是行动小组，我记得有阿纳托里奥、玛伊塔和哈辛托。他们确实见过他，但只见过几次。其他人从来未见过他。他是个军人，你不知道？而我们是什么人？搞地下革命的。他呢？别忘了，他是陆军少尉，陆军少尉啊！”

“一个陆军少尉？”阿纳托里奥同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陆军少尉？”

“他是被派来打进我们内部的。”霍阿金同志斩钉截铁地说，“这太明显了！”

“当然，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玛伊塔点点头，“同志们，让我们考虑考虑。他们竟这么傻吗？派一个陆军少尉打进我们队伍中，而这个少尉竟在一次生日舞会上大谈起社会主义革命来，有这样的事吗？我套他点话，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没了。他心地善良，天真无邪，容易激动。他虽然也谈论革命，可他自己并不懂得革命是怎么回事。他的思想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对他说来，革命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兵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放几枪。他闻出点味道，可不知从哪儿下口吃。这就是我和他试谈后得出的结论。”

玛伊塔坐在那里，显得有点不耐烦，会议开了三个小时，烟抽个精光，可烟瘾又上来了。为什么他排除少尉是情报部

门派来搜集工人革命党（托）情报的一个军官呢？如果是呢？如果他们就是利用这样愚蠢之极的手段，又有什么奇怪呢？秘鲁的警察、军人、资产阶级不是很愚蠢的吗？然而，那个性格开朗、风华正茂、善于言谈的青年形象再一次打消了他的疑虑。他听到哈辛托同志对他解释：

“就算他是被派来打入到我们组织内部的，至少，我们处在有利的地位上，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应该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不过，同志们，假如我们有机会打入到他们内部而忽视了这个机会，那么这也不是革命家的做法。”

于是，他们内部突然又出现一个新议题，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军队内部是不是存在革命的潜在力量？打入到海、陆、空三军内部的工作该不该作为他们的一个奋斗目标？应不应该在士兵内部、海军战士内部、飞行员内部建立支部？有没有必要用理论武装这些和无产阶级与农民有共同利益的战士？把阶级斗争的纲领扩大到军界是不现实的，因为官兵之间的社会地位不同，教养不同，尤其是军人的气质使得官兵之间的关系牢不可破，想一想行得通吗？玛伊塔后悔不该把陆军少尉的事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就因为这个，会议还要持续几个小时，他真想把有点浮肿的双脚泡到冷水盆里。今天凌晨参加完苏尔基约区的生日舞会，他泡过一次。他高兴地拥抱了姨妈——教母。他泡着泡着竟然睡着了，梦见天亮时自己和巴列霍斯在一个海滩比赛跑步，那海滩有点像闻名遐迩的“甜水海滩”。他逐渐落后了，落得很远，小伙子便回过头来笑着给他鼓劲：“加油！加油！是不是你老了，跑不动了？”

“会议开了几个小时，我们俩没说什么话。”莫伊塞斯一边说，一边吃蛤蜊肉炒饭，“比方说，玛伊塔应该继续与巴列

霍斯见面，还是趁早断绝往来，以防不测？并不像我说的那么简单，会议又过细地分析了环境、原因、效果，分析了十月革命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官僚帝国主义力量的关系，分析了五大洲阶级斗争的发展，受新殖民主义奴役的国家贫困化，垄断资本的集中……”

开始讲话时他满脸堆笑，渐渐地，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他一口接着一口，吃得津津有味，不断夸奖“绿色海岸饭店”厨师的手艺。“如果就这样发展下去，这么好的菜我们还能吃多久？”忽然，他没有胃口了。为了我，他才讲这些叫他大为扫兴的事，他还能重新振作起来吗？

“玛伊塔和巴列霍斯帮了我的大忙。”这是他今天上午第三次讲话这样吞吞吐吐，“要不是由于他们，我仍旧在某一个小组里，在街上卖双周刊小报哩。要卖五十份得费多大劲啊！明知工人们不看，看了也不懂。”

他擦了擦嘴，打了个手势，叫招待把盘子端走。

“说到巴列霍斯的事，我自己也不相信我们干的事。”他难过地说，“我清楚地知道，除了再坐大狱，再流落异国他乡，政治失败，个人倒霉，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的。然而……惰性，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我也没有更好的词儿。怕人家骂自己是叛徒，怕突然把这些年来经过斗争，甚至牺牲辛辛苦苦得来的这一切一笔勾销。神父们被开除教籍时，想必就有这种感觉。”

他看了我一眼，仿佛这时才发现我和他在一起。

“有时候玛伊塔情绪很低落吗？”我问他。

“我不知道，说不定没有，他是硬汉子。”他沉思片刻，耸耸肩膀，“也许有，不过不当着别人的面表现出来罢了。我想，假如我们掉进一口井里，又没有梯子能爬上来，谁都会产生

悲观失望的念头。不过，往往直到死也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噢，玛伊塔和巴列霍斯帮了我一个大忙。”

“这话你重复了好几次，好像你自己也不相信。或者，你认为他对你并没有多大用处。”

“他对我并没有多大用处。”他肯定地说，但带着厌烦的神情。

我笑了，用讥讽的口吻说：“秘鲁的知识分子有独立性格的人并不多，而他便是其中之一。另外，他做事脚踏实地，甚至帮助同行做些事情。”他听后冷冷一笑，使我很尴尬。他的意思是：与其说他个人脚踏实地，不如说“发展行动中心”很有作为。毫无疑问，“中心”为秘鲁做出的贡献比他二十年来在党内做的成绩重大得多。“中心”还帮助别人出版书籍，使他们获得奖学金，把某些女生从大学妓院中解放出来。不过，对他本人来说，“中心”使他丧失信心。自然，革命工人党（托）也叫他大失所望。他朝我看了一眼，仿佛在考虑是否有必要向我倾诉衷肠。他曾想成为一个学者，搞调查研究，然后著书立说。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现在看来永远也实现不了。他曾想写一本《秘鲁经济史》，从印加文化以前直写到现代，既有通论，又有详尽的史料。还有其它一些学术研究方面的计划全落空了！为使“中心”顺利地开展工作，他本人既是管理员，又是外交家、广告员，几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没有空闲时间；要是一天有二十八小时，或者三十小时，他照样忙不完。

“你不觉得可笑吗？一个曾经是托洛茨基分子的人，在青年时代激烈攻击官僚制度，而自己竟也变成一个官僚。”他强作笑颜地说。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霍阿金反对说，“没有那么好的事，你们还没有发觉吗？”

事实上，玛伊塔想，是没有那么便宜的。此外还谈论什么事呢？刚才不是还在讨论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以及被镇压的事吗？这事是由梅达尔多同志的错误引起的，他谈到俄国革命时士兵参加苏维埃的问题。按照梅达尔多的说法，发生于一九二一年二月的反社会主义暴动，足以证明士兵阶层的觉悟之低，并证明依靠士兵的革命潜在力量是冒险的。哈辛托同志由于被梅达尔多批了一下，便进行反驳，他放下一九二一年的叛乱问题不提，转而说梅达尔多不应该忘记，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一九〇五年干什么来着。不是他们首先起来反抗沙皇的吗？而且早在一九一七年，他们就成立了苏维埃，比工厂成立的还早！后来又讨论起托洛茨基对喀琅施塔得的态度和立场。梅达尔多和阿纳托里奥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革命史》①这本书中就谈到：镇压叛乱是对的。那是迫于形势，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实际上它是反革命性质的，而且为白俄和帝国主义列强服务，然而，玛伊塔肯定托洛茨基后来改正了这种说法，因为托洛茨基曾发表声明，说他本人没有参予镇压海军叛乱，而是由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单独干的。托洛茨基甚至指出，列宁执政期间，在镇压水兵叛乱这件事情上已经看出，斯大林有官僚主义及反无产阶级的罪恶苗头。最后，讨论又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讨论起托洛茨基的著作翻译得是否好的问题。

“投票表决有什么意义？”玛伊塔说，“让我们达成一个协议吧，这些提法是可以调和的。尽管看来不大可能，我承认

① 即联共（布）党史。

巴列霍斯有可能打入我们的内部，或许是个挑动分子。否则，正像哈辛托同志说的那样，我们就不应该放弃争取一个青年军官的机会。这就是我的建议，我再和他接触一下，试试看，能不能把他争取过来。当然，关于党的情况，我丝毫也不会向他透露。如果我发现什么疑点，立即和他断绝往来；如果发现不了什么可疑之处，咱们再研究下一步的措施。”

或许因为他们太累，或许因为他说的话最令人信服，他的建议被采纳了。他看到四个人同时点头同意，顿时兴奋起来，心想，现在可以去买烟抽了。

“不管怎么说，即使有时候他情绪低落，他也会掩饰的。”莫伊塞斯说，“有一点，我一向羡慕他，他做什么事都信心十足，不仅在托派革命工人党内部是这样，甚至在此之前，当他还是莫斯科派以及阿普拉党成员时也是这样。”

“要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在政治上变来变去，你又怎么解释呢？是什么造成的呢，是思想信仰还是心理因素？”

“更确切地说，是道德原因。”莫伊塞斯纠正我说，“尽管一谈到道德，你也许认为这和玛伊塔不是一回事，对吧？”

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狡黠的光。这难道是一个小小的暗示，以便进而谈及那些关于玛伊塔的流言蜚语吗？

“我并不觉得不是一码事，绝对不是这样。”我肯定地对他说：“我一向认为，造成玛伊塔政治上的这些变化，与其说是思想因素，倒不如说是情感因素或是道德因素。”

“他总是寻求十全十美、纯而又纯的事物。”莫伊塞斯微笑着说，“从小他就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绝过食，他说是为了体验一下穷人的生活。你知道吗？说不定，就是从那儿来的。在政治上寻求纯净，那是不现实的。”

这时，招待给我们端来了咖啡，他默不作声地注视着我。人们相继离开“绿色海岸饭店”，其中有那个带保镖的重要人物，保镖挎着冲锋枪。这时又能听到了波涛声，我们看到，在左边靠巴兰科防波堤处，一些冲浪者像骑马一样骑在冲浪板上等待大浪的到来。有人说：“从海上来抢劫最容易，海岸没有设防。一定得提醒管理员。”

“是什么东西使你对玛伊塔这么感兴趣？”莫伊塞斯问我，继尔用舌尖试试咖啡的浓度，“在所有的革命者中，他是最令人费解的一个。”

“我也不知道，他身上有某种比别人更吸引我的东西，某种象征主义的东西，预示着某种任何人没有推测到，然而后来发生的事。”

我也不知道该怎样继续说下去，如果能够，我会进一步说清楚的，然而，此时此刻，我只知道我想了解玛伊塔的故事，或者据此编造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可以对他作出道德方面的、社会方面的、思想方面的解释，并且向他证明，在所有的故事中，玛伊塔的故事最为重要，最为紧迫，可是，这并非真心话。说真的，我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我对玛伊塔的故事那么感兴趣，甚至于神魂颠倒。

“说不定我知道为什么，”莫伊塞斯说，“因为那是古巴革命胜利之前的第一次起义，是在左派分裂为两党之前发生的。”

或许他说的有道理，或许因为那起冒险事件具有序幕的性质。事实上，那起事件在秘鲁是划时代的，这一点不论是玛伊塔，还是巴列霍斯都无法预见到。不过，这个历史事件也许谈不上什么重要性，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对我来说，那起事件具有某种发人深思的东西，虽然我

一时还说不清，但对别人来说，那仅仅是一次小小的暴力行为，一次恐怖活动，一次暴动，或者一个梦呓而已。那次事件是由我们萨莱西亚诺母校的一个同学导演的。

“一个进步军人？你肯定会有这种事吗？”梅达尔多同志风趣地说：“多年来，阿普拉党人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军人，以便替他们干革命，并给他们打开总统府的大门。阿普拉党都老了，也没有找到这么个人。你想叫我们党也变成那样的党？”

“我们党不会的，”玛伊塔笑了，“因为我们不去搞政变，我们要干革命。你别担心，同志。”

“我可很担心，”哈辛托同志说，“不过，我更担心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卡洛斯同志付了房租没有？别让老太婆再找我们的麻烦。”

每次会议结束时，他们都不一起离开。三个星期以前的那次会议，阿纳托里奥和霍阿金先走的，他们几个又等了几分钟才离开库房。玛伊塔一想起上次会议发生的那件事，就忍不住笑：当时他们正在激烈地讨论玻利维亚的土地改革——土改是由帕斯·埃斯特恩索罗领导的“全国革命运动”发起的，这时，一个老太婆突然破门而入。他们吓得茫然不知所措，仿佛进来的这个人是个告密分子，而不是一个满头银发、体弱多病、弓腰驼背、拄着一根金属拐杖的老太婆。

“布隆贝太太，晚上好。”卡洛斯同志反应过来了，“怪事！”

“您为什么不敲门呀？”哈辛托同志抗议道。

“我没有必要敲我自己家库房的门。”布隆贝太太嗔怪地说，“不是说好了你们每月一号付房租吗？你们怎么啦？”

“因为银行罢工耽误了几天。”卡洛斯同志抢先站起来说，企图用身子挡住那张印有几个大胡子人头像的招贴画儿以及成堆的《工人之声报》，“正好，我这里有张支票，给您，太太。”

布隆贝太太一见卡洛斯同志从口袋里取出一个信封，马上消气了。她仔细地检查了一下支票，点点头，接着便离开了，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说，以后别再拖欠，因为像她这么大年纪的人，无力挨家挨户去收房租。

他们一个个忍俊不禁，忘记了讨论，又开始猜测：布隆贝太太看见了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人头像了没有？她会不会到警察所去报告？今天晚上，他们的这个地方会不会被夷为平地？原来对她说，租这个地方辟作国际象棋俱乐部，而她这次不期而至恰恰就连一个棋盘、一副棋子也没有看见。最终警察没有来，因此有理由认为，什么也没有引起老太婆的怀疑。

“除非这个想干革命的陆军少尉可能会来，别人是不会来的。”梅达尔多说：“他不是来抓我们，而是打入我们内部。”

“认识他好几个月还会发生这种事？”玛伊塔话中有话，但又怕引起争论，这样继续下去没有烟抽，“总之，我们会弄清楚的。已经过去十分钟了，我们走吗？”

“要调查一下，为什么帕雅尔迪和卡洛斯没有来。”哈辛托说。

“七个人当中就卡洛斯的生活比较正常。”莫伊塞斯说，“他是搞建筑工程承包的，还有个砖厂。库房、印刷厂和租金以及印发传单的费用由他提供。我们大家都出钱，不过，我

们出的那点儿钱实在可怜，他妻子恨死我们了。”

“玛伊塔呢，他在法新社挣钱可能很少。”

“他工资的一半，甚至一多半都花在党的事业上了。”莫伊塞斯同意我的话，“当然，他老婆也憎恨我们。”

“玛伊塔的老婆？”

“他们是合法夫妻，”莫伊塞斯笑了，“只不过时间很短。那个女人叫阿德莱达，是银行职员，长得很漂亮。我们向来不理解他们的婚事。你不知道吧？”

我是不知道。

他们一起出来，把库房门锁上，在拐角处停下来。玛伊塔买了一盒印加牌香烟，递一支给哈辛托，又给梅达尔多一支，然后赶快把自己的一支点上，把指头也给烫了一下。他们沿阿尔丰索·乌加尔特大街走着。他眯缝着眼贪婪地连续抽了好几口，这才过了瘾，喷出的烟圈在夜空中散开。

“我已经知道为什么那个少尉的形象总印在我的脑子里。”玛伊塔大声说。

“这大兵叫我们浪费了好多时间。”梅达尔多抱怨道，“就为一个少尉我们浪费了三个小时！”

玛伊塔仿佛没有听见。

“因为他无知，没有经验，或者什么别的。他大谈革命，而我们却已经不去谈它了。”

“同志，请你别尽讲那些叫人听来不着边际的话，我是个工人，不是知识分子。”哈辛托开玩笑地说。

此话虽是戏言，但他总挂在嘴边，不能不让玛伊塔暗暗思量：哈辛托同志内心深处是否真的不羡慕他，口头上一味蔑视。这时，一辆只有几个乘客的公共汽车离开了车道直朝

他们滑来，他们三人赶忙挤到墙根，这才免遭飞来的横祸。

“你很风趣，很诙谐。”玛伊塔补充说，“这样有益于健康，也满有意思，咱们已经情绪不高了。”

“你想说我们都老了？”哈辛托说，“也许你老了，我可是腰板硬朗得很。”

然而，玛伊塔无心开玩笑，他又急切而且无所顾忌地讲起来：

“我们倒变成空谈的理论家，变得过于严肃认真，快变成政客了。我也说不准……那个青年一谈起社会主义革命便充满热情，真叫人羡慕。当然，斗争会使一个人变得老练。不过，没有点儿幻想也不行。同志们，我们仅仅谈论方式方法，而忘记了谈目的、目标，这很不好。”

他们明白他要说的是什么吗？他意识到自己的思路很乱，就改变了话题。不过，在大街上和他们分手后，当他独自朝塞皮塔街上他的住房走去时，这种想法又在脑子里翻腾起来。此刻，他站在洛阿伊萨医院对面的人行道上等红灯，但见挤满四条车道上的卡车、小汽车、公共汽车川流不息地疾驰而过。前一天夜里，那个以幻觉形式出现的联想这时突然明晰起来了。是的，就是它，大学。大学这一年令人失望，他在圣马科斯大学听的历史、文学、哲学课令人失望。他很快得出结论：如果说这些大学的教授们过去曾经对经典著作及伟人的思想产生过兴趣，那么现在他们的思想则僵化了。只要看看他们讲的内容，他们布置给学生们的作业，就知道他们原有的那点平庸学识已经一钱不值了。那位教西班牙文学史的教授仿佛认为，读莱奥·斯皮特哲尔乌的论洛尔卡①诗作

① 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西班牙著名诗人、剧作家。

的评论比读原诗更重要；或者阿玛多·阿隆索①先生论诗人聂鲁达的著作比聂鲁达的诗更重要。对那个历史教授来说，秘鲁历史的起源比秘鲁史本身更值得研究；而哲学教授则认为，语言的形式比思想内容、比思想本身对现实的影响重要……他们的文化枯竭了，变成了虚伪的面纱，变成脱离现实的徒劳无益的说教。他早就说过，对脱离生活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还能期待什么呢？因而，他怏怏不乐地放弃了大学的学习。他认为真正的文化植根于现实生活中，他，哈辛托，梅达尔多，托派革命工人党和革命工人党的同志们都学究化了吗？他们忘记了主次界限了吗？他们的革命工作是不是变得神秘了？变成学究式了？有点儿像圣马科斯大学的文学、历史、哲学教授们那样了？听了巴列霍斯那一席话，等于是一种警告。“玛伊塔，不要忘记本质的东西。同志，别在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上纠缠。”巴列霍斯不懂什么道理，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他还是个童男，这是事实，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巴列霍斯比他们有出息，因为革命对他来说就是实干，是可以摸得着的东西，宛如天穹落在大地，革命就是建立一个正义、平等、自由、友爱的王国。他甚至想象到了巴列霍斯对革命的理解：农民打碎酋长的锁链，工人冲破束缚，一跃而成为机器、工厂的主人。在这样的社会里，剩余价值不再为一小撮人所占有，它将归全体劳动群众……蓦地，他打了一个寒噤，到了卡涅特和塞皮塔那个街角了吗？他这才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搓了搓裸露着的双臂。糟糕！我竟这样心不在焉地走到这里。这是危险的信号吗？如同潜在的色情受虐狂？卡涅特和塞皮塔这个十字路口是他最忌讳的，每每经

① 阿玛多·阿隆索（1896—1952）：西班牙著名哲学家、语言学教授。

过这里时就感到口中涌出一种怪味。就是那儿，报亭的对面，那天早上，突然一辆墨绿色小汽车尖叫一声，急煞车停下来。他还没有来得及思考是怎么回事，就从车上跳下来四个家伙，用手枪逼着他，强行搜查了他，连拉带推地把他塞进车。他也曾在不同的拘留所待过，然而，这一次最糟，时间最长。他第一次受到那样野蛮的对待，他以为自己疯了呢，曾想到自杀。从那以后，一种近乎迷信的恐惧感使他总是极力避开这个路口，以免引起令人不快的回忆。从塞皮塔街拐过去又走了两个街区，来到他自己的家。他总是感到双脚特别沉重。该死的平脚板！“这双脚简直成了一个苦行僧的脚，如踏针毡……”同时他又想：“革命对那位英俊的少尉来说，如同过节一样。”

他的房间是在一栋二层楼房的楼上，只有十五平方米（长五米，宽三米），杂志、报纸胡乱堆在地上。一张床连个床头也没有，床上只有一个垫子，一条毯子。墙上挂着几件衬衣，几条裤子。门后挂个小镜子，一个架子上摆着他的刮脸用具。一条电线上吊着个又脏又小的灯泡，暗淡的光线愈发显得屋子狭小。一进门他就俯下身子，从床底下掏出个破脸盆——床底下的灰尘呛得他打了个喷嚏——这样，他的房间里就又多了一样东西。所有的房间都没有盥洗室，只是在院子里才有两个公用厕所，一个公用水龙头。居民们自己去打水用。白天总要排队，不过晚上则没有人。因此，玛伊塔很快接满了水，小心翼翼尽量不洒出一滴地端到房间里。他脱下衣服，倚在床上，把脚放在水盆里。啊！多解乏呀。有时，他一边洗着脚一边就睡着了，当天亮醒来时浑身发冷，连续打喷嚏。自然，现在他没有睡。一阵阵凉爽的感觉从脚底传到脚腕，传到大腿，他感到身上轻松多了。他想：与少尉

接触即使没有什么结果，但认识他也不错。一个革命家决不能像圣马科斯大学的那些文学、历史、哲学教师那样，关在书斋里。一个革命家不应忘记，生活就意味着斗争，不停顿地斗争，直到献身……

“付款。”莫伊塞斯说，“别争了，我来付。确切地说‘中心’付。把你的钱包装起来吧，它里面从来不见太阳①。”

不过，已经没有太阳了。天空阴沉沉的，当我们离开“绿色海岸饭店”时，就像冬天：利马的冬天总是雾蒙蒙、水汪汪的，仿佛就要下一场倾盆大雨，然而从来也没有下过。莫伊塞斯走到门口，取出寄存的手枪对我说：“这是一支口径七点六五毫米的勃朗宁手枪。”随即他检查了一下是否上了保险，又把它放进汽车上面的套子里。

“至少你得告诉我，现在你知道些什么？”他问我，这时，我们已经坐在他的绛紫色的卡迪拉克牌汽车里，小汽车慢悠悠地从阿尔梅达里斯的豁口往上爬。

“他四十多岁了，扁平足，一辈子秘密从事革命理论研究，说得难听点，一辈子搞阴谋诡计。”我总结性地说，“先是美洲革命人民行动联盟党员，后来脱党变成莫斯科派，最后成了托洛茨基派。五十年代的那些左派组织，哪个他没有待过？哪些思想他头脑里没有过？他隐蔽过，躲藏过，坐过大牢，受了一辈子苦。不过……”

“不过什么？”

“挫折既没有使他心灰意懒，也没有让他腐化堕落。他总是勤勤恳恳的，是个理想主义者，尽管生活对他是无情的。你

① 秘鲁货币为索尔，其意为太阳。这里是作家在搞文字游戏。

觉得我这么说准确吗？”

“嗯，基本上准确。”莫伊塞斯赞成我的说法，同时刹住车，让我下来，“不过，你想过没有，在我们国家，要腐化堕落也不是那么容易，需要机遇。大部分人是本本份份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可选择，你信不信？你想过没有，如果玛伊塔有机会的话，他会不会腐化堕落呢？”

“我想过，他的行为表明命运确实没有给他提供这种机会。”

“你现在还没有掌握像样的材料。”莫伊塞斯说。

远处听到有零星的枪声。

第　三　章

从巴兰科区到我去的采访地必须穿过利马市中心，接着从里卡尔多·巴尔马桥上越过里马克河（现在的季节河水很脏），然后沿皮埃德拉·里莎大道继续向前，最后绕过圣克里斯帕尔山。路程又长又险，交通阻塞时有发生，速度很慢。途经之地越来越穷，圣伊西德罗区不如观花埠区繁华，而林塞区和维多利亚区则一个穷似一个。在这两个区的中心，梦幻般地竖起了银行家及保险公司的大楼（高楼中间自然不乏矮小的修道院以及仍然奇迹般立于地面之上的某些平房），过河以后是桥下区，然后就是郊区。这里的所谓房屋几乎全是用苇箔、砖头塔成的草棚，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垃圾堆。往昔，利马郊外这一带有的只是贫困，而现在又增加了流血事件和恐怖活动。

车行到与恰斯基斯大道交汇处，马路上的柏油开始脱落，代之而来的是一个个小凹坑，尽管如此，车仍然可以勉强颠簸前进。到处是猪圈、土堆。灯杆子光秃秃的，灯泡哪里去了呢？被淘气的孩子们用弹弓打碎了。好在是第二次来，不会吃第一次那样的苦头，上次我的小汽车就陷在杂货店对面

的泥坑里了。这次我索性在杂货店前把车停了下来。上次真有点滑稽，当我发现车抛锚时，就叫站在街角里的一帮男孩子帮我推。帮倒是帮我了，然而在帮我推之前，他们给我脖颈上套了块铁枷子，威胁我说，他们要什么我就得给什么，不然就把我活活打死。后来我的手表被摘去，我的钱包被拿走，鞋子和衬衣也都给扒了，经我再三恳求才没扒我的裤子。一边推车，我一边问他们，这个区杀人犯很多吗？不少。有政治分子吗？也有。昨天就在拐弯那里出现一具死尸，身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告密的公狗！”

我把车停放在一边，然后从垃圾堆中穿过。这里与猪圈别无两样，许多猪在一堆堆的垃圾里拱来拱去，寻觅可食之物，我的两手还要不停地在脸前晃来晃去驱赶苍蝇。这里的房子绝大部分是用铁皮、砖头、石块搭成，只有个别的是用水泥、砖坯、木材建造的，而这样的房子有的刚开个头，有的建了一半就停了，它们的主人永远也不会把它盖完的，颓垣断壁，破烂不堪，到处皆是。屋子里挤满了人，当我走过时，居民们和上次一样冷冰冰地注视着我。不久以前，市郊的政治暴力行动还不像城里居民区和市中心那么严重，然而，现在大多数被杀害、被绑架的事却发生在市郊贫民窟里。凶手不是革命特别行动队，就是武装部队，要不就是反革命特别行动队。居民中更多的是老人、妇女，而年轻人中，男人较少。我仿佛不是置身于利马，不是在海滨，而是安第斯山上的一个穷乡僻壤，瞧他们的装束：凉鞋，裙子，披肩，驼羊毛背心，操一口克丘亚语①。难道他们离乡背井来到利马，居住在这又脏又臭的地方比在山村里会好些吗？虽然条件这

① 秘鲁印第安人语。

么差，但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们肯定会这么说：在这些垃圾堆中生存的希望和政变革命的前景，看来比在阿恩卡什、布诺以及卡哈马尔卡山区要大些。在那里，天气干旱，土地贫瘠，无法耕种；传染病流行，死亡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他们。也许是这样的，否则，又怎样解释他们会选择这么一个又脏又臭的地方定居呢？

“对他们来说，我已经是不错了，他们心甘情愿。”玛伊塔说，“但是，如果你认为他们贫穷，贫民窟就顺理成章地蕴藏革命潜力，那你就搞错了。他们不过是流氓无产者而已。他们没有阶级觉悟，因为他们并未形成一个阶级，甚至连什么是阶级斗争也不懂。”

“你这说的什么呀？”巴列霍斯笑了。“什么是他妈的阶级斗争？”

“历史前进的动力，”玛伊塔俨然一位教授那样一本正经地讲解，“也就是在社会中，每一个阶级的利益之间的斗争。这种利益是由每个阶级在物质生产中的地位决定的。你知道，有资本家，有地主，有知识分子，还有的人除了是个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这就是工人们。另外，还有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这就是贫民窟里的穷人，他们是流氓。我越讲你越糊涂了吧？”

“你把我讲饿了。”巴列霍斯打了个哈欠，“你讲得我胃口上来了。什么阶级斗争不阶级斗争的，咱们还是去斗争一杯冰镇啤酒吧！然后，我请你到我的父母亲家吃午饭。我姐姐要走了，这是一件大事。我这位可怜的姐姐比我在军营里生活得还差。我介绍你认识认识她。下一次见面时，我就把我对你说过的那件稀奇的东西带来。”

他们俩是在玛伊塔的房间里，玛伊塔坐在地上，陆军少尉巴列霍斯坐在床上。屋子外面的说话声、笑声、汽车噪音听得清清楚楚。空气中飘浮着尘埃，宛如一个个小虫翻飞。

“要是这样，你将永远弄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玛伊塔自己也泄气了，“说真的，你没有碰到个好老师，我给你讲的东西，我自己也说不清。”

“你比我在军官学校学习时的那些教官好多了。”巴列霍斯笑着鼓励他，“你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吗？我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不过，那些抽象的论述我听起来费劲，实际问题，具体事情，我容易理解。这样吧，我先把我的革命计划讲给你听听，然后咱们再去喝啤酒。”

“你考试及格以后，我才听你的那个美妙计划。”玛伊塔也学着他的腔调，“你说，到底什么是他妈的阶级斗争？”

“大鱼吃小鱼。”巴列霍斯朗声笑起来，“我说老兄，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嘛。不需要学习什么大道理，我就知道一个拥有千把公顷土地的庄园主、酋长和印第安人之间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我考了个二十分①吧？你听了我的计划会目瞪口呆的，玛伊塔。你要是看到我带给你的那件意想不到的东西，你的眼珠子会迸出来。你跟我吃午饭吗？我想让你认识一下我姐姐。”

“称您嬷嬷，修女，还是小姐呢？”

“就叫华尼塔好啦。”她说，“最好用‘你’称呼，我们的年龄差不多一样大，对吧？我来介绍一下，她是玛丽亚。”

她们俩都穿着皮凉鞋。我坐在凳子上，看到她们的脚趾

① 二十分计分法。

头裸露在外面：华尼塔的脚趾一动不动，而玛丽亚的则不安地动着。华尼塔的皮肤是棕色的，看起来精力充沛，粗胳膊粗大腿，嘴角上的汗毛很浓；而玛丽亚则是一个白人，小巧玲珑，眉清目秀，表情羞涩。

“喝瓶汽水还是喝杯白水？”华尼塔问我，“你最好喝汽水。这里水贵如金，每次都得去恰斯基斯大街弄水。”

她们俩的这个地方，使我想起两年前在圣克里斯帕尔山见过的医疗站，那是法国神父戴福尔德办的，由两个法国修女管理。这里的围墙也与那里一样光秃秃的，仅仅用石灰水粉刷了一下。地上铺着稻草编席，盖的是毯子，这一切使人觉得这是沙漠中的一个住宅。

“这里最需要的就是钱，”玛丽亚说，“神父戴福尔德这么说的。我读过他的《在群众的心里》一书，这本书曾经风靡一时。”

“我也读过，”华尼塔说，“可我记不得说什么了。我一向记性不好，年轻时也是这样。”

“太遗憾了！”我脱口而出，因为我发现，她们住的地方竟没有一个十字架，没有一个圣母雕像，没有一幅宗教画，没有什么能说明这所房子的主人是修女。“关于记性不好的问题，因为我……”

“噢，对了，他呀？我记得。”华尼塔看着我，仿佛责备自己似的说，随即把汽水递给了我，语调马上变了，“我的弟弟，当然会记得喽。”

“你还记得玛伊塔吧？”我问她，然后对着汽水瓶口喝起来，汽水有点儿甜味，一点儿也不凉。

“他，我也记得。”华尼塔点点头，“我就见过他一次，是在我父母家中。不过，我想不起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那次见

面以后，又过了两星期，我又见过我弟弟一次。那是最后一次，他除了跟我谈他的好友玛伊塔外，别的啥也没说。我弟弟喜欢他，崇拜他。他对我弟弟的影响很大，以至于……我还是不说为好。

“噢，是这桩事。”玛丽亚用一块硬纸壳权作扇子，赶走往她脸上落的苍蝇。奇怪的是，这两个女人都没有穿圣服，只穿着毛料裙子和灰毛衣。不过，从她们穿这些衣服的方式上，从拢在一起罩着发网的头发上，从她们的言谈举止中，不难发现她们确是修女。“好在是谈他们，而不是谈我们，我们刚才还忐忑不安呢。现在我可以对你说，因为出版界对我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可是没讲好话呀！”

“我们将要干的是些什么事呢？”玛伊塔嘲弄地笑着说，“假定我们已经占领那个村庄，攻下警察所，打开监狱，夺下了哈乌哈军火库的武器弹药，我们还干什么呢？我们就像野山羊一样跑到山里去吗？”

“不是像野山羊一样跑。”陆军少尉反驳他，但脸上毫无愠色，“我们可以骑马，骑驴，骑骡子，坐卡车或是步行，但是，最可靠的办法是开动双脚，在山区没有比两只脚更好的交通工具了。老兄，看得出，你对山区还不了解。”

“我确实很不了解山区，”玛伊塔赞同地说，“这使我感到惭愧。”

“为了叫你不感到惭愧，明天你跟我到哈乌哈去吧。”巴列霍斯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老兄，我包你吃住不花分文，周末也不要你出钱。我让你看看乡下是什么样子，我带你到居民点走走，你就会了解真正的秘鲁。我说，你别打开那件礼物，你答应过我不打开的。否则，我就会抢回来。”

他们坐在“甜水海滩”的沙地上，看着寸草不生的漫长海岸线。海鸥就在他们前后盘旋飞翔，潮湿而带咸味的海风轻拂着他们的脸庞。这件礼物是个啥东西呢？包得那么仔细而严实，仿佛是一件贵重礼品，还挺重的。

“我当然愿意去哈乌哈。”玛伊塔说，“不过……”

“不过，你身无分文，买不起车票。”巴列霍斯接过他的话碴儿，“你别担心，我替你付小公共汽车票钱。”

“好吧，这事以后再说。我们先谈正事。”玛伊塔坚持说，“这是件严肃的事情，你看了我给你的那本书没有？”

“我喜欢这本书，我全懂了，只是有几个俄国名字不好记。玛伊塔，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本书吗？因为它多讲实际，少扯理论。《怎么办》这本书太棒了，列宁讲得很透彻，他知道应该怎么办。他是个实干家，我像他。那么，你认为那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吗？”

“你总算看了，只要喜欢它就好，你有进步。”玛伊塔并不正面回答他的问话，“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愿意听吗？你姐姐那么做有道理，她使我很感动。我不觉得她是个修女，她使我想起了以前。你知道我小时候像她一样虔诚吗？”

“玛伊塔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多了。”华尼塔说，“那时他差不多都四十岁了吧？我觉得他像个五十岁的人，而我弟弟看起来年轻多了，他们就像父子俩。我很少回家，有一次恰巧碰上他。那时我们住在修道院里面。我们可不像别人，半天在修道院，半天在街上混。”

玛丽亚显得不耐烦，她使劲摇纸壳，把苍蝇赶得乱飞。苍蝇多极了，有的在眼前飞来飞去，有的落到墙壁上，看上去如同钉子帽儿。

“我知道这里面包的啥东西。”玛伊塔想，“我知道这件意料不到的东西是什么。”他感到胸口发热，又想，“你疯了。华尼塔有多大呢？猜不准。个子不高，身段不算美，她的言谈举止充满活力，上牙老是咬着下嘴唇。她在西班牙住了好多年，是不是在那里恋爱过？因为她说话仍然带有西班牙人的腔调，有些口音尽管改了，但是和利马人还有点儿差别。”他继续遐想，“你在这儿干什么，玛伊塔？看你那心神不定的样子，和一个修女在一起干什么呀？”玛伊塔把手从湿乎乎的沙子上伸过去，偷偷地摸了摸那件意料不到的东西。噢，是一件武器。

“我原以为你们俩是一个教派。”我对她俩说。

“你弄错了。”玛丽亚说，她总是笑眯眯的，而华尼塔则严肃有余，甚至连说话时也板着面孔。窗外砖头横飞，好像是淘气的孩子们在打架。“我和无产者们在一起，而她过去和贵族在一起。现在我俩都结束游民生活了。”

我们开始谈论的是玛伊塔和巴列霍斯，然而，不知不觉地又把话题转到社会上发生的犯罪行为。起初，革命分子在这个区里很有势力，他们大白天公开募捐，有时也举行集会。高兴了就杀死个人，指控人家是叛徒。后来又出现了“自由分队”，他们抓到真正的造反分子或者同谋分子，不是砍头就是锯腿剁手，或者用硝酸毁坏他们的面容。暴力程度明显地增加。华尼塔认为，不论怎么说，刑事犯罪比政治犯罪多，不过有时刑事犯罪也打着政治犯罪的旗号。

“不久以前，我们的一个邻居因为争风吃醋，把他老婆杀了。”玛丽亚说，“他的几个小舅子发现他正在那里掩盖罪证，

并且写了个有名的牌子‘告密的母狗’挂到尸首上。”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我提议，“谈谈那些年开始酝酿的革命，谈谈玛伊塔和你弟弟干的那个革命。它是后来的许多革命中的头一个，是划时代的，它的结局已经有目共睹了。”

“也许那些年发生的革命就数我们的‘伟大’，”华尼塔打断我的话，“死了这么多人，那么多人被害。难道起到过一点儿积极作用吗？这场暴力招来更多的暴力，什么变化也没有，对不对？不论在这里，在乡下，还是在山区，哪里都比以往更穷了。”

“你们也谈论这个啦？”我问她，“玛伊塔和你谈起过穷人，谈起过穷困的问题？”

“我跟他谈宗教问题。”华尼塔说，“你别以为是我提起的，是他先对我说的。”

“是的，我过去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可是现在我不是。我丢掉了宗教的幻想。”玛伊塔叹了口气，后悔不该说这些，他怕巴列霍斯的姐姐误解，“您从来也不怀疑？”

“我从早起睁开眼到晚上睡觉闭上眼，从来也不……”她闪烁其词地说，“谁给您说过信教的人就不能怀疑？”

“我是想说，”玛伊塔鼓起勇气，“他们说天主教学校的使命是培养人类精华，您不觉得这是无稽之谈吗？难道能够用福音派慈善博爱的教义，去教育统治阶级的子女？您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

“我想过这个，甚至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也想过。”修女华尼塔笑了，“确切点儿说，我们想过，真是这样。当我入教团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相信上帝赐给本教团的所有成员以权力和财富，让我们去拯救那些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人。还说我

们这些女孩子就像一个人的脑袋，如果教育得好的话，会影响躯干、胳膊和腿，可是，现在没有一个人相信能够用这种办法改造世界。”

她又讲到她和她的伙伴们在修女学校造反的事，这使玛伊塔大为震惊。后来位于索菲亚努区的那所为穷人而开办的修女学校被迫关闭了。有些有钱人的女孩子，每个人都找一个穷孩子作为保护对象，给她们礼物，如糖果、衣服，每年带她来自己家一次，坐在爸爸的汽车里，靠在妈妈的身旁兜风。有时过圣诞节，女孩子及大人还派司机给保护对象送个圣诞面包去。多丢人呀！多叫人难堪！这个能叫行善吗？她们写信批评、抗议、反对，后来这个免费学校不得不关闭。

“嬷嬷，看起来我们之间的距离并不大。”玛伊塔十分惊讶，“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讲。有一个伟人曾经说过：当人类被迫以革命的形式消灭掉非正义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宗教。”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宗教，何必再来一个新的宗教呢？”修女华尼塔不同意他的话，同时把盛糖果点心的盘子递给玛伊塔。“吃块饼干吧！”

“这话是托洛茨基说的。”玛伊塔进而明确指出，“他是一个革命家，无神论者，但是，他也尊重人们的信仰。”

“关于革命唤起民众热情的问题，只要你到了山区便会体会得很深刻了。”巴列霍斯朝离他们不远的一群鹈鹕扔去一块小石头，“你真的觉得我的计划那么糟糕吗？是不是故意贬低我，玛伊塔？”

“我们认为，那简直是胡闹。”华尼塔耸了耸肩膀，做出个无可奈何的样子，“现在我又纳闷，不论怎样，那时，女孩

子们总算有个地方读书呀！而且每年一度，还能得到个圣诞面包。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说那时我们做的对不对。结果是什么呢？那时我们学校共有三十个修女，二十个孤女，而现在只剩下三个修女，一个孤女也没有了。其它学校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教团现在已不复存在……难道那是我们社会责任感的表现？我弟弟牺牲得有价值吗？”

她强作笑颜，仿佛自我解嘲。

“这是很容易的，就像吃面包、喝牛奶咖啡那么容易。”巴列霍斯激动地说，“当印第安人为剥削他们的庄园主劳动时，没有干劲，效率极低；而当他们为自身劳动时，创造的财富就多，这对全社会有利。我得了个满分，二十分吧，老兄？”

“为了不再产生一个寄生阶级，来剥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劳动成果，”玛伊塔给他解释，“为使新贵族不再享有那么多权力，从而产生新的非正义，恰恰是为了避免这个，列·达维多维奇提出了继续革命的理论。唉，这样的长篇大论，我自己都听烦了。”

“我想去看足球比赛，你呢？”巴列霍斯叹了口气，“我从哈乌哈溜出来，就是为了看利马联队和大学队的比赛，我不想错过机会。去吧，我请客。”

“怎么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呢？”我对她说，发现她缄默不语，“那场无声革命①究竟对教会有利还是有害？”

“那场革命使我们的幻想破灭了，但是信仰我们还有。至于说别人，我们不知道。”玛丽亚说，又转过身问华尼塔，

① 即修女革命。

“玛伊塔是什么样子？”

“讲话很柔和，很有礼貌，穿着朴素。”华尼塔回忆说，“他想用他那反宗教的一派胡言乱语说服我，但是，我认为是我把他说服了。他对修道院、神学院、教堂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对我们修女革命一无所知……我记得，末了他惊奇地瞪大眼睛对我说：‘这么说，我们差不多在干一样的事情。’时间说明他说的有道理，对吧？”

华尼塔还对我说：“两年前，就在她们居住的那个区，有一位神父忽然不见了。他叫米盖尔，看来他就是那个化名叫雷翁西奥的人，上个月率领一些人袭击了总统府。”

“我不相信是他。”玛丽亚不同意，“米盖尔神父是个吹牛皮大王。光听他说话，活像个纵火犯，但实际上，他是个消防队员。我敢肯定他被警察，要不就是被自由分队杀害了。”

是的，就是它。它既不是步枪，也不是手枪，而是一枝刚出厂的轻自动步枪，乌黑乌黑的，油光锃亮。玛伊塔出神地看着它，端着自动步枪的双手微微颤动。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视线移开，往屋子四下看了看，仿佛从地上那堆得乱七八糟的报纸和书籍里会跳出一个人似的，冲他说：“玛伊塔，抓住你了。”“你倒霉了，玛伊塔。”“当场把你抓住了，玛伊塔。”“你是一个冒失鬼，脑子里少根弦，你是一个……”然而他对少尉没有一点儿反感。这有点儿像对待一个你喜欢的、干了个恶作剧的淘气孩子，搞得你哭笑不得。你同时会想：“我真想揪着他的耳朵对他说……”

“你有一件事使我非常好奇，我不知应不应该对你说，希望你不要生气。我可以和你坦率地谈一谈吗？”玛伊塔说。

他们去得太早，体育场的看台上还没坐满一半人，运动员们也还没有开始做准备活动。

“你说吧！”巴列霍斯嘴里喷烟吐雾地说，“我知道，你会说我那个革命计划非常幼稚；要不你肯定会再一次批评我，不该给你带那件礼物，对不对？”

“我们俩认识多久了，”玛伊塔问，“两个月了吗？”

“我们已经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不对吗？”巴列霍斯回答，一边为那个矮小而灵活的守门员扑了个好球而鼓掌，“你要对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一切是在浪费时间。”

巴列霍斯只顾看球，顾不上听他说话。

“借书给我，教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好吗？”

“并不是我给你讲的你不能理解。”玛伊塔对他进一步说明，“你的脑袋很灵，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学习什么都行。”

“不错嘛。”巴列霍斯说完，又注意看球去了。“我还以为我是个笨蛋，白浪费你的时间呢。”

“不，你可不是笨蛋。”玛伊塔朝他笑了笑，“相反地，我一跟你谈话，就可以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就可以了解你，因此我感到：理论对你不但没有用处，反而可能有害。”

“啊哟！差一点踢进了，那个转身动作真漂亮！”巴列霍斯激动地站起来鼓掌。

“这个你就来劲了，你瞅见什么了？”玛伊塔又说。

“我什么也没看见。”巴列霍斯说，“现在我确实变得很笨。你是想说叫我忘记我的那个计划，我不该送那支自动步枪给你，是吧？好——好球！早就该进了。棒极了！”

“从理论上讲，革命自发主义是不好的。”玛伊塔说，“没有学说，没有科学知识的指导，冲动常常会导致无政府主义。

你对理论问题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说不定这样更好。幸亏这样，你不会像我们那样……”

“‘我们’？你指的是谁？”巴列霍斯问他，转过身来看他一眼。

“我们只注意理论问题，而忽视了实际问题，还有……”

说到这里，玛伊塔停住了，因为比赛已经结束，观众们正在放爆竹，往场内扔纸球。

“玛伊塔，你看得入迷了，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呢。”巴列霍斯追问他，但并不看他，只是盯着自己口中的香烟，心想：难道他是个告密分子？“你说‘我们’，我问你，‘我们’是谁，老兄，你怎么不回答我呀？”

“我是指秘鲁的革命者，秘鲁的马克思主义者。”玛伊塔一板一眼地说，同时观察他的表情，心想：难道他是个特务，来侦破的？“我们懂得许多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但我们不懂得怎样接近群众。我是指这个。”

“我问过他，是不是也信奉上帝，基督教义是否与他的政治思想抵触。”华尼塔说。

“老兄，我不该问你这个。”巴列霍斯后悔地解释道。他们从体育场的看台上随着人流往下走。“对不起，你什么也不要说了。”

“你什么事都知道，还要我对你说什么呢？我很高兴来看这场比赛，当然，球踢得很差。我好久没看比赛了……”

“我想对你说一件事。”巴列霍斯拉着他的胳膊，“我非常清楚，你不相信我。”

“你疯了？”玛伊塔说，“我为什么不相信你呢？”

“因为我是个军人，你对我不太了解。”巴列霍斯说，“我知道，有些事你不想告诉我。关于你的政治生活，我啥也不想知道，玛伊塔，对朋友我是肝胆相照的，我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我欺骗了你，你就用我送给你的那支枪毙了我……”

“坦率地说，革命与天主教是抵触的。”玛伊塔肯定地说，但语气很温和，“嬷嬷，最好是不要自欺欺人。”

“您扯到哪儿去了？您的思想太落后了。”华尼塔似有嘲弄地说，“如果您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精神的鸦片，您以为我会感到惊奇吗？以前我说不定会这样，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一切都在变，我们也起来闹革命了。您别笑！”

莫非从那时起，秘鲁就已经进入神父和修女要求进步的时代了？华尼塔说是开始了，可我怀疑，然而，无论怎么说，那时它刚刚开始，玛伊塔对此并不了解。玛伊塔听了会高兴吗？据说，那时穷人区的主教巴姆帕伦阁下，一只手戴着罗马教皇授予的戒指，而另一只手戴着镰刀斧头标志。古斯塔沃·古铁雷斯神父提出一种关于神学解放的观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天主教徒的责任。门德斯·阿塞奥主教阁下劝说墨西哥教徒，要学习教徒进军卢德斯①的榜样，向古巴进军。小时候为体验穷人生活而绝食的玛伊塔，听后会感到满意吗？是的，这是毋庸置疑的。难道他也和许多革命者一样仍然是天主教徒？他是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思想僵化分子？

① 法国比利牛斯山区—城市，朝圣中心，有两个圣母像，一个在地下。

华尼塔沉思片刻。

“是的，我看是这样，他是个教条主义者。”华尼塔同意，“至少，在宗教这个问题上，他一点灵活性也没有。我们就聊了一会儿，我说不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后来，我总想到他。他对我弟弟影响很大，他改变了我弟弟的生活。我弟弟是从来不读书的，是他引导他读起书来，当然，是读那些共产党的书。我曾经企图阻止他与我弟弟接触：你发觉没有？玛伊塔在给你传经布道？”

“是啊，我知道。不过，我跟他学了不少东西。”

“我弟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个造反派，天生就有正义感。”华尼塔补充说：“他把玛伊塔当成良师益友，而玛伊塔则把他当枪使。”

“你的意思是，玛伊塔应该负责任？”我问她，“你认为这一切都是玛伊塔的主意？是他引导巴列霍斯参与了哈乌哈事件的？”

“不是的，因为连怎么样使用它我还不会。”玛伊塔说，“我对你说实话，我有生以来连支玩具枪也没放过。关于过去的事，关于友谊问题，我必须提醒你一件事。”

“你什么也不要提醒我，我已经请求过你谅解我的冒失。”巴列霍斯说，“我倒喜欢听你再发表个演说。咱们还是继续讨论双重政权问题吧！谈谈怎样逐步动摇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基础问题。”

“对一个革命家来说，革命比友情重要得多，这个你要好好记住，永远不要忘记。”玛伊塔说，“革命高于一切，其它处于第二位。那天下午，我曾想把这种思想灌输给你姐姐。她的想法都不错，比一般的教徒好多了，但远远不够。如果一

个人相信上帝，相信存在地狱的话，那他总要把革命放在第二位，而这样，革命永远也不会发生。我相信你，我认为你是个了不起的朋友。如果有什么事我瞒着你的话……”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请求过你原谅我吗？”巴列霍斯打断他的话，“你就从来没有说过错话？明天我们就去卢林，你带上那件东西。我来给你上第一课，学习使用冲锋枪比研究双重政权问题容易得多。”

“理所当然，后来的事情非发生不可。”华尼塔说，不过她的语气并不肯定，“玛伊塔是个老政治家，一个职业革命家。我弟弟则是一个好冲动的小伙子，玛伊塔比他大，比他有文化，他受玛伊塔的控制不足为怪。”

“我说不准，不敢贸然下结论。”我不同意她的看法，“有时候，我倒认为正好相反。”

“这是胡说八道。”玛丽亚插话，“一个小伙子怎么可能引导一个聪明过人的老家伙干出那种蠢事来？”

嬷嬷，事实如此。玛伊塔是一个地下革命者。他一生就是图谋造反暴动，一会儿入这个党，一会儿又入那个组织，却没有入一个大党，最后入的那个组织小得不能再小了。当他到了别人该退休的年龄时，突然在他面前出现一个人，给他打开了行动的大门。还能有什么比别人给他的那支冲锋枪更叫他着魔的东西呢？

“这倒是件新鲜事。”华尼塔笑着说，仿佛给我道歉似的，“不管怎么说，这不是真事。”

“我并不是要写真实的故事，我是要写小说。”我进一步说明，“把他放在一个遥远的历史环境之中，并不照抄现实，如果高兴的话，就说它是虚构的。”

“那你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劲呢？”她讥讽地暗示，“为什么还要调查发生过的事情，还要用这种方式来跟我谈心呢？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瞎编呢？”

“因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我的小说中，我一向是要根据了解的原因再设法虚构的。”我对她解释，“这是我的写作方法，而且我认为基于历史现实编写故事，这是唯一的创作方法。”

“有时候，我就想，能够了解真正的历史吗？”玛丽亚打断我的话，“是不是历史书没有小说那么多的虚构成份，还是比小说更虚构？比方说，我们讲的这件事，还有关于神父们闹革命，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渗透问题……就没有听到一个人出来做一个简明的解释。”

“您指什么？”

“许多人忍饥挨饿，受疾病的折磨，悲观失望，气急败坏，面对着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而又无能为力。”玛伊塔说，他说话时总是那么文雅，修女发现他的嘴唇几乎不动，“尤其应该看到，有的人有能力做点什么，可他们从来啥也不做。这些人都是政治家、富人，他们掌权，他们统治别人。”

“但是，因此就丧失信仰？”华尼塔说，她十分惊奇，“相反，更应坚定信仰，应该……”

玛伊塔的语气逐渐地强硬起来：

“不论信仰多么坚定，到一定的时候，有的人就会说：‘我够了。’这么多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仅靠一个许诺——来世再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嬷嬷。事实明摆着呢！地狱就在利马街头，尤其是蒙东。您知道蒙东意味着什么吗？”

一个贫民窟，它是第一批穷人区中的一个，不比华尼塔

和玛丽亚现在住的这个区差，但好也好不到哪儿去。从华尼塔与玛伊塔谈话以来，贫民窟日益扩大，除了贫穷和失业，现在又增加了屠杀。难道真的是因为蒙东区半个世纪以前的穷困，把年少而虔诚的玛伊塔变成一个造反分子吗？然而，同样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华尼塔和玛丽亚就没有发生玛伊塔那样的变化。她们俩没有一个悲观失望，或者气急败坏，也没有逆来顺受。我还发现，尽管她俩也处在贫困之中，她们也并不认为屠杀和炸弹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她们俩仍然是教徒，不对吗？在卢林那一带的沙漠中枪声不是还在响吗？

“不是。”巴列霍斯瞄了瞄，扣动扳机，枪声比玛伊塔预料的还小。玛伊塔的双手紧张得出了汗，“不是给我自己的，我撒谎。实际上这些书我要带到哈乌哈，给圣何塞中学的学生们读。我相信你，玛伊塔。还要告诉你一件事，这事连我最喜欢的人——姐姐，我也没有告诉她。”

巴列霍斯一边讲，一边把冲锋枪放到玛伊塔手上，教他如何持枪，如何打开保险和扣动扳机，怎样装子弹，退子弹。

“这样不好，这种事不要告诉别人。”玛伊塔批评他，他的声音有点变化，因为他听到一梭子子弹打响了，震得他的手和身体颤动。半晌，他才发现原来这是他自己放的枪。远处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有的地方呈黄色，有的地方呈赭红色，有的地方呈蓝色，周围一片寂静。“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安全第一。不是指你，而是指其他的人，你懂吗？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怎么都行，但不能因为对朋友信任，就把同志们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境地，把革命置于危险之中。假如我给警察工作，怎么办呢？”

“你不是当警察的材料，你连当个告密分子也不够格。”巴

列霍斯笑着说，“怎么样，放枪很容易学吧？”

“真的很容易。”玛伊塔表示同意，用手摸摸枪口，感到手指上有燃烧的感觉，“以后再也不要跟我提起圣何塞中学的人来，我不需要他们的友谊。别胡来。”

突然，刮起一阵热风，沙粒像雨点般地打来。陆军少尉确实选择了一个好地方，在广漠的沙滩上谁能听到他们的枪声？玛伊塔，你不要以为什么都会了，最重要的不是上子弹、退子弹、瞄准射击，而是会保养、擦洗、拆卸、组装。

“你应该理解我。”巴列霍斯又提起刚才那事，同时他指了指公路，意思是该回去了，否则风沙会把他们淹没，“老兄，我需要你的帮助。圣何塞的学生都是些年轻人，刚上中学四五年级，我们是在监狱的足球场上踢足球时认识并交上朋友的。”

他们俩顶着风在软绵绵的沙滩上行走，双脚一踏下去便陷到脚踝。玛伊塔忘记了射击课以及刚才的冲动，蓦地又想起少尉对他说的那事。

“你什么也不要再跟我说了，省得将来后悔。”他说，然而内心却十分好奇。

“住嘴，你这家伙。”巴列霍斯赶忙用一条手帕捂到嘴上，免得吃沙子，“起先，我们先踢足球，后来又一起去喝啤酒、跳舞、看电影、聊天。从咱们俩聚会时起，我就把你教给我的再教给他们。圣何塞还有一个老师帮助我，他说，他也是社会主义者。”

“你给他们讲马克思主义吗？”玛伊塔问。

“是的，这是真正的科学。”巴列霍斯做个怪相，“它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的消毒剂，他们的脑袋壳里装的全是这类货色。我说，老兄，用你们知识分子的语言，这该怎么

说呀？”

刚才他教玛伊塔射击时，俨然是一位老练的教官，说得头头是道，而现在却变成一个胆怯的青年，不知该从何说起。透过雨点般的飞沙，玛伊塔看了看他，发现他很英俊。心想，有多少女人亲过他这张年轻的脸，吻过他火热的嘴唇，曾依偎在他的怀抱中啊！

“你知道吗，你可是把我弄得张口结舌了！”玛伊塔几乎喊起来，“我认为，我那些马克思主义的说教使你腻味透了。”

“说真的，有时候很腻味，有时候我听不懂。”巴列霍斯坦率地承认，“比方，不断革命的问题。你一下子给我讲那么多东西！而当我给圣何塞的学生们讲解时，就成了一锅糊涂粥，因此，我才一再要求你到哈乌哈去。去吧，帮我一把。这些年轻人就是一堆纯净的炸药，玛伊塔。”

“当然，我们还是信教的，不过不穿教服。”玛丽亚莞尔一笑，“我们有好多事要做，但不是许愿一类的事。我们不是学校里的学生，而是在这里工作。教团尽力帮助我们。”

华尼塔和玛丽亚认为，她们在穷人区里为教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肯定是这样看的，否则，又如何解释她们俩宁肯担惊受怕而住在这么一个贫民窟里呢？在穷人区里，没有一天不出事，修女、神父、女工常被拦路抢劫。不管她们这样做有无结果，但她们这种信仰实在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信仰给她们力量，信仰使她们不怕这里的腥气恶臭。我对她们说，当我打这里走过时，就像进了地狱。

“那边可能更糟。”华尼塔说，一丝笑意不露。

“你从来没去过那边的新居民点吗？”玛丽亚插话。

“没有，我从未到蒙东区去过，”华尼塔回答。

“我小时候去过好多次，那时，我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华尼塔发现他有点儿心不在焉，是怀念往昔吗？“我和‘天主教行动组织’的几个孩子在一起。当时，那个区有一个加拿大教团，有两个神父，几个世俗教友。我记得那个年轻的神父，他个子高高的，红脸膛，还是个医生。他说：‘我学的东西，到这里一点儿用不上。’我不忍心眼看着小孩子一个个像苍蝇一样死去，多少人得了肺结核呀！而在报纸上整版整版地刊登富人举行舞会、宴会、婚礼的广告和照片。那时，我才十五岁。晚上回到家，怎么也祈祷不下去，心想：在蒙东区发生的一切，上帝听不见也看不到。他把耳朵捂起来不想听，把眼睛遮住不想看。突然，有一天我自己醒悟过来。嬷嬷，要想真正为此而斗争，就不能相信上帝。”

华尼塔觉得，玛伊塔即使信仰有点动摇，也不该发展到如此荒唐的地步，然而，终于被他的激情感动了。

“我也经常因为信仰而苦恼。”华尼塔说，“但我还没有发展到质问上帝的地步。”

“我们不仅谈论理论问题，也议论实际事情。”巴列霍斯接着说。他们顺着公路朝利马走去，自动步枪藏在一个大包里。碰见卡车、公共汽车开过，他们便伸手要求搭车，但是一辆也没有停下。

“就像自制莫洛托夫手榴弹办鸡尾酒会用，造炸药当鞭炮放，是吧？”玛伊塔讥讽地问，“还有你的革命行动计划，也是实际事情，对吧？”

“老兄，别急，我还没有说完呢！”巴列霍斯总是那么开朗，“比方说到乡村去，亲眼看看农民们有什么问题，他们是

怎么解决的。因为印第安人已经开始行动，占领土地，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要求耕者有其田。”

“你是想说收回土地，对吧？”玛伊塔凑近他低声说。他好奇地看着巴列霍斯，他目光呆滞。尽管许久以来，两人经常见面，但此刻，仿佛他刚发现真正的巴列霍斯。“你不要忘记，那些土地原来就是他们的。”

“对，我是说把土地还给农民。”陆军少尉点点头，“我对他们说，走吧，咱们去找农民们聊一聊。这几个青年看到印第安农民在没有任何政党的帮助下，自己起来打碎锁链。他们就这样慢慢地懂得了革命必须在我国发生。有一个叫乌维卢斯的教员在理论问题上给我些帮助，当然，对我帮助最大的还是你这位老兄。去哈乌哈吗？”

“你的话真叫我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是好。”玛伊塔说。

“那你就快闭上嘴吧，免得灌进沙子。”巴列霍斯诙谐地笑了，“你瞧，这辆小公共汽车可能会停。”

“这就是你说的已经有了一批人，万事俱备。”玛伊塔说着用手揉了揉红肿的眼睛，里面灌进了沙子。“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在哈乌哈，你已经和基层农民接触过，这就是说……”

“这就是说，当你在研究革命的时候，我已经干起革命来了。”陆军少尉拍他一下，“就是这样。我是讲实干的人，而你是一个理论家。我们要结合起来，伙计，理论要和实践结合。我们只要把人民发动起来，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我们。我们会干一番大事业。握着我的五个手指发誓去哈乌哈吧！老兄，我们的秘鲁是了不起的！”

他仿佛是个孩子，那样激动，那样幸福！瞧他那样子：穿一身不透水的军服，头顶上留一小撮美国莫伊卡诺印第安人

式的头发。再次同他相会，玛伊塔感到很高兴。他们在角落里找到一张桌子坐下，向中国招待要了两杯咖啡。这时，玛伊塔想，如果他像巴列霍斯一样年轻的话，倒可以跟他歃血结拜为兄弟。

“今天在宗教界，有很多神父和修女像蒙东区的加拿大神父一样。”华尼塔说道，没有半点生气的意思，“教会一向了解贫困的状况。不管您怎么说，教会为了减轻贫困的状况，已经做了它力所能及的事。现在教会也懂得，不合理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这是社会问题。教会并不赞成某些人应有尽有，而大多数人一无所有。我们懂得，在这种条件下，单是精神方面的帮助简直是讽刺……但是，我扯远了。”

“没有，这是个严重问题。”玛伊塔鼓励她，“贫穷，秘鲁有成千上万的人饿肚子，这是现实。有办法解决吗？什么办法？谁能拿出办法来？上帝？不，他拿不出。嬷嬷，要靠革命才行。”

天色渐渐黑下来，一看表，我才发现自己在那里已经待了四个小时。我真想亲耳听一听（不是华尼塔讲给我听）玛伊塔亲口谈一谈对宗教的看法。我们谈话时，不时有孩子从半开着的门缝向里面探头探脑，窥伺我们的动静，尔后又扫兴地离开了。他们中有多少人会被起义的洪流卷进去？记不记得我的老同学玛伊塔讲起过他去蒙东区帮助加拿大教团的事呀？他也没说过神父中有多少人会去杀人，又有多少人将被杀害？这时华尼塔到隔壁的医疗站看看发生什么事没有。玛伊塔是每天下午课后，还是仅仅星期天才到这里来帮忙呢？医疗站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九点提供服务，有两个大夫轮流值班，

下午还有一个男护士、一个女护士来打针或作应急处理。玛伊塔是不是在帮助那个红头发大夫埋葬饿死、病死的孩子？那时他眼睛里会不会含着泪水，心脏激烈地跳动，想象的翅膀在天空翱翔？会不会情不自禁地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你眼睁睁地看着发生的这一切却无所作为呢？紧靠着医疗站的是一栋矮小的木板房子，“共同行动”的办公室就设在里面。华尼塔和玛丽亚就在医疗站服务，并且住在这里。玛伊塔曾经义务帮助过的医疗站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据说，还有一个律师也到这里来为居民们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玛伊塔到这里与他们打成一片，深深地了解了穷人的疾苦。他的信仰开始发生动摇，可在学校里，他从来也没有提起过。他跟我谈论的是那时的连播小说，甚至还说，如果《基督山伯爵》能拍成电影就好了。华尼塔与玛丽亚还告诉我，她们俩曾经在卢里坎乔区的冷饮厂工作过几年。工厂倒闭后，就在“共同行动”教团工作，教团给她们一点钱，可以勉强维持她们的生活。为什么玛伊塔第一次见到她，就能推心置腹地谈起来？为什么一个修女能引起他的好感？因为修女是他新近结交的朋友的姐姐吗？因为他一想到学生时代的坚定信仰就感到惆怅吗？

“刚开始发生暴力时，我们确实很害怕。”玛丽亚说，“怕在我们这里也放上一颗炸弹，把什么都炸掉。可是，过了这么久，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虽然这个区有许多人在流血，在死亡，但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很尊重我们的。”

“你们家的人都是虔诚的教徒？”玛伊塔问她，“您没有遇到过麻烦吗？”

“与其说是信仰，倒不如说是习惯。”修女华尼塔嫣然一

笑，“大家不都是这样嘛！我是遇到过麻烦，也发生过动摇的。起初我对父母亲说，我要去当修女，他们都惊呆了，我妈妈似乎觉得她活在世上没有意思，而我爸爸说我等于行尸走肉。但是，现在他们都习惯了。”

“一个儿子当兵，一个女儿进修道院。”玛伊塔说，“格洛尼亚区上层人家都这样。”

“你过来，你过来，”巴列霍斯从桌子那边喊玛伊塔，“过来和家里的其他人聊聊。你别把我姐姐独占了，我们也很少见面。”

华尼塔和玛丽亚上午在“共同行动”教团办的小学校给孩子们上课。星期天，神父来这里时，学校就权作教堂，神父还带领居民作弥撒。神父最近不大来，因为不知谁丢了一个小炸药包到教堂里，爆炸了，使他吓破了胆。

“看来，并不是‘自由小分队’干的，而是小孩子们的恶作剧，他们知道神父胆子小。”玛丽亚说，“可怜的神父，对政治问题从来不感兴趣，而他唯一的缺点就是胆小怕事。他叫炸弹吓掉的肉不下十公斤。”

“你是不是认为我讲到他时，对他怀有一种仇恨的情绪？”华尼塔奇怪地作了个鬼脸。我发觉她并不随便发问，而是一直在思考问题。

“我没有发现。”我对她说，“我发现你讲到玛伊塔时，尽量不提他的名字。你总是拐弯抹角绕来绕去，而不是直呼其名。是因为哈乌哈事件吗？你肯定认为是他把你弟弟巴列霍斯推到那一步的，对吧？”

“我不敢说肯定，”华尼塔不承认，“也许我弟弟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尽管我觉得这样不好，可是这种仇恨的情绪又

不容易排除，但并不是因为哈乌哈事件。因为有一件事让我否定了自己。我和弟弟最后一次在一起时，我曾问他：‘你要变成一个无神论者，成为一个和你的朋友玛伊塔一样的人吗？你也将为此而献身？’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耸耸肩说：‘也许吧，姐姐，因为革命高于一切。’”

“红衣主教埃内斯托也说过革命高于一切。”玛丽亚提醒说。她又补充说，她也不知为什么，似乎觉得，就是与玛伊塔一起工作过的红头发神父把伊万·伊利奇神父以及埃内斯托红衣主教带到秘鲁来的。

“是的，是真的。如果那天下午我们聊天时，玛伊塔知道他讲的那些话在教会里也能听到，他该说什么呢？”华尼塔说，“那时，我已经觉得什么都乱了套，可是等到伊万·伊利奇来时，我简直目瞪口呆了。一个神父竟能说出那种话？我们的修女革命发展到那种地步还能叫无声革命吗？”

“但是，关于伊万·伊利奇，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玛丽亚接过华尼塔的话说，“你没有去听听埃内斯托红衣主教讲话吧？他讲的才叫好呢！在学校时，我们好几个修女特地请假到国立文化学院和帕尔多·阿里亚加剧院去听他讲话。”

“他现在是他们国家的一位部长，成了大人物，是吧？”华尼塔问。

“好吧，我跟你到哈乌哈去。”玛伊塔低声答应巴列霍斯，“不过，请千万要当心。尤其我听了你说的关于那几个小伙子的事情以后，我认为更有必要提醒你。同志，你知道，这叫造反。弄不好，你会把职业丢掉，甚至更严重的事情都会发生。”

“你倒给我讲起这个来了，不要忘记，每次咱们见面，都

是你对我进行煽动性宣传的。”

最后，两人都笑了起来，给他们送来咖啡的中国招待问他们笑什么，巴列霍斯说：“讲了个奥托·弗利兹的笑话。”

“下一次你到利马来时，咱们再订个日期，我到哈乌哈去。”玛伊塔许诺他，“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关于我去哈乌哈的事，你连一个字也不要对你的那些人提。”

“保密，保密，你就知道保密。”巴列霍斯不耐烦地说，“我早就知道，安全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是也不能太谨小慎微。关于保密的问题，我倒想给你讲一件事，你愿听吧？彼波特，就是在你姨妈家跳舞的那个小子，把阿尔茜给我夺去了。我去看她时，他正好在她家，两个人手拉着手。她对我说：‘这是我男朋友！’就这样把我给冷淡了。”

巴列霍斯有说有笑，看来不以为然。玛伊塔又再三嘱咐他，什么也别告诉圣何塞学校的人，也别告诉乌维卢斯先生，他们会吓一跳的。让巴列霍斯快点回哈乌哈去。于是两人握手告别，玛伊塔目送这位身着军装、腰板笔直而体格健壮的朋友离开杂货店①朝西班牙大街走去。当巴列霍斯渐渐远离时，他想，这已是第三次在这个地方喝咖啡了。这样谨慎吗？区政府离这儿就几步远，杂货店的顾客中难免有告密分子。他自己冒险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小组。谁告诉他这么做的呢？玛伊塔半闭着双眼，仿佛看到在三千米高原上，有几个满脸红斑的年轻人，头发平直，胸部宽阔。他看到他们在汗流浃背地踢足球，无比兴奋而激动。陆军少尉就在他们中间，仿佛年龄也与他们不相上下，只不过他更高大，更灵活，更有劲，更有经验。他像头山羊，满场奔跑，一会儿盘带，一会儿踢

① 秘鲁街头小杂货店有时兼营咖啡、啤酒、汽水之类食物。

球，一会儿顶球。踢完足球后，他看到他们都挤到一间土房子里，从窗户向外远眺，紫色的山巅上白云缭绕。小伙子们都在那里全神贯注地聆听陆军少尉演讲，他手里拿着一本列宁的《怎么办？》，不时地展示给他们看，“小伙子们，这是真正的炸弹呀！”而玛伊塔本人并未笑，他不想嘲笑他们，也不想把他对托派革命工人党同志们讲的话告诉他们。“他是很年轻，不过，是块好料子，虽然还不成熟，但可以干一番事业。”这时，他非常羡慕巴列霍斯，羡慕他年轻有为，热情奔放，甚至心灵深处感到对他怀有某种冲动之情。下一次托派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时，还要把哈乌哈的事提出来深入讨论，因为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当他从角落里的桌子边站起来时——帐已经结了，钱由巴列霍斯付了——发觉他的裤裆鼓鼓的。他的脸一阵绯红，全身抖动，欲望强烈。

“我们陪你走过去。”华尼塔说。

我们又站在门口议论了一会儿。天近黄昏，马上就要黑下来。我对她们说大可不必，因为我停车的地方离她们家足有一公里，何必让她们走那么远的路！

“并不是我们舍不得你走，而是因为我们怕再发生抢劫一类的事。”

“我现在没有什么好让他们抢的，”我对她们说，“只有这几把车钥匙和这个本子，上面记的事情也无足轻重。脑子里没有记下的，写小说怕也用不上。”

然而，无论我怎样劝阻，她们都不听。一出门便是臭气冲天的贫民窟，她们把我夹在中间，仿佛是我的两个保镖。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不忍目睹的景象：破旧的房屋宛如洞穴，垃圾堆、牲畜圈散发的恶臭扑鼻而来，儿童在其间玩耍，偶尔

还能见到几条饿狗，夹着尾巴，低头觅食。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在门口聊天，也有人在街上溜达，有说有笑，也有出言不逊、骂骂咧咧的。尽管我落脚十分小心，还是经常掉进小土坑里，而玛丽亚与华尼塔则走起来如履平地，好像每一个土坑都记在她们的脑子里。

“偷盗和抢劫比政治犯罪更猖狂。”华尼塔又说起此事，“这是大批人失业、吸毒的恶果。当然，在贫民窟偷盗从没有减少过，但是，过去穷人区的人只到外面去偷有钱人。失业、吸毒、暴力使人们之间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了。现在穷人之间也互相残杀起来。”

她又补充说，这个问题现在变得相当严重。只要天一黑，凡是打这个区走的人，身上没有不带刀子的，除非忘记带了，要不就是醉汉，把凶器丢了。他们都知道，要是不带刀子，就可能遭到抢劫。小偷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家偷盗，而抢劫往往酿成流血事件。人们已经到了绝望而走投无路的地步，因此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例如，几天前人们碰到一个家伙正企图强奸一个小女孩，人们把他逮住，浇了一身汽油，把他活活烧死了。

“就在昨天还查出一个可卡因提炼室。”玛丽亚说。

面对这一切，玛伊塔又作何感想？那时，毒品实际上并不存在，仅仅是夜生活放荡的人用来逢场作戏而已。而如今……我听说在医疗站买不到成药，而且到了晚上还得把药品带回家放在箱子里，因为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进去偷，不管什么都偷，瓶、丸、散、片。他们不是为了治病，治病要有药方，而且不花钱，他们是偷去吸毒。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成药都有可卡因，因此偷到什么吃什么。常常有的小偷第二天不得不到医疗站治病，因为他们偷吃药而拉肚子、呕吐或

者发生更严重的情况。贫民窟的男孩子们则把偷到的药就着香蕉皮、曼陀罗叶、浆糊等一切能找到的东西一起吃。面对这一切，玛伊塔会说什么呢？我是无法猜出的。此外，我尽力回忆他的形象，然而怎么也不能集中精力。我眼前宛如一团鬼火忽隐忽现，上下飘忽不定。

当我们走到垃圾堆时，听到许多猪正在拱翻觅食，这里的味道更加难闻，简直叫人忍受不了。我一再让她们回去，但她们不听。华尼塔说，垃圾堆这一带最危险。我不能集中精力回想玛伊塔。为什么呢？因为面对着这样一些现象，玛伊塔的事显得微不足道了。玛丽亚说，凡是外面来的女人总少不了被抢劫。

“这一带还是野妓活动的场所。”华尼塔补充说。我想，面对着这类无耻行径，玛伊塔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又能做些什么呢？实在令人痛心疾首，对吧？为了生存而出卖肉体。但是，就在这垃圾堆边，在猪群中间……

“还不是因为她们有主顾。”玛丽亚打断她的话。这种想法不对头。如果我也学那位加拿大神父，因为悲观失望而不写我的小说，对任何人也无妨，但一本小说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悲观失望则啥也不是。她们俩晚上在这个区工作感到安全吗？多亏上帝保佑，到目前为止，任何意外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甚至发狂的酒鬼也没有对她们无礼。

“也许我们太丑了，引不起别人的注意。”玛丽亚朗声大笑。

“两个大夫被抢过。”华尼塔说，“但是，他们照常来服务。”我想继续和她们谈下去，我发现我心不在焉，忽然想到玛伊塔，忽然红衣主教兼诗人埃内斯托的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大约十五年前他到利马来时，我见过他，他的演说使玛丽亚大

为震惊。我没有告诉她们，我也到国立文化学院及帕尔多·阿里亚加剧院听他发表过演说。我对他的讲话印象也非常深刻。同样，我也没有告诉她们，我后悔不该去听诗人讲话，因为过去我喜欢读他的诗作，但从那以后，我就不看他的东西了。这正确吗？这两者之间难道有联系吗？也许有联系，但我说不清楚。联系是有的，我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他打扮成格瓦拉的模样，用蛊惑人心的言词回答听众席上一些人煽动性的问题。他的讲话甚至博得了那些最顽固分子的鼓掌欢迎。他说，天堂与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任何区别；宗教界的人都是男盗女娼，而革命会使他们变成高尚的人，就像古巴发生的那样；资本主义的老窝梵蒂冈总是保护有势力的人，而现在变成了五角大楼的附庸；古巴和苏联只有一个政党，卡斯特罗要党员都做高尚的人，做群众的楷模，这和教会的主张不谋而合；有人喋喋不休地攻击苏联集中营里的强制劳动，难道应该相信资本主义的宣传？最后他又站在剧院的台子上挥动双手向全世界揭露，由于美国的导弹试验而引起新近尼加拉瓜的风暴……直到现在，对他的虚情假意及歇斯底里的喊叫，我仍然记忆犹新。从那以后，我尽量避免去见我喜欢的作家，以便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每当我读到他的作品，他的这个形象就出现在我的脑际，就像硝酸一样腐蚀他的作品，使得我不忍卒读。

我们已经走到轿车跟前。有人把靠司机座位的门撬开了。小偷什么也没有找到，气急了就把坐垫划破，座位上水汪汪的，表明他们在上面撒了泡尿。我对华尼塔和玛丽亚说，我得感谢他们，因为这样一来，我非得换座垫不可，它本来就很旧。她们则难过而惋惜地安慰我一番。

第　四　章

“故事迟早是要写的。”参议员说，他挪动一下身子，以便使受伤的腿更舒服些，“我是说真人真事，而不是道听途说，当然，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曾提出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谈谈，但他坚持要在议会的酒吧里。正像我担心的那样，我们的谈话不时被打断：一会儿进来个议员，一会儿闯入个记者，有的向你问好，有的和他开玩笑。他是最受欢迎的议员之一，由于遭到袭击，腿瘸了。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我一再给他解释，我不是写一部关于玛伊塔真实的故事，现在只是尽可能搜集有关他的材料、人们对他的看法，以便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他眨巴着一对小眼睛，不信任地打量着我：

“现在，不该做任何不利于左派民主统一发展进程的事情。我们正在努力统一，在目前条件下，只有左派统一起来才能拯救秘鲁。”他低声抱怨，“虽然玛伊塔的事已过去二十五年，但它可以勾起人们的痛楚。”

参议员骨瘦如柴，但谈吐自如，西装革履，满头银发，叼着个烟嘴。兴许是受伤的腿妥隐隐作痛，只见他不时地用手揉

搓。他写东西准确无误，这是一位政治家不可缺少的。这一点成为他打开贝拉斯科将军政权大门的钥匙，他被选中做将军的顾问。贝拉斯科军事独裁时，大部分好听的词藻是他发明创造的，军政府因此而获得一个进步军政权的美名，而他本人又兼任一家被没收的日报主编。贝拉斯科将军的讲话稿是他起草的（尽管有些法律学方面的词汇，军事独裁者说起来很拗口），他在军政权中代表最激进的一派。现在，参议员卡姆波斯则是一个折衷派和事佬。极右派、毛派极左分子以及托洛茨基分子都激烈地攻击他。游击队宣布将把他处死，自由分队也宣布他被判死刑。尤其是自由分队——它是我们曾经生活过的荒唐年代的余孽——断言，他是造反分子的秘密头目。几个月前，一颗炸弹把他的汽车炸毁，司机受了伤，他的腿被炸断，因而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谁丢的炸弹呢？不得而知。

“但，总之……”当时我想大概没法和他讲下去，便准备告辞，他忽地叫唤起来，“既然您已经了解了这么多情况，就不应忘记一件重要的事：玛伊塔替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过，而且也很可能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效过劳。”

“这不是真的。”玛伊塔抗议。

“是真的。”阿纳托里奥反驳他，“列宁与托洛茨基一向谴责恐怖主义。”

“行动本身并不是恐怖活动，”玛伊塔说，“而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起义行动。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也谴责这个，那他们一生中又做过什么呢？阿纳托里奥，你相信好了，我们忘记了主要任务。我们的责任是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头等重要任务。这件事还要一个陆军少尉来提醒我们，真叫人难

以置信。”

“至少，你应该承认列宁和托洛茨基是谴责恐怖主义的，对吧？”阿纳托里奥暂时退让了一步。

“在承认差别的前提下，我也反对恐怖主义。”玛伊塔同意他的看法，“盲动恐怖主义脱离群众，使人民远离先进分子。我们和它有点不同：我们是点燃导火索的火星，引起泥石流的雪球。”

“你今天像个诗人。”阿纳托里奥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笑声冲出这小小的房间，传到屋外。

“诗人我倒不是。”玛伊塔想，“但是充满幻想，感到年轻有为。”

许多年来，他确实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乐观主义，仿佛堆在他周围的书报慢慢地燃烧起来，他感到浑身热乎乎的，飘飘然腾空而起。这就叫幸福吗？他认为，这次在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全会上的讨论，是许久以来最令人激动而鼓舞人心的一次。开过会后，他先到塞古拉剧院的小广场上待了一会儿，然后又到法新社，在那里从事文字翻译近四个小时。尽管很忙碌，可他心里却感到轻松愉快；因为他提交的关于陆军少尉的情况报告以及巴列霍斯的计划提案，都得到全会的批准。

“工作基础，行动计划。”玛伊塔想，这些黑话没人懂。决议一旦被批准，就应立即投身到革命行动中去。讨论时，他信心十足地把观点阐明得一清二楚。他发言时，同志们都专心致志地听着，没有人打断他的话，他们都被感动了。是的，这个计划是可行的，但必须有一个革命组织，譬如，托派革命工人党去领导，而不是让一个只有良好动机而没有坚实思想基础的青年去领导。他半闭着眼睛，一幅画清晰地浮现在

他的脑海：一支得到城市市民支持的全副武装的先锋队，对其战略目标及每一步战术行动都了如指掌，将成为秘鲁革命的核心。它将像一根导火索一样引起革命的熊熊烈火。难道在秘鲁这样一个国度里，阶级矛盾在远古时代业已存在，革命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由这样一个核心作为起点，通过大胆的武装行动及宣传，便会逐渐创造革命的主观条件，工人、农民也就会投身到革命中去。想着，想着，直到坐在床头的阿纳托里奥欠起身来说话时，才使他回到现实中来。

“我去看看是不是还在排队，要不我真得拉到裤筒里了，我实在憋不住了。”

阿纳托里奥已经下去看过两次，仅有的两个大便池总是有人站在那里等候。玛伊塔看见他出去时弓着身子，双手捂着肚子。今天阿纳托里奥来了，这太好了！今天终于发生了一件重要事情！今天开始了一件新事，这样便有人和他一起共享会后的喜悦。“党发生了质的飞跃。”他躺在床上，右胳膊垫在头下，心想。托派革命工人党通过了跟巴列霍斯合作的提案，并且任命一个行动小组（由哈辛托同志、阿纳托里奥同志以及玛伊塔本人组成）负责拟订一个活动日程表。决定派玛伊塔到哈乌哈去看看巴列霍斯的那个小组都由哪些人组成，了解一下他们与曼塔罗山谷的农民有些什么接触。然后行动小组的其他两名同志也到山区去，以便共同协调工作。托派革命工人党的会议在一片欢笑声中结束。玛伊塔就是怀着这种极其兴奋的心情来到法新社翻译电文的，怀着同样喜悦的心情回到他的房间的。走到胡同口，他发现一个年轻人在半明半暗的暮色中笑得合不拢嘴巴，原来是在等候他。

“我太激动了，想来找你聊聊。”阿纳托里奥说，“你很累吗？”

“累什么呀！咱们上去吧。”玛伊塔朝他肩上拍了一下，“我也十分激动。就像巴列霍斯说的，这是百分之百的炸药。”

有过不少谎言、传说、影射，甚至圣马科斯大学的校园里有一份传单，指控玛伊塔。指控他什么？说他是间谍？说他是告密分子？后来有两篇文章明白无误地谴责他的行动。

“说他是告密分子？”我代替参议员说出来，“可是你们原来……”

参议员作了个手势，不让我继续说。

“我们那时也是托洛茨基分子，和玛伊塔一样，攻击我们的人都是些亲莫斯科分子，因此，开始我们不予理睬。”他给我解释，说完耸耸肩膀，“他们每天攻击我们革命工人党是大杂烩。托洛茨基派也好，莫斯科派也好，里面都有该隐①分子。对此他的信条是：离得最近的敌人最坏，务必消灭它，哪怕与魔鬼达成协议。”

这时，一位新闻记者走过来问他：据报上说，因为他怕被谋害，便借口重新给腿动手术要溜到外国去。这则消息是否真实？他笑了笑说：“纯属造谣中伤。只要不被杀死，我将永远和秘鲁人民在一起。”新闻记者听了他的话，满意地离去了。我们又要了一杯咖啡。参议员又接下去说：“我知道，像我们这些议员大人们，每天能有几杯咖啡喝，称得上特权人物；而对其他秘鲁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奢侈，然而，这种现象不会继续太久了，议会咖啡库里的存货已所剩无几了。”接着大家又自言自语地谈及战争的危害：配给定量，无安全感，以及最近人们因谣传外国军队将要入侵而感到的恐惧不

① 该隐：亚当与夏娃之长子，嫉妒其弟阿维并将他杀死。

安。

“事实是，莫斯科同志们的报告都是经过核实的。”他继尔又说，“消息肯定来自上面，莫斯科，克格勃。从那里，他们得知玛伊塔的两面派行为。”

他往烟嘴里插上一支烟，点上火抽起来，揉揉腿。倏地，他的脸色变得忧郁，仿佛自己问自己，是不是因为他泄露内情太多？他和我的老同学玛伊塔曾经在同一个党待过，有过共同的政治抱负，一起从事过地下工作，受到过迫害，但他又不能对我说玛伊塔是清白无辜的。

“您知道，监狱，玛伊塔进出过好几次。”他把烟灰掸到空咖啡杯子里，“说不定就在牢房里会强迫他替他们工作，有人坐牢越坐骨头越硬，而有的人则是软骨头。”

他瞧瞧我对他的话有何反应。我发现他泰然自若，坚信没有人能辩得过他。他为什么仇恨自己党内的老同志呢？

“这种事很难拿到证据。”

很久以前，有一天，玛伊塔围着一条沾满油垢的围巾，把一个写着姓名、地址以及标有地图的小本子交给一个身穿便衣的军人和一个不大会讲西班牙语的外国人。

“根本不可能弄到证据。”他纠正我的话，“然而，有一次得到了证实，他迫于形势而不得不如实供出。那是在贝拉斯科将军年代，我们发现，实际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导着我国的情报部门。有一份名册上出现了很多名字，其中就有玛伊塔。”他回忆起几件事情，因而得出结论说：“玛伊塔自从认识巴列霍斯以后，行动可疑。”

“这种指控太可怕了！”我对他说，“他是军队的特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谍报人员，而且同时又是……”

“特务，内奸，似乎言过其实，”他进一步解释，“可能是

通风报信，但同时又是他们的牺牲品。您采访过其他认识玛伊塔的人吗？”

“您找过莫伊塞斯·帕尔维·莱伊巴，他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莫伊塞斯参加了哈乌哈事件的全部准备工作，甚至，哈乌哈事件的前一天晚上，他见过玛伊塔，他知道好多内情。”

参议员会对我说莫伊塞斯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不会的，他永远也不会对“发展行动中心”的主任莫伊塞斯提出类似的指控。他清楚地知道，莫伊塞斯给他出版过两本有关社会政治学方面的研究著作，而且其中一本是莫伊塞斯与他合写的。

“莫伊塞斯是一个谨慎的人，知道为捍卫利益而斗争。”他略显难堪地说，“他现在的信条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是最好的哲学，如果一个人想避免麻烦的话。然而，不幸的是，我可不是他这样的人，我一向是直言不讳的。正因为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才被人把我的腿给炸坏了，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会因此而丧命。正因为我是这么一个人，才能毫不惭愧地看待我自己的家庭。”

他低头沉思，仿佛一谈到自己的经历就感到惶惑。

“莫伊塞斯对那时的玛伊塔有什么看法？”他问我，同时总低着头看我的鞋尖。

“玛伊塔是一个天真而又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我对他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者，虽然有些鲁莽，有时又喜欢闹事。”

参议员又陷入沉思，咖啡店内烟雾缭绕。

“那时就有人劝他别把事情揭开，以免将来不好收拾。”他停了一下，笑笑，又继续说，“不是别人，就是莫伊塞斯指控他是内奸，因此，那天晚上，我们把他开除出托派革命工

人党。”

他使我哑口无言，小小的咖啡店变成了审判庭，我仿佛看到年轻时代的莫伊塞斯手中拿着一叠证据，雷鸣似的吼叫着：告密分子！告密分子！而我的老同学玛伊塔，面对着他们这些思想家则吓得脸色铁青，身体蜷缩一团，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门开了，阿纳托里奥走了进来。

“我以为你打水去了呢。”玛伊塔边欢迎他再次上来边说。

“啊，现在我喘气舒服些了。”阿纳托里奥笑笑，顺手把门关上。他用凉水把头和脸洗了洗，并且在胸前抹了几把，身上还滴着水珠。他手里拎着衬衣走了进来，小心地把衬衣放在床上。这时玛伊塔发现：这小伙子很英俊！袒露的上身肌肉很匀称，胸毛上挂满了晶莹的水珠，他的胳膊修长。玛伊塔记得，四年前，在土木建筑工会的一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他。玛伊塔讲话时，几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不时地打断他，当然，攻击的言词无非是老调重弹，说什么托洛茨基与托洛茨基主义是希特勒的同盟军，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华尔街大亨们的走狗。其中攻击得最厉害的一个年轻人，长着一对大眼睛，一头深栗色的头发，坐在第一排，他就是阿纳托里奥。玛伊塔有必要反驳他吗？虽然他措词激烈，但不知为什么，玛伊塔觉得那个青年人挺可爱。玛伊塔想接近他，但想到自己不善于交际，怕谈不拢，也就放弃了这种想法。不过，散会以后，当他们离开工会时，大家都已经心平气和了，玛伊塔便走到他跟前，并邀请他一起去喝杯咖啡，说：“喝完咖啡继续辩论。”他欣然接受。过了不久，阿纳托里奥即成为了托派

革命工人党的一员。他经常对玛伊塔说：“同志，是你把我脑袋里的耶稣教义洗得一干二净。”这是事实，玛伊塔曾经对他作了大量细致而灵活的工作。借书和杂志给他阅读，并且动员他参加一个由玛伊塔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请他喝了无数次咖啡，一次次耐心地给他讲解托洛茨基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将要进行一次消灭官僚、消灭专制和腐化的革命。而现在，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就在他眼前袒胸露背，正在微弱的灯光下平整他自己的衬衣。他想：“自从我和巴列霍斯认识以后，再没有梦见过阿纳托里奥。是的，一次也不曾梦见过他。”幸好阿纳托里奥也分到行动小组。在党内，他与阿纳托里奥最合得来，玛伊塔对他的影响也最大。阿纳托里奥很遵守时间，玛伊塔多次和他约定到团结广场或阿根廷大街的工厂门口卖报或散发传单，虽然他住在卡亚俄港，路程很远，但从来没有迟到过。

“这么晚，我懒得走了……”

“如果你不嫌挤，就住下吧。”

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都在玛伊塔的斗室内过过夜，有时候几个人一起来，有时候先来几个，后来几个，大家索性挤在一处。

“我留在这里过夜，你会睡不好的。”阿纳托里奥说，“你应该弄一张大床，以备急用。”

玛伊塔笑笑。他有些冲动，身体的一个部位硬梆梆的。他赶忙想哈乌哈的事，以便分散注意力。

哈乌哈事件之后，他们把玛伊塔开除出党了吗？

“在哈乌哈事件之前，”参议员纠正我，看到我表情诧异，他有些得意，“就在哈乌哈事件之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

家的提案似乎是想请玛伊塔退出托派革命工人党。这样做是向敌人表明，他和我们无关。不过，事实是他先被开除出党，尔后就发生了哈乌哈事件。我们知道，一旦出事，再也来不及弥补了。您还记得，事件之后对我们实行过大镇压吧？有的人被捕，没有被捕的同志转入了地下组织。玛伊塔早已被人们忘却。朋友，这就是历史。许多人不清楚哈乌啥事件是怎么回事，但它引起了反革命的报复，结果玛伊塔与巴列霍斯成为英雄……”

参议员又陷入沉思。无疑，他是在考虑这件事的荒谬性。我索性不打断他，让他去思考。那位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玛伊塔参与这样一次冒险行动，用心何在呢？难道他是个两面派分子，就为着坑害党内同志才这么干？这个想法太可怕了。这种事在一本小说里是很难说清楚的，因为我的小说毕竟不是一本侦探小说，可以离开现实胡编乱造。

“现在看来，这事毫无意义，”参议员补充说，“因为他们失败了。敌人曾想把左派消灭干净，但仅仅是几年的事。后来发生了古巴革命，一九六三年发生了哈维尔·埃拉乌德事件，一九六五年革命左派运动游击队和民族解放军起义，一个接一个都失败了。这对那些热衷于搞暴力革命理论研究的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现在他们终于自愿自觉地放弃了，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这并不是革命，而是一次恐怖活动。谁曾想到过，秘鲁会发生这么大的屠杀？”他看看我，“现在，事实说明玛伊塔和巴列霍斯干的那件事没有意义。我敢肯定，现在没有人记得那件事了。总之，不就这么回事吗，还有什么好说的？”

“巴列霍斯！”我对他说，“他也是个挑动分子？”

他吸了一口烟，把烟气吐向一边，以免喷到我脸上。

“没有证据说明巴列霍斯是挑动分子，他也许是玛伊塔的工具。”他又捕风捉影地说，“很可能是这样，不对吗？玛伊塔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而另一个则是个没有经验的小伙子。不过，我再对您重复一遍，没有证据。”

他讲话的语调始终是温和的，一边讲，还不时地向进出咖啡店的人打招呼。

“您知道，玛伊塔参加过许多党，”他补充说，“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左派。仅仅是因为他反复无常才喜欢这样做？虽然我非常了解他，也难以下结论。他像一条鳗鱼，一溜身就不见了，没有办法深入了解他。虽然他有时入这个党，有时入那个党，有时和这些人在一起，有时和那些人在一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参加过所有的进步组织，或是接近过所有的进步组织。您觉得他的历史可疑？”

“他不是也蹲过所有的监狱吗？”我对他说，“在管教所待过，在第六监狱、弗隆东监狱都待过。”

“我认为他在狱中呆的时间不长。”参议员暗示，“他进过许多监牢，哪一个也没有待久，但是，他的名字确确实实出现在情报部的名单里。”

参议员讲起玛伊塔时心平气和，一点厌恶之意也不流露。他说玛伊塔是个两面派分子，对一向信任他的同志们，当面说好听的，背后捅刀子。他组织暴动的结果是招来反动派对左派组织的大镇压。别看参议员此刻心平气和，实际上对玛伊塔恨之入骨。他指责玛伊塔的那一席话，并非信口开河，而是在头脑中酝酿已久，而且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不知对其他人说过多少遍。他如此仇恨玛伊塔有无道理？难道他仅仅为了贬低玛伊塔在自己记忆中的形象？这种仇恨究竟为什么呢？

是政治性的，是个人恩怨，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确实是个骗局。”他利用一根火柴棍把烟蒂抠出，丢在烟灰缸里灭掉，“起初我们就有疑心，但我们又觉得不大可能，他搞的这个伏击，隐蔽得可是太妙了。一次绝妙的军事行动。”

“您当时就认为那是情报部伙同美国中央情报局搞的一个圈套？”我打断他的讲话，“目的是要消灭一个只有六个人的组织？”

“六个人，六个？”参议员卡姆波斯笑笑，“您不要忘记玛伊塔，连他是七个人。”不过，他这时变得严肃起来，“伏击的目的不仅是托派革命工人党，而是所有左派组织。这是一次防患于未然的军事行动。敌人想从根本上把发生在秘鲁大地上的任何革命尝试都扑灭。然而我们还是发现了他们的阴谋，暴动虽然发生了，敌人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损失很少，正是我们托派革命工人党使其它左派组织免遭敌人血腥屠杀，国家才有现在这个局面。”

“托派革命工人党是怎样粉碎敌人的埋伏的？”我反驳他，“哈乌哈惨案最后还是发生了，难道这不是事实？”

“我们使敌人百分之九十的阴谋没有得逞。”议员进而明确指出，“敌人的预谋只实现了百分之十，我们有几个人被捕？有几个人被迫转入地下？也就有四五年我们不敢活动。不过，并没有消灭我们，敌人是想这样做的。”

“但是，付出的代价不是很高吗？”我对他说，“因为玛伊塔与巴列霍斯毕竟……”

这个阿拉伯人的后裔打断我的讲话。

“当挑动分子和告密分子是有危险的。”参议员严肃地说，“结果是必然的，他们俩失败了，也付出了代价。凡是干这一行的，下场不都是这样的吗？此外，还有一个证据，您可以

看看活下来的人，他们当时怎么样？尔后又怎么样？现在都在干什么？”

显而易见，这些年来，参议员卡姆波斯变得没有一点儿自我批评精神了。

“我总以为革命必须从总罢工开始。”阿纳托里奥说。

“你这是索雷尔①思想，是无政府主义的。”玛伊塔嘲笑他，“不管是马克思、列宁，还是托洛茨基，都不曾说过，实行总罢工是唯一的革命方法。你忘记了中国革命？毛泽东说过什么？总罢工还是革命战争？靠里坐坐，你要掉下去的。”

阿纳托里奥从床沿上往里蹭蹭。

“如果计划能够实现，在秘鲁，士兵和人民就无法互相支援，”阿纳托里奥说，“那将是一场无情的战争。”

“我们必须敢于冲破那些陈旧的框框和空洞的教条。”玛伊塔侧耳细听，听外面有什么动静，因为每到这时候，外面总有响动。尽管他内心很不平静，却不想和阿纳托里奥谈论政治问题。谈论点什么呢？随便谈什么都行，但千万别谈论他们党员间建立起来的团结与友谊。接着，他又补充道：“对我来说就更难了，因为我比你年纪大。”

床太小，两个人睡太挤，稍微一动，床便吱呀作响，他们俩都脱掉了衬衣和鞋子，只穿条裤子。他们关上灯，对面街灯的亮光从窗户里射了进来，一只发情的猫在远处阴森可怖地叫着。夜深人静。

“我对你讲一件心事，阿纳托里奥。”玛伊塔说。他仰面

① 哥尔吉斯·索雷尔（1847—1922）：法国作家、政治家、革命工团主义思想的创始人。

而卧，总是喜欢把右臂放在头下，把枕头加高。几个小时之内，已经抽完了一包香烟。尽管心脏在扑通扑通急速地跳动，可他还是想吸烟，憋得难以忍受。尔后，他告诫自己：玛伊塔，安静些，现在你可别胡来。千万不能，玛伊塔。“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就要来到。阿纳托里奥，肯定这样。”

“这是我们大家的重要时刻，”小伙子响应他，“是我们党生命的重要时刻，但愿也能成为秘鲁的重要时刻。”

“你不一样。”玛伊塔说，“你还很年轻，还有帕雅尔蒂。你们的革命生涯刚刚开始，而且开门大吉。我已经年过四十了。”

“过四十岁就叫老？不是说这叫第二次青春吗？”

“更确切点儿说，是第一个衰老阶段。”玛伊塔吞吞吐吐地说，“我在党内干了二十五年。最近几个月，最近这一年，尤其是咱们党分裂之后，我们仅剩下七个人，我耳边总是回响着一句话：白浪费时间。”

周围一片寂静，只有母猫的叫声打破了沉寂。

“我有时候也心灰意懒。”他听到阿纳托里奥说，“事情没有办好时，就这样，人大概都这样，但是，你也这样悲观倒使我惊奇，我一向钦佩你的乐观主义精神。”

天气闷热，他们俩的小臂紧靠在一起，都已渗出湿漉漉的汗水。阿纳托里奥也仰卧在床上，凭借半明半暗的路灯，玛伊塔瞅见阿纳托里奥的一双赤脚与他自己的双脚并排地靠在床边。他想：只要一翻身，他们的脚准能搭在一起。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玛伊塔尽量掩饰内心的不快，“我不是因为献身革命而悲观失望。对革命，我从来没有失望过。每当我走到街上，我便发现自己是植根于一个什么样的国度，我清楚地懂得，没有什么比革命更为重要的事情。我感到悲

观是因为时光已经流逝，是因为我选择的这条道路。”

“如果你敢对我说，你后悔信仰列·达维多维奇，后悔信仰托洛茨基主义，我就把你宰了。”阿纳托里奥开玩笑地说。“叫我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呢？”

然而，玛伊塔无心开玩笑，一方面他感到激动兴奋，一方面又感到苦恼。心脏剧烈地跳动着，他想：阿纳托里奥肯定听得见。小房间内的书上、纸上、杂志上落满了灰尘，微风一吹，散落到鼻子里，弄得鼻子直痒痒。玛伊塔毫无道理地想：忍着，千万别打喷嚏，否则就会死的。

“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阿纳托里奥。为一些与客观现实毫不相干的问题，我们成天无休止地争论，脱离群众，没有在人民中扎根。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场什么革命？你还很年轻，而我干革命干了这许多年，结果是革命毫无进展。今天，我第一次感到我们前进了，革命已经不再是一个幽灵，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事物。”

“别说了，老兄。”阿纳托里奥对他说，同时伸出手朝他腿上拍了一下。玛伊塔微微一动，心想：与其如此亲热地拍打，倒不如让阿纳托里奥狠狠地揍一顿。“今天在会上，当你建议立即投入行动时，你说：我们还要毫无作为地争论到哪年哪月？这话打动了我的心。你从来没有讲得那么好，那么情绪激昂。那时我想：现在咱们就到山区去，还等什么呀？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真的。”玛伊塔把身子侧向阿纳托里奥，尽力睁大眼睛，端详着他的侧影：没有皱纹的前额上耷拉着一撮卷曲的头发，洁白的牙齿，微张着的嘴巴。他背后便是书架，上面的书籍模糊不清。

“我们就要开始一种新生活。”玛伊塔低声细语地对他说，“从洞穴走到外面，从搞秘密活动的库房、咖啡馆里走到群众

中去开展工作，去打击敌人。我们去和群众打成一片，阿纳托里奥。”

他的脸紧贴在年轻小伙子的肩上，皮肤味直冲鼻底，令他陶醉，如痴如狂。他那蜷缩着的膝部，紧挨着阿纳托里奥的腿。灯光半明半暗，阿纳托里奥一动不动地呆着。他睁着眼睛吗？胸脯随着有节奏的呼吸上下起伏。他把右手轻轻地伸进阿纳托里奥的裤裆里：“让我给你泄泄精吧！”他对阿纳托里奥窃窃私语，同时自己感到无比冲动，“让我给你玩玩，阿纳托里奥。”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没提到，如果我们想深入下去，就必须谈一谈。”参议员叹息道，或许他感到有难言之隐，“当然，您知道，玛伊塔是个同性恋者。”

“在我国不少人利用这个问题攻击对方。这也是难以证实的。难道同性恋与哈乌哈事件有联系？”

“是有联系，可能正因为这个，才让人抓住把柄。”他补充说，“就是因为这个，他才陷入困境，敌人才得以迫使他为其工作。这是他的一个致命弱点，只要你替他们干一次，以后就非得干下去不可。”

“据莫伊塞斯说，玛伊塔结婚了。”

“所有的鸡奸者都结婚。”参议员笑笑，“他们利用结婚作掩护，结婚只是逢场作戏，掩人耳目。他的婚姻是个悲剧，没过多久就散伙了。”

参议院或是众议院的会议开始了，人们相继步入会场，接着便传来一阵摆放会议文件夹的窸窣声和扩音器里的讲话声。酒吧空无一人，都走光了。参议员卡姆波斯低声对我说：“我们要向部长提出质询。议会要他明确答复，是否有外国军

队进入本国领土。”但是，他似乎不急于离开，继续站在客观立场上往下讲，把他对玛伊塔的憎恨掩饰得一丝不露。

“可能根源就在这里。”他想了想说，一边玩着烟嘴，“一个同性恋者值得人信任吗？他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一个女人气十足的人。这样的人经不起考验，容易背叛。”

他越讲越起劲，可逐渐离开了话题，既不谈玛伊塔，也不谈哈乌哈事件，而滔滔不绝地讲起同性恋的阶级差别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密切联系。否则，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同性恋？这并非偶然，并非因为他们那个制度的环境宜于造就道德完美的人。然而，遗憾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支持秘鲁的暴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有许多东西值得学习。在那里，没有懒汉，人们精神充实。而精神空虚颓废乃至怀疑人们生而就有的男女有别，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文化。鸡奸者就是这种文化的产物，结婚也丝毫不能使他们改变。

“你不觉得羞耻吗？”玛伊塔听到阿纳托里奥说，“咱们是朋友，我在你家里过夜，你这么干不感到耻辱，玛伊塔？”

阿纳托里奥起身坐到床边，胳膊肘支撑在膝盖上，双手抱着头。窗外的路灯灯光洒在他的背部，光滑的皮肤呈现出深绿色，胸腹肋骨线条异常分明。

“是的，我是感到羞耻。”玛伊塔吞吞吐吐，费了好大劲才迸出上面一句话，“请把刚才这事忘掉吧！”

“我认为我们是朋友……”小伙子声音颤抖，背对着他，既气愤又蔑视，“真叫人扫兴，他妈的！你以为我是个鸡奸者。”

“我知道你不是。”玛伊塔低声说。刚才他还兴奋、冲动，而现在感到浑身颤栗。他企图回想起巴列霍斯，想象他到达哈乌哈时的激动而净化灵魂的时刻。

“你别说了，我已经够难受的。”

“你认为我心里好受吗？他妈的。”阿纳托里奥尖声说。他身子动了一下，床随之吱吱响了起来。玛伊塔心想：小伙子可能会站起来穿上衬衣，然后嘭的一声把门关上走掉。然而，顷刻间床不响了，小伙子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你把一切都打乱了，玛伊塔。你多么愚蠢，你选择了一个好时机，正好是在今天。”

“难道发生了什么事？”玛伊塔低声说，“别孩子气啦。听你的口气，好像我们一切都完蛋了。”

“对我来说，从今天晚上起，你完蛋了。”就在这时，他们听到头顶上有窸窸窣窣的响声，时断时续，毫无节奏，令人心烦。陡然间，声音越来越急促，整个破旧的天花板都颤动起来，仿佛要塌下来砸到他们身上似的。继尔，又毫无动静。以往每当听到这样的声响，玛伊塔就感到一股无名的怒火涌上心头，而今天他则由衷地感谢。他感到阿纳托里奥在一动不动地侧身细听，暂时把玛伊塔刚才的愚蠢之举忘记了。而玛伊塔又想到他的邻居们，三三两两，四五成群，甚至有时七八个人挤在同样大小的房间里，就像摆弄带鱼似的一条挨一条。他们对脏臭、对声响并不那么敏感，然而，此刻他倒羡慕起他们来了。

“是耗子，”玛伊塔吞吞吐吐地说，“在天花板上，多极了，又打又闹，不过，一会儿就会停下来的。它们不会跳下来，别耽心。”

“我才不怕呢。”阿纳托里奥说。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我住的那地方，卡亚俄也有，不过都在地下，在下水道里，不在人的头顶上。”

“起初，我一个人很害怕。”玛伊塔说，现在他说话流利

些了，逐渐恢复了平静，喘气也匀称了，“我投放过耗子药，下过夹子，市里也派人来熏过。可都不顶事，就好了几天，后来又骚动起来。”

“猫比药和夹子管用。”阿纳托里奥说，“你得想办法要一只猫。否则，就在你头顶上打打闹闹，你他妈的受得了吗？”

远处，那只发情的母猫又淫秽地叫了起来，她可能与一只公猫配上了。玛伊塔听到猫叫，心悸得跳了一下，感到阿纳托里奥在私下窃笑。

“在托派革命工人党内部，曾经任命了一个行动小组与巴列霍斯一起准备哈乌哈暴动。您是小组成员之一，对吧？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没做什么，有几件事非常幼稚可笑。”参议员诙谐地笑笑，仿佛他一笑，这段历史便不值一提。无疑，这是一种手腕。“比方说，有一次，我们研磨木炭，干了一个下午，又买了些硝石粉和硫磺配制炸药。我记得，连一克也没有配成。”

他摇摇头，显得颇为得意，慢腾腾地点上一支烟，朝空中喷了一口，然后看着烟柱袅袅上升。这时，甚至招待员都走光了，议会的酒吧显得大了许多，从半圆型会场里传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议员暂时把我淡忘了，想着他自己的问题：“我希望议会能够让部长说实话，这样我们便可以明确知道美国海军进没进入秘鲁领海，是不是古巴人已经准备好从玻利维亚边境上侵入秘鲁。”

“在行动小组内，我们对玛伊塔的行迹感到可疑。”停了一会儿，他终于又回到话题上来，“在此之前，我们就注意观察他的行动，他当然不知道。就是从他突然认识那个军人那时起。一个陆军少尉要到山上干革命，我们应该支持他。那

是在一九五八年，时代不同于现在。这不令人怀疑吗？但是后来，尽管我们不十分信任他，还是去了哈乌哈。到了那里以后，才感到不对头。”

议员对玛伊塔和巴列霍斯的指责并不使我感到意外。使我惊奇的是他讲话的方法竟是如此迂回曲折，听起来实在令人费解。他讲起话来一个声调，没有抑扬顿挫之分，好像玛伊塔的双重性是一个定理那样乏味。同时，我试探了几次，一个确凿的证据也没有从他嘴里挖出来，全是猜想、猜测、假设之类的话，我越听越糊涂。“据传古巴人已经进来，在库斯科山区和布诺山区打游击的就是他们。”他惊叫着，“一会儿就会得到证实。”

我不得不把他拉回来：

“您能举出几个曾经引起你们怀疑的事例吗？”

“好多例子。”他马上接过我的话碴儿，同时吐一口烟，“个别的事实也许不能说明问题，但从许多个别事实联系起来看，就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您还记得某个具体的事例吗？”

“突然，有一天，他向我们提议联合别的政治组织一起暴动。他说，先联合莫斯科派，甚至他都事前与他们接触过。您听说过没有？”

“我确实闻所未闻。”我回答他，“所有的左派组织，如莫斯科派、北京派、托洛茨基派，后来都赞成联合组成统一阵线，协调行动，有人甚至主张组成一个党。为什么这个未成为现实的问题值得怀疑？”

“这是二十五年以后的事，”他讥讽地笑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不可能心血来潮地提出与莫斯科分子合作。在当时看来，这仿佛是梵蒂冈建议他的天主教

徒皈依伊斯兰教一样。这个建议本身就是自我暴露。莫斯科派对玛伊塔恨之入骨，而他也仇视他们，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这就等于说让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合作，可能吗？”他遗憾地摇摇头，“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我从来不相信。”阿纳托里奥说，“党内的其他人是这样认为的。我总是维护你，说他们这是污蔑的不实之词。”

“如果我谈这个能使你忘记刚才的事，那好吧，咱们就谈谈这个。”玛伊塔叹了口气，“如果你没忘记，那咱们索性不谈。阿纳托里奥，这可是一个很难的题目，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许多年以来，我都不理解。”

“你想让我走吗？”阿纳托里奥问他，“现在我就走。”

但是，他并没有动窝。为什么玛伊塔又想起隔壁的邻居们？他们一家老小几代人挤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大家共铺一块垫子，共盖一床毯子，室内空气龌龊，腥臭难闻。为什么他现在又想起他们来？要知道，他早已把他们忘却了。

“我不愿意让你走。”玛伊塔说，“我希望你忘记刚才的事，以后我们再也不要提起它。”

一辆破旧的汽车咯吱咯吱地响着从街上开过去，肯定车身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玻璃震得直晃动。

“我不知道。”阿纳托里奥说，“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忘记，会不会像过去一样对你。你是怎么了？怎么能做这种事？”

“既然你一定要我说，那我就对你说吧。”看来他下决心要说，这使阿纳托里奥大为惊奇。他闭上眼睛，怕舌头不听使唤，继续说：“开完中央委员会以后我很高兴。一想到我们终于要行动起来，我就好像变成另一个人……我那时的心情你是知道的，阿纳托里奥。就因为这个，是冲动、激情所致。

这太不像话，失去了理智。我常常想搂抱你，爱抚你。从我认识你以后，我常常有这种欲望。但是以前，我都能控制住自己，你是看不出来的。今天晚上，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我知道，你从来不会让我碰你的。我碰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最大的欲望就是让我给你玩玩。”

“我要向党报告，把你开除出党。”

“现在我必须走了，”参议员卡姆波斯忽然对我说，他看了一下手表，朝议会大厅瞧瞧。“将要讨论义务兵役制的问题。从十五岁起开始服役，您看怎么样，十五岁的小兵，有的可能还是小学生……”

他站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我感谢他为我的来访花了那么多时间，但是我也坦率地对他说，采访使我有些失望。他对玛伊塔的指控，以及仅仅把哈乌哈事件说成是一个骗局，我认为证据不足。他听后毫无愠色，仍然和蔼地笑着。

“我不知道我这样坦率地与您谈话合不合适。”他对我说，“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我自己知道。然而在这一件事情上，出于政治原因，我宁愿不要沾起稀泥，以免伤及别人。不过，总而言之，您是小说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如果您对我说，您将要写一本散文或者一本社会政治书，那我可能就无可奉告。一本虚构的小说，情况就不同。当然，信不信由您。”

我对他解释，别人给我提供的证据不管真假与否，对我都有用。他也许认为我对那些结论性的话持怀疑态度，他弄错了。我将借鉴的不是他提供证据的真实可靠性，而是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的色彩，他的戏剧般的力量。这一点，我要利用，我感觉他知道的远比他已经说出来的要多。

“你看我今天像个鹦鹉一样，喋喋不休地讲了一通。”他

回答我，丝毫不感到惊讶，“还有一些事情，即使活活地把皮给我剥下，我也不会说的。时间、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

我们走到门口，议会的走廊里挤满了人：前来会见议会各个委员会的人，身带笔记本的女记者们，佩戴袖章的各个党派的同情分子，一帮一伙地站在那里排队，要到议会大厅的各个走廊去。议会内正在辩论新的义务兵年限问题，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安全措施做到家了：持枪的警察，手握冲锋枪的调查部人员比比皆是。此外，还有议员们的私人警卫。因为不准许进入会场，他们都在过道里徘徊，他们的枪明晃晃的，子弹袋鼓鼓囊囊的。凡是进议会大厅的人都要受到警察的检查，必须打开提包和公文袋，看看里面是否夹带炸药。尽管检查得这么严格，最近仍然发生了两起爆炸事件。其中一起相当严重，就在参议员会议室里爆炸的，炸死两人，炸伤三人。参议员卡姆波斯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着，见了谁都打招呼，一直陪我走到出口。我们就从那些保安人员中间走过去，气氛十分紧张，仿佛脚底下到处都是地雷。我想，随便一件什么事，都会使议员们像座火药库一样爆炸开来。

“这里的空气多好啊！”参议员走到门口时说，“我在这里也不知道待了几个小时，空气让烟尘污染得很脏。好了。我已尽我所能。我烟吸得很多，我想这几天非得戒掉不可，实际上我已经戒过不下十二次了。”

他亲如家人地抓着我的胳膊肘，咬着我的耳朵说：

“关于咱们俩的这次谈话，我可是啥也没说，既没谈到玛伊塔，也未提及哈乌哈事件。谁也不能指控我在这种时刻利用往事挑起争议，从而加深民主左派之间的分裂。如果您点了我的名，我只好站出来辟谣。”他仿佛是在开玩笑，但我们俩心照不宣。虽然他说话声音很低，但却是对我的警告。“左

派决定不提这件事，而现在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将来有朝一日会把这丑事公布于众的。”

“假如你说我说过什么，那我就说纯属捏造。”他说着向我挤挤眼，又仿佛无意碰了碰他西装里的一个硬东西——手枪，并敲了两下，“不过真实情况你已经掌握，只要你不提我的名字，随便您怎么用都行。”

他热情地把手伸给我，同时又狡黠地挤挤眼。我发现他的手指短小而纤细，这样的指头怎么能扣扳机呢？

“你有时羡慕资产阶级吗？”玛伊塔说。

“你问我这个干什么？”阿纳托里奥感到莫名其妙。

“因为我一向蔑视他们，但有一件事我羡慕他们。”玛伊塔说。如果说出来，阿纳托里奥会取笑他吗？

“什么事？”

“每天能够洗澡。”玛伊塔满以为他说出来，小伙子会笑的，但他没露一丝笑意，继续坐在床沿上，只是稍微动了一下。这样，玛伊塔能够看清了他的侧影，瘦长的身材，表情严肃，棕色的皮肤，从窗户上射进来的灯光直接照到他的侧影上。嘴唇很厚，轮廓分明，犬牙利齿闪闪发亮。

“玛伊塔。”

“唉，阿纳托里奥。”

“你以为今后我们两人的关系还能像以前一样吗？”

“是的，还和以前一样。”玛伊塔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阿纳托里奥。莫非发生了什么事吗？你彻底忘掉它吧。”

又听到天花板上有短促而细小的声音，玛伊塔发觉小伙子紧张得直起腰来。

“这么大的声音，我真不知道你每天怎么睡得着。”

“没有办法。还能不睡觉吗？”玛伊塔反驳道，“不过，有人说，人类什么都能适应，这不对。我就不习惯该洗澡的时候不能洗。时间都这么久了，我竟记不起最后一次洗澡是什么时候。我想是在我姨妈家，她在苏尔基约区住，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然而，我天天想念那种生活。当我十分疲惫地回到家时，在院子里只能像猫洗脸那样洗洗，尔后打一盆水上来洗洗脚。那时我想：要是能够冲个淋浴有多痛快呀！往喷头底下一站，水把身上的污垢就全冲走了，把心事也给冲掉了，然后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阿纳托里奥，资产阶级的生活多好呀！”

“附近连一个公共浴池也没有？”

“有一个，离这里有五个街区，我每周去一两次。但洗一次澡的钱，够在大学生食堂里吃一顿饭。我可以活着不洗澡，但不吃饭可不行。你家里有淋浴？”

“有。”阿纳托里奥说，“问题是不时时有水。”

“你多幸运！”玛伊塔打了个哈欠说，“在这点上，你倒像个资产阶级。”

这一次阿纳托里奥仍然没有笑，两个人都默默无语地、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尽管天仍然是黑沉沉的，但窗外有许多迹象表明已届黎明时分：汽车发动机响声，喇叭声，难以辨别的说话声，行人走动声。大约五点？或许六点？他们俩一夜没合眼。玛伊塔觉得很累，就像是干了一件重活或者病后初愈那样软弱无力。

“咱们睡一会儿吧。”玛伊塔说，然后转身仰面而卧，用手捂住眼睛，并且尽量往里靠靠，腾出点地方给阿纳托里奥。“明天，确切点说是今天，还有许多事要干呢。”

阿纳托里奥啥也没说。过了一会儿，玛伊塔感觉到他挪

动了一下身子，床响了。玛伊塔偷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也仰卧在床上，于是尽量不去碰他。

“玛伊塔。”

“阿纳托里奥。”

玛伊塔等了半天。小伙子又啥也不说，只是感觉到他呼吸急促。玛伊塔又动了一下，感到周身热血沸腾。

“睡一会儿吧！”玛伊塔重复说，“明天，只想哈乌哈的事，阿纳托里奥。”

“你要是高兴的话，你就相信我，”玛伊塔听见他似有怯懦地小声说。接着好像恐惧似的补充道：“但是就这一次，玛伊塔。”

参议员卡姆波斯走开了，我站在议会大厦的楼梯顶上，看到对面街上人流、车流——小汽车、公共汽车、小公共汽车如潮水般涌来。玻利瓦尔广场上人声嘈杂，过往行人匆匆忙忙。尔后，我跟在一辆极为破旧的灰色公共汽车后面，直到阿班卡伊大街，我才从右面赶过它。公共汽车的排气筒是一个与车身一样高的烟筒，一边走，一边排出滚滚浓烟。车上挤满了人，门也关不上，站在门口的人奇迹般地抓着某一个地方，与行人及过往车辆擦肩而过。这时正值下班，车站上等车的人成群成堆。公共汽车一来人们便一窝蜂似的涌上前，又推又挤，有的口中骂骂咧咧。在这里等车的都是穷人，这脏臭难闻的公共汽车，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家常便饭。他们一个个汗流浃背，有幸挤上车的，便怒气冲冲地站在车上乘半个小时或者三刻钟。这些秘鲁人，衣着破旧寒碜，领带油乎乎的，妇女们穿着又肥又大的裙子。他们中少数有幸得到上帝庇护的人，生活虽然穷困而单调，但总算有一个固定的工

作，或者当办事员，或者当下级职员，有固定的工资，能享受社会保险，退休后生活也有保证。你看这些打着赤脚、流落街头的孩子们，他们在车子中间钻来钻去，正在从一辆缓慢前进的卡车上偷瓶子，一看是空的，便气得直往车上吐痰。你再看，那边那位带着四个孩子的妇女，他们个个衣衫褴褛，满脸污垢，几乎分不清鼻子和眼睛。他们站在宗教裁判监狱展览馆的台阶上，向每一个从身边走过的人都机械地伸一下手，同时口中小声说："太太，行行好！"或是"先生，给点什么吧！"跟这些人相比，上面提到的那些人算是特权阶级了。

我忽然决定不去圣马丁广场了，而去参观一下宗教裁判监狱展览馆。我好久不曾来这里，最后一次大约是见到我的中学同学玛伊塔以后。参观时，玛伊塔的形象总是浮现在我的脑际。我在他姨妈——教母家中的相框里，曾见过他那副未老先衰、疲惫不堪的形象。现在，这形象仿佛被召到这个展览馆中来了，我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展览馆和他有什么关系？一个是二十五年前昙花一现的革命党人；一个是宗教机构，在长达三个世纪的岁月中，在秘鲁以至整个南美洲正统宗教——天主教里起着卫道士的作用，具有至高无上权力。是一条什么样的无形的线，把二者串在一起了呢？

宗教裁判厅现在是一片废墟，但是它的嵌板式顶棚如今却完好无损，正像一个女教师给她的学生们做的一篇背书式的讲解中说的一样。多考究的顶棚！宗教法庭的法官们当时是一些令人仰慕的人物。那些由教士们从西班牙运来的塞维亚花砖已荡然无存；铺地用的西班牙砖业已分辨不清。大厅门口有一尊石雕，紧挨墙壁。我停下脚步仔细一看，这石雕实际是一个十字架，安放在一个摇摇晃晃的铁架上，上面雕着一把利剑，一根象征光荣和胜利的月桂枝。

宗教裁判法庭是一五八四年在这里建立起来的，上溯十五年由施恩会①主管。法庭只用很少一点钱，便买下了利马城创始人之一堂·桑乔·德里维拉的一块地基。宗教裁判法庭就在这里行使宗教的神圣权力。地域之广，包括现在的秘鲁全境、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拿马、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和巴拉圭。审讯大厅里有一张用一整块木头制成的巨型桌子，桌腿都雕成魔鬼的模样。身穿白色教袍的法官、法庭的律师们、公证人、讼棍、狱吏、行刑队就是从这个大厅，从这张桌子背后跟异端邪说、丑行恶习、亵渎神明、腐化堕落，跟犹太教新教徒、一夫多妻罪等展开了勇敢的斗争。“他们还与异教徒及分裂派进行战斗。”玛伊塔想。宗教裁判法庭的官员们的工作严谨而艰苦，合法而古怪，与他们合作的，有同时代的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律师、神学家、大学教授、讲道者、诗人、散文家。玛伊塔又想：“你们烧死多少个同性恋者？”每判处一个罪犯，宣判一个裁决，事前都要进行过细的调查，积累大量卷宗。玛伊塔此时想：“你们拷打过多少个疯人？绞死过多少无辜？”宗教最高法庭宣判之前，要把犯人关押许多年，最后的判决就从这张桌子上发出。桌子上摆着一个头盖骨，几个银制墨水瓶，瓶子上雕着利剑、十字架和鱼的图案。上面的题词是：“我，真理之光，指引你的良心和判决。如果你不坚持正义，你将得到应有的惩罚。”玛伊塔想：“你们焚烧了多少坚持真理的圣人？烧死了多少敢于同你们作斗争的人？火焚了多少可怜鬼？”

因为指导宗教裁判法官判决的并非是真理之光，而是告密分子。由于他们的告密，使得这个阴森潮湿、终日不见阳

① 十三世纪创立于西班牙，当时主要负责办理从摩尔人手中赎回俘虏的事宜。

光的地牢里犯人日日爆满，待到判决时，大多数人已经瘫痪。玛伊塔仿佛听到有人说：“你早晚也得关进来，就像你的为人，你造反有罪！”告密分子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可以毫无顾忌地告发，从来不会受到报复。秘密之门就在这里完好地保存下来了。玛伊塔惶恐地从门缝里张望，他感到告密分子就在身后，只要头稍稍一动便认出他，拿到他的罪证。他将被剥夺一切财产，终生监禁在地牢里或者被活活烧死。他感到毛骨悚然，心想：“要除掉一个对立面多么容易，只要到这里面来，一只手拿着圣经，你就放心大胆地揭发吧！阿纳托里奥要是来这里揭发，我必定被烧成灰烬。”

事实上并没有烧死多少！墙上的一块嵌板上注明，三个世纪以来仅仅烧死三十五个人。我怀疑其真实性，这个数字不能令人信服。而且说，三十五个人中，有三十个在尚未被焚烧之前便死于棍棒之下。然而，第一个被利马宗教法庭判处死刑的是名法国人，叫玛特奥·萨拉德，就是被火焚致死的。有人控告他，说他进行的那些化学试验近乎恶魔撒旦。“狗儿屁了？”玛伊塔思考着。就是从那个法国佬被判死刑时起，“狗儿屁”这个词在秘鲁广为流行，专门用来形容没有交好运的人。“但是从今以后，不会有革命者遇到‘狗儿屁’这种不幸了。”他想。

烧死的人虽然不多，可被宗教法庭严刑拷打的人却不计其数。一旦某人被密告，他（她）就会受到无情的折磨、拷打，直至死亡。当时，宗教法庭逼供用的形形色色的刑具都展示在这里，人们用模拟人正在为观众表演。还有一种刑具叫分肢绞，犯人被捆绑在一张桌子上，四肢与四个曲柄相连，一旦开动，便可把胳膊或腿分别拽断，也可同时把四肢截断。最常用的刑具是枷，套在头上使囚犯动不得，任人抽打。最

富有创造力的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刑法，可以称为勒刑。施刑人坐在椅子上，面对着戴手铐脚镣的犯人，只要一蹬脚，一抬手，犯人的腿部、手臂、脖子和胸部便会被勒住。最现代化的拷问方法是灌凉水，最富想象力的是火刑——烧脚心。“现在的刑法有的给睾丸通电，有的注射麻醉剂，有的把人闷在粪缸里，有的用烟蒂烧。”玛伊塔想，“在这方面没有多大进步。”

然而，当他一想到自己处在这么一种环境中，便心不由己地自问：“玛伊塔，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这不是在这儿白白地浪费时间吗？难道你没有要紧的事情要做？”一想到那些犯罪分子日以继夜、年复一年地甚至直到死都被监禁在这么一个小牢室内，他便激动不已。他们曾被指控为信奉犹太教，异端邪说，妖魔鬼怪，亵渎神明；有的则万分后悔，并发誓痛改前非，终身赎罪。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矛盾的房间：一方面阴森可怖，另一方面却还有点儿人情味。这里有一顶高帽子，一件绣着十字架、蛇、魔鬼和火焰的忏悔衣。罪犯穿上它，从监狱经过十字架街，来到十字架前跪下忏悔，然后直奔马约尔广场，或遭鞭笞，或被处死。有的则不分白天黑夜，一直穿着忏悔衣，直至宣判。对身穿忏悔衣的罪犯形象，我印象尤深，牢牢地刻划在我的脑海里。步出参观厅时，我仿佛仍然看到他们身穿忏悔衣，然后回到各自的家中。见到他们这一身打扮，有的人一阵恶心，直想呕吐；有的人感到阴冷可怕，毛骨悚然；有的则感到愤愤不平，怒火满腔。玛伊塔想：“罪犯们成年累月地穿着这样一身衣服，人们就会像憎恶疯狗那样躲开他们。”不过，他又想：“这个展览值得一看，他富有教育意义，也十分有意思。”通过这些实物，我认为这个展览馆反映出，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有一个基本不变的东西，

这就是暴力。道德和暴力，前者产生于盲目的信仰，后者产生于不知忍让；前者是思想，后者是腐化愚蠢所造成的恶果，并且总是伴随着权力之争，从而酿成令人憎恶的复仇心理，酿成为私利而争斗的暴力。来这里很有必要，只要在这个展览馆浏览一遍，对我国今天的现实，对我国之所以有今天，便会恍然大悟。

在宗教裁判法庭展览馆门口，原来只有一位母亲和四个孩子在那里乞讨，而我出来时，发现少说又增加了十二家，其中有老人、成年男子、妇女和小孩。很奇怪，他们也围成一个法庭的样式，只不过这“法庭”是由一些满身污垢、一脸漆黑、衣衫褴褛的人组成罢了。一看到我走出来，他们便伸出一双双黑乎乎的脏手乞求施舍。我的身后是暴力，我的身前是饥饿。就在这些台阶上，我见到了我祖国的缩影，这里是秘鲁历史的两副面孔。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在我参观宗教裁判法庭博物馆时，玛伊塔的形象始终萦回在我的脑际。

我几乎是跑步来到圣马丁广场乘坐小公共汽车的，因为宵禁前大约半小时，一切车辆都将停止行驶。我怕来不及到家，在格拉乌大街就赶上宵禁。事实上也没有几个街区，然而，天一旦黑下来就很危险，已经发生过好几起抢劫事件。上个星期还发生过一次：那天，水利工程师路易斯·萨尔迪亚斯的新婚妻子的汽车坏了，她不得不从圣伊西德罗区步行回家。结果没有走到家，宵禁的时刻到了。就在格拉乌大街上，她被一辆警察巡逻车带走了。他们扒光她的衣服，尽管她竭力反抗，还是挨了一顿痛打，而且被奸污了。尔后，他们把她送到家，对她说：“你得感谢我们，我们没有把你枪毙就不错了。宵禁以后在街上抓到的人都得枪毙。这是上司的命令。”路易斯·萨尔迪亚斯给我说这件事时，气得眼珠子都快迸出

来。他说，打那以后，不论是谁打死警察，他都拍手称快。他还说，恐怖分子取得胜利有何妨？还有比我们现在这日子更糟的吗？我知道他这种想法不对头。会有比现在更糟的事，坏事是没有界限的，然而我尊重他痛苦的感情，并没有对他的说法提出异议。

第　五　章

乘火车到哈乌哈去必须头天夜里买票，第二天早晨六点钟赶到德萨姆帕拉多斯车站。别人告诉我说，车上人很挤，果不其然，简直是爬上车的。我很幸运，上车后找到了一个座位，而大多数人都站着。火车上没有卫生间，火车开动，那些胆大的人便站在两节车厢间撒尿。虽然离开利马时我吃了点东西，但不一会儿我就感到饥肠辘辘。火车到站皆停，乘客有上有下，途经乔西卡、圣巴托洛迈、马图卡纳、圣马特奥、卡萨帕尔卡、拉奥罗雅等站，可哪个站都没有卖食物的。二十五年前，只要车一停，小贩便蜂涌而上，叫卖水果、汽水、三明治、甜食，而现在只有卖点心和玛黛茶的。火车左右晃动，行驶得很慢，如老牛爬坡。许多事使我感到新鲜：首先，笨重的火车得从海平面爬到五千米的高度，然后在梅格斯山峰的安蒂哥纳山口处穿越安第斯山脊。面对着这样一幅雄伟壮观的自然景色，我陶醉了，竟忘记了在每一节车厢里荷弹持枪的士兵以及为防止袭击而架在车头上的机关枪。火车这次运行，又将遇到些什么麻烦呢？山区公路两边的山石被恐怖分子用炸药炸塌了，道路堵塞，几乎无法通行。他们

为什么不把火车隧道炸坏，不把桥梁炸毁？可能出于某种神秘莫测的原因，他们认为有必要留着这条铁路运输线，以保持利马与胡宁市之间的联系。我十分庆幸，这样我便可以到哈乌哈市去采访有关玛伊塔的事情。

群山绵延，一条条沟壑夹在其中，山涧流水哗哗作响。火车时而进入隧道，时而穿过小桥。我不禁想到八十年前，梅格斯工程师在修建这条盘山铁路时建立起来的丰功伟绩：冬日顶着狂风暴雪，夏日冒着山洪暴发的危险；铁路之字型盘山而上，逢山凿洞，遇水架桥，工程之难令凡夫俗子望而却步。二十五年前，革命家玛伊塔于二三月份的一个上午第一次乘坐火车在这条铁路上旅行时，也曾想到梅格斯工程师的业绩吗？可能他首先想到的是修筑这条世界最高铁路时，黑白混血儿及印第安人曾经付出的巨大代价：他们打炮开山，架桥，凿洞，抬枕木，修路基；每天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劳作竟达十二小时，而且食不果腹，工资微薄。开山时，有多少劳工被炸断了手指、手臂？有多少苦工被崩坏了眼睛？又有多少人从悬崖绝壁上滚下被活活摔死？睡梦中的劳工又有多少被突如其来的山洪卷走，葬身于泥石流中？那些冻死、饿死、累死在工地上、帐篷中的劳工又如何统计？火车越爬越高，玛伊塔感到呼吸困难，脑袋隐隐作痛，心跳明显加剧。然而，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他想放声大笑，想痛痛快快地吹口哨，热情洋溢地和车厢内每一位旅客握手。他心急如焚，恨不能马上就见到巴列霍斯。

“我就是乌维鲁斯老师。”我刚走过哈乌哈车站出口处的铁栏杆，他便一边说，一边把手伸给我。在此之前，我们排着长队挨个等候警察检查。他们让我打开包，乱翻了一通，其

实我包里就带了一身睡衣。“朋友们都管我叫矮子。请不要见外，咱们认识了就是朋友。”

我来之前给他写了信，他是专门来接我的。车站附近有很多军人，戒备森严：荷枪的士兵，骑马的巡逻兵，车站周围全用铁丝网隔开，街上还有坦克兵巡逻。我们迈动双脚徒步而行。这里的形势真的很不妙？

“最近几个星期形势稍微有些好转。”乌维鲁斯先生对我说，“现在宵禁令已撤销。这样，我们就可以到街上看看天上的星星。我们都忘记星星是个什么样子了。”

他对我说，一个月以前，有一批人起来造反，攻打哈乌哈兵营。战斗持续了一个晚上。兵营附近尸首遍地，后来浇上汽油烧掉了，恶臭冲天。打那以后，起义军队再也没有在城里搞大的军事行动。当然，附近的山上，枪声未断，每天清晨起来，都能看到山顶上镰刀斧头旗迎风招展，而到下午，巡逻队便到山上把旗子拔掉。

“我在芭卡旅馆里给您订了个房间。”他说，“那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你会亲眼看到的。”

他是一个身材矮小而体格健壮的老人，身着一套格子西装，领带短小，打个结也就有一公分大，满鞋是泥，仿佛刚从稀泥中蹚过。他身上有一种山区人特有的憨厚，讲起西班牙语来几乎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往外迸。并带有浓厚的克丘亚话口音。一直步行到广场，我们才找到一辆破出租汽车。和我上一次来时比较，城市并无多大变化。至少，看上去没有战争的伤痕，既看不到成堆的垃圾，也见不到乞丐。家家都有一个古老的大门，窗户全是百叶窗，显得洁净而庄重。乌维鲁斯先生是教理科的，他在国立圣何塞中学任教三十年。退休时，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仪式，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参加了。

他讲话时，都激动得哭了。

“喂，老兄。”巴列霍斯说。

“噢，你这家伙。”玛伊塔说。

“你终于来了。”巴列霍斯说。

“是啊！”玛伊塔笑笑，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为什么至今芭卡旅馆还在营业？难道还有人到哈乌哈来旅游吗？当然没有。来干什么？所有的节日活动，包括名闻遐迩的狂欢节都取消了。芭卡旅馆依然开放，是因为从利马来的官员以及有时某个军事团体喜欢住这儿。现在可能一个军事团体也没有，因为门口看不到站岗的。旅馆似乎好几个世纪不曾粉刷过，墙壁脏乎乎的，既没有服务员，也没有管理人员，只有一个看门的，他什么都干。我把东西放在满是蜘蛛网的房间里，来到临湖的花坛边等候乌维鲁斯先生。“您熟悉芭卡的历史吗？”一见面他就指着清澈透明的湖水问我。此时天空万里无云，湖四周青山环绕。许多年前，这里住着一群吝啬鬼。一天，风和日丽，空气清新，来了一个乞丐，挨家挨户要饭吃。可没有一家给他，有的人家没等他进门，就放狗把他赶跑了。最后，碰到一家，只有一个寡妇和她那年幼的儿子。她给了他点吃的，并且宽慰了他。就在这时，只见乞丐浑身闪烁金光，寡妇发现他的长相和耶稣一模一样。他对她说：“马上离开芭卡，抱着你的儿子，带上所有能够携带的什物。不论听到什么响声，你都不要回头看，只管往前走。”寡妇遵其所言，马上离开。当她正往山顶上爬时，忽然听到背后一声巨响，她好奇地回过头，发现一股巨大的泥石流像山一样涌向村庄，霎时间将芭卡全村连同它的居民一起埋没。

以后，这里就变成一个平静的山湖，水里游荡着鸭子、水鸟，生长着鲑鱼。从此以后，他们母子俩再也没有看见那个神仙。神是不可能让凡人看见两次的。现在，哈乌哈的居民一抬头，便能够看到他们母子俩的雕像巍然屹立在山巅之上，面对着湖。每逢节日，人们都到雕像前凭吊，这时他们必然想起压在湖底的那些吝啬的居民们。水中，青蛙呱呱，鸭子哇哇鸣叫不停，游人们从不放过在湖上泛舟的良机。

“同志，你认为怎样？”

玛伊塔发现，巴列霍斯和他一样，非常高兴和激动。他们俩朝塔拉芭卡大街走去，陆军少尉巴列霍斯就住在那条街上。旅途如何？很顺利，尤其使他感动的是亲眼见到名为“地狱”的山口。玛伊塔并不说话，只是暗中观察街上殖民时期的房屋和哈乌哈的女人。怎么搞的，她们脸上都有雀斑。他感到空气格外清新，“玛伊塔，你终于来到了哈乌哈。”然而此刻，他感觉不舒服。

“大概我有高山反应，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头晕得厉害。”

“对革命来说，这可是个不好的兆头。”巴列霍斯跟他开玩笑，说着把他手中的小箱子夺过去。玛伊塔身穿一套卡其布衣服，脚蹬一双厚底皮鞋，头发剪得很短。“喝一杯马黛茶，睡一个午觉，你就好了。八点钟咱们俩去找乌维鲁斯先生，他可是一个有识之士。你会亲自领教的。”

狱吏们的宿舍坐落在一处高地上，周围还有铁栅栏。巴列霍斯的宿舍也在这里，他在自己的卧室内加了一张行军床，把玛伊塔安置好，并对他说，好好睡一觉，高山反应就会好的，随后走了出去。巴列霍斯走后，玛伊塔发现厕所里还有喷头。“在哈乌哈的这段时间，每天睡觉前、起床后，我都可

以冲个澡。回到利马后我要能装个喷头该多好！”他只脱了鞋子，穿着衣服便一头倒在床上，闭上双眼。可是，怎么也睡不着。玛伊塔，你还不了解哈乌哈。什么事不了解？能举出例子吗？传说远比现实更吸引人，比方说，芭卡的来历。历史上，芭卡曾经是萨乌萨斯人的居住地，属于黄卡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是印加帝国所征服的最强大的部族之一。因此，当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来到秘鲁时，萨乌萨斯人便投入他的怀抱。这样，西班牙征服者就与土著复仇者联合起来对付印加帝国。在殖民地时期，这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哈乌哈一词在土语中是物产丰富的同义语。现在见到人民生活得这般贫困，谁能相信，历史上它曾经是个繁华之地呢？皮萨罗曾率领军队由卡哈马尔卡出发远征库斯科，抵达哈乌哈时，宣布它为秘鲁的首都。玛伊塔，这你知道吗？远征军就是沿着印加帝国有名的四条山道之一越过安第斯山脊的。现在，这些道路则成为游击队活动的地方。哈乌哈被宣布为首都的那几个月中，也确实曾显赫一时。后来，它被利马取而代之，它的名字、它的人民、它的文化逐渐被人们遗忘。利马成了首都以后，就从利马出发对全国其它地方进行掠夺，利马则成了新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殊不知，利马处在一个最不利于人类健康的海湾附近。

玛伊塔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头始终感到晕眩。乌维鲁斯先生面对着芭卡湖津津有味地讲着。我一想到幼年时代对哈乌哈的了解就觉得可笑。那时它被称为“肺痨病人之城”，因为自从上个世纪开始，全国各地凡是得了肺病的人都到这里来疗养，据说哈乌哈的干燥气候有利于患肺病的人的康复。那时肺结核是一种可怕的不治之症，人们对它极其恐惧，另外，文人也过于渲染它的可怕。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起

初，骑着母骡子沿着羊肠小道，尔后，沿着工程师梅格斯修筑的铁路乘火车而来。当然，只有那些开始吐血、能够付得起旅费和疗养费的人，才来得起这里。死在奥拉贝哥雅疗养院的人也不少。正是由于来这里疗养的人越来越多，疗养院也越来越大，直扩展到市区。昔日，哈乌哈的名字能唤起人们的尊敬，激起人们对金钱银币的向往，尔后，它的名字意味着咳嗽、痨病、肺出血、死亡。“哈乌哈的名字始终未变，可它的意思却发生了变化。”玛伊塔想。他用手按着胸口，数数心脏跳动的次数，想起他的姨妈即教母何塞法太太。那时他们住在利马苏尔基约区。当他绝食时，善良的姨妈用手指头点着他的脑袋训他：“小傻瓜，你想去哈乌哈？”而阿莉西娅和索伊莉塔两位表姐一听到他干咳，就挖苦他说：“喂，表弟，你开始咳嗽了，你已经在往哈乌哈的路上迈步呢！”如果何塞法姨妈及索伊莉塔和阿莉西娅表姐们得知他来哈乌哈干的这事，该说什么呢？之后，巴列霍斯带领他去会见乌维鲁斯先生，同时还有圣何塞中学的六个高年级学生。乌维鲁斯先生是一位很讲礼貌的人，玛伊塔和他握手时，他又点头又哈腰。这时玛伊塔刚刚冲完冷水浴出来，浑身起鸡皮疙瘩，喃喃自语：“现在应该给哈乌哈的历史上加一句话：它是秘鲁革命的摇篮。”过去说哈乌哈是块宝地，遍地出金子。后来，哈乌哈则成了肺病疗养地。现在，应该在哈乌哈的传说中再加一个革命的哈乌哈传说。会见是在乌维鲁斯先生家中进行的。玛伊塔向窗外望去，只见街上有许多房子是坯墙瓦顶，石头砌的路面高出平地一大截。他想起来乌维鲁斯先生家时，巴列霍斯曾告诉他，这里一二月份雨水频繁，路面凸起是为了便于行人走路。他又想到：“哈乌哈将成为秘鲁社会主义革命的摇篮，真叫人不敢相信。既然它能成为产金重地、疗养之

地，为什么就不能成为革命的摇篮呢？”

我对乌维鲁斯先生说，至少，表面上看来哈乌哈不像利马那么贫穷。我说的对吗？他并不正面回答我的问话，而是摆出一副难堪相。我们就坐在冷清的湖岸边，停了一下，他终于开口道：

“我想关于巴列霍斯的故事，您肯定听说过许多，这些天您还会听到不少的故事。”

“是听说过不少。”我说，“总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我试图在事实的基础上写一下这段历史。历史不就是由故事构成的嘛，有真也有假。”他建议我到他家去。一辆由两头驴子拉的车答应把我们捎到城里。半个小时后，我们在阿方索·乌加特街第九街区下了车。乌维鲁斯先生的家就在对过，几乎与监狱面对面。还没等我问他，他就告诉我：“这里曾经是陆军少尉巴列霍斯的地盘，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监狱在街的尽头，占整整一片街区。市区就到灰墙那里为止，墙外就是田野、庄稼、桉树、山丘。远处，看到的是壕沟、铁丝网和站岗的士兵。去年有一阵子，曾经盛传游击队要攻克哈乌哈，并宣布它为解放区的首都，有的谣言说要攻克阿雷基帕、布诺、库斯科、特鲁希略、卡哈马尔卡、伊基多斯尼。监狱与乌维鲁斯先生家所在的这个区的名字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与痛苦、赎罪相联系：它叫“痛苦的十字架街”。他的屋子矮小阴暗，室内陈设简陋，墙上的像框里镶嵌着一幅闪闪发亮的画像：胸打小领结、头戴大礼帽、口蓄八字胡、硬梆梆的领子、西服背心，下巴上留着一撮摩非斯特①式的山羊

① 歌德《浮士德》中的魔鬼。

胡子。从相貌上看，可能是乌维鲁斯先生的父亲或者祖父。室内有一张长沙发，用一块色彩鲜艳的斗篷搭在上面，几件几乎要散架的陈旧家具，书架上胡乱堆着些报纸。苍蝇在人眼前飞来飞去，一个学生帮他端来两个小盘子，每个盘子里放一块奶酪和几块面包片。当年玛伊塔要是看见这些东西，肯定会直流口水。我十分饥饿，问他哪里能买到吃的。他说："现在这个时候，哪里也没有卖的，或许傍晚能买到几个烤土豆。不过，我可以请你品尝一杯上好的皮斯科酒。""关于我和巴列霍斯的友谊，人们说得神乎其神。"乌维鲁斯先生补充说，"我在利马服兵役时就认识他，那时我们俩就企图谋反。后来他来到哈乌哈当典狱长，我们俩又继续干。其中只有一点是真的，我是退伍军人。不过，当我在军队服役时，巴列霍斯还是一个吃奶的孩子呢……"他无可奈何地笑笑，接着几乎叫起来："纯属造谣！他来这里上任不久以后，我们俩才相识的。坦率地说，是我教他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说不定您知道，"他放低声音，警觉地环顾四周，指着空空的书架说，"在哈乌哈数我的马克思著作最全。"

他越说越远，根本就不提巴列霍斯。虽然他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切去一个肾，患高血压、静脉曲张，几乎快见犹大了），早就什么政治活动也不参加了。但是，前几年，当恐怖分子在这个区再度猖獗时，官方把他的书全给烧掉，并且还关了他一个星期的牢房，给他的睾丸上电刑，逼他供出与游击队的勾结活动。他又能与他们有什么勾结呢？殊不知"人民之声"游击队早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他站起来，打开一个箱子，取出一张纸条给我看，上面写道："你被人民判处死刑，狗叛徒！"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意思是说，他已经老朽，生命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要杀就杀吧！他一个

人孤苦伶仃，连根棍子也没有。死而无憾。

“原来是您教巴列霍斯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我利用他停顿的机会打断他的话，“我还以为是玛伊塔呢。”

“那个托洛茨基分子？”他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轻蔑地说，“可怜的玛伊塔！他在哈乌哈时高山反应很厉害，几乎要丧命……”

这是真的。玛伊塔感到太阳穴胀得厉害，心脏忽而跳动急促，忽而缓慢得仿佛要停止跳动。他觉得说不定自己血管里的血会迸出来，只觉得全身冰冷。“我会晕过去？会死吗？”这种感觉时隐时现，他宛如一个立于悬崖绝壁边缘的人，时刻都有跌下去摔死的危险感。他觉得拥挤在乌维鲁斯先生屋子里的人都在注视着他。有几个人在抽烟，喷出的灰色烟雾在室内袅袅上升，两个苍蝇嗡嗡地飞着，看不清那几个中学生的脸什么模样，只听到他们不时地向乌维鲁斯先生提问题，打断他的演说。玛伊塔思路中断，紧挨着巴列霍斯，坐在一把小凳子上，背靠书架。虽然他竭力想听听乌维鲁斯先生讲什么，然而他只觉得自己的太阳穴及心脏怦怦跳个不停。虽然他高山反应厉害，但他模模糊糊地听到：“他是从利马来的革命家，是来考考我们本地这些同志的。”他想：“三千五百公尺的高度就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他似乎觉得乌维鲁斯先生此刻滔滔不绝的演讲，无非企图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知半解打动他。他对青年们解释说，要推动革命前进，首先必须对社会矛盾以及阶级斗争在每一个阶段的特点进行正确的分析。玛伊塔想：“你的野心真不小啊，可以与埃及艳后格雷奥巴特拉比美了。”

瞧他在那里胡说八道些什么？纯粹是颠倒历史，还以为

科学与诗是一回事。“我多傻呀！怎么不事前买点抗高山反应的药呢？”巴列霍斯问他：“你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好。”可他心里想：“难道我来哈乌哈就是让这个撒尿都撒不到池子里的老家伙给我上马克思主义课？”过了半晌，矮子乌维鲁斯才说了几句对他表示欢迎的话：“这就是巴列霍斯给你们讲的那位利马来的同志，他有做革命工作和工会工作的丰富经验。”他请玛伊塔讲话，并对青年们说，谁有问题可以向他提。玛伊塔朝六张稚气的脸孔笑了笑，而他们则怀着好奇而崇敬的心情看着他。

乌维鲁斯先生又继续对我说：

“如果非要找一个有过错的人，最有过错的就是玛伊塔。”他脸色很难看。“他把我们骗得好苦。我们以为他是利马的革命者，是党和工会派来的联络员，他能代表成千的同志们，而实际上他谁也代表不了，是个无名小卒。最糟糕的是，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由于他的到来，共产党不支持我们了。真的，我们太天真。我懂得马克思主义，然而党有多大的力量，我压根儿就不清楚，更不了解左派内部的分歧。可巴列霍斯知道得比我还少。您以为是玛伊塔那个托派分子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给陆军少尉巴列霍斯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只是当巴列霍斯溜到利马时，他们见过几次面而已。陆军少尉是在我的这个房间里学到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

乌维鲁斯先生属于哈乌哈的一个古老的家族，他们家族曾经出过副省长、市长和许多律师。（山区的人对律师都很是崇拜。哈乌哈这个城市按人口比例算，出的律师最多。）他们家可能算是当地的富户，因为他说有许多亲友都到国外定居去了，有去墨西哥的，有去阿根廷的，还有去迈阿密的。他

将在这里待到寿终正寝。他不怕威胁，也不怕别人陷害。他不愿离开故土，倒不仅仅因为他没有钱，而是因为他的矛盾心理，他的反抗精神所致。他从青年时代就与叔伯兄弟、表兄弟不一样。他在小庄园里干过活，开过杂货店，当过律师，教过书，还是哈乌哈市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付出的代价很高，坐过监狱，挨过棍子，受到过侮辱，然而，最叫他痛心的是左派的无情主义。现在他们翅膀硬了，马上就要取得政权，把他们这些元老都给忘记了。

“真正的哲学课、历史课在圣何塞学校里是不能讲授的，是在这里，在我的这个小房间里，我给他上的。”他自鸣得意地大声说，“我的家曾经是一所人民的大学。”

他突然停下，因为我们听到外面有隆隆的响声和军人的喊话声。我到走廊上偷偷一看，只见一辆坦克车正隆隆开来，就是我在车站上见到的那一辆。坦克后头是一队士兵，士兵们随着军官的口号声，步伐整齐地跑着，转眼间消失在监狱的拐弯处。“如此说来，这一切并不是玛伊塔策划的？”我突然问他，“这次暴动的具体方案不是他拟定的？”

我突如其来的问话搞得他茫然不知所措，他的惊奇也不无道理。

“托派分子玛伊塔策划的那次暴动？”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您想到哪儿去了！他来到这里时，巴列霍斯和我把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他只是最后参加了一下而已。我再给您透露点情况：只是到最后一分钟，才把暴动的具体细节告诉了他。”

“你们不信任他？”我打断他的话。

“为谨慎起见。”乌维鲁斯先生说，“好吧，如果您喜欢用‘不信任’这个词，那就说不信任也未尝不可。不是怕他去告

密，而是怕他一旦知道实情就缩回去。这个决定是由我和巴列霍斯两个人作出的。当我们确信就他单独一个人时，才如实告诉他。如果早告诉他，说不定他会临阵逃脱。您知道，他不是本地人，高山反应他就受不了。另外，从未使用过武器，还是巴列霍斯在利马郊外的沙漠里教他射击的。什么革命家不革命家的，见鬼去吧！听说他还是同性恋者呢！”

他又像往常那样皮笑肉不笑地笑笑。我差点对他说，他自己当时并没有去他应该去的地方。相反，玛伊塔虽然高山反应厉害，但始终和巴列霍斯在一起。我还几乎对他说，他指责玛伊塔的那些话，别人就可以反过来说他是罪魁祸首，临阵逃脱。当然，这些话我并没有说出口。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顶撞别人，我的责任是聆听别人讲述这段历史，我观察、分析，进而加工，进行艺术再创造。不一会儿，又听到外面坦克隆隆作响及士兵喊口号的声音。

一个小伙子说：“该走了，到时间了。”这时玛伊塔的高山反应轻多了，最厉害的时刻已过去，已经能较清醒地回答乌维鲁斯先生、巴列霍斯及圣何塞中学的学生们的问题。当然，他仍然感到胸有点发闷，头有点痛，心脏的跳动仍很急促。问题回答得好吗？虽然他心灵深处并不那么有把握，但他回答的语气比较肯定。为了不使那几个学生失望，他回答时尽量不讲假话，同时也极力避免提及那些会使他们大失所望的真实情况。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一旦革命爆发，利马的工人阶级支持他们吗？是的，当然不会马上。开始时可能由于新闻广播的歪曲报导，当局乃至资产阶级政党的污蔑诽谤，工人阶级将弄不清事实真相，不会马上响应。面对着疯狂的镇压，他们可能束手无策，然而，镇压本身会使他们进

而明白，究竟谁捍卫他们的利益，谁剥削他们，欺骗他们。因为，革命行动会使工人阶级懂得，暴力是阶级斗争的最激烈的形式。学生们瞪大了眼睛，一眼不眨地瞧着他，使他深为感动。“他们相信你说的这一切。”而此刻，当圣何塞的学生们彬彬有礼地同他握手告别时，他自己也拿不准，真的一旦干起来，利马的无产阶级将采取什么态度？漠不关心？敌视？会瞧得起他们这帮子上山为工人阶级而战斗的先锋队？事实上，工会被阿普拉党控制着，该党又与执政党联盟，他们反对一切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事物。或许只有被共产党影响的那几个为数不多的工会会持相反的态度。不，他们也不会支持。这几个工会会指责他们是挑动分子，说他们给政府提供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的把柄，因此将有大批进步人士被关押或被迫流亡国外。他甚至想象得出，《团结报》攻击他们的标题、散发的传单，以及与他们对立的革命工人党党报《工人之声》攻击他们的文章、内容是什么。是的，这一切，第一阶段都可能发生，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如果起义能继续发展，在全国各地动摇资产阶级统治，迫使统治阶级摘下假面具而对工人阶级进行镇压、屠杀，工人阶级将迅速觉醒。他们将摆脱改良主义的影响，抛弃那些腐化堕落的工会领导人，放弃与投降阶级共处的幻想，从而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来。

“好啊，年轻人已经走了。”乌维鲁斯先生从堆满书籍、报纸、小册子且长满蜘蛛网的书房里取出一个军用水壶、两个杯子，“现在让我们干一杯。”

“你觉得这几个年轻人怎样？”巴列霍斯问玛伊塔。

“非常热情。不过，也太年轻点，乳臭未干。”玛伊塔说，“有几个也就十五岁左右，对吧？你敢肯定他们会听吆喝？”

“你不相信青年人。”巴列霍斯笑了，“当然听吆喝。”

“你还记得贡萨雷斯·布拉达吧？”矮子乌维鲁斯先生提醒说，他像个侏儒一样地在书架中串来串去，然后回到座位上，“老家伙该进坟墓去，事业让年轻人去干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巴列霍斯说着用右拳击了一下左手掌。而玛伊塔则想：我听见了，我并不怀疑。在你看来，什么都会如愿以偿。你是一个天才的领袖，你自己就是一个中央委员会。“谁也不会叫这些孩子们去开枪打仗，他们负责传递情报。”

“革命的印第安人通讯员。”矮子乌维鲁斯先生接过话碴儿，“从他们学走路时起，我就认识，他们是圣何塞学校年轻一代的精华。”

“他们负责通讯联络，”巴列霍斯解释，“负责游击队与城市间的联络，传递口令，运送食品、药物、弹药武器。正因为他们小，容易混过去，并且他们对本州的山区地形了如指掌。我在山区训练过他们长途行军，他们很能干。”

他说，他们从悬崖上跳下来，双脚着地，一点也摔不坏，他们的身体好像是橡皮做的；多么湍急的河流，他们都能如同鱼儿一样游过去，既撞不到暗礁上，也不会被漩涡卷走；他们不怕冷，即使在雪地里也冻不坏；不管山多高，他们在上面如同在平地上一样跑跳自如，一点儿也不气喘吁吁。玛伊塔又感到一阵难受：心跳加剧，血压升高。告诉巴列霍斯吗？跟他要杯古柯茶或者要点药吃，以便解除高山反应的痛苦？

“明天，在里克兰你就会认识到所有拿起武器和我们一起干的人。”巴列霍斯对他说，“好好准备一下吧，你要爬高山的。在那里你将见到羊驼和伊初针茅。”

虽然玛伊塔感到非常难受，但每当矮子乌维鲁斯或者巴列霍斯停止说话时，他就觉察到外面死一样的寂静，什么声

音也没有，没有汽车声，没有喇叭声，没有刹车声，没有汽笛声，没有脚步声，也没有模糊不清的说话声。哈乌哈的夜晚是这样的宁静，他是第一次领略，感到奇怪。这与他所在的这个房间内形成明显的对比，人们说话声始终未停。室外大街上，如此空旷沉静，缺少生命感，缺乏机器声，使他内心感到空虚。在利马时，甚至被囚在牢房中（他曾被关在第六监狱、巴诺蒂科监狱、弗隆东监狱），从未发现周围有这样沉静的时刻。巴列霍斯和乌维鲁斯一讲话就破坏了这种静谧的气氛，头晕减轻了一些，但是恐惧感仍笼罩心头。他知道，说不定什么时候血压又会升高，心跳加速，呼吸困难。矮子请他干杯，他强作笑颜勉为其难地把杯子放到唇边，喝了下去。烧酒使他浑身发热。“真是荒唐之极！距利马就三百公里，我好像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来到外国。这是个什么国家？从一处挪动到另一处就变成了外星人。”每每想到他不熟悉山区，不了解农民，他就感到羞愧。他又侧耳细听巴列霍斯与乌维鲁斯对话。他们俩原来在谈论安第斯山东坡原始林中的一个市镇：乌丘巴木巴。

“位于什么地方？”

“没有多少公里，”乌维鲁斯先生说，“从地图上看很近。但是，如果您想从哈乌哈去，就跟上月亮差不多远。后来贝朗德执政时，才修完原来剩下的四分之一段公路，这样才打通了去乌丘巴木巴的路。在此之前要去那儿，需要徒步而行，穿越崇山峻岭、悬崖陡壁、深沟山涧。”

现在有没有办法去那儿呢？当然没有。自从一年多以前，那里就成为战场，就没有办法进去。据说，那儿成了一座公墓，死亡的人比全秘鲁其余地方的总和还多。我的故事中牵

涉的几处至关重要的地方我都无法去访问，采访只好到此中断。此外，即使我经过努力绕过政府军与游击队的交战区到达那里，也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哈乌哈的人都说，丘南和里克兰两个镇完全从地面上消失了。是的，是这么一回事，乌维鲁斯先生的消息有根有据。大约六个月前，丘南还是起义军的一个堡垒，并且拥有一架高射炮。后来，空军对那里进行狂轰滥炸，并且使用了燃烧弹，最终将丘南夷为平地。死伤惨重，连蚂蚁也无一幸存。同样，在里克兰也实行了大屠杀，就发生在两个月前。但是具体怎么回事，无人说得清。据说里克兰人包围了一个游击队营地，把游击队员一网打尽。因为那些家伙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抢他们的粮食，宰他们的牲畜。但有的人说，里克兰人自己把他们处死了；而另外一些人则说，他们把游击队员交给政府军，政府军把他们拉到广场，靠在教堂的墙上，全给枪毙了。后来，又来了一批游击队员进行报复，对里克兰居民实行血腥屠杀。他们使用的方法才叫怪呢：把所有的人都赶到广场上，站成一队，报数，凡是数五的都拉出来或用斧头砍死，或用石头活活砸死，或用大刀砍死，因此，现在里克兰也不复存在了。剩下来的里克兰居民有的流落到哈乌哈的贫民窟，有的钻进深山老林里去了。我丝毫也不抱幻想。乌维鲁斯先生把杯子放到唇边喝了一小口，然后又接下去说：

“只有那些不怕雪、不怕泥石流的真正男子汉才能到达乌丘巴木巴。”他说，“只有不得静脉曲张的人才能去，像我现在这个样子是去不成的。不过，以前我的身体结实又有耐力，曾去过那里一次。那幅景象真叫人难以想象，安第斯山全被热带雨林覆盖着，植物密不透风，数不清的动物栖息其间，蒸气弥漫，到处都有古迹。乌丘巴木巴这个名字曾名扬四海。您

不记得？怎么搞的？乌丘巴木巴人的英雄事迹向来为秘鲁人所称道。”

我对他说，这个名字我确实忘记了，但经他提醒，我想起来了。听到我的话，他十分惊奇，又给我斟满了一杯酒。这种皮斯科酒名叫“安第斯山魔鬼”，是他特意保存下来的，现在哪里也买不到。什么都限量，人们都快饿死了。那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山区中部的许多地方掀起了农民抢占土地的风暴。城里的人、海边的人以及官方人士都极为震惊。那时，我居住在巴黎，和一部分革命者每日都在咖啡馆里聚会，密切地注视着国内事态的发展，不知要过多久，才能在《世界报》简明新闻上读到一两条消息，但是，我们的想象力是无限丰富的。安第斯山区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群起造反了，他们手持石头、棍棒，乃至投石器。黎明时分或深更半夜，他们扶老携幼，牵着牲畜来到庄园，拔掉界牌，占领土地，把牲畜打上自己家特有的记号，盖起新房，第二天，便开始在自己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土地上劳作起来。他们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成为土地的主人，只不过是几个世纪以前，被封建庄园主们兼并去了。“这是开始吗？火山终于爆发了？”那时我们按捺不住激动兴奋的心情自问。是的，这就是开始，在巴黎的咖啡馆里，我们从《世界报》的字里行间推测，那场农民占地运动是革命者们干的，是新的俄国社会党分子干的。他们来到乡村，动员农民们自己起来进行土地改革，既然以前那么多政府都曾许诺过而没有付诸现实，为什么自己不起来干呢？后来，我们才得知，农民们抢占土地的行动并非是共产党派人去发动的，也不是托派组织干的，而只不过是农民们自发的行动。他们受不了庄园主的欺凌，忍受不了饥饿贫困的折磨，受到自从奥德利亚军事独裁政权倒

台以来秘鲁社会要求正义呼声的影响，自发干起来的。乌丘巴木巴？对，除此之外，那时塞洛德巴斯科附近的阿尔格兰，库斯科附近的康赛普西翁等地都发生过农民抢占土地的暴力事件。后来，大部分农民被武力赶走，造成很大伤亡，只有个别地方得以达到目的。不过，胡宁州的乌丘巴木巴？

“是的，先生，”巴列霍斯说，他因能够向他证实这个消息而感到自豪，“都是皮肤比你还白、眼睛比你和我还蓝的印第安人干的。”

“起初印加帝国征服了他们，库斯科的基布卡玛约克斯用暴力强迫他们耕种土地。”矮子乌维鲁斯发表演说，“尔后，西班牙人又把他们最好的土地霸占去，迫使他们到山上去开矿。在矿上，不久便都得了肺矽病，大部分人死掉了。那些留在乌丘巴木巴的农民，被交给一个叫佩拉埃斯·里约哈的庄园主。几个世纪以来，他对农民们的剥削与压榨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然而，正如你看到的，庄园主消灭不了他们。”巴列霍斯补充说。

他们离开了乌维鲁斯的家，到外面徘徊，后来坐在武装广场的一条长凳上。天空晴朗，繁星闪烁。此刻玛伊塔忘记了寒冷，也忘记了高山反应，他异常兴奋激动。他回想起秘鲁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几次大的农民起义：图帕克·阿玛鲁、胡安·布斯塔曼特、阿杜斯巴里亚。许多世纪以来，乌丘巴木巴的农民也是这样被压迫，被奴役。他们梦想得到被人占去的土地，他们不停地祈求祷告。最初祈求过地上的蛇，天上的鸟儿，后来祈求圣母，祈求神，又求助过不少的法官，但结果是他们打输了官司。现在，他听他们说，仅仅几个星

期、几个月以前，阿伊娜庄园的农民们就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突然，一天晚上，他们带着猪、狗、驴、马涌进了庄园，说：“我们要求得到的土地，原来是我们自己的。”这事已经发生了，玛伊塔，可你还一点儿也不知道？

“一句话也没有听说过。”玛伊塔吞吞吐吐地说着，用手搓搓冰冷的胳膊，“利马，什么也不知道，连一点传闻也没有。”

玛伊塔凝视着繁星满天的苍穹，听着他俩给他讲述这里发生的一切。乌维鲁斯递给他一支香烟，陆军少尉马上给他点上。

“正如我说的那样，”巴列霍斯肯定地说，“农民们占领了阿伊娜庄园，政府不得已派了警察把他们赶出去。瓦恩卡约派去的一个连队，走了一个星期才到达乌丘巴木巴。后来，农民们都被枪杀了，死伤无数，惨不忍睹，然而，周围的农民们并没有被征服。他们现在懂得了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一家印第安人或者是一伙印第安人从哈乌哈广场的阴影里穿过，玛伊塔觉得像是幽灵似的，刚一出现又很快消失在教堂后面的拐角处，他们头上顶着洗衣盆之类的东西。

“不是乌丘巴木巴的农民们准备起来斗争。”矮子乌维鲁斯说，“他们正在进行斗争，革命已经开始。我们要做的是把革命引向正道。”

玛伊塔感到寒气袭人，同时不时有高山反应的感觉，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

“这些消息可靠吗？”

“就像我这么可靠。”巴列霍斯笑了，“我到那儿去过，亲眼见过。”

“我们俩到那儿去过。”矮子乌维鲁斯纠正道，把“我们”二字拖得很长，“我们见过他们，并且我们还和他们谈过

话。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玛伊塔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现在他确信巴列霍斯不是一个没有经验、冒冒失失的毛头小伙子，而是一个严肃的男子汉，他思维敏捷而且颇具远见卓识，他的根深深地扎在山区。巴列霍斯比他在利马时想象的更加成熟。他们的计划远比他估计的全面周密。遗憾的是阿纳托里奥没有来，要是他来了多好呀！可以与他交换看法，共商大计，从而引导当地这些满怀革命激情的人走更加正确的道路。最遗憾的是托派革命工人党的其他同志们没有来。要是他们来，会发现这里发生的一切并非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火热斗争。虽然还没有到夜里一点钟，可是仿佛哈乌哈街上就只有他们三个人。

“现在你该懂得，我过去对你说安第斯山区革命的条件业已成熟是有根据的吧？”巴列霍斯又笑了笑，“老兄，我对你说过许多次，这里是一座火山。我们就要叫它喷射火焰！”

“当然，我们决不会两手空空地到乌丘巴木巴去。”乌维鲁斯先生又把声音降得很低，他环顾四周，仿佛这些话能召来灾祸似的，“我们带了三挺机枪、一些毛瑟枪，我也搞不清少尉是从哪里搞来的，同时还带了些急救药品。这些东西我们都用帆布盖起来，隐蔽得严严实实，一点破绽不露。”

他停了一会，又品尝一下酒的余味，然后小声对我说，就凭他给我讲的这几件事，要是被人听到的话，我们俩都要被杀头。

“您看，事情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杀了许多人。”听到渐渐离去的坦克声消失在夜空中（整个下午我们不时地听到坦克声），他才又继续说，“一切都有科学根据，并不是头脑发热，心血来潮，只是后来巴列霍斯犯了个错误：他把日

期提前了。我们做了大量过细的工作。地点不是也选择得很好吗？游击队现在不正控制着这一地区吗？政府的军队根本不敢到那边去。简直可以和越南、萨尔瓦多相比了。干杯！”

那边，山区里要是有一个人，一帮人，甚至一支游击队，就像稻草堆里埋一根针，是很难找到的。透过繁星闪烁的天空，玛伊塔看到这样一幅景象：热带雨林草木丛生，盘根错节，密不透风，人迹罕至；巴列霍斯与乌维鲁斯率领一支游击队在林中艰难地行进。这里不是亚马逊平原，是平原与高山交界处的热带雨林，到处是高低不平的山坡、沟壑、狭谷，间或也有悬崖绝壁。这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开展游击战的理想地区。敌人要是敢进去的话，切断敌人的交通，偷袭扰乱，击溃敌人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对敌人来说，这里就是一个迷宫，只能进不能出。他自己的胡子也长长了，显得消瘦多了，可眼神里充满自豪感。他的手因练抠扳机起了老茧，因点导火索，扔手榴弹变得粗糙。看到日益发展壮大的游击队，原来他灵魂深处残存的那一丝心灰意懒的情绪被一扫而空。起义战线越来越扩大，城市里的工人、佣人、学生、下级职员逐渐懂得革命是自己的事，必须自己起来干才行。这时，他感到特别需要阿纳托里奥，如果他可以在这里与他聊一夜：“他在我身边的话，我也就不会感到寒冷。”

“先生，我们再谈谈玛伊塔，好吗？就说五八年三月他来的那一次吧。那次，他认识了您和圣何塞学校的一些学生，他知道你们和乌丘巴木巴的农民有联系，巴列霍斯想在那里建立游击队。他第一次来还干了些什么？您还知道些什么？”

他眨眨一对小眼睛，略显不快地看看我，喝了一口皮斯

科酒，津津有味地咂咂舌头。他就喝那么一小口，怎么能在嘴里呆那么长时间？我知道这一瓶喝完后，我一口酒也喝不了了。不要说喝，怕饭也吃不下了。我好久不曾喝酒，喝了一点就上脸。我有点集中不起精神，心跳加速，大概玛伊塔的高山反应就这个样子。

“那个可怜的家伙，可能一生中没有那样吃惊过。”他终于开口了。每当讲起玛伊塔时，他总是带有轻蔑的口气。莫非他憎恨玛伊塔，还是对所有利马人、所有首都人、所有海边人都怀有敌意呢？“他一到这里就以老革命自居，以坐过监狱为荣，满以为会成为头头。可当他到这里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了，万事俱备。”

他伤心地叹了口气，哀叹他的皮斯科酒即将殆尽；哀叹他逝去的青春；哀叹他本人和少尉教训过的玛伊塔；哀叹正在遭受的饥饿。虽然，我和他谈话的时间不长，但我已经发现他是个自相矛盾的人，很难让人理解。一会儿激动起来，倒也像个当年的革命者；一会儿又高声嚷嚷：“说不定什么时候恐怖分子会闯进来，处死我，给我挂个牌子，还写上：‘狗叛徒’的字样。也许自由分队会从我尸首上把睾丸割下来放进我嘴里。”一会儿又对我大发雷霆：“这是一场噩梦，你怎么能写成小说？”他还会谈论我所感兴趣的事情吗？是的，他又谈起来：

“当然，我可以把他这次来哈乌哈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都告诉您。他服从我的安排。我组织人和他开了两次座谈会：一次与圣何塞学校的学生们，一次和一些来自奥罗亚矿、卡萨帕尔加矿及莫罗科恰矿区经验丰富的同志们。他们大都是哈乌哈人。他们在矿上做工，这些矿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一个帝国主义合资公司经营的。矿工们每逢过节和周末都来。”

“那些矿工们也同意与你们一起干？”

巴列霍斯与乌维鲁斯说，应该让矿工们参加会议，但是玛伊塔说还是不参加为宜。一共来了五个人，玛伊塔到达哈乌哈的第二天上午，就把他们叫到乌维鲁斯的家，谈了约莫两个小时。会议开得相当不错，玛伊塔和他们很谈得来，尤其和一个外号叫“鹦鹉”的人谈得最投机，他看书最多，政治上最成熟。然而，不论是谁，都没有说放弃工作，离开家去拿起武器干，玛伊塔也没有说让他们干。“他们都很明智，”玛伊塔想，“都是工人，知道这样干要担多大风险。”工人们第一次见到他，个个显得谨小慎微，畏首畏尾。这也是符合逻辑的吧？看样子都是乌维鲁斯先生的老朋友，至少那个镶着满口金牙的“鹦鹉”。他曾经是阿普拉党党员，现在他说是社会主义者。工人们一谈起矿上的那些美国佬，个个恨得咬牙切齿；谈起工资、事故以及因长期在矿井下工作得的疾病时，他们表现出很高的革命热情。但是，每当玛伊塔说到应该怎样参加起义时，他们的回答则含糊其辞。一谈到起义这个具体问题，他们的决心便发生动摇。

“我们还去了里克兰。”乌维鲁斯慢吞吞地说，“我带他去的，搭我侄子的卡车。那天巴列霍斯必须在监狱里上班。里克兰，可怜的里克兰呀！您知道在这场战争中，有多少像里克兰这样的城镇被夷为平地？有一天，一个法官对我说，他听参谋部的一个上校说，据武装部队的秘密统计，已经死了五十万人。是的，我带他去的里克兰，有一段路全是沿着悬崖走，走了四个小时才爬到四千五百米的高度，穿过山口。那天可真够我们那位托派分子受的！他的鼻子不停地出血，手绢都湿透了。山这样高，他不习惯，见到悬崖就害怕，头脑发晕。我向您起誓，我一点不撒谎。”

他以为卡车会从悬崖上滑下去，自己会摔死，或者因他的鼻子出血不止，也会丧命的。总共走了二十四个钟头，才到达里克兰县，里克兰在安第斯山脉的山沟里。这次活动，是他在哈乌哈的所有活动中最令人鼓舞的一次。他大开眼界：神鹰栖息的高原，皑皑的白雪，晴朗的天空，黄褐色的山峰。他想：" 真叫人不敢相信，这么高的地方竟有人居住。人们征服了大自然，在山坡上开垦土地，播种农作物，在这样一个贫瘠的地方创造了人类灿烂的文化。 " 矮子乌维鲁斯给他召集了十二个人，大都是手工业者和小农。他们都兴致勃勃地来了，他们都会讲西班牙语，能够把思想表达清楚。他们向他提了许多问题。他被他们的热情所感动，用比对圣何塞的学生们讲话时更加坚定的语气对他们说，他们肯定会得到利马进步阶层的支持。有几个来人穿着粗制皮凉鞋，这些下层人讲起革命来流露出的热情多么令人激动啊！他们认为，革命本来就是应该发生的事，是一件具体的事情，应该全力以赴，百折不挠地干下去。他们说起话来直来直去：谈到武器，谈到隐藏武器的地方，谈到他们从第一天起就参加行动。不过，玛伊塔说这话时心里也是很矛盾的。苏联将给他们什么样的援助？他没有勇气谈斯大林分子的官僚机器怎样背叛了革命，怎样背叛托洛茨基。他认为，现在把这些事讲出来会使他们糊涂，至少，这是不谨慎的。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会支持，但要等到秘鲁革命已经成为事实时。在此之前，他们只会尽力从道义上支援，口头上支持，本国有些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要社会主义国家助一臂之力，非得等到一切都大功告成。但无论如何，他们会支援的，因为，这场革命一旦开始，就势不可挡地向前发展。

“一言以蔽之，里克兰让你大为惊奇。”巴列霍斯说，“老兄，我早就预料到了。”

他们坐在火车站对面一个名叫“斗鸭酒家”的小饭馆里，饭桌上铺着浅蓝色油布，窗户上挂着印花布窗帘，上面印着一幅斗鸭图。玛伊塔眺望窗外，山峰起伏的群山渐渐地由赫色变为金黄色，由黄变灰，由灰变暗。他们从午饭后就待在这里，已经有几个钟头了。店主认识乌维鲁斯和巴列霍斯，一有空便凑过来和他们聊上几句。但当他一走近时，他们便马上改变话题。玛伊塔询问有关哈乌哈的事。为什么叫“斗鸭酒家”？这出自亚乌约区的一个传说。每年一月二十日过节时都跳一种叫班迪亚的舞，跳时在街上竖起一根杆子，上面倒挂着一只活鸭子，骑手和狂舞的人跑着跳着，互相争着把鸭子的头揪下来。

“那时多好啊，还有鸭子。”乌维鲁斯牢骚满腹，“我认为我们谈的相当深入了。那时谁都能吃得起鸭子，哈乌哈的人每天吃两次鸭子。这种事现在说起来，孩子们都不相信。”他又长吁短叹道：“那种节日可有意思了，吃呀喝呀，可以和狂欢节媲美。”

“我们唯一的要求是，一旦我们干起来，党就要履行他的义务。”巴列霍斯说，“大家都是革命的，对吧？你给我的那几份《工人之声报》，我看了不知多少遍，每一篇文章都谈论革命。好啊，那就应该对写在纸上的话负责任。”

玛伊塔听到这些话，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是第一次发现，巴列霍斯对托派革命工人党的支持抱有怀疑态度。关于党内对他的计划与他本人的辩论，玛伊塔在巴列霍斯面前只字未提。

“党是要履行他的诺言的，但事先必须确定这是一次经过周密考虑的严肃行动，并且有成功的把握。”

那些天，托洛茨基分子玛伊塔发现，准备工作并无草率之处，亦非头脑发热之举。乌维鲁斯谈到正题上来：“他并不怀疑我们的准备工作有不周密之处。”

“确实是这样，比我想象的严肃认真得多。”玛伊塔对巴列霍斯说，“你知道，你把我蒙在鼓里了吗？你从未对我提起过，你已经组织了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参加的起义网。同志，直到现在我才清楚。”

“斗鸭酒家”掌灯了。玛伊塔看到有许多小虫子围着灯光飞来飞去，灯吊在一根长绳子上。

“我也像你对我那样，有些事情对你也不能不提防。”少尉说，此时他讲起话来既沉着又冷静，完全变成另一个人，“需要考验你是否可以信赖。”

“你学得不错嘛。”玛伊塔满意地对他笑了笑说。他停顿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今天他的高山反应轻多了。两天以来，他第一次能够舒舒服服地睡上几个小时。他是否正在逐步适应高原气候呢？“另外两个同志，阿纳托里奥、哈辛托下个星期来，然后，他们将写出一份报告交给党中央，这份报告决定党是否参与。对此，我持乐观主义态度，当他们把我所见到的都看过之后，肯定不会往后缩的。”

毫无疑问，就是在这里，当他第一次到哈乌哈时，玛伊塔的脑子里就产生了那种后来给他带来许多麻烦的想法。他在“斗鸭酒家”和他们说过？他是小声说的，而且说的时候

非常谨慎，没有泄露左派分裂的真相。他怕说出来，他们会大失所望。是这样的吗？乌维鲁斯先生说，不是这样。“尽管我年老、体弱多病，可是我的记忆很好。”他说玛伊塔从来也没有跟他们说过，他和别的组织或党派有联系。那么，是不是只把他的想法和巴列霍斯说过？不过，不管怎么说，那种想法是在哈乌哈产生的，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好凭感情用事的人。如果说他回到利马后找过布拉克盖尔，而且很可能还找过革命工人党的人，那肯定他在山上的时候就已经反复考虑过了。那些天，他住在塔拉芭卡街的营房里，夜里头痛，睡不着觉，一边听着他朋友的呼噜声，自己的心急速地跳动着，一边酝酿了那种想法。就凭托派革命工人党这么一个小组织，能领导这么一场重要的起义吗？天很冷，尽管盖着毯子，他仍然蜷缩一团。他把手放到自己的心口，悟出了道理：左派之所以分裂，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具体的行动，天天在那里作无谓的争论。就是因为这个，使得他们越辩论越分裂。游击行动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可以使一切革命者团结起来。只要干起来，他们就会懂得，空头辩论是无济于事的。是的，在政治斗争中，严肃的行动是治愈宗派主义的灵丹妙药。行动可以打破小圈子，使敌对的同志们开阔眼见，懂得一定要具有大无畏的精神，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同志们，革命已经开始，巴布罗派和反巴布罗派有什么紧要呢？”他想。哈乌哈的气候很冷，天空布满星斗。“这里的纯净空气，会使我玛伊塔心明眼亮。”他把手从胸口移开放到裤裆里，他想念阿纳托里奥，开始玩弄起来。

“他没有对你们说，这个计划很重要，就凭一个托派组织难以实现？”我又提出，“他想争取到另一个托派组织的配合，

甚至想获得共产党的支持，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没有对我说。”乌维鲁斯先生一听到我的问话，立即答道，“关于这个，他只字未提，而且没有和我们谈左派的分裂，更没有说托派革命工人党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组织。他有意地卑鄙无耻地欺骗了我们，对我们说党长党短的。我那时以为他说的党就是指共产党，而这也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学生。”

远处，仿佛是在开炮，要不就是雷鸣，停了几秒钟后，又响了起来。我和乌维鲁斯哑口无言地倾听着，继尔又听到一阵轰鸣。他说：“这是炸药爆炸的声音，是游击队在山上放的。他们故意这么搞，为的是扰乱兵营的士兵，使他们不得安宁。这叫心理战。”

不，是野鸭子。一群野鸭子哇哇地鸣叫着飞过田野。玛伊塔他们从酒店里出来，信步漫游，手插在口袋里。再过一个小时，他就要乘火车回利马。

“当然，来多少人都有地方住，”巴列霍斯说，“人越多越好。有足够的武器供给那些愿意使用它的人。我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要快点去联络人。”

他们沿着城边游逛，远处屋顶的红瓦折光闪闪，微风轻拂桉树、柳树沙沙作响。

“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没有必要仓促行事。”

“有充分的时间？”巴列霍斯冷淡地说，转过头看了他一眼。他发现，在巴列霍斯的眼里，闪烁着疑惑的光。玛伊塔想：还有什么事没有，我得问问他。“组织领导过阿伊娜庄园起义的两个领导人，现在就在这里。”

“在哈乌哈？”玛伊塔惊奇地问，“为什么没有把他们介绍

给我？我很想和他们谈谈。”

“他们被关在监狱里，不许探监。”巴列霍斯笑了，“他们成了阶下囚。”

“这两个领导人，是被去乌丘巴木巴镇压农民哄抢土地的警察押到这里来的，但是，不敢肯定在这里能待多久。说不定什么时候发来一道命令，要警察把他们转移到瓦恩卡约或者利马。可计划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他们能争取到农民的合作。如果警察把他们从哈乌哈押送到乌丘巴木巴就坏事了。你看，为什么我说时间不多？”

“共有两个领导人，一个叫亚历康德罗·孔多里，一个叫塞农·贡萨雷斯。”我干脆先把名字给他点出来。乌维鲁斯听到我的话张口结舌。灯光很暗，我们几乎是在黑影中。

“对，就这么叫。”乌维鲁斯吞吞吐吐地说：“您很清楚嘛！”

我是很清楚。我把报纸上、杂志上有关这件事的文章都找来读了，并且和无数参加过这件事的人及见证人都谈过话。然而，越调查我反而觉得对事实真相知道得越少。因为每调查到一个新的材料，便出现新的矛盾、猜测和神秘之处。

为什么距这里很远的胡宁州热带雨林区的这两个领导人，会被关押到哈乌哈的监狱？

“纯属巧合。”巴列霍斯给玛伊塔解释，“关于这个，我并没有介入。他们转到这里，是因为审判官要在这里对他们进行审讯。要是我姐姐，她该说是上帝的旨意。”

“在他们被抓走之前就答应过与你们合作？”

“从原则上，可以这么说。”乌维鲁斯说，“我们去乌丘巴

木巴时和他们谈过话，是他们帮我们把武器藏起来的。但是，只是在这里关押的那一个月中，他们才答应与我们合作，他们和少尉巴列霍斯成了莫逆之交。据我所知，直到事情发生之前，并没有把具体细节告诉他们。”

虽然，这事已经过去很久，但谈话的最后一部分使乌维鲁斯很难堪。他只是讲听说云云，而他本人最终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是有争议的，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又听到远处有枪声。“或许在枪毙恐怖分子的同谋。”他咕哝道。不知什么时候，闯到家把他们怀疑的人抓走，推上吉普车或者坦克车拉到郊外。第二天就能在路边看到尸首。蓦地，他问我：“在秘鲁这样的处境中，大家都不知道是否头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你竟想要写一本小说？这样做有意义吗？”我对他说：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而且我已经着手写了。从乌维鲁斯先生的表情中，我看到他有些沮丧，他说的这些话，使我感到他未免过于悲伤。我总觉得他说什么都是为了自己，为了替自己开脱。我知道这是一种偏见，但我无力摆脱。难道其他所有的人不也都是这样吗？他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就因为我是一个活着的人吗？为什么我听到的尽是些对玛伊塔不利的话？难道我忘记了在政治斗争中，这个国家还没有变成一座坟墓之前早就是一个大垃圾堆吗？莫非我忘记了敌对的双方常常利用各种卑鄙的伎俩，毫无根据地互相攻击吗？不，不是这个。我感到玛伊塔可怜，而仅仅是因为他走投无路，他受到许多折磨，他的处境不佳。

“这就是说，一句话，在制订行动计划方面，玛伊塔什么作用也没有起。”我对他说。

“公正一点说，微乎其微。”乌维鲁斯纠正我的话，无可奈何地耸耸肩，打个哈欠，堆起满脸皱纹。“有他没他都一样。

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有一定份量的政治领导人，是一个工会负责人，才吸收他参加的。我们需要全国工人及革命者的支持。这就是玛伊塔的作用，然而，结果他连托派革命工人党那么一个小组织也代表不了。政治上，他是个孤家寡人。”

谈完话，我告别乌维鲁斯先生，来到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天上繁星点点，我朝芭卡旅馆走去。一路上，“孤家寡人”这个词始终萦回在我的耳际。乌维鲁斯先生说，如果我怕走这么长的路，可以睡在他的小厅里。然而，我必须走，我需要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摆脱他的坏情绪对我的不利影响，从而冷静地思考我的写作计划。爆炸声停止了，这爆炸声仿佛是宵禁令一样，街上连个人影也不见。我走在路当中，脚落地时故意使劲踏一下，以便遇见巡逻队时，让他们知道，我并不回避他们。对于一个长住利马的人来说，看到天空这样晴朗，心旷神怡之情自不待言。利马总是雾气腾腾，很少见到天上的星星这样明亮。可是，天很冷，我冻得发颤，以至于上牙直磕下牙，下午我还感到饿，现在顾不上了。我又想起“孤家寡人”这个词。他，玛伊塔，从这个党跳到那个党，党越来越小！越来越激进。他不就是为了寻求纯洁的思想吗？可他始终也没能找到，而他终于和一个年仅二十二岁、具有少尉军衔的典狱长，以及一名国立学校的教师一起投身到一个极不平常的起义举动中去：在胡宁区的高原上开展游击战。岂不知他们的行动完全脱离秘鲁的左派组织。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我调查研究了一年多以后，现在仍如当年在巴黎惊悉哈乌哈暴动那天一样，神魂颠倒……吊在老式杆子上的街灯发出微弱的光，古老的房屋隐约可见，有的拥有两扇大门，门上有一对门环，百叶窗式的阳台，我想象得出这样的宅第一般都有走廊相连，院落

中植满树木，墙上覆盖着爬墙虎。昔日居民的生活虽不乏单调，但井然有序，而今人们则是提心吊胆，忧心忡忡。

那位孤家寡人在他第一次到哈乌哈时，肯定感到无比激动而幸福，因为暴动已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他看到一张张笑脸，他和他们谈过话；他还察看了即将举行暴动的地方。仿佛他干了一辈子共产党，密谋起义，时而被追捕，时而坐牢，现在都觉得值得，而这在一个星期以前看来，宛如痴人说梦。真的没有梦见过？确实没有。想倒是想过，但他想到的是一个想了多少年的小伙子。他梦见他把小伙子搂在自己怀里，让小伙子舒服了一阵，自己也过了瘾。他听到小伙子在自己怀里痛快地呻吟……这时他感到一阵舒心的痒，原来是遗精了。他想："你疯了？就在这里，在火车站上？当着巴列霍斯的面？"他又想："同志，这种幸福感你从未有过。"

我发现没有一户人家开着门，可是我记得几年前我来时，傍晚街市非常热闹，有无数商店点着煤油灯，有裁缝店、蜡烛店、理发店、表店、面包店、帽子店。有时，还能看到有的人家在阳台上养兔子。我感到饿了，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同时，我又想玛伊塔第一次去哈乌哈时，他那幸福而激动的情形。那时，他就要回利马，他肯定托派革命工人党会通过他的行动计划。他想："我去找阿纳托里奥，我们俩好好谈一夜。我把什么都告诉他，我们会高兴得忍不住笑出声的，他将大力帮助我。尔后……"

这时，街上十分宁静，间或听到一只夜鸟从屋檐底下飞出来，发出几声惊叫。我已经走出镇子。就在这里，玛伊塔他们就在这些宁静的街巷里，在这个广场上干起了革命。二

十五年前，此地比现在美丽多了，那里有一棵垂柳，还有一棵柏树。那时他们很难想象，在本国事情会如此之糟，会发生这样的饥馑，这样的屠杀，更想象不到左派会分裂得这么厉害。就在这里，玛伊塔回利马之前，在车站上和他们分手时，这位“孤家寡人”还对好冲动的少尉说，为了使起义开头就获得成功，有必要考虑一下，采取几项武装宣传的措施。

“你是指什么？”巴列霍斯问他。

火车已经进站，乘客们推推搡搡，蜂涌而上。他们就站在车门口，利用开车前的几分钟交换意见。

“翻译成天主教的话，就叫做用事例开导群众，”玛伊塔说，“用具体行动教育群众。他们领略到它的威力，会得到深刻的印象，并从中受到启发。一次武装行动宣传，比几百份《工人之声报》还管用。”

他们小声地说着，丝毫没有被人听见的危险，乘客都在拼命挤车，谁还顾得听他们说话呢。

“除了用武装宣传的形式占领哈乌哈的监狱及武器库外，你还想什么？再攻打警察局，夺取宪警队的哨所，对吧？”

“要做的事远比这些多。”玛伊塔说。

占领这些地方就意味着，由一个陆军少尉领导的纯军事行动，有点像一次哗变。从思想方面看，意义不太明确。一定要充分利用最初的几个小时，通过报纸、电台不停地进行宣传报道。这样，开头所做的一切都将在人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并且将永志不忘。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最初时刻，开展有象征意义的工作。这样，它的革命意义、阶级特点就将深入到党员、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中去，就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你知道吗？”巴列霍斯说，“我看你说的有道理。”

“至关紧要的是，应该知道我们的整个行动计划需要用多少时间？”

“只需几个小时。切断电话电报联系，控制电台。这样，除非派人到瓦恩卡约去通知，否则外界根本就无法知晓。等到去报信的人到了那里，再集合警察到达这里，至少得需要五个小时。”

“足够了，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足够了。”玛伊塔说，“告诉群众，我们的革命行动是反对资产阶级政权，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你在发表演说呀。”巴列霍斯笑着拥抱他，“上车，上车吧。快去快回。可别忘了把我送给你的那件礼物也带来，你会用得着的。”

“计划是十全十美的。”这话，乌维鲁斯先生在我们的谈话中说了好几次。请问，先生，究竟什么地方卡了壳？计划部分地改变了没有？又是谁改变了计划并提前行动？

“我也说不准。应该说，由巴列霍斯变更的。不过，莫非是他受托派分子玛伊塔的影响？直到进入坟墓，这个疑点我也搞不清。”他说。这个疑问很伤他的脑筋，而对他的诽谤攻击，甚至把他的名字列入游击队的黑名单里，使他无限惆怅，有苦难言。

回旅店的路程我已经走了一半，仍然没有碰到一支巡逻队、一辆坦克，没有遇上一个人，也没有看见一条狗，只是听到几声夜鸟啁啾。月光如水，星光闪闪，田野宁静，万籁俱寂。苗圃、按树、山岗肃立。马路两厢的住房也和市里的一样，闭门锁户。今夜，湖水应是很值得一看的，一到旅店，我就去湖边静观。走着走着，我对我写的书又倍感兴趣。我

将到阳台上，还要到码头上去，不会有冷枪打扰我，也不会有谁蓄意杀害我。我将静坐回忆，遐想，构思我的小说，天亮前便可成章。

一声哨子响，火车徐徐起动了。

第　六　章

“那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可怕的一次接见。”布拉克盖尔说，“我疑惑地盯着他的眼睛，简直认不出来了。是他吗？”

“是啊，我就是。”玛伊塔马上回答，“我可以进来吗？事情很急迫。”

“你想，一个托派分子闯进我家。”布拉克盖尔笑笑，他想起那天上午，突然，玛伊塔出现在他面前。“我不认为我们俩还有什么好谈的，玛伊塔。”

“事情很重要，又很急迫，远远超出我们之间的分歧。”他当时讲话的语气很肯切。好像没有睡觉，脸也没有洗，看得出他是急匆匆地赶到这里的。“你怕受牵连？那我们另找个地方谈。”

“我们总共只见过三次面。”布拉克盖尔又补充说，“头两次是在托派革命工人党开除他之前，说他是叛徒。其实，就因为他去找过一个斯大林分子，而这个斯大林分子就是我。”

布拉克盖尔又笑笑，笑时连喷出的气都带一股浓烈的雪茄烟味。他戴一副宽边近视眼镜，看看我，显得有点不高兴。我们坐在观花埠区的“海地咖啡馆”。这里正在修缮内部，因为不久前发生的一次暴力事件，把柜台和地板都毁坏了，震碎的窗户玻璃现在还没有装上。我发现周围的人，广而言之，坐在这个咖啡店里二十几张小桌周围的人，都在议论：古巴军是不是真的越过秘玻国境进入到秘鲁？三天前由玻利维亚和古巴“志愿军”支持的秘鲁暴动分子，是否真的击退了前去镇压他们的政府军？是不是军政府真的已警告美国当局，如不及时干预，暴动分子指日可取阿雷基帕市，并在那里宣布秘鲁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当然，布拉克盖尔和我尽量避而不谈别人议论的这些事情，而是谈论与我要写的小说有关的一个事件，它发生于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现在早已被人们忘却。

“实际上，他也是个斯大林主义分子。”停了一会儿，布拉克盖尔补充说，“那时，大家都这样。难道你不是？那时你不也对巴尔布塞①写的《斯大林传略》很感兴趣？你不是还能背诵聂鲁达写的悼念斯大林的诗吗？你不是还有一张毕加索画的斯大林头像的宣传画？斯大林逝世时，你不是也哭了吗？”

布拉克盖尔是三十五年前我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导师。那时，我参加了一个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学习小组，地点是在自由人民区的一户人家里。他那时，确实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分子，是一架只能印发公报的机器，一台只知道重复别人话语的机器人。现在他老了，干点印刷工作，生活艰苦，捉襟见肘。他现在还在党内吗？也许在，但他是个永远爬不

① 亨利·巴尔布塞（1873—1935）：法国作家，故于莫斯科。

到领导层的老党员。他现在就在我面前，我们是在白天相见的。虽在白天，但天色灰暗，利马笼罩在浓雾之中，使人倍感沉闷压抑，加之这时又传说，秘鲁南方的战争将国际化，使人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他从未被捕过，而那时，共产党所有的极左派组织的大小领导人都转入了地下，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死去，关于他的历史有很多传闻，但我不想去调查核实。（如果消息准确的话，马上就要爆发全面战争，我就来不及写完我的小说。如果战争打到利马，打到我的家门口，我怕根本就写不下去。）我现在感兴趣的是，二十五年前，哈乌哈起义前夕，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曾经举行过三次会议。这三次会议他都参加了。会上各派都亮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有反对派，包括他这个斯大林主义分子，有玛伊塔那个托派分子。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布拉克盖尔理应提拔到中央委员会或者进共产党的领导层去，而现在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据说，这与他在中欧的一个国家（匈牙利或者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一件事有关。当时他被派到那里的一个干部学校学习，结果陷进去了。人们在“背后”说他搞宗派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狂热，不守纪律，瓦解党的路线。谁也搞不清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反正最后把他开除出党。难道他犯了超级大罪：批评苏联？如果是这样，那他为什么要批评苏联呢？事实是，其中只有几年他被清理出党。对一个党员来说，还有什么比清除出党更令人难过的事呢？一个神父被开除教籍也不会那样孤单。一旦被清除什么就完了。后来，可能他做了个像样的自我批评，又恢复了党籍。尽管回到了党内，可从此未受过重用。据我所知，党只派他看《团结报》及其它一些小册子、传单的校样，这样直到暴动发生后，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自由分队开始大

批搜捕并杀害他们。他那时在党内是一名无名小卒，一点作用不起，没有人抓他，也没有人来杀害他。对过去痛苦的记忆，使得他一切幻想都破灭了。最近几年，每次我见到他，他总是给我一种萎靡不振的感觉。当然，差不多我总和别人一起见到他，像今天这样，我们俩单独在一起谈个十分八分钟的时候极少。

“并没有把玛伊塔开除出托派革命工人党。”我纠正他的说法，“是他自己退出的，就是在最后那次会议上。他的退党声明登在《工人之声报（托）》上。当时我把它剪下来，保存着呢。”

“是把他开除了。”他语气很肯定，纠正我说，“我了解托派分子们的这一次会议，就像我亲身参加了一样那么清楚。最后一次我见到玛伊塔时，他自己亲口对我说的，那是在第三次会议上。我去要杯咖啡，你不急吧？”

这个店现在也只有咖啡和饮料，连那种质量很差的饼干都实行定量配给，因此规定平民百姓就只能要一杯咖啡喝，然而，这个规定没有人服从。咖啡店里邻桌的人情绪激昂，大家都扯着嗓子讲话。虽然我不想听，可是难免分散精力，偶尔也能听到一星半点。其中有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说，外交部估计，越过国境进入秘鲁的古巴人和玻利维亚士兵可能有几千人。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姑娘听到后，睁圆了眼睛问：“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不是也来到秘鲁了？”“他太老了，经不起这么折腾。”青年人的话使她大失所望。我看到窗外迪亚戈纳尔大街上一些衣衫褴褛的小孩子们，他们个个都光着脚，发现一辆小汽车停下来，便一窝蜂似地围上去，有的要洗车，有的要给看车，有的要给擦玻璃。在我们就座的这家“海地咖啡馆”里，也有好几个孩子转来转去，要给人家擦皮鞋，说

保准擦得镜子一般亮。（有人说，这里爆炸的那枚炸弹就是这样的孩子们放的。）街上还有三五成群的妇女，一见到行人或汽车在红灯亮时停下来，便马上凑上前去卖走私廉价香烟。秘鲁现在什么都缺，唯独不缺香烟。为什么他们不走私进口些罐头、饼干等能够充饥的食物呢？这类东西倒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呀！

“是这么回事。”玛伊塔气喘吁吁地说。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安静下来，能够有条不紊地讲述。布拉克盖尔索性不打断他，让他讲下去。他把要说的话都说了。这样做对不对？他不得而知，他也不管后果如何。一夜没合眼，现在顾不得想那么多了。“你看，我敲你的门不是没有道理吧？”

布拉克盖尔默默无语地看着他，玛伊塔瘦长的手指被烟熏得发黄，香烟即将燃尽。小房间既是布拉克盖尔的卧室，又是餐厅和会客室，里面堆满了家具，还有为数不多的几本书，绿色的糊墙纸因返潮而变得斑斑点点。玛伊塔讲话时，听到楼上有女人的说话声及小孩的哭泣声。布拉克盖尔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如果不注意他那双盯着玛伊塔的眼睛，很可能会认为他睡着了。他的家在赫苏斯·玛丽亚区，外面很安静，没有过往的汽车。

“你这是对党的挑衅，太愚蠢了。”半晌，布拉克盖尔总算说了一句干巴巴的话。玛伊塔手中的香烟灰掉到地上，布拉克盖尔用脚踩了一下。“我还以为托洛茨基分子会耍花招哩。玛伊塔，我完全可以不见你。”

玛伊塔并不感到意外，布拉克盖尔总算说了几句应该说的话。玛伊塔心里想：一个党员不应该轻信别人的话，而布拉克盖尔毕竟是一个党员呀！这一点，自从那次他们俩一块

被捕时他就懂得。玛伊塔在回答他的话之前，又点上一支香烟，并且打了个哈欠。楼上的小孩又哭了起来，一会儿工夫，妈妈便哄着小孩睡着了。

“请你记住，我不是向你们的党请求帮助，只是想把这事告诉你们，它高于我们之间的分歧，与所有的革命者都有关系。”

“甚至包括那些背叛十月革命的斯大林分子？”布拉克盖尔不服地嘟囔道。

“是包括那些背叛十月革命的斯大林分子。”玛伊塔点头表示同意，继而改变了谈话的语气：“在迈出这一步之前，我已经考虑了整整一个晚上。我不相信你，正如你也不相信我一样。你没有觉察出来吗？你认为我不知道这样做冒险吗？我是在把一件危险的武器放在你和你们党的手中，然而，我就在这里，你别说那些连你也不相信的‘挑衅’之类的话了。好好想想吧！”

这一段故事如此离奇，我很难理解。玛伊塔向自己的政敌透露暴动的详细情况，更有甚者，明知他们不会与自己合作，还说不是去请求帮助。这不是荒唐到了极点吗？他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今天黎明时分，革命电台广播说，从昨天晚上红旗就在布诺的上空飘扬了，天亮之前将在阿雷基帕市、库斯科市上空飘扬。”我听到有一个人这么说，而另一个人则说：“胡扯淡。”

“他来找我时，我也觉得没有意义。”布拉克盖尔同意我的说法，“起初，我认为那是个骗局，或者他陷到这件事中而不能自拔，感到悔之莫及，故意制造困难，事情越弄越复杂……后来，事情发生以后，当然就很清楚了。”

“唯一清楚的是我们自己背后被捅了一刀。”帕雅尔迪同志吼叫起来，“在这种冒险的事情上，祈求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帮助，这是无视组织纪律。这是百分之百的背叛。”

“如果必要的话，我再给你解释一遍。”玛伊塔打断他的话，然而，并没有动气。他坐在一堆《工人之声报》上，后背正好靠在那幅宣传画上的托洛茨基脸上。霎时间，室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他们是在老地方，索里托斯街的库房里开会。）“不过，同志，请你说清楚：你说的‘冒险’二字是指‘革命’吗？”

布拉克盖尔伸出舌头舔舔干裂的嘴唇，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那淡如清水的咖啡，然后，闭上双目，默不作声。大概他在思考邻桌上的对话：“假如消息可靠，明后天，战争就能打到利马来。”“巴乔，你是这样看吗？唉，战争将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天色渐晚，汽车越来越多，迪亚戈纳尔街上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讨饭吃的小孩子和卖香烟的妇女也越来越多。“古巴人和玻利维亚人来，我才高兴呢！”一个脾气很坏的人说，“现在厄瓜多尔海军可以找到借口打进来了，说不定都到了皮乌拉市，甚至到了奇克拉约市。但愿他们把那些该杀的人都杀光，结束这一切。”我则几乎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因为我对他们这些耸人听闻的话语不感兴趣。我的兴趣仍然在那两次会议上，我的兴趣仍然在那时的利马上。那时候，汽车少多了，穷人少多了，走私的人少多了。在当时看来，现在发生的这些事似乎是不可能的。

玛伊塔把暴动的秘密告诉他们的政敌斯大林分子，并且他又在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与同志

们进行了辩论。

“他来找我算是聪明的一步。除此之外，他干的那些事都很愚蠢。”布拉克盖尔补充说。他取下眼镜，擦擦镜片上的灰尘。我看到他不戴眼镜宛如一个瞎子。“如果游击队站稳了脚跟，就需要得到城市的支援，需要组成一个援助游击队的阵线，以便能给他们输送药品，提供情报，隐藏并治疗伤病员，招募新兵。这样一个阵线就是游击队所做一切的共鸣箱。这个阵线由哪些人员组成？难道在全秘鲁就靠那二十几个托派分子？”

“实际上，我们只有七个人。”①

布拉克盖尔懂了没有？但他又像一尊雕像那样一动不动。玛伊塔抬起头，才看到他很疲倦，不过他自己也很累。不时，又听到楼上有小孩在哭，有女人在说话。玛伊塔又给他解释：没有人要求共产党员们都必须上山去（这时，谈话尽量不提巴列霍斯的名字，不提哈乌哈，不说日期），也没有人提出要他们放弃原则、理想，打消偏见，改掉教条主义的毛病等。他只是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并且提醒他们要提高警惕，说不定明天早上形势突变。到那时，或者为信仰而斗争，或者放弃信仰。到那时，共产党人必得向人民群众证明：他们到底是真的想推翻剥削社会制度，并代之以工人、农民为领导的革命社会制度，或者平时说的那些革命词藻纯粹是讲给别人听的，而他们所依靠的只是那个最强大的联盟，幻想有朝

① 玛伊塔的内心独白。下同。

一日革命会从天上降到秘鲁来。

“攻击起我们来，你倒真厉害。”布拉克盖尔说，“你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说具体点。”

“要你们有所准备，别无其它。”当时我想：他会不会打断我的话？我从未感到那样疲劳过，得费好大劲才能听清他的话。楼上，小孩又放声哭起来。“因为，一旦我们干起来，敌人肯定要进行屠杀，你们很难逃避镇压。我想是这样。”

“当然是这样。”布拉克盖尔咕哝了一句：“如果你说的不是瞎话，政府、新闻界以及所有的人都将说这是由我们发动的，用莫斯科的钱，执行的是莫斯科的命令。你不认为会这样吗？”

“很可能会这样。”我表示赞同。这时，小孩哭得很厉害，哭声令人烦躁不安。“不过，现在你们已经知晓，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此外……”

我张口结舌，不敢把话说完。自从和布拉克盖尔谈话，我第一次感到犹豫不决。我的脸直冒汗，眼睛睁得大大的，两手颤抖。冒险和叛变？

“这些话说得恰如其分，我支持。”卡洛斯同志斩钉截铁地说，“帕雅尔迪同志说的全是真理。”

“现在你要集中精力考虑巴列霍斯的问题。”总书记警告玛伊塔，“我们首先讨论哈乌哈的问题。然后，讨论玛伊塔同志去找布拉克盖尔的问题。”

“对，”卡洛斯同志说，而玛伊塔则想：哼，你们大家都和我对着干。“一个陆军少尉搞了个革命的暴动计划，既得不

到工会的支持，又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除了称它是冒险行动，我们还能称它为什么呢？”

“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挑衅或者闹剧。”梅达尔多同志插话。他毫不客气地看看玛伊塔，尔后冷冰冰地补充说：“党不能去做无谓的牺牲。”

玛伊塔感到屁股底下的那一堆《工人之声报》开始往一边歪，他想：要是报纸倒了，自己滑倒才倒霉呢。他偷偷地看了他们一眼，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进来时，他们用那样一种冷漠的态度和他寒暄；为什么今天的会议没有一个人缺席。他们都反对他吗？甚至连行动小组的成员也反对？阿纳托里奥也反对？但他并不泄气，只是顿时感到火冒三丈。

“此外，还有什么？”布拉克盖尔鼓励我。

“枪支，”我对他小声说，“要多少有多少。如果打响，共产党愿意干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枪支。当然，是白给。”

我看到布拉克盖尔停了几秒钟以后，又点上一支香烟。那天上午，也不知他抽了多少支。火柴灭了两次，第三次一点上他赶忙深吸了一口，结果呛得直咳嗽。我暗自思忖：“这回你该相信事情是严重的吧？”我见他蓦地站立起来，嘴巴里、鼻孔里同时喷烟吐雾，走进隔壁的房间大声喊道：“带他出去走走。哭得这么大声，我们没法谈话。”没有人回答他的话，不过，小孩马上停止了哭泣。布拉克盖尔又坐下来，看了看我，心情平静了一些。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一场埋伏，玛伊塔。”他咕哝道，“不过，有一件事我很清楚：你发疯了，你真的认为党在这件事情上，出于某种原因，比方说，共同的事业，会和托派分子合作？”

“不是和托派合作，而是与革命合作。”我进一步明确地对他说，“是的，我认为会，因此我才来找你。”

“确切点说，是一次小资产阶级的冒险行动。”阿纳托里奥说。从他谈话吞吞吐吐的样子，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他是在背台词：“没有请群众参加，计划里也没有提群众。另一方面，假如我们到达乌丘巴木巴，谁能保证农民肯定起义？谁也没有。这一切是由一个满脑子都是政变思想、冒险思想的陆军少尉策划的。我们在这里面起什么作用？只不过被别人拖着走，当炮灰。”说到这里，他才转过身来，鼓起勇气看了我一眼，说：“同志，我的责任是向大家说出我的想法。”

“昨天晚上你并不是这么想的。”我心里是不同意他的说法的，然而，也许他是这么想的，那么，他头天晚上的表态就是骗我的。为要找点事分散一下我的注意力，我小心翼翼地挪动一下身子，把坐在屁股底下的报纸摆好，往墙上靠了靠。现在事情很明显，党中央（托）事前开过一次会，会上对今天的会议定了调子。阿纳托里奥肯定参加了那次会议。这时，我感到一阵恶心，揪心的难受。这是演戏给我看呢。昨天，在塞皮塔街的房子里我们俩不是谈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吗？我们俩不是还在一起研究了一下行动计划吗？上山之前，你还要和什么人告别一下吗？就只和我教母即姨妈说一下就行。你对她说什么呢？我搞到了一个到墨西哥学习的奖学金名额。姨妈，每个星期我都会给你写信的。昨晚，阿纳托里奥就怀疑、犹豫和心理矛盾吗？可是一点迹象也没有呀！相反，他很感兴趣，而且态度诚恳。我们俩并排躺在床上，黑着灯，小床吱吱呀呀地响，天花板上一有动静，他就吓得身子一缩，往我身上靠一靠。他这一动，便勾起我对他身上某

一部位的好感，我正在急不可耐地等着他的动作。突然，我对着他说：“我不想你死。”停了一会儿，我又说：“你想到过你会死吗？”他细声柔气地回答我说：“我当然想到过，不过，没有关系。”这时，我感到浑身颤动，仿佛我身子底下的那一堆《工人之声报》又要倾倒，我心里想：“实际上，对你有关系。”

“我认为他是在装腔作势，要不然就是有精神病。我认为他……”布拉克盖尔不说话了，邻座上一个姑娘的笑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有时在同志们中自鸣得意，自己仿佛像拿破仑在士兵们面前那么威风。我想，大概他今天早晨醒来时，觉得自己如同列宁当年在芬兰车站上一样。

他又停下不说了，刚才那个姑娘的笑声再次打断了他。在另一张桌子旁，有一位先生正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发表高见：“把水桶、脸盆都灌满水，放到每一间房子里，浴缸也要放满水。没有自来水，海水也行，如果赤色分子进了城，美国就要轰炸。比轰炸更严重的是火灾，一定得准备足够的水，哪里着火就往哪里浇。我的估计错不了，你们相信好了。”

“虽然他有点虚张声势，但说的还是真话。”布拉克盖尔继续说，“他说的都是实话，他们有用不完的枪支，是陆军少尉从利马军队的武器库里搞到的。你知道，他还送了一挺冲锋枪给玛伊塔，是吧？当然，毫无疑问，就是从这些武器中抽了一支给他的。武装暴动是少尉的一个由来已久的念头，很可能他还是士官生时就有这个想法。玛伊塔没有得神经病，他关于暴动的意见是诚恳的，虽然愚蠢，但不乏诚心。”布拉克盖尔假惺惺地笑笑，露出满口黄牙。他不耐烦地把脚一抬，将一个要给他擦皮鞋的小孩轰走。

“他们有好多枪，但人手不够。”布拉克盖尔嘲弄地说。

“党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反应？”

“谁也不把它当回事，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什么枪支、游击队的，痴人说梦。那是在一九五八年夏天，当时，古巴卡斯特罗的胡子兵还没有打到哈瓦那，谁相信这种事？党自然持反对态度。一定得和那个托洛茨基分子一刀两断，以防患于未然。后来，当然就一刀两断了。”

一个太太指责那位说储存水可以灭火的先生无知：“对付炸弹最好的办法是祈求上帝！用水对付轰炸，没有听说过！您认为战争是狂欢节泼水玩呀？去你妈的蛋吧！”“幸亏您不是个男子汉，否则我真要把你的嘴撕破。”那位先生暴跳如雷，大声吼起来。这时，陪同太太的一位先生则大大方方地对他说：“我是个男子汉，过来撕我的吧！”看来要动手打架了。

“骗局也好，异想天开也好，这事我们不想听下去了。”布拉克盖尔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也不想再见到你了。”

“这我早就估计到。你们就是你们，谁也改变不了你们的立场观点，你们永远是这个样子。”玛伊塔说。

人们把那两个要动手打架的男人拉开，火气发得快，平息得也快。那个姑娘说：“别打了，这种时候咱们必须团结起来。”一个罗锅儿目不转睛地盯着姑娘裸露着的两条大腿。

“对玛伊塔来说，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布拉克盖尔说着把脚一抬，赶走了另一个跪在他膝下要给他擦皮鞋的小男孩。“他可能冲破了许多禁令的束缚才去看我的。肯定他以为，那场起义可以将把秘鲁分为两半的安第斯山推翻。天真到何等地步！”

布拉克盖尔把烟蒂丢掉，灰白色的烟柱袅袅上升，他看了一眼，又把烟蒂捡起来贪婪地抽了最后几口，这才扔掉。玛伊塔当初迈动双脚去找他时，是不是也这样垂头丧气？当我发觉已经是深更半夜，发现起义的只是我们一小撮人，而且将得不到任何城市组织的支持时，是不是也这样无精打彩？

“还有致命的打击在后头呢！”布拉克盖尔补充说，“他所在的党说他是叛徒，结果，把他开除了。”

这是总书记哈辛托·塞巴约斯的意思，他是秘鲁的托派组织元老，出身工人，他耐心地听取了其他人反对玛伊塔的发言，最后又听取了阿纳托里奥的发言。阿纳托里奥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对年老的总书记一向热爱，而且五体投地地崇拜）。总书记气愤地接着说，他说话时别人一动不动，洗耳恭听：

“对，同志，你说的对。背着我们大家，以党的名义去向我国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乞求合作，这不仅仅是宗派主义的分裂活动，而且是背叛行为。你的发言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替自己辩解，我必须请你脱离党组织，玛伊塔。”

我当时是怎样给他们解释呢？虽然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一个承认事先开过会，然而我感觉到他们是开过会，正像布拉克盖尔现在对我说的一样。我怎么给他们解释我去访问那个头号敌人——布拉克盖尔呢？从后来事情的发展来看，后果并不是那么不可估量。明天或者后天，凡是能够打进利马的“赤色分子”，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幽灵，他们毕竟是在一面旗帜下进行战斗，虽然其中有亲莫斯科分子、托洛茨基分子、毛派分子之分。革命是一桩极为重大而严肃的事情，虽然有时，这一派对秘鲁现实的解释比那一派正确，但这一派要能

取得控制另一派的特权则很难办到。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只有当所有的革命者在不放弃原则的前提下，把无原则的争吵搁到一边，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团结起来才有可能。玛伊塔有四十多岁，穿着不讲究，爱出汗，喜欢眨巴眼睛。他想把那个法宝推销给他们，这个法宝改变了他的命运，而且他相信也将会改变他们以及所有左派的命运。这个法宝就是行动，干。只有干起来，才能减少摩擦、分歧、对立、差别，才能消除由于自私自利与个人主义而产生的敌对行为；只有干起来，大家都投身到革命的急流中去，才能消除革命者以及同志们之间的派别之争。就是为这个我才去找布拉克盖尔的。我不是去泄露任何情报，我既没说出名字，也没说日期和地点，我也没有代表托派革命工人党去和他讲话。我对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以个人名义找他交换意见，将来任何协议必须在党与党之间达成。我没有请求组织批准就去找他，是为了争取时间。我不是要去哈乌哈吗？我去找他，只是想提醒他们，革命就要开始，如果他们是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考虑怎么办的问题，为的是让他们准备好，以便进行斗争。反动派必然进行自卫，必然像一头四面被围困的野兽，不顾一切地进行疯狂的反扑，因而需要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可是他们听我讲完了没有？似乎他们打断我的发言，不让我说下去了。仿佛他们连喊带推，把我赶出了开会的库房。

“他们让他讲了好几次话。”布拉克盖尔肯定地对我说，“会上的气氛十分紧张，甚至把个人问题搬出来，玛伊塔和霍阿金几乎动手打起来。后来霍阿金投票反对他，把他批得一无是处，威风扫地，像丢在地上的一块破布，然后又把他拣

起来，轰他出去。这是一场托派闹剧。我认为，了解托派的这最后一次会议，对你写书很有用处。”

“是的，我也这么想。不过，有的地方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莫伊塞斯、阿纳托里奥、帕雅尔迪、霍尔金都否认开过那次会？他们在很多事情上说法不一致，但有一件事他们说的都一样，玛伊塔的退党声明是他自己到哈乌哈后，通过邮局寄给他们的，而那时托派革命工人党已决定不参加暴动。难道他们个个都记性不好？”

“他们这叫不谋而合。”布拉克盖尔有些语塞地说，“玛伊塔不可能编造出这么一次会。会议开过几个小时之后，他来我家亲口对我说的。这对他来说是致命的，因此，他坐立不安。在一片谩骂声中，什么都说得出口，把他的致命弱点也搬出来。你想象得出那有多可怕吧！”

“朋友，你干脆说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一个平民百姓被弄得晕头转向，没好气地嚷道。那个姑娘正在乐得发笑，笑中带有几分傻意。乞讨的小孩们总算让我们稍微安静了一会儿，他们跑到街上，在行人中间敲打着一个破罐头筒。

“他还对你说起过那个事？”我感到惊讶，“那件事他从来不谈，对他的好朋友他也没有提起过。为什么在那种时候去找你？我实在不懂为什么？”

“开始，我也不理解。现在我认为我懂得为什么了。”布拉克盖尔说，“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革命者，这一点你不应忘记。托派革命工人党把他开除了，因此，我们当时可以重新考虑原来我们拒绝他的态度。也许，那时我们可以认真对待他的起义计划。”

“实际上，我们早就应该开除你的党籍。”霍阿金同志肯定地说，并转过身看看我。我想：他为什么仇恨我呀？“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者，因此，我毫不隐讳地对你说，你背着我们去找那个斯大林主义分子警察布拉克盖尔，这种勾当，我并不惊讶。你不是一个正大光明的男子汉，仅仅因为你不是一个男子汉，玛伊塔，你懂吗？”

“不要进行人身攻击。”总书记打断他的话。

霍阿金的话，如当头一棒，把我打懵了，我一句恰当的话也找不到：只是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为什么我如此震惊？难道在我的心灵深处也总是惴惴不安，怕在辩论中有人突然点出这个问题将我的军吗？顿时全身为之一震，我索性抬了一下屁股，坐坐好，可感到眼前发黑。我怕极了，心想：阿纳托里奥就要站起来，他会揭发说，我们俩昨天晚上在一块睡觉了。我说什么呢？

“这不是人身攻击，它与现在发生的事有关。”霍阿金同志反驳道。玛伊塔怕极了，惶惶然不知所措。这时他才明白过来，霍阿金真的恨他。难道玛伊塔做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刺伤了他的心，他现在来报复他吗？“同志们，他做事这样鬼鬼祟祟，擅自决定去找我们的敌人，就是一种女人的做法。在这个圈圈里，还从来没有说过玛伊塔做过见不得人的事情呢。一个同性恋者能够成为忠诚的革命家吗？同志们，这就是祸根。”

“为什么他说同性恋而不用鸡奸这个词？我想真是荒唐，这里用鸡奸二字不更确切吗？”总书记站起来用手一指，让霍阿金说。

“肯定是玛伊塔对他们说他自己去找过你。”

“肯定。”布拉克盖尔同意，“他认为自己干的对。他想说

服其他的人通过一个决议：等行动小组的三个人去哈乌哈以后，留在利马的应该继续和我们接触，以便双方达成一项协议。玛伊塔的野心可谓不小。托洛茨基分子起初不相信哈乌哈起义会成为事实，而后来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最后，他们终于被玛伊塔拖进了哈乌哈事件。但正好让他们找到了借口，不履行诺言，进而甩掉他，或者说，把他分裂出去。托洛茨基分子都是些大运动员：清洗，分裂，宗派活动，驱逐出党。”

他笑笑，露出满口被尼古丁熏黄了的牙齿。

“个人问题与会议无关，性的问题、家庭问题与会议无关。”我重复哈辛托的话，眼睛盯着阿纳托里奥的颈项，他坐在一把挤牛奶用的凳子上，双眼死死地瞅着地面。“因此，我对挑衅不予回答，因此，我不回答你，霍阿金。”

“不允许把个人问题搬出来，不允许进行威胁。”总书记提高嗓门说。

“玛伊塔，你到底是不是同性恋者？”霍阿金又和我作对。我看到他紧握双拳，摆出一副自卫或许是进攻的架式。“至少，你应该坦白你是否有这个毛病。”

“不允许在会上顶嘴。”总书记又提醒说，“要打就出去打！”

“同志，你说得对。”玛伊塔说，并目不转睛地看着哈辛托，“既不顶嘴，也不动拳，什么也不会使我们离开这个中心议题。这不是一个关于性的问题的辩论会。假如霍阿金同志认为它重要，那我们就下次会上谈。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日程上来吧！至少希望你们别打断我的发言。”

我恢复了平静，他们让我讲下去，然而，我一边讲，心里一边在想：这已无济于事了，他们已经背着我决定断绝与起义的联系，什么理由也不会使他们改变的。但是，我并未流露出悲观失望。我兴致勃勃地对他们重复着这样、那样的理由，尽管他们不同意，遇到这么多阻力，我仍然认为是站得住脚的。客观条件不是成熟了吗？人民成了封建庄园主、酋长及帝国主义剥削的牺牲品，这不就是一个伟大的潜在的革命力量吗？因此，革命的主观条件要靠进步分子去创造。譬如，用武装宣传的方式打击敌人，这就是一件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军事行动，群众就会逐渐地被发动起来，从而投身到革命的行列中去。难道事例还少吗？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以及古巴的例子就证明：一个坚定的先进组织是可以发动一场革命的。说哈乌哈起义是一次小资产阶级的冒险行动，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那是一次经过周密计划的行动，而且拥有基层群众的支持。当然，基础不很强大，这也是事实。假如我们大家都完成各自的任务，也许会成功的。说托派革命工人党被拖着走，也不符合事实，它在思想方面是起领导作用的，而巴列霍斯仅仅拥有军事领导权。同志们，对这个问题应全面地看，持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而不是宗派主义的观点。当然，在利马这里，援助很少，因此，应该争取与其他的左派组织合作，这将是一场持久而艰苦的斗争……

“有人提议把玛伊塔同志驱逐出党，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帕雅尔迪同志提醒大家。

“我们应不应该再见，并没有明确说。”布拉克盖尔说着把门关上，不让他进屋。

“说来话长。”玛伊塔反驳道，“我什么也不能答应你，就因为我来找你谈过话，他们把我开除出托派革命工人党了。”

“而我呢？就因为接待了他，同志们把我也开除了。”布拉克盖尔说，“不过，那是在十年以后。”

“你与党的矛盾就是因为与玛伊塔的那次谈话？”

我们离开“海地咖啡馆”，沿着观花埠公园走到拉尔科■街的拐角处，布拉克盖尔要在那里乘小公共汽车。许多人在小商贩的地摊中间走来串去，地上的东西碰腿绊脚，要价很便宜。据传入侵而引起的骚乱，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我们不时听到“古巴人”、“玻利维亚人”、“轰炸”、“海军”、“战争”、“赤色分子”等一类的词。

“不，不是真的。”布拉克盖尔申辩说，“我的问题是因为我提出讨论领导路线而引起的，但是，开除的理由从表面看来，并不是因为我的提议而引起的。而是说我犯了许多错误，其中之一就是怀疑我接近托洛茨基分子，说我建议党与托派分子共同行动。谁敢于提出批评建议，谁就受到谴责，凡是批评者说的做的都是垃圾。现在，谁也改变不了这种状况。”

“这就是说你也成了哈乌哈事件的牺牲品。”我对他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他转过身来看看我，我发现他的脸色像羊皮纸一般黄，似笑非笑。“据说还有一些事例证明我和托洛茨基分子有勾结，可我那时不得而知。因为玛伊塔到山区去了以后，是我把他的书籍接收下来了。”

“这些书现在我没人托交了，”玛伊塔抓着他的手诙谐地说，“我成了孤家寡人。你比告密分子可靠，留给你，我放心。请你收下我写的那些东西吧，看看它，你会得益非浅。”

“我就像在中学时，咱们俩一起读巴尔加斯·维拉①的作品那样，偷偷地看了他写的那些玩艺儿，我发现大多数是托洛茨基的陈词滥调。”布拉克盖尔笑笑，“确实是偷偷地看的。我索性把有签署他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的那一页撕掉，这样不留任何罪证。”

他又笑笑。路边有个人，手里托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正在播放一则新闻，他的四周围了一圈人，都在侧耳细听。我们俩只听到新闻的末尾部分：“重建祖国军事委员会向全国各族人民揭露一个罪行：从今天黎明时分起，古巴、玻利维亚与苏联的联合部队已经入侵祖国的领土，侵略军从布诺州分三路进入我国的神圣疆界。今晚八点，军事委员会将向全国人民发表广播电视演说，详细报告敌人对我秘鲁人民犯下的罪行。现在我们全国人民都紧握双拳，准备为捍卫祖国而……”入侵果然是真的。假如美国在厄瓜多尔军事基地的海军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话，那么肯定他们也要来的。我们又继续在人堆中往前走，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得慌慌张张，不知所措。

“不管谁胜，我反正完了。”忽然布拉克盖尔说，他也被这消息吓破了胆，“如果美国海军进来，我就要完蛋了，因为我的名字已被列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老牌特务的名单中。如果暴动分子打进来，我也要完蛋，他们会说我是修正主义分子、社会帝国主义分子，背叛革命事业。我不会学海地那个人，在卧室内放满水把自己淹死，我认为把自己烧死可能更好一些。”

① 哥伦比亚作家（1860—1933），著有小说：《淤泥之花》、《红月桂》等。

在那个名曰“布兰卡商店”对面的车站上，已经聚集了好多人，要等许久才能等上一辆小公共汽车。布拉克盖尔对我说，在他自己也被开除的那些年月中，更能理解玛伊塔那天的处境。我虽然这时离他远点，但仍然听得见他说些什么。我想：虽然是间接地，但正是由于哈乌哈起义，才使布拉克盖尔在革命队伍内部失宠，被打入冷宫。这类事情本身很复杂，什么是必然进程，什么是意外事件，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很难搞清。这就是人类的历史。然而现在看来，虽然玛伊塔多次亲自来找他，给他带来麻烦，而他现在并不对玛伊塔怀恨在心，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他尊敬起来。

“没有人弃权，你可以数一数有几只手。”哈辛托说，“玛伊塔，一致通过。你已经不属于托派革命工人党了，你自己把自己开除了。”

会场内死一般地沉静，与会者鸦雀无声。“我应该走吗？应该说点什么吗？让他们这样整我，还是我破口大骂他们一顿，以解心头之恨？”

“十分钟以前，你我都知道我们俩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布拉克盖尔一边嚷着，一边气势汹汹地在玛伊塔身前徘徊，玛伊塔则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而现在，你的所作所为仿佛说明，咱们俩一向是同志。真荒唐可笑！”

“请先不要走。”梅达尔多同志轻声说，“同志们，我请求大家重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咱们虽然不在同一个战壕里，但是，咱们都是革命者。”玛伊塔说，“我们有相似之处，你我都应该懂得这一条道理：

个人问题服从于政治，因此，你就别抱怨了，让我们谈一下吧。”

重新考虑？这时，所有的眼睛都转向梅达尔多同志。玛伊塔坐在角落里，靠着那堆旧《工人之声报》，室内烟雾腾腾，他看不清他们的面部表情。

“他那时是不是表情沮丧，悲观失望，仿佛觉得地壳要塌陷似的？”

“不，他非常自信，心平气和，看上去满乐观的，或许是有意掩饰住内心的痛苦。”布拉克盖尔摇摇头，“至少他想向我表明，开除不开除对他无所谓，或者他真的不在意。你知道有一种人，他们到了晚年才对性爱或者宗教兴致勃勃，不知疲倦，表现出异样的狂热。玛伊塔就那样，他对行动的兴趣不亚于一个年轻人。我觉得可笑至极，就像那些老家伙对跳现代舞一样着魔，有时真不能不让人嫉妒他们。”

“我们之所以成为敌人，是因为思想原因。同样，我俩只要消除思想障碍，现在又可以成为朋友。”玛伊塔对他笑了笑，“我们两人之间的友好与敌对纯属一个策略问题。”

“你是不是想要做个自我批评，重新申请入党？”布拉克盖尔说完笑了笑。

一个奋斗了半辈子而又不见成效的革命者，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行动比空谈更重要，便不加思索地投身到行动中去。他是那样地急不可待，热情洋溢，希望通过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奋斗得到补偿。玛伊塔那些天就是这个样子吗？他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头脑清醒。这是友谊、爱情，还是什么政治原因在起作用？不是，那些话只不过用来争取布拉克盖尔。如果他真能这样控制自己的感情与本能，他也就不会过那种双重生活：一方面他确实像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地从事秘密的地下革命活动；另一方面他又在夜间去搞同性恋。对他的能力不应有任何怀疑，他是能够利用一切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他最近的努力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不是办成了看■■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吗？他和别人认为，与头号对敌的人合作起来发动一次暴动。已经过去了三辆小公共汽车，布拉克盖尔仍然没有上去。我们决定沿着拉尔科大街往下走，说不定到贝纳维德斯大街好乘点。

“这个大家都要清楚，除非对反革命有利，我们大家谁也不能从中得到好处。相反，就对党大为有利。”梅达尔多同志小心翼翼地解释，“我们的敌人将会拍手称快，甚至另一个革命工人党也会这样，他们会说，瞧，他们又内讧了。别打断我的讲话，霍阿金，我不会像一个基督徒那样请求你们宽■他的，你们别想。对，我已经讲了，我说的‘再考虑一下’■是指这个。”

索里托斯街库房里的紧张气氛现在缓和了一些。刚才那会儿，浓烟灼眼，现在，玛伊塔已经能够看清楚他们的脸形，他发现他们一个个瞪着眼听莫伊塞斯讲话，表情十分惊奇。怎么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玛伊塔开除出党呢？他们感激有人为他们提供了不在现场的证明，这样，他们仿佛如释重负，感到心安理得了。

“玛伊塔同志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本人明白，我们大家心里也清楚。”梅达尔多同志补充说，“现在，在目前这

种形势下，他是不会重新回到党内来的。但是，同志们，这一点他说过了，巴列霍斯的计划继续执行。不管我们参加与否，起义是要举行的。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可客观上是要影响我们的。”

莫伊塞斯，你要走到哪里去呢？玛伊塔奇怪的是，当他提到自己时，还称“同志”。刚才，他看到他们都举手赞成开除■■出党时，又气愤又沮丧；而现在听了梅达尔多这一席话，尤其听到“同志”这两个字，他的气全消了。“得赶快利用这个机会呀！”他想。

“托洛茨基主义不领导游击战。”玛伊塔说，“托派革命工人党一致决定不支持我们，而革命工人党对此次行动，连一个字也不晓得。计划是严肃的，得到群众支持的。你没有发觉吗？共产党倒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填补空白。”

“主动把头往铡刀底下伸，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荣誉！”布拉克盖尔不耐烦地说，“你把这杯咖啡喝了，如果你高兴的话，那就给我讲讲你和托派分子的爱情悲剧吧！不过，关于起义，■■塔，你一个字也不要提。”

“不要你们现在决定，也不必在一周内决定下来，你们认为多长时间合适就多长时间。”玛伊塔不理睬他的话，继续说，“对你们来说，主要的障碍就是托派革命工人党。此刻这个障碍不存在了，现在，参加起义的人是一批独立的革命者，他们之中有工人，也有农民。”

“你不也是一个独立的革命分子吗？”布拉克盖尔一个字一个字地向外迸。

“请你买下一期的《工人之声报（托）》看一下，你就会心服口服。”玛伊塔说，“我又变成一个无党派的革命者了。你看，你们有多么好的机会呀！去领导他们，带领他们干吧！”

“那就是你看到的退出组织的声明。”布拉克盖尔说。他把眼镜摘下来用口中的热气哈了一下，然后掏出手帕擦干净。“是个假声明。我才不相信那纸声明呢，更不用说签字呀，以及报纸上登载的喽。那么，登载它的用意何在？用以欺骗读者吗？谁是它的读者呢？除了你说的他们（只有七个人）以外，难道《工人之声报（托）》还有读者吗？总共不就■■■派分子吗？同志，历史就该这么写。”

虽然时候尚早，但拉尔科大街的商店全都关门不营业了。是因为听说敌人从南部入侵才关得这么早吗？这时的比迪亚戈纳尔街比观花埠街心花园那一带的人都少。平常，这里到处可见三个一帮、五个一伙的乞丐在汽车中间串来串去，此刻，也为数不多了。观花埠区政府大楼的墙壁上，用红漆写了一条醒目的大标语：“人民战争必胜！”旁边还画了面镰刀斧头旗子。仅仅三小时前，当我路过这里时，还没有这些东西。难道一个小分队突然出现在这里，就在警察的眼皮底下用刷子刷的？仔细一瞧，我才发觉区政府的大楼底下，确■没有警察守卫。

“至少应避免再给党造成损失，我们给你个机会。”梅达尔多同志继尔又小心谨慎地说，“退出组织吧！我们将把你的退党声明刊登在《工人之声报（托）》上。这样，至少你到哈乌哈干什么事都与党没有关系，党不要承担责任。同志们，我说的‘再考虑一下’也就是这个意思。”

玛伊塔看到有几位中央委员点头。莫伊塞斯，即梅达尔多的建议有可能通过。他又考虑了一下，权衡利弊。是的，这样也许好些。他举起手问：可以讲话吗？

在贝纳维德斯大街上等小公共汽车的人，并不比布兰卡商店前面的少。布拉克盖尔耸了耸双肩，意思是说，要有耐心。我对他说，我陪着他，直到看着他上车为止。这里，同样也有几个人在谈论外国军队入侵的问题。

“现在我倒觉得，那个起义计划并不那么空想。”布拉克■■■，“假如那个起义发源地能存在得长久一些，也许真的■■■功了。玛伊塔说是这样估计的。如果起义继续坚持下■■话，党就非得与他们一起干不可，就得站出来去领导它，正像最近发生的这一次。谁还记得刚开始那几年我们反对过它，而现在，我们倒和毛派分子争起领导权来了。我说的不对吗？不过，科罗诺斯同志不会原谅的：二十五年前，他就事先估计到了。”

他谈论党时使用的语气把我弄糊涂了，因此我就问他，最后他被允许重新入党了没有。他闪烁其辞地答道：“仅仅是半接受。”这时，一个怀抱孩子的太太仿佛听到了点什么，突如■■，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说是俄国人打进来了，这是真的■■■们怎么惹着他们了？现在我女儿怎么办呢？”女孩子也不安地嘟囔起来。“您就安心吧！这都是谎言，不可信。”布拉克盖尔安抚她说，同时向开来的一辆小汽车伸出手。汽车没有停，一直向前开去。

几分钟前，气氛还很紧张。此时，总书记一改刚才的口气，温和地说：“梅达尔多同志的建议有道理，应该避免革命工人党的那帮分裂主义分子乘机大捞一把。”

总书记看了玛伊塔一眼，心想：事关他，应该让他发言。“玛伊塔，你说吧。”

“我们又谈了许久。虽然把他开除了，但一谈到起义，他就异常兴奋。”布拉克盖尔回忆道，他点上一支香烟，“我得知起义迫在眉睫，就几天之内的事了，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起。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在哈乌哈。我以为可能在库斯科，因那时库斯科州的农民有的已经开始抢占庄园主的土地。可是，一次革命发生在哈乌哈的监狱里，谁会想到呀？”

我又看到他皮笑肉不笑的样子。我们不约而同地■■■二八大街走去。

几小时过去了，玛伊塔仍赖在那里。他浑身汗淋淋的，衣服脏乎乎、皱巴巴的，眼圈黑黑的，卷曲的头发乱蓬蓬的，坐在椅子边上，就在布拉克盖尔那又挤又简陋的小客厅里。他正在那里绞尽脑汁地讲给布拉克盖尔听，有时急得直打手势，但他的眼神闪烁着坚定的信念。末了，他指责布拉克盖尔说：“你们拒绝迈进历史进程的大门，你们不想创造历史。”

“这件事确实自相矛盾。”走了半个街区以后，我听到■拉克盖尔又冒了一句，“因为当时托派革命工人党之所以开除玛伊塔的党籍，是不想让自己那一帮人投身到哈乌哈去，而后来这个党却走得更远，他们竟抢劫起银行来。”

受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攻下哈瓦那的鼓舞，他们也按捺不住地干起来了？是不是小心谨慎的托派革命工人党刚刚摆脱了玛伊塔的起义计划，他们自己去抢劫资产阶级的银行？他们先抢劫了国际银行，刚才我们就打它门前走过。几天以后，又抢劫了维多利亚区的东方银行。在这最后一次行动中，帕雅尔迪被当场捉到。这两次抢劫行动，使托派革命工人党威

信扫地。或许当他们去抢劫时，就怀有这样的意图：“别看我们不支持玛伊塔和巴列霍斯，可是我们还是能够破釜沉舟地干一番事业的。”

“他们丝毫也不后悔。”布拉克盖尔说，“是古巴，古巴革命才打破了框框。正是古巴革命把我们认为‘革命条件尚未成熟’的观点埋葬了。我们坚持的革命使一连串不断暴动的理论不攻自破。由于菲德尔在古巴站住了脚，使一切敢于斗争的人们觉得，革命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如果你不去拿的话，我的房东就会把这些书送到巴拉达废品公司处理掉。”玛伊塔仍坚持，“请你下个星期一去拿吧，书并不太多。”

“好吧，那我就留下你的那些书。”布拉克盖尔终于被玛伊塔说服，“就算我给你保存着吧，一直到你回来。”

七·二八大街的车站上，等车的人也不少。大家都在围着一个戴礼帽的人，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正在调台找新闻。他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所有的台都在播放音乐。我和布拉克盖尔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仅仅来了两辆小公共汽车，车上挤满了人，连停也没停。这时，我告别了他，因为我想按时赶回家，以便听军事委员会在今晚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走到曼科·卡帕克街的拐角处，我回过头去看看，布拉克盖尔还站在路边，一副无精打彩、失魂落魄的样子，仿佛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他的形象使我想起玛伊塔，那天会上把他开除出党之后，可能也就是这副样子。布拉克盖尔说，当他答应替玛伊塔保存书时，玛伊塔又告诉他应该把房间的钥匙放在什么地方，然后才非常高兴地走了。“惩罚了他，他反

而变得更乐观了。”布拉克盖尔说。毫无疑问，他说得对，玛伊塔的反抗能力与大无畏精神，在逆境中表现得更突出。

虽然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但拉尔科大街两侧人行道上的流动商贩却依然如故，有卖安第斯山风景画的，有卖画像的，有卖漫画的，有卖手工艺品和各种小玩艺儿的。我回避着那些戴手镯、项链，挎披肩的人，她们左右围着一些留长发的青年男子和衣着华丽的姑娘们。突然，我闻到一阵香味。在这一处充满唯美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地段上，人们对本国南部发生的一切既不奇怪，也不惊慌。甚至可以说，他们不知道就在最近这几小时，战争已经升级，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打进来。在奥恰兰街角，我听到有一条狗在叫，狗吠声很微弱，仿佛没有气力一样。人们连肚子也填不饱，自然顾不上养家禽。我又想起了玛伊塔：头天晚上在索里托斯街开了一整夜的会，会上实际上是把他开除出党了，对外却又说是他自己退的党；接着，他来到布拉克盖尔家，他们俩谈了好长时间，结果原来与他们敌对的布拉克盖尔，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并且进而成了他的知心朋友。那天上午玛伊塔感觉怎么样呢？肯定又饿又累，不过，他的情绪并未受到影响，他就是带着这种情绪从哈乌哈回来的。他始终认为自己干得好，干得对。他们开除他，并不是因为他去找过布拉克盖尔；在此之前，他们就决定往后缩了。他们对他发无名火，并且谴责他背叛组织，这都是事前有预谋的，他说什么也无济于事。难道他们惧怕斗争吗？不是的。确切点说，是悲观主义，缺乏斗志，没有勇气打破常规，去干实际的事情。他从布拉克盖尔家出来，挤上一辆公共汽车，车上没有空座位，他用手使劲地抓着把手。他被夹在两个挎篮子的黑女人中间，这两个女人差点把他挤扁。他过去领教过他的同志们的那种态度

吗？“ 这么多年来，你从没有这样对待过他们呀。 ”因为他们很少和群众接触，所以他们不相信群众。他们怀疑革命，怀疑自己的理想，党内无休止的派别之争，使得他们失去了干具体事情的勇气。两个黑女人中的一个瞪着眼看看他，他这才发现自己在自言自语。他也忍不住笑了笑，他们当时处在那种精神状态之下，是不会持积极态度的，这反倒成了他们的负担。确实需要支持，可是在利马找不到。不过，随着斗争的深入，在利马以及在其它地方，会出现一些援助他们的组织的。当托派革命党的同志们看到起义先锋的威信日益增加，并有群众不断参加，他们会后悔自己的优柔寡断，红萝卜革命党人也不例外。与布拉克盖尔的谈话，可以看作是一颗定时炸弹，当他们看到涓涓细流变成汹涌澎湃的大河时，就会想起门是敞开的，并且希望他们随时进来干。他们会来的，他们会心服口服的。他想得出神，以至于车到了他家那一站时竟忘了下车，坐过了站。

步行到家时，玛伊塔已经精疲力尽。院子里有一长队妇女在排队打水，后面的人都在抱怨第一位妇女，她耽搁了半天也没接完水。他走进房间，上床躺下，连鞋子也没有脱。他实在没有勇气下去排队打水。可是，要是有一盆凉水，此刻他把双脚泡进水里，那该多舒服啊！他闭上双眼，强打精神，考虑怎样起草一份退党声明，当天下午就交给哈辛托，以便登在这一期《工人之声报（托）》上。报纸已经在印刷厂里排版了……

这一期《工人之声报（托）》仅仅四版，一个印张。现在变得发黄，我用手一抓，差点从手指缝里滑掉。此刻，我坐在电视机前，尽管八点了，可是军事委员会的将军们还没有出来讲话。玛伊塔的退党声明并未登在第一版。第一版上，有

两篇长文章和一篇用花边框起来的短文。左边是社论，题目是大号黑体字：《住手，法西斯分子！》。那是指发生在中央山脉塞罗·德巴斯科矿区的两起罢工，那里有一家秘美合资的矿产公司。当时，警方解散罢工工人时，打伤了几个人，好像有一个死了。文章说，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警察、军队和反动派在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对拉丁美洲工人阶级进行恫吓、瓦解工人运动整体计划的一部分。那么，一言以蔽之，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电视画面上先播放的是军队游行，人们抬着国徽，举着国旗，后面接着的是我国历史上各位先哲的画像。演说终于要开始了？社论说，敌人要阻止日益高涨、势不可挡的工人运动向社会主义迈进。这些手段吓不住那些通晓历史的人，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使用它，德国的希特勒使用它，而现在华盛顿在拉丁美洲也正在使用它。然而，他们不会获得成功，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它是一种有用的肥料，正像列宁、托洛茨基写道：反动派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仿佛对树木进行剪枝一样，越剪果实越多。现在将军们果然出来了，你看：海军的，空军的，陆军的。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副官、部长、警备区司令及利马军区的长官。将军们阴沉沉的脸色似乎证明，外国军队入侵的谣传是真实的。《工人之声报（托）》的社论结尾时，要求工人、农民、学生及其它进步阶层团结起来，与纳粹法西斯的阴谋进行斗争。现在开始奏国歌了。

另一篇文章是专门写给锡兰（即今斯里兰卡）的。那些年代，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眼光确实盯着全世界。文章肯定说，托派的势力在锡兰议会内居第二位，而在工会内居第一位。从文章的动词时态的使用上，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从法文翻译的。难道会是玛伊塔译的吗？人名很难记，如：总理班达

纳奈克夫人。国歌结束了，那个军事长官出来了，他是军事委员会的老发言人。这一次，他一反常态，没有像以往那样，一开始就扯得很远，而是开门见山地提到问题的实质。他的声音并不斩钉截铁，而是有些颤抖。他说，古巴和玻利维亚的军队分三路侵入我国的领土，空中有战斗机的支援。侵略军从昨天晚上起，就对布诺、库斯科和阿雷基帕州的居民进行狂轰滥炸。这是一次明火执仗的入侵，它是对国际法的践踏，已经造成大量伤亡，毁坏了大批的财物，甚至炸弹投向布诺市区，把那里的社会保险医院也炸毁了，死伤人员不计其数。发言人对战争灾难的描述持续了几分钟。他会说美国海军已越过厄瓜多尔国境进入到秘鲁境内吗？《工人之声报（托）》上用花边框起来的这篇文章说，不久，托派革命工人党将在土木建筑工会办公处举行上次延期的活动：“背叛革命：托洛茨基主义对苏联的解释”。要找到玛伊塔的退党声明，必须翻到第二版，在一篇题目为《让我们在部队内部建立苏维埃！》的长文章底下的一个角落里才能找到：《退出革命工人党（托）声明》，它没有编者的话，也没有眉注。军事委员会的发言人又肯定说，尽管秘鲁军队的数量与装备均不及敌人，但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军队将英勇抗击国际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的入侵。军事委员会已发布一项最高命令，号召三军预备役军人入伍。难道接下去他将要说，美国飞机会对侵略军进行轰炸吗？

革命工人党（托）总书记同志：

通过此信向您提出：我宣布退出革命工人党（托）的行列。我在本党工作了十余年，我之所以退出纯属个人原因。我想享有个人的独立性，这样，无论做什么都由我本人负完全责任，什么也不牵涉到党。现在，我国又

处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十字路口，这种时候，我需要的是个人的行动自由。

我主动退出革命工人党（托），并不意味着我的思想也脱离党。正是党的思想向全世界的工人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同志，我想再一次申明，我坚信秘鲁无产阶级，坚信革命必将成为现实。革命必将彻底打碎剥削制度的锁链，必将摧毁几个世纪以来束缚我国人民思想的蒙昧主义。革命始终将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光辉指引下进行。这个理论已经由列宁和托洛茨基把它变为现实，它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大，更具有生命力。

我请求将我的这个退党声明登在《工人之声报（托）》上，以使让舆论界知晓。

顺致革命敬礼！

阿·玛伊塔·阿维达尼奥

于本市

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讲话的结尾部分极其简短，而且语气并不十分肯定。他说，他以秘鲁人民的名义呼吁，为自由世界的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教义而对集体专制的无神论者的进攻进行战斗。他又说，秘鲁军事委员会已经要求美国政府提供援助。为打垮苏联—古巴—玻利维亚共产主义的入侵和奴役祖国的罪恶阴谋，美国政府已经向我们派来了援兵，并运来了大批物资。显而易见，战争已经不只是秘鲁一国的事情，秘鲁将成为世界上，强国之间联合他们各自的盟国与卫星国进行战争的舞台。不管谁胜谁负，肯定有成千上万，或者成百万的人要在这场战争中丧命。即使秘鲁能够幸存下来，必然

会到处一片废墟。这时我有点恹恹欲睡，甚至连电视机也懒得去关。但是看到下面这幅情景时，我的头脑却很清醒：阿纳托里奥正在用一支枪指着玛伊塔。玛伊塔并不惧怕，而是感到万分遗憾：“你们这样往后缩，这意味着什么呀！巴列霍斯怎么办呢？期限马上就到了！”看来阿纳托里奥并不想置他于死地，仅仅是想阻止他去哈乌哈。玛伊塔朝着阿纳托里奥迈了几步，想叫他清醒一下，明白过来，但是阿纳托里奥持枪的胳膊笔直地挺着，一动不动。这时，玛伊塔发现阿纳托里奥正要扣扳机，他赶忙举起双手，同时心里想：“就这样不战而死了不成？”他感到心如刀搅，难过极了，这样到主显节①那天，他就再也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了，而是到阴间受刑去了。“阿纳托里奥，你为什么这样胡来？”阿纳托里奥的回答使他很扫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心理正常，头脑冷静，而不是一个善于动感情的人。“因为你是一个同性恋者。”阿纳托里奥沉着而冷静地说。而此时此刻，玛伊塔倒觉得他讲起话来斩钉截铁、气势汹汹，反而心里好受些。“因为你是个搞同性恋的，这就是你的报应。”总书记也在那里竖着耳朵听着，阿纳托里奥说完，他点点头表示赞同。“因为你是个搞同性恋的家伙，这就够让人恶心的了。”梅达尔多同志也补充说，但见玛伊塔的头在总书记肩后面也点了几下。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都在那里，大家一字型排开，每人手里拿着一支枪。他们已经审判了他，而现在就要处决他。但不是因为他违犯了纪律，犯了什么错误，或者背叛组织，仅仅因为那么一桩小事：他把舌头放在阿纳托里奥的嘴里。这时，他吓瘫了，开始大声呼喊巴列霍斯、乌维鲁斯、“鹦鹉”以及里

① 元月六日，耶稣显灵节。

克兰的农民们、圣何塞的学生们："同志们，救救我，他们欺骗了我。"这时，他醒了，浑身是汗，发现阿纳托里奥就坐在床边上看着他。

"你说的话没人能听得懂。"玛伊塔听到他细声柔气地说。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玛伊塔支支吾吾地说，他还没从睡梦中完全清醒过来。

"我送上门来了。"阿纳托里奥说，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玛伊塔，眼神里露出一丝狡黠的目光，"你生我的气了？"

"你真无耻。"玛伊塔吞吞吐吐地说，但仍然躺着不动。他只觉得嘴里发苦，双眼被眼屎糊得模糊不清，身上起鸡皮疙瘩。"你真不要脸，阿纳托里奥。"

"是你教给我的嘛。"小伙子温柔地答道，眼睛老是盯着玛伊塔的眼睛。他的眼里有一种琢磨不透的神态，这使玛伊塔有点恼火，同时也感到后悔莫及。一只大苍蝇在电灯泡周围飞来飞去。

"哈乌哈的事太离谱了，我们讨论过，大家一致认为得叫你悬崖勒马。"阿纳托里奥说，他的身子一动不动，内心燃烧着某种欲望，"谁要把你开除出党呢？你去找布拉克盖尔干什么？否则，谁也不会同意开除你的。"

"我不和你争论，"玛伊塔说，"这都已成为过去。好了，请你走吧。"

然而小伙子就是不动，仍然在那里调情似的看着他。

"现在我们既不是同志，也不是朋友，"玛伊塔说，"你他妈的想干什么？"

"我想让你给我吸一吸。"小伙子看着他，很斯文地说，同时用五个手指头拍拍他的膝盖。

第　七　章

“玛伊塔，你在这里干什么？”阿德莱达惊奇地喊道，“你来干什么呀？”

罗斯比里奥西城堡位于林塞区和圣贝亚特里斯区的交界处。这两个区，现在已无法区分了。不过，玛伊塔和阿德莱达结婚的时候，这两个区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林塞是一个较贫穷的区，大多数居民近乎于无产或中产阶层；房屋矮小，色彩单调，破落的修道院，狭窄的胡同，人行道坑坑洼洼，小花园高低不平。而圣贝亚特里斯区则是一个豪华区，这里居住的人家都很富有，他们建造了成片的宅第，其式样或为殖民地时期的，或为塞维亚式的，或为新哥特式的。你看这个罗斯比里奥西纪念碑，样子就很奇特，城堡四周的围墙砌有城垛，镶嵌着一排排钢筋水泥筑成的尖形枪眼。林塞区的居民对圣贝亚特里斯的居民既羡慕又憎恨，而圣贝亚特里斯的人则瞧不起林塞人。

“我想和你谈谈。”玛伊塔说，“还有，如果你方便的话，我想看看我的儿子。”

现在，圣贝亚特里斯区和林塞区已经合二为一。圣贝亚

特里斯区日益衰落，而林塞区却逐渐变富，成了一个中等区：里面既有职员，也有商人和专门职业者，既没有富户，也没有赤贫，但是家家的日子都紧紧巴巴，省吃俭用才能熬到月底。阿德莱达的丈夫堂·胡安·萨拉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邮电局的一名老职员。他的相片就挂在靠近窗户的墙壁上。窗子连块窗帘也没有，从窗户上望去，罗斯比里奥西城历历在目，一清二楚。城堡附近是空军部的一个办事处，四周布满了铁丝网和沙袋，里面站着一个个头戴钢盔、手持步枪的哨兵。我来这里时，就在那儿碰到一班巡逻队，他们拦住我，把我从头到脚搜了个遍。航空兵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中，手指头扣在步枪的扳机上。发生过那么多事件，这样做也无须大惊小怪。相片上的堂·胡安·萨拉特身穿西装，胸结领带，表情严肃，阿德莱达挎着他的胳膊，表情也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

“那是我们在卡涅特结婚时照的，我们到胡安的一个哥哥家住了三天。那时我已经怀孕七个月了。几乎看不出来，对吧？”

真的，从相片上看，谁也看不出她怀胎那么久。相片大概有三十年了。她现在保养得可真好啊！她一度是我萨莱西亚诺中学校友玛伊塔的妻子。

“我怀的那个孩子是玛伊塔的。”阿德莱达补充说。

我聚精会神地听她讲，同时仔细地打量她。我一迈进她那阴暗的小屋就看见了她，使我大吃一惊。我只和她通过一次电话，万万没有想到，电话里那个声音沙哑的人，竟是这么一位吸引人的妇女，虽然她已经上了些年纪。肩上披着一头卷曲的灰发，一副温和的脸相，厚厚的嘴唇，深邃的眼睛，

她坐在那里，两腿交叉着，光滑的双腿修长而匀称。当她作玛伊塔的妻子时，真称得上是一个美女。

“你终于想起你的儿子喽！”阿德莱达不无惊奇地叫起来。

“我总是想着他的。”玛伊塔反驳道，“不来看他，并不等于不想他，这是两码事。我们既然有约在先，我就不能失言。”

然而，她的眼神表明，她有什么心事，受了什么挫折而显得悲观失望。她对什么都无所谓。什么起义军占领了库斯科，在那里成立了政府啦；昨晚利马街头枪声不断啦；南方各线行动迟缓的政府军为援助美国海军，是否已在阿雷基帕市的拉豪雅港登陆啦……她都不感兴趣。上面说到的这些事，她甚至一件也没有提起过。利马人没有不提心吊胆的。（当然，对我说来能够争取到与她谈话，可谓一大胜利。）自然，我也集中不起精神来，那些红旗呀，步枪啦，以及库斯科市街上人们庆祝胜利的喊叫声，老是在我脑海里闪现。

“你要是失言不来才好呢！”阿德莱达说，一边顺手把耷拉到额前的刘海儿往旁边一拢，“看到你来，我丈夫会找我的麻烦的。这你不知道吗？”

她告诉我，为了让她的儿子出生后不姓玛伊塔的姓，姓另一个父亲的姓，为了能有一个安定的家，她不得不提前与现在的丈夫结婚。我还要重复一遍，我怎么也集中不起精神来，可我的时间不多了。阿德莱达几次都拒绝见我，幸亏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恳求，她才答应了。这真是一种荣誉。记得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她竟把电话挂了。在电话里，我曾向她发誓，保证在我写文章时不提及她丈夫的名字，不提及她

儿子的名字。最后我又对她说，只要她见见我，向我提供点情况，尤其是讲讲玛伊塔去哈乌哈之前，她最后一次见到玛伊塔的情况，我就满足了。这本身也是一种劳动，我答应给她报酬。她说就谈一个小时，我说我付给她二十万索尔。她会不会闭口不谈，认为那些“纯属个人私事”呢？

“今天，情况比较特殊。”玛伊塔强调说，“我发誓，一会儿就走。”

“当时我认为他急于要找地方躲藏，哪里也找不到，才跑到我家来。”阿德莱达说，“他一生都是这样。从我认识他起，直到我们离婚，他总是说有人追捕他。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他是一个很神秘的人，对我也是这样。”

她真的爱过他吗？要不又怎样解释她与他曾结为夫妻呢？她是怎样认识他的？在苏克雷广场上摸彩认识的。她压了个十七，在她旁边的那个人压了个十五，轮子正好转到十五那里停住了。“哟，您的运气多好呀！得只小狗熊。”阿德莱达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而站在他身旁中彩那人说：“我可以把它送给您。请允许我把这只小狗熊送给您，好吗？让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玛伊塔。”

“好吧，请进。我不希望对门那长舌头的女人，看到我在街上与你在一起。”阿德莱达终于给他开了门，“请你就待五分钟，如果胡安看见你在这里，他会大发雷霆的。这一生中你给我带来的麻烦还少吗？”

难道从玛伊塔激动而紧张的心情中，她就没有发现，他这次来看她意味着就要去干一项不同寻常的事情吗？一点没

有发现，她甚至没有看出他那时的心情激动而紧张。玛伊塔如同往常一样，心平气和，穿戴破旧，比过去更消瘦些。

当他们俩有了一些交往并互相信任时，玛伊塔向他承认，在苏克雷广场摸彩那次巧遇并非偶然，事实上他早就见过她，跟踪过她，尾随了好久才跟她搭上了话。

“我还以为他对我一见钟情哩。”阿德莱达以一种冷嘲热讽的口气补充说。每当她提到他时，她就很恼火。虽然过了许多年，但她内心仍有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完全是一场骗局，而我受骗上当了。他从来就没有爱过我，而且他又极其自私，甚至他是怎样伤我的心他都没有发觉。”

玛伊塔朝四下看了看：一片红旗的海洋，数不清的拳头举在空中，宛如一片森林的步枪，成千上万的人喊哑了嗓子。此时，他觉得自己呆在阿德莱达家不可思议，看看周围，都是些带塑料垫子的扶手椅子，墙上的油漆已脱落，而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住着一个小孩，虽然孩子姓别人的姓，但却是他的儿子。他感到不是滋味。“我来这里好不好？”他来这里并非是感情上的需要，难道就没有目的，没有企图？阿德莱达能不起疑心吗？欢庆胜利的人们，是不是在用克丘亚语唱国际歌呢？

“我要到外国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回秘鲁。”玛伊塔给她解释，并坐在近处一把扶手椅的扶手上，“我想认识他一下再走，就看他一分钟。你看，没有关系吧？”

“当然有关系。”阿德莱达粗鲁地打断他，“孩子不姓你的姓，他唯一的父亲就是胡安。你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才给孩子找了个安身之所，才给孩子找了个真正的父亲吗？你

会把我这一切给毁掉的。”

“我不想毁掉，”玛伊塔说，“我一向是遵守咱们的诺言的。我只是想认识一下这个孩子，我不告诉他我是谁，甚至我可以不和他说话，只要你愿意就行。”

头几次，玛伊塔没有对她实说他干什么，只是对她说他是记者，以此为生。看他那走相，左右摇摆；看他那牙齿，齿间距离太大；看他穿戴，便知他经济情况不佳；是不能说明他是个好小伙子的，然而，他还是有某种东西能够吸引她的。她那时是林塞区一家信贷银行的一位很漂亮的职员，是什么东西使她喜欢上他了呢？

这时，我从窗户上看到，守卫在罗斯比里奥西城堡的航空兵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中：每一个打那儿路过的人都必须出示证件，并且身上被搜个遍。难道又发生了什么事吗？难道有什么重大事情电台尚未广播，而他们已经知晓？我看到有一个挎篮子的年轻姑娘，固执地不肯让他们搜身，结果他们给了她一枪托子。

“我在他身边，觉得能学到些东西。”阿德莱达说，“自然他并不是个满腹经纶的学者，但他讲的那些事情，我的其他追求者从来没有讲过。因为我对那些事一无所知，结果就像一只小鸟面对一条毒蛇，我上钩了。”

此外，他彬彬有礼，潇洒自然，颇有主见，这也使她喜欢他。他跟她说一些事情，很讨她喜欢。可是，他为什么不吻她呢？有一天，他把她带到苏尔基约区的姨妈家中，她就只认识他的这一个亲戚。何塞法太太给他们准备了一顿午餐，还有点心。太太对她很亲热。他们正在聊天，突然，太太有点事出去了。屋子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一边听着收音机播放

的音乐。她想：“现在可是个好机会，该来吻我了吧？”玛伊塔就在她身边，坐在扶手椅子上，她正在等他动作呢，然而，他竟连她的手也没有碰。她又想：“可能非常爱我，太紧张了吧？”

挎篮子的年轻姑娘被打服了，乖乖地让他们检查。检查完后才放她过去。当她从窗户对面走过时，我看到她嘴唇在动，没好气地骂那帮无礼的家伙。

“求求你，别固执了。”阿德莱达说，“另外他现在上学去了。你要干什么？有什么企图？如果让孩子猜出点什么，那太可怕了。”

“难道他看见我这张脸，会奇迹般地认出我是他爸爸吗？”玛伊塔自我解嘲地说。

“我害怕，好像恶运要降临到我们头上。”阿德莱达支支吾吾地说。

实际上，玛伊塔的声音和表情都因紧张、忧虑而失真。他坚持要见也没有用。他要见一个自己从未放在心里的儿子，这种心血来潮的想法不就是一种不祥的兆头吗？来这里是很不慎重的，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假如让阿德莱达的丈夫胡安碰上，就会出事。而任何事情，不论它多么微不足道，都将对他的那个计划起反作用。“别坚持了，快走吧！”他自言自语，然而，仿佛自己的身子被钉在了扶手椅上。

“胡安那时是邮电局的局长，邮局就在我们林塞区。”阿德莱达说，“他看着我上班来，看着我下班去的，老是追着我不放，请我去这儿去那儿的，每个星期都说要我和他结婚。虽然我冷落他，可他就是不死心。”

“是他主动提出让你的儿子姓他的姓吗？”

“这是我同意和他结婚的一个条件。”

我又看看他们俩在卡涅特的合影，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像她这样一个美人能和那么一个又丑又老的邮电局长结为夫妻。玛伊塔的儿子现今可能也有三十岁左右了。儿子的生活正常吗？这可是他妈妈衷心希望的呀！如果儿子得知这一切，又作何感想呢？现在他儿子是参加了起义军、国际部队，还是参加了政府军，甚至替美国海军服务？或许，儿子也像他母亲认为的那样，不管什么军都是臭垃圾？

“就这样，我们一起玩了几次，他连吻都没有吻我一下。到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时，他说的话使我大吃一惊。”

“如果有朝一日我提出与你结婚，你将说什么呢？”

“你知道，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阿德莱达娇声娇气地说。

“那么现在我就郑重地向你提出，”玛伊塔说，“阿德莱达，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一次也没有亲过我。”阿德莱达重复着，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事情就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突然提出和我结婚，而我呢，也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我这是自找的，我谁也不埋怨。”

“这正好说明您爱他。”

“并不是我急于结婚。”她肯定说，一边习惯地把耷拉到前额的刘海往后拢了一下，“他那时年轻，我很感激他，我并不缺钱花。那时追我的人多了，胡安也是其中之一，而我却

偏偏挑了个没有立锥之地的人，一个革命者，一个那么怪的人。这不傻吗？”

“好吧，那我就不见他。”玛伊塔咕哝道，然而，他还是没有从椅子上抬起屁股，“不过，至少你跟我说说他是什么样子。还有你自己，你们夫妻还好吧？”

“比跟你那时好多了。”阿德莱达顺从而又伤感地说，“我生活得平平静静，不必担心有人说不定什么时候闯进我家，翻个底朝天，还把我丈夫抓去。和胡安在一起，我们每天都有饭吃，也不会因为交不起房租而被人家轰出门。”

“从你说话的语气中可以看出，你生活得并不是十分幸福。”玛伊塔吞吞吐吐地说，但他转念又想：在这么重要的时刻，在此地谈论这个，这不是荒唐至极吗？不应该抓紧时间去买药品，到法新社取钱，准备行装吗？

“不幸福。”阿德莱达说，自从玛伊塔答应不看儿子，她显得热情了些，“胡安叫我把银行的工作辞了。有个工作还好些，能有个地方说说话，还可以到街上走走。而现在，我天天关在家里，扫地呀，洗衣服啦，做饭什么的，烦死人了，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不，不是这样。”玛伊塔说，环顾客厅四周，“和其他的上百万人相比，你生活得很好，阿德莱达。”

“你又要给我讲政治？”她生气了，“那请你走吧。就是因为你的缘故，我仇视任何形式的政治，对什么也不能像对政治那样恨之入骨。”

他们认识了三个星期就结婚了，是在林塞区政府登的记。结婚以后，她才开始认识了真正的玛伊塔。这时，库斯科的上空是一片红旗的海洋，家家房顶上都飘扬着一面旗子；古

老的教堂墙壁上以及大街上的石头上，都因新近的战斗而沾满了鲜血。起初，她并不懂他说的革命工人党是怎么回事。那时，她只知道秘鲁有个阿普拉党，奥德利亚将军上台执政时宣布这个党为非法组织，但后来普拉多掌权时，又宣布它为合法组织。不过，她从未听说过还有一个叫革命工人党的组织。此刻，库斯科市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人们兴高采烈地朝着天空鸣枪，领导人发表狂热的演说，宣布一个新世纪的到来，一代新人的诞生。接着开始枪毙叛徒、特务、刽子手以及旧制度的护卫者。是不是就在那里的美丽的武装广场上？而就在同一广场上，殖民地时期的总督政府把图帕克·阿玛鲁①四马分尸。关于那个革命工人党，玛伊塔给她解释说：“仍然是一个小党。”

“我没把他说的那个小党当回事，我好像觉得是闹着玩儿似的。”她说着，又把耷拉到脸上的头发往后一拢，“然而，还没有过去半个月，突然，一天晚上有人敲门，当时就我一个人在家。我把门打开，原来是安全部的两个调查员。他们说要搜查什么，结果把厨房的一袋子米也拿走了。从此，倒霉的事开始了。”

几乎见不到她的丈夫，她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会，是在印刷厂，还是躲藏起来了。玛伊塔并不整天在法新社工作，每天他只去上几个小时的班，而且挣钱不多。如果不是靠她在银行工作，他们的生活根本就无法维持。不久，阿德莱达便发觉，对玛伊塔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政治。有时他带几个人

① 秘鲁民族英雄，1780年率领印第安人起义，反对西班牙统治，1781年失败，被处死。

来家里，一坐下就没完没了地争论。有一天，她问他：“这就是说，革命工人党是共产党？”“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回答道。到这时，她才清楚，原来自己竟和一个共产党分子结婚了。

“我还以为胡安爱你，而且他会使你幸福呢。”

“在你没有出现在我眼前时，他是爱过我。”阿德莱达不无抱怨地说，“再就是当他同意把他的姓赐给你儿子时，那阵子也爱我。不过，以后就恨起我来了。”

难道胡安对她不好？不，他对妻子很好，但总是让她觉得他对她宽宏大量。对孩子，他的确很好，尤其关心他的教育。“我，玛伊塔，在这里干什么呀？在利马没有几个小时了，我竟谈论起这些事情，这不是浪费时间吗？”玛伊塔突然觉得这样不好，然而，他又没有勇气拔腿就走。此刻的玛伊塔，实际上一只脚已经迈进哈乌哈，而他在利马与她的最后一次谈话光谈夫妻问题，这使我大失所望。我倒希望听她说点惊人的戏剧性的故事，使我对玛伊塔起义前夕的思想脉络有所了解。我对她说：

“听您说，似乎那次你们俩谈您的情况的时候比谈他的多。对不起，打断了您的话。请您继续说下去。也就是说，他搞的那些政治活动使您受了不少的罪，对吧？”

“这比他去搞鸡奸还让我受罪呢！”说完她的脸一阵绯红，但又继续说，“后来我发现，他之所以与我结婚，就是为了掩饰他的同性恋癖病。”

终于，她把玛伊塔的秘密公开讲出来了，然而，此刻我一边想着阿德莱达的话，一边又想起库斯科发生的事：那里红旗招展，血流成河，起义军与国际主义者沉浸在欢乐的幸

福中。再过几个星期，利马会不会也这样？当我坐小公共汽车来这里时，司机说，昨天晚上，政府军在许多新居民点公开枪毙所谓恐怖主义分子，比方说，圣萨尔瓦多村、科马斯村、尼奥镇等。在利马会不会也像太平洋战争①时，智利人打进来，实行大屠杀呀？我耳边响起一位历史学家在伦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的发言，他引证当时英国驻利马的领事的话：当秘鲁志愿军在乔里约区和观花埠区顽强抵抗智利军队进攻时，利马市内的乌合之众则对开杂货店的中国人大肆屠杀，说他们是敌人的同谋，有的被绞死，有的被砍死，有的在大街上被活活烧死。尔后，这些乌合之众又洗劫有钱人家。那些躲藏在使馆的秘鲁太太们和先生们可吓破了胆，他们呼吁侵略军快点打进来。这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更惧怕那些疯狂的群众：印第安人、黑白混血人、印欧混血人和黑人等，是他们占领了利马城。现在，如果政府军最终抵挡不住起义军的进攻，那些食不果腹的群众，会不会也带上口袋闯进有钱人家中呢？有钱人现在大多居住在圣伊西德罗区、卡苏阿里娜区、观花埠区和恰卡里亚区。到那时，将军们、海军司令们、官员们以及各部部长们，必将带上他们的首饰、美元以及匆匆忙忙找出来的各种证件，或登上飞机，或爬上战船，逃之夭夭，而且还有许多人来不及逃走的便仓惶涌向各大使馆及领事馆。利马会不会也像现在的库斯科那样，到处杀人放火呢？

“看来，对他同性恋的毛病，您也并不饶恕他？”我对阿德莱达说。

① 1879—1883年间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的战争。智利为掠夺阿塔卡玛的硝石与秘鲁、玻利维亚宣战，结果智利获胜，秘、玻割让阿塔卡玛区给智利。

“一想起这事，我就气得浑身发抖。”她同意我的话道。

是那次？那天晚上，不，确切地说是黎明时分，阿德莱达听到刹车声，车轮子滑动声，就在他们家对面。因为那时，她总是提心吊胆地怕警察闯进来，她立即从床上跳起来观察动静。借着黎明的晨曦，她看到一辆小汽车停下来，从车上跳下一个人，像是玛伊塔，只是看不清脸而已，司机也从另一边走下来。她回到床上，蓦地，她听到点什么。（声音很怪，这声响她从未听到过，而且很难说准是什么。）她很不安。她把脸贴到玻璃上，这时，她发现另一个人做了一个不寻常的动作，和她男人玛伊塔告别。这种忸怩作态只有那些爱开玩笑的人、瞎胡闹的家伙以及那些酒鬼们才做得出来，但是玛伊塔并不是那种喜欢打闹而又随随便便的人呀！就在她以为他们要握手告别时，另一个家伙一把抓住了玛伊塔的裤裆，不是别的地方，是门襟那儿，抓着不放。玛伊塔理应把那家伙的手推开，骂他几句：“放开我，醉鬼！放开！”可他不但没有那样做，相反，出人意料地跟着那家伙走。玛伊塔把他抱住，两个人亲吻起来。又是吻脸，又是亲嘴。那是个“女人”，“他”想干好事了。这时，阿德莱达气得手脚直抖。一个穿裤子和男上装的“女人”？若明若暗的光线使她看不清自己的男人和谁接吻，那个家伙正在玩她男人身上的一个器官，两个人就在那空无一人的脏乎乎的街上。然而从那人魁梧的身影、头与发型上看，无疑是一个男人。她真想就那么半裸露着身子一头窜出去，对着那两个家伙大吼一声：“鸡奸分子！鸡奸分子！”然而，过了几分钟后，那一对分开了。玛伊塔朝家里走来，她躺下装睡。黑暗中，她感到羞愧难言，偷偷地看着他走进屋子。阿德莱达以为他会解释说：自己喝多了，记不起干什么来着，也记不起与谁在一起待过。可他并没有喝

酒，她也从来没见过他喝酒呀！她看着他在黑暗中脱掉衣服，只穿条裤衩，他总是这样，裤衩就是他的睡衣，然后，他轻轻地躺到她身旁，生怕把她惊醒。这时，阿德莱达对他既厌恶又讨厌。

“我也说不准待多长时间，”玛伊塔说，仿佛他是忽然想到似的，“就看我混得怎么样了。我想改变我的生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还回秘鲁来。”

“你以后不搞政治了？”阿德莱达惊奇地问。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他答道，“我去干的事，就是你一再要我干的。我终于懂得了，你说得对。”

“太遗憾了，不过已经晚了呀！”

“晚是晚，但总比从前好。”玛伊塔淡淡一笑。他觉得渴极了，就像刚吃过咸鱼。随即他又思忖：“我还待在这里干什么？该走了！”

阿德莱达显得很高兴，这种表情他记忆犹新。

这时，库斯科的上空突然隆隆作响，人们惊魂落魄，炸弹一个接一个地爆炸开来。与此同时，一群飞机低飞而过，射下数千发子弹。只见原本完好的房屋，霎时间只剩下断垣残壁，碎石、瓦砾、砖头四处横飞，居民们有的被炸死，有的被机枪扫射而死，有的被倒塌的墙壁压死，少数幸存者，哭喊着仓惶逃命；只有极少数手中有枪的人，对着烟雾弥漫的天空射击。

“玛伊塔就向您一个人辞行，”我肯定地对她说，“连向姨妈何塞法太太也没说一声。那么多年以后他又来看您，您不觉得奇怪吗？”

“他说要到外国去，想知道他儿子的一点情况。”阿德莱达回答我，“当然，后来从报纸上我才清楚了是怎么回事。”

外面，罗斯比里奥西城堡的入口一带，突然一阵骚动，仿佛在铁丝网和沙袋后头增加了警卫人员，而同时在库斯科，狂轰滥炸并没有吓坏那些被关押的坏蛋，匪徒们从警察看守所、从监狱里窜到市中心的商店里趁火打劫。起义军的首领们则断然发布命令：公开抢劫者格杀勿论。顷刻间飞来一群群兀鹫，在被枪毙的那些尸首上空盘旋，这些死尸与被炸弹炸死的尸首混为一体。到处散发着火药味，腐败的尸体味和烧焦味。

“那就利用这次机会，把你的病治好。”阿德莱达轻声细语地说，轻得我几乎听不见。然而她的话使我顿觉惊奇。

“我没有病。”玛伊塔咕哝了一句，“跟我说一下孩子怎么样，我就离开。”

“对你来说，是病。”阿德莱达坚持说，同时拿眼睛瞅着他，“难道你治好了？”

“阿德莱达，我这不是病。”他吞吞吐吐地说，感到手心直冒汗，而且嘴巴更干渴了。

“我再说一遍，对你来说是病。”她说，而玛伊塔则想，现在她生气了。勾起她的痛楚，这是我的过错。我赖在这里干什么呀？还不赶快离开！“对别人来说，那是堕落，但是你不是一个腐化堕落的人。这个我知道，而且，我还请教过医生。医生说可以治好，但你不愿意接受电疗。我答应过你，替你向银行借一笔钱付治疗费，可你就是不同意。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了，告诉我实话，你为什么不愿意接受治疗？你害怕？”

“电疗没有用。”玛伊塔说，“我们不谈这个了，最好给我杯水喝。”

太太，您和他结婚，这还不能治他的“病”？玛伊塔是不是以为和一位年轻漂亮、充满魅力的女人结婚，可以治他的“病”？

“那时我是那么想的。”阿德莱达说，同时又习惯地把一撮头发向后一拢。停了半晌，我们又恢复了谈话。“当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他真的想治好，至少应该试一试。他结婚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毛病，尤其是为了骗他的那些革命同志。我成了他搞同性恋的烟幕弹。”

“现在我向您提个问题，”我对她说，“您不愿意的话，可以不回答。你们两人之间的性生活正常吗？”

看来我提的问题她并不感到难堪，她把搭在一起的腿分开，朝我挤挤眼。

库斯科死的人太多，根本就没法埋葬。起义军的首领命令给尸体浇上汽油等可燃液体，把尸首统统烧掉。必须赶快处理掉，以防止尸体腐败引起疾病。市区的空气腥臭污浊，令人窒息。忽然，外面人声嘈杂，只见一辆装甲车停到城堡外面的铁丝网前，跳下好多士兵，加强了戒备。我想，大概情况更紧急了，说不定要发生什么事。阿德莱达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要是有人攻打他们，我们首当其冲。”库斯科街上的尸体在燃烧，发出的噼啪声，并不能盖过死者亲朋的呼喊哭叫声，哭声声嘶力竭，似鬼哭狼号，令人心碎。人们苦苦哀求不要火焚，要求照基督徒习俗，实行土葬。极个别的几位亲属甚至不顾烟熏火燎，臭气扑鼻，从革命分子的眼皮底下抢走尸体。不知从哪个慈善团体、教堂或修道院走来一群教徒，他们口中念念有词地祈祷着，从死人和瓦砾中穿过。

“我不懂什么叫性生活正常，什么叫不正常，”阿德莱达轻声说，又习惯地拢了一下头发，“没法进行比较。那些年代，一个女人从不和她的女友谈论这类事，因此，我想可能是正常的。”

然而，事实是不正常的。他们是住在一起。有时也作爱。就是说，有时晚上抚摸抚摸，亲吻亲吻，然后便三下五除二地行行房，之后，顷刻间他就进入了梦乡。当时，她总觉得有点儿太浮浅，太平庸，太卫生，太不完全（后来她才发觉）。难道生理需要与欲望就这样简单吗？并不只是因为她不喜欢玛伊塔事前总把灯关掉，她总觉得他每次都是那样一蹴而就，匆匆了事，仿佛心里想着别的事，别的人，尽管他的身体与她靠在一起。“他在想别的事？”阿德莱达常常这样自问。那么他什么时候能够不想别的事，而一心扑在她身上，投到她怀抱中呢？后来她索性直截了当地问他，他则支支吾吾，含糊其辞地解释。幸好表面上看来，她对丈夫还满意。玛伊塔有时候，在深夜或在黎明想的是他的那些同性恋朋友，尽管难免犹豫不决，但最终对他们的手、对他们的嘴巴更感兴趣，因而也就到卡亚俄港附近，到波尔本尼区去找他们。实际上，作爱时他两三下就完。开始，阿德莱达不懂得他为什么这么快就结束战斗。不过，后来才知道，要求他再坚持一会儿，要求他别下来，这时她仅仅感到的是一阵发痒发酥，并未达到性兴奋高潮，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连这种感觉也没有，因而她总是不满足。她真傻，直到后来有一天晚上，她真的达到兴奋高潮，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因而又自问：“难道是我的过错？是我太冷淡？我不知道怎么样刺激他？”

“再给我杯水喝吧。”玛伊塔说，“现在我就走，阿德莱达。”

她站起来去给他倒水，当她返回时手中拿着一叠相片。她把相片递给了他，一句话也没说。其中，有孩子刚出生时照的；有几个月尚在襁褓中的，她的丈夫胡安抱着；有一周岁照的，旁边有一个生日蛋糕，蛋糕上还有两支小蜡烛；有穿短裤和鞋子的，小家伙瞪着眼瞅着照相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一张一张地仔细地看着，同时又看看自己，想从中发现点什么相似之处，注意儿子的特征、姿势、表情和衣着。那个儿子我还从未见过，将来也很难见到。明天我到了哈乌哈会记得这些形象？当我在高原上，在热带丛林中长途行军、冲锋陷阵、埋伏袭击时，儿子的形象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吗？一旦出现，我又作何感想呢？我去斗争，我将流血牺牲，难道不正是为了他吗？而现在，就在看相片的时刻，玛伊塔他爱自己的儿子不爱？他不感到痛苦而悔恨吗？不，他只感到好奇，只觉得应该感谢她，是她这样大方地让自己看了相片。难道仅仅因为好奇心的驱使，此刻他才来到阿德莱达的家？或者也是为了看看她是否还恨他？他给她的生活留下了痛苦而辛酸的记忆。

“我也不知道。”阿德莱达说，“如果是为这个而来，那么他走的时候应该清楚，他给我造成的创伤使我无法原谅他。”

“不管怎么说，您还是和他生活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怀孕。”

“那时我就像死人一样麻木不仁。”她咕哝一句，“正是由于怀了孕，我才鼓起勇气，下定决心和他一刀两断。”

那时她已经好几个月不来例假，自己便开始怀疑，直到有一天医生告诉她化验结果，说她有了喜。她当时激动得哭

了。但她马上想到：未来的孩子要是知道父亲是个同性恋者该怎么办呢？在他们离婚前的好几个星期，她和他争论了几次，让他去接受电疗。

“不是因为怕，”玛伊塔看着阿德莱达，声音很小地说，“阿德莱达，那是因为我不想治。”

由此可见，玛伊塔最后一次见到阿德莱达时，谈了过去谈不到一起的问题。对吧，太太。甚至玛伊塔这一次显得比你们生活在一起时更坦率些。

在库斯科街上进行宗教游行的那支队伍，人越来越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被死伤的亲人吓破了胆。他们有的死了双亲，有的兄长丧命，有的儿孙不见。死者不计其数，或被乱石击死，或被倒塌的房屋压死，或被烈火烧死，而那些遍布库斯科大街小巷的蛇神像，也被压倒在乱石碎瓦之中。活下来的人看到神像居然也有这样的下场，心中倒也感到慰藉。不久，在国王广场附近，起义军便组织积极分子和战士们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来提高人们的斗志。口号声、枪声以及人们狂怒的呼喊声响彻库斯科上空。

“如果不和你的道德观冲突，我要求你把胎儿打掉吧。”玛伊塔对妻子说，好像这句话就挂在嘴边，说起来如此轻松、随便，“理由很多。我的这种生活，我们的这种生活能养得起一个孩子吗？我所从事的工作，要求我必须有献身精神。一个人不能给自己套条绳子。总之，只要不和你的道德观冲突，求你把他打掉。当然，如果你不愿意，那咱们就担负起养育的责任。”

阿德莱达听后并没有哭，两个人也没有再争论下去，她

只是说：

“我不知道，以后再说，我考虑考虑。”

不过，也就在此刻，她清楚地懂得自己应该怎么做。

“那么说，你对我撒谎了？”阿德莱达得意地笑了笑，“那时你对我说，你不好意思做电疗，你觉得太无聊，又说这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弄了半天，都是骗人的。不过我很高兴，你终于向我讲了实话。”

“不仅那时，即使现在，我仍然觉得不好意思，我有时真觉得那样太无聊。”玛伊塔说。听了他的话，我都觉得脸发烧，舌头不听使唤。不过，我认为有必要把故事讲下去。继尔玛伊塔又说：“这仍然是我生活中的极大不幸。”

“那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把它治好呢？”阿德莱达重复道。

“我就是我。”玛伊塔吞吞吐吐地说，“我是个革命分子，我的脚是平脚板，我是同性恋者。我不想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这很难给你讲清楚。在这种社会里，有许多清规戒律，有许多世俗偏见，凡是不符合的，都认为是不正常、犯罪，或者是一种病态。这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腐败透顶，有许多思想离奇得很，因此，需要来一次革命，你说对吧？”

“但是，他自己曾经对我说过，同性恋这种人，在苏联会被关进疯人院，而在中国就会被枪毙，那里对同性恋分子就是这么处理的。”阿德莱达对我说。她当时曾反问玛伊塔：“就为这个，你才要搞革命？”

库斯科市处于一片混乱中：房屋倒塌，尘土飞扬，正在燃烧的尸体发出阵阵恶臭；教徒们在祈祷，伤残人在哀嚎，活下来的人在绝望地呼喊。然而，这一切并未持续多久，转瞬

间，天空中的飞机马达又隆隆地响起来，它的噪音盖过了上述的一切。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咒骂，炸弹便又降落到他们头上，机关枪的子弹又向他们扫去。

“就为这个，我还要再搞一个革命。”玛伊塔低声细语，同时用舌尖舔舔干裂的嘴唇，他实在太渴了，然而又不敢要第三杯水，“不是一个假革命，而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的革命。一个消灭一切不合理现象的革命，在这样一个革命的社会里，谁也不会因为他自己的行为而感到羞耻。”

“你和你们革命工人党的那些狐朋狗友，就要干这样一次革命？”阿德莱达情不自禁地笑了。

“就我一个人去干这样的革命。”玛伊塔也回之一笑，“我已经不在革命工人党了，昨天晚上我退出了。”

阿德莱达第二天上午很晚才起来，因为夜里老是考虑那个问题，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起床后，她一边穿衣一边思索，甚至在等公共汽车时，她还在思考那个问题。她心神不定地来到林塞区的信贷银行，坐在一张小写字台前结了一笔帐。十点钟左右，她请了一会儿假到邮局去。胡安·萨拉特就坐在那里，他面前的玻璃瓶已有了裂纹。阿德莱达故意拢拢头发，整整衣服，好让胡安看见自己。果然胡安发现了她，忙不迭地向她点头，而她也报之以会心的微笑。胡安·萨拉特取下眼镜，整理了一下领带就离开座位，跑过来与她握手。

库斯科城处于一片混乱中：街上到处是破瓦碎石，尸首遍地。现在又倒塌了一些房屋，而少数幸存下来的几栋房屋则被人们趁火打劫，洗劫一空。有的人呻吟不止；有的人嚎啕大哭；有的人拼命抢劫；有的人垂死挣扎；有的人寻找死

者。虽然起义军巡逻队在各个街口发出命令，但很少有人服从。命令说：“同志们，我们的口号是放弃城市！放弃城市！放弃城市！”

“我自己也感到这样做太失体统。”阿德莱达说，一边看着他们那张度蜜月时的照片。

这就是说，就在这个客厅里，玛伊塔最后一次见到了他已离婚的妻子阿德莱达，他对她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以及自己的伟大抱负：搞一个真正的革命，搞一个完全的革命，这个革命要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这就是说，虽然在他来见阿德莱达之前遇到了许多的问题，遭受过失败与挫折的打击，但他仍然是欣喜异常而又富有诗意，布拉克盖尔也是这么对我说的。

“但愿我们的革命能够给其它革命指出方向。阿德莱达，但愿如此，但愿我们秘鲁能给全世界做出榜样来！”

“最好是开门见山，我就这样开诚相见地和您讲话。”阿德莱达自己也不敢相信这两句话是从自己口中说出的，她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呢？她甜甜地一笑，习惯地用手拢了一下头发；就这样，林塞区的邮政局长被弄得神魂颠倒，“您曾经迷恋过我，而且迷到发疯的程度，要和我缔结良缘。对吧，胡安？”

“是这样的，阿德莱达。”胡安·萨拉特首先坐到彼蒂·杜瓦斯大街一家小咖啡店的桌子前，他是与阿德莱达来喝汽水的。“迷恋到发疯的程度，比发疯还厉害。”

“胡安，现在您好好看看我，然后坦率地回答我的问题：您现在仍然像以前一样喜欢我吗？”

“我比以前更喜欢你。”林塞区的邮政局长胡安咽了下口水，“你比以前更漂亮，阿德莱达。”

“好吧，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和我结婚。”开始讲话时她就泰然自若，而现在仍然那么自如镇定，“我不想欺骗您，胡安，我并不爱您，但是我将努力去做，您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将永远尊敬您，而且我将尽一切努力做您的好妻子。”

胡安·萨拉特眨巴着眼睛惊奇地看着她，手中的汽水杯子颤动起来。

“阿德莱达，你这是说的真心话？”他终于迸出了一句问话。

“是真心话。”她现在说话仍然镇定自若，“我就向您提一个要求：请您把您的姓赐给我肚子里将要出生的这个孩子。”

“再给我杯水。”玛伊塔说，“我这是怎么了？老是渴。”

“你说得太多了，发表了一通演说。”阿德莱达说完站起来。尔后她在厨房里一边倒水一边又说：“你一点儿也没改。确切点儿说，更坏了。现在你不仅想替穷人搞革命，还想替同性恋者搞革命。玛伊塔，你真让人好笑。”

“对，替同性恋者搞革命。”玛伊塔想，“对，我就要为同性恋者干革命。”

玛伊塔听到她朗声笑起来，而自己丝毫没有感到恼火。

库斯科城处在烟雾及腥臭难闻的气味中，只见人们从废墟中爬起，捂着嘴巴和鼻孔狼狈地向城外逃去，剩下的只是一堆堆尸首、动弹不了的伤残人、爬不动的老人和不会迈步的小孩子。与此同时，趁火打劫分子不顾烟熏火燎，臭味冲鼻和随时都有可能被炸弹炸伤的危险，闯进那尚未被炸坏的人家，寻找金银财宝以及充饥之物。

“他接受了您提出的条件。”我说，“堂·胡安·萨拉特一定很爱您，太太。”

“我一边和玛伊塔办离婚手续，一边就和胡安结了婚，我们是按宗教方式结的婚。”阿德莱达叹了口气，看着他们在卡涅特的留影，“离婚手续拖了两年。办了手续后，我又和胡安到政府部门登了记。”

玛伊塔当时怎样对待这个事呢？他肯定不会感到意外，而且觉得松了口气。不过，他那时倒也装模作样地对阿德莱达说：“你不爱他，就和他结婚，我担心你以后要吃苦头。”

“你不是就这样和我结的婚吗？当然，咱们俩不一样，你骗了我，说爱我；而我与你相反，对胡安说了实话，不爱就说不爱。”

“不过，你估计错了。”玛伊塔说，他刚把那杯水喝下去，觉得肚子胀鼓鼓的，“你记得我提醒过你吗？从一开始我就对你说……”

“你别再给我发表演说了。”阿德莱达打断他的话。

她不说话了，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椅子扶手。从她面部的表情上我看得出，她估计时间差不多到了。然而，我看了看手表，尚差十五分钟。就在这时，响起了枪声：先是一声，紧接着两声，尔后又是一阵射击声。阿德莱达与我几乎不约而同地朝窗外望去：警卫不见了，肯定都隐蔽到铁丝网和沙袋的后面去了。但是，在左边，有一队航空兵朝罗斯比里奥西城堡走去，他们显得一点不慌张。实际上，枪声来自很远的某一地方。难道贫民区在枪毙人？在利马郊区开始战斗了？

“ 您儿子真的相信了？ ” 我又接下去问她。她把视线慢慢从窗户移开，一改刚才惊奇的神色，把脸一沉——可能她总是这样郁郁寡欢——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

“ 后来，孩子知道胡安不是他爸爸。 ” 她说，说完嘴唇颤动起来，而她的眼睛却闪烁着怒火。

“ 您看，我扯远了。我们还是不谈您儿子为好。 ” 我知趣地说，“ 最好我们还是谈谈玛伊塔。 ”

“ 我决不发表什么演说。 ” 玛伊塔安慰她说。他把杯子里剩下的水一饮而尽。玛伊塔你是不是在发烧？怎么喝了这么多水？“ 阿德莱达，坦率地讲吧，在我离开之前，我想知道我儿子怎么样，也想了解一下你境况如何。我不应该来。本来想你一定生活得不错，心满意足，可是，我发现你仍然十分恨我，恨所有的人。 ”

“ 我恨你还不如恨我自己呢！我一生中经历的这些事，都是我自己找的。 ”

远处又响起了枪声。从邻近的山坡上、山顶上向库斯科城望去，她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只听到人们歇斯底里的喊叫声。

“ 不是胡安告诉他的，是我自己告诉他的。 ” 阿德莱达长吁短叹地说，“ 直到现在，胡安也不原谅我，胡安一直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儿子。 ”

后来，阿德莱达对我说起一段往事，这件事搅得她日夜不得安宁。这里面有宗教信仰问题，有嫉妒，也有蔑视。小胡安（她儿子也叫胡安）从小就喜欢爸爸，和爸爸合得来，也许因为他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正是由于妈妈阿德莱达的过错，

他自己的身世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你是说，你丈夫每个星期天都带他去做弥撒？”玛伊塔思索了一下，然后大声说。这时，我想起自己小时候怎样天天祈祷，唱赞美歌，受圣餐，忏悔；怎样搜集好看的彩色邮票，然后如获珍宝似的夹在作业本里。“好吧，至少在这一点上像我。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天天做弥撒。”

“胡安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阿德莱达说，“他自己就常说，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派的忠实信徒。确实是这样。当然，他希望小胡安也成为像他那样的信徒。”

“这是必然的。”玛伊塔同意她的话，然而，同时他又联想到哈乌哈圣何塞中学的那些孩子，他们怎样全神贯注地聆听巴列霍斯讲马克思主义原理和革命的问题。他看到他们正在那里偷偷油印指挥部给他们的声明，在工厂、学校、电影院门口、市场上怎样散发传单。他看到，他们就像主耶稣手中的面包那样迅速增加，他们每天都召来几十个像他们一样出身贫寒而又具有牺牲精神的小伙子，他们沿着安第斯山间的那些陡峭而打滑的羊肠小道，越过军队的封锁线，躲过巡逻队的眼睛，就像猫儿一样灵敏，把鲜红色的镰刀斧头旗子插到了山峰上，又插到了楼房顶上。甚至连我也看到他们怎样为游击队运送药品、军衣和食品，并且千方百计地传递情报。虽然个个汗流浃背，但他们精神饱满，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玛伊塔的儿子，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这些小伙子还都很年轻，也就是十四、十五或十六岁左右。多亏他们，游击队才有可能取得胜利。“你们干脆去把天也摘下来吧！”我想。让我们把天够下来，把天栽在地上，让天与大地在黄昏时分合二为一，让山顶的乌云与地上燃烧着的火所产生的烟合二

为一吧！而在库斯科上空盘旋飞翔的黑点点是什么呢？它们并不是什么尘埃，而是穷凶极恶的食肉猛禽，它们饿得受不了了，不顾烟熏火燎向地上的尸首俯冲下来。那些有幸活下来的人（有的是死者的亲属，有战士，有国际主义分子，也有少数伤员）跑到了山顶上，在那儿，能够听到猛禽扑打着翅膀，拼命地撕咬着眼前的猎物。自然，山顶上的人只要一呼吸，一股恶臭便冲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这就是说……”我鼓励她继续说下去。现在仍不时地听到远处阵阵枪声，不过，不论是阿德莱达还是我，我们俩都没有朝街上望去。

“这就是说，我们从没有在小胡安面前提起过那个问题。”她接着说。我尽力控制自己不要分散精力，听她讲述，然而我的视力所见、耳朵所闻仍是那个大屠杀的场面。

那是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它就像盐酸一样，在心灵深处腐蚀他们的夫妻关系。胡安很爱那个小男孩，但是他并没有原谅阿德莱达，他为了要娶她做妻子而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时光飞快流逝，不久小胡安已经中学毕了业，并且进了一家药店工作。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父亲有一个情妇。“堂·胡安有个情妇！？”真让他惊奇不已。然而确实是这样，并且他还给他的那个情妇买了一处房子。阿德莱达知晓后并不吃醋，而是觉得像胡安这么个老朽的家伙，路都走不稳，眼睛也看不太清，居然还有个情妇，真是荒唐可笑至极！她真的笑得前仰后合。一个女人当她妒嫉另一个女人时，是因为她也爱这个男人，而阿德莱达压根儿就没有爱过胡安。跟他结婚后，她简直是皱着眉头忍受那个老家伙的折腾，她几乎是过着一种禁欲主义的生活。令她气愤的是，那个老家伙就挣那么一点钱，怎么能养得起那个女人……

“可是，我儿子可气坏了，他简直忍受不了。”她补充说，似乎有点昏昏欲睡，“他开始无缘无故地发火，一天天消瘦下来。仿佛他父亲有了个情妇，世界末日就到了一样。是不是他从小受的教育使他太纯真了呢？一个小孩子这样还是可以理解的，可他那时都是一个二十岁的成人了呀！到了这个年龄，都有一些生活经历了，他的表现令人费解。”

“那是因为您的缘故，孩子才有心灵上的创伤。”我说。

“因为宗教信仰。”阿德莱达坚持说，“胡安就是这么教育他的。他是那么虔诚，突然的打击是受不了，几乎变成个疯子。爸爸教他怎样成为一个好人，可一夜之间，他发现爸爸是个伪君子，他怎么接受得了？他那时已经有自己的思想，都二十岁了。”

她停下不说了，因为这时枪声越来越近。我从窗户上望去，发现铁丝网后头的哨兵一动不动，我认为没有什么值得惊慌的。顷刻，又听到枪声，仿佛是从南方，从观花埠，从圣伊西德罗方向来的。

“说不定您儿子的这种性格是玛伊塔遗传给他的呢。”我对她说，“玛伊塔从小就是这样，一个十足的虔诚信徒，认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耿直，笃信无疑。他从来不懂什么叫妥协让步。谁要是说的一样而做的又是另一样，他就大发雷霆。他没有跟您讲起过他为了与穷人同甘共苦而自愿减食的事吗？这样的人，一生不会幸福的，太太。”

“我看到他成天价那样痛苦，心想，如果把事实真相告诉他，或许会减轻他的苦恼。”阿德莱达不无怨愤地说，“我也差点疯了。”

“好吧，我走了。不过，最后我得求你一件事。”玛伊塔

说完站起来，他感到很后悔，刚才就应该走了，“不要对任何人说你见过我了。无论什么原因，都别说。”

然而，阿德莱达对这种谨慎小心、保密之类的事从来就不相信，她从来也不把它当作严肃的事看待。虽然她与他生活在一起时，目睹过警察到她家好多次。她总把这看成是孩子们的玩笑一样，什么搜捕不搜捕的，不就像孩子们的捉迷藏一样吗？如果老是担心，认为什么人都可能谋反，只要有人告发，就今天逮捕一个，明天逮捕一个，不论是当兵的，还是阿普拉党人，不论是资本家、帝国主义分子还是斯大林主义分子，到头来，大家不都成了敌人？这叫人怎么生活得下去呀？此刻，玛伊塔的这句话使阿德莱达想起自己过去的那场恶梦。“当心，别说！”“别重复！”“你不应该知道。”“谁都不应该告诉。”……有时候，她一天能听到玛伊塔说好几遍。虽然她心里不服，可嘴上并不与他争。“好吧，那就不说。”玛伊塔嘴角挂着一丝得意的微笑和她告别，然后急匆匆地离开了。他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就像脚板上打了泡一样。

“他没有哭，也没有发生任何悲剧。”阿德莱达说，一边呆若木鸡地看着半空，“由于好奇，他只向我提了几个问题。玛伊塔什么样子？为什么我们离了婚？就这两个问题，再没有提其他。看到他心里踏实了，因此当时我想，看来告诉了他，也不会改变他那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的情绪。”

然而，第二天他的儿子就不见了。十年过去了，阿德莱达再也没有见到他。她突然失声。我看到她正在那里使劲地抓自己的手，仿佛要把皮给剥下来。

“这是天主教徒的做法吗？”她嘟嘟囔囔地说，“和自己的母亲一刀两断，可他的母亲又犯了什么罪呢？至多不就是一

个过失吗？难道我的所作所为不都是为了他吗？”

甚至当时报告了警察局，让警察帮助寻找她的儿子，虽然儿子那时都成了大人了。看到阿德莱达那垂头丧气的样子，我真感到难过。当然，我也懂得她的这个创伤是由玛伊塔造成的。然而，我感到同时她如释重负，因为我看到了玛伊塔，他就在林塞区的大街上，正朝阿雷基帕大街走去，在找小公共汽车。他是否感到这次来看前妻白跑了一趟呢？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而且很可能以后永远也不会见到他。他悲观失望、意志消沉了吗？没有，相反，他兴致勃勃，精力充沛，心急如焚，正在那里思考怎样打发他在利马还剩下的几小时时光呢。他受到挫折失败之后，一向能很快振作起来，并且以更大的精力准备迎接摆在他前面的新任务。过去，他天天干的是简单的手工劳动，令人乏味，只有当他粉刷科恰卡斯印刷厂的墙壁，到阿根廷大街和五·二广场散发传单或者为《工人之声报》翻译文章时，他才有点兴趣。而现在，他真的要干革命了，这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这场革命已迫在眉睫了。他想：“这场革命，我要去点燃它。”一天总是陷入无谓的争吵中，难道不是白费时间吗？他掏了掏口袋，取出一张单子，又把要买的东西看了一遍。他在法新社的帐结算了没有？

“头几天，我以为他自杀了呢。”阿德莱达说，气狠狠地搓着手，“他要是死了，我也活不成了，非得自杀不可。”

几个星期过去了，他杳无音信。又过了好几个月，突然一天，胡安收到了他的一封信。那封信，他是经过周密考虑才写成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心情是十分平静的。他说，他非常感谢胡安为他所做的一切，并且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能报答他的抚育之恩。他还请求胡安原谅他不辞而别，但又说那

样也许更好些，否则又将说些什么呢？不要为他担心，此刻，小胡安难道是在暮色苍茫的山区？他是不是参加到那些肩背冲锋枪、腰别手枪的人中间去了呢？他们正在那里上窜下跳，发号施令，要人们守秩序，不要乱动。

“信是从布加尔巴来的。”阿德莱达补充说，“信上只字没提我。”

对，帐结算清了，法新社付给玛伊塔的是现钱，而不是支票，总共四万三千索尔。他高兴死了。他原来估计，至多也就是三万五千索尔。这几天中就数这件事情使他高兴，多出了八千索尔。他想，把单子上的东西全部买了后，还能剩下一些钱。自然，他并未与法新社的编辑们告辞。当他与社长告别时，社长曾问他，星期天能不能代个班，他说没有时间，要去齐克拉约市。他兴致勃勃地离开法新社，又匆匆忙忙地来到阿班卡伊大街。他买东西一向没有耐心挑拣，但这次不同以往。为买一条草绿色的牛仔裤，他跑了好几家商店，还专门挑厚实耐用的。他想，要穿着它爬山战斗，抵御寒冷。他索性买了两条，但不是在同一家商店买的。继尔又在大街上的一个摊贩那里买了一双胶鞋，小贩借给他一个小凳儿，他靠着国立图书馆的墙根坐下试了试，不大不小正合适。然后，来到拉木巴街，找到一家药店。一进门他就把计划采购的药品条子掏出，险些交给司药。但他马上止住，心中想：“谨慎小心，从不多余。”决定把要买的药物、绷带、消炎片、凝固剂、磺胺以及其它急救药品分几家药店买。这些药物都是巴列霍斯要他买的。

“从那时到现在，你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我没有见到他。”阿德莱达回答我。

胡安见过他。有时他也到利马来，还和胡安一块儿吃午饭，他在布加尔巴和尤里马瓜斯的几家锯木场工作过。然而，自从谋杀、绑架、爆炸以及战争发生以来，他再也没有写过信，连人影也见不着。他们的儿子要是不死的话，肯定变成游击队员了。夜幕业已降临，库斯科市活下来的人都紧紧地挤在一起，在黑暗中互相拥抱着取暖，抵御寒气的袭击。那些睡着的人正在梦见飞机狂轰滥炸，白天，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但是，玛伊塔的儿子并没有睡，他正在指挥部的洞室里与别人争论问题，企图说服他的反对者。他说，一旦恶臭稍减，库斯科市的人就应该返回去，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有的指挥官不这么看，他们说市区太危险，很容易遭到空袭，群众的损失难道还少吗？但是在这里，在广阔的田野间，则不大容易遭到空袭。玛伊塔的儿子竭力反驳，讲话的嗓门越来越大。灯光下，他的脸看上去很光滑，然而有几处伤疤却清晰易见。他的肩上仍然挎着冲锋枪，腰间别着一支手枪。手中的烟已经熄灭，可他并未发觉。他说话的声音斩钉截铁，仅从这铿锵有力的话音中，便知道他曾经战胜过寒冷、饥饿、疲劳、恐怖，并与逃跑主义、犯罪行为斗争过。他肯定地说，胜利一定会到来，而且为期不远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预言错过，而且将来也不会估计错。

“虽然他不常来利马，但每次差不多总去找胡安，然后两人一起出去。”阿德莱达重复说，“从来没有找过我，也没有打过电话给我，甚至胡安说让他见见我，他都不同意。您能理解为什么他对我这么憎恨吗？开头，我给他写过许多信，后来我也就听天由命了。”

“已经超过时间了。”我提醒她。

玛伊塔接过药包，交了收据就离去了。在最后一家药店买了凝固剂和红汞，单子上写的药品都买齐全了。药包很大，而且重得很，当他回到塞皮塔街自己的家时，胳膊都给压酸了。箱子打好了，里面带了几件毛衣、衬衣，而就在这些衣服中间，夹着巴列霍斯送给他的那支冲锋枪。把药放好后他又朝房间扫了一眼，地上乱七八糟地堆了不少书。布拉克盖尔能来把书拿走吗？他离开家时，把房间的钥匙藏在楼梯旁边的两块板子中间。如果他不来的话，房东就会把这些书卖掉抵房租。这一切现在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坐上出租汽车来到大学公园。现在他顾不得那么多，什么房间呀，书呀，阿德莱达呀，儿子呀，以及他过去的那些同志们啦。现在利马与他有什么关系呢？司机把他的箱子往车架上搁时，他的心跳顿时加剧了。小公共汽车几分钟后就要开向火车站了。这时，他想："我玛伊塔这一次将一去不复返了。"

我站起来，把钱付给她，并且一再对她表示感谢。她把我送到门口，我刚一迈出门槛，她就把门关上了。在这傍晚时分，我竟看到了罗斯比里奥西城堡的墙垣，使我惊奇不已。我又得受航空兵的检查。他们放我过去了。我打街上走时，看见家家闭门锁户，门口都是石头和稀泥，前后左右处处都是。现在不仅听到了枪声，还能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以及零星的炮声。

第　八　章

这个人活像阿西姆波尔多笔下的一个人物：鼻子恰似胡萝卜，歪歪斜斜，使人想起葡萄藤，鼓起的腮帮子宛如两个榅桲果，突出的下巴好似一个凸凹不平的土豆，脖子是一串磨掉皮的葡萄。虽然他丑陋，但你会觉得他丑得可爱；也许有人会说，堂·埃塞基耶尔特意蓄一头耷拉到肩膀的长发，头发看上去油光锃亮。他的身体如一堆松软的肉，由两条肥大的腿支撑着，腿上穿一条同样肥大的裤子，身上穿的毛衣补丁摞着补丁。一只鞋系有鞋带，另一只的脚尖却裂开个大口子，走路一抬脚，脚尖就露出鞋外。然而，他并非乞丐，而是哈乌哈市武装广场的一家店主。现在他经营家具和日用百货，他的店紧靠着卡门学校和芳济会教堂。哈乌哈的人都说，别看他那副打扮，可他是本市最富有的商人。他为什么没有像其他有钱人那样逃之夭夭呢？起义军几个月前把他抓去，人们说他付了赎金；自从那以后，大家都说他“替革命纳了税”。

“我知道是谁叫您到这里来的，我知道，是矮子乌维鲁斯那个婊子养的让您来的。”他见我刚走到他的店门口，就劈头

盖脸地对我说，“ 高兴来，您就来吧，反正我啥也不知道，啥也没有看见，我和那件鸟事毫不相干。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我知道您在写巴列霍斯。我才不介入呢！您还是尊重客观事实吧！我对您说，我并没有生气。告诉您，好让您清楚明白。 ”

实际上，他对我说话时，气得眼珠子直冒火星，声音大得很，甚至连在广场上巡逻的警察都听见了。他们走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什么事也没发生。警察走后，我又平心静气地对他说：“ 没有必要这样大吵大叫的，堂 · 埃塞基耶尔，我不想在文章里提您的名字，从来也没有这样想过。在我写的这篇故事中，既不提少尉巴列霍斯，也不提玛伊塔，凡是当事者都不提，谁也不会看出来。 ”

“ 那您他妈的为什么来哈乌哈呢？ ” 他反问我，同时用两个铁钩子一样的指头指指点点，“ 您为什么在街上、在广场上碰到人就问这问那的，管他妈的啥用？何必去打听呢？ ”

“ 为的是撒起谎来有根有据。 ” 我说，这话我今年说了不下百次，“ 堂 · 埃塞基耶尔，您至少让我把话讲完。就占您两分钟的时间，可以吗？我可以进去吗？ ”

黎明时分，晨光熹微，哈乌哈的空气格外清新。这晨曦羞羞答答，犹豫不决，若明若暗。教堂及周围楼房的阳台（家家的阳台上都摆着花），都把自己的长长影子留在广场上，广场里绿树成行，微风轻拂，影子忽隐忽现。晨风带着寒气向玛伊塔袭来，他冻得身上起了鸡皮疙瘩。是不是因为他太紧张？还是因为他害怕？不，他既不紧张，也不害怕，确切地说，他心跳过快。这倒不是因为即将发生的事使他如此心情急切，而是因为这倒霉的高山反应每对每刻都在找他的麻烦。他只睡了几个小时，因为从破碎了的玻璃窗上吹进来的

冷风把他冻醒了，因为他睡的那张理发椅子毕竟没有床那么舒服。五点钟左右，一声雄鸡啼鸣把他吵醒了，他立刻想到：“今天开始了。”虽然当时他还没有睁开眼睛。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摸着黑找到了一盆水，尽管很小心，还是碰到了室内的东西上。用凉水一洗，他倒彻底清醒了。睡觉时，他并没有脱衣服，因此只需要把鞋穿上就行。他把箱子盖盖上，就开始等候起来。他坐到堂·埃塞基耶尔的一把理发椅子上，闭上双目，记起巴列霍斯给他的指示。此刻，他沉着冷静，非常自信，要不是有点高山反应的话，他会感到非常惬意而幸福的。不一会工夫，他听到有人开门。借着提灯的光，他看到埃塞基耶尔走了进来，给他送来一铁碗热乎乎的咖啡。

“你睡得很不舒服吧？”

“我睡得很好。”玛伊塔说，“到五点半了吧？”

“差不多快到了。”埃塞基耶尔小声说，“从后门出去，别出声。”

“谢谢你的热情招待。”玛伊塔和他道了别，准备起程。

“祝您好运气。”

“好什么呀？我的运气才不好呢！我错就错在心太好了，我太傻了。”他的鼻子翘得老高，鼻子上的青筋也都迸起来，眼睛直冒火星，“我的错就在于我对一个陌生的外乡人起了恻隐之心，留他在我的理发店里过了一夜。要不是别人对我说，他一无亲二无故，我会主动去找他来过夜吗？还不都是矮子乌维鲁斯那家伙干的吗？”

“堂·埃塞基耶尔，都已经过了二十五年了，”我努力安抚他，使他冷静下来，“这已经是旧事了，谁还记着它呢。您别生气了。”

“我生气是因为他那样对待我是不公平的，而现在他又说我卖身投靠了恐怖主义分子。咱们走着瞧吧！我就不相信政府军会枪毙我，会了结我这一生。”堂·埃塞基耶尔吼叫着，“我生气是因为那次事件的智囊人物安然无恙，倒把我这个啥也不知道，啥也没看见的人关了起来。王八蛋警察把我的肋骨打断了好几根，踢我的腰，还踢我的睾丸，弄得我尿了好长时间的血。”

“不过，您总算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又重操旧业了，而现在您成了哈乌哈的一个富户，谁不羡慕您呢？堂·埃塞基耶尔，您别这样，别发火了，忘掉它吧！”

“我怎么能忘记呢？您这不是就来找我的麻烦吗？叫我说那些我一无所知的事。”他大声叫着，仿佛要扑向我，把我撕碎似的，“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吗？知道得最少的人成了最倒霉的，这还不够吗？”

玛伊塔在走廊里徘徊了一会儿，当他肯定街上没有任何人时，便把门打开，出去后顺手把理发店的门关死。广场上空无一人，微弱的晨曦仅仅能照清脚底下那么大一块地方。他走到一条凳子前，里克兰的人还没有到。他坐在凳子上，把箱子放在双脚中间，把嘴巴缩进毛衣领口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一定得像部机器一样。他记得在服兵役前，参加军事训练时曾听到过这样的话：“一部活的机器人，既不能迟到也不能早到。尤其是一个战士，从不允许怀疑，严格地执行命令，就像一部搅拌器或者一部卷扬器那么准确无误。”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今天面临着的最严重的考验，将能通得过。后面的考验相对来讲就容易些，这样就一步步接近最终的胜利。他听到鸡鸣，身后花坛的草丛中，青蛙在哇哇地叫个不停。他

们迟到了？里克兰的卡车应该停在圣伊莎贝尔广场，所有往市场拉东西的卡车都停在那里。在那里，他们分成小组，各自执行自己的任务。真糟糕：他连将要与他会面的那两个同志的名字都不知道。会合后他们一起去监狱，然后再到电话局。“今天是星期几？”“圣埃得蒙多·丹特斯。”他的大半个脸缩在毛衣领口里，想起了《基督山伯爵》里面的这两句口令，情不自禁地笑了。就在这时，圣何塞中学的一个学生准时到达了，他叫费利西奥·塔皮亚，穿着草绿色的卡其布军衣、军裤，灰色的毛衣，腋下还夹着一本书。“他们来帮助我把革命搞起来，尔后还去上学。”玛伊塔想。“咱们得抓紧时间，否则就赶不上第一节课了。”每一个小组都有一个圣何塞的学生归他们指挥，叫他们当通信员，以便及时进行联络。一旦每个小组都切断敌人的联系，他们就返回自己的家。

“里克兰的人迟到了。”玛伊塔说，“山上的路会不会堵塞了呢？”

男孩子抬起头看看天空说：

“不会，没有下雨。”

在这个季节不大下雨，泥石流或者河水不可能封住公路，并且事先已经说好，万一公路被堵塞，里克兰的人就从山上步行到盖罗。学生费利西奥用羡慕的眼神看着玛伊塔。学生年纪很轻，上唇上刚开始长汗毛，不过两颗獠牙很难看。

“你的同伴们也和你一样准时吗？”

“罗贝托已经在奥费利纳托街和梅基亚德斯街的十字路口那儿了，我看到他们朝圣伊莎贝尔广场走去。”

费利西奥·塔皮亚很流利地回答了玛伊塔的问话，而这时玛伊塔又懊悔刚才没有最后检查一下冲锋枪。枪就在箱子里，他心里老是想着它。头天晚上，在理发店时他给冲锋枪

上了油，睡觉前他一遍又一遍地打开，关上保险，检查枪膛里的子弹。还需要检查一遍吗？广场上已经有人在活动了。头戴披风的妇女们走向教堂，不时有满载货物的卡车驶过。现在是六点差五分，玛伊塔站起来提起箱子。

“你快跑到伊莎贝尔广场去，如果卡车到了，你就告诉我小组的人，让他们直接去监狱好了。六点半，我给他们打开大门。懂了吗？”

“我一向直言不讳，有什么说什么。现在我对您说，那事，巴列霍斯不应该负责，那个外乡人玛伊塔也不应该负责，全怪乌维鲁斯。”堂·埃塞基耶尔用他那黑乎乎的手不停地挠满是紫葡萄颗粒的脖子，然后又叫道：“对那天上午发生的事，他应该负责，对没有发生的事他也应该负责，因为他是肇事者。只要找他了解就行了。那个狗家伙对那段往事了如指掌。”

这时，一家电台正在用英语播放新闻，声音大极了，埃塞基耶尔不得不停下来。这家电台被“圣何塞学校战斗队”征用了，正在对美国海军、空军广播。

“这个讨厌的美国佬电台，他妈的！”堂·埃塞基耶尔狮子般地吼着，用双手把耳朵捂住。

我对他说，我感到奇怪，到目前为止我在大街上还没有看到一个美国海军呢，所有巡逻队都是秘鲁士兵和警察。

“他们可能一个个都喝得酩酊大醉；要不，正在休息，干累了。”他如同一头野兽一样咆哮着，“美国佬把哈乌哈市全都腐化了，甚至连修女也让他们变成妓女了。这是必然的，您不信？我们这里，大家都快要饿死了，而他们有的是美元，对不对？听说连喝的水他们也从美国空运来。说什么他们的钱会促进我们地方商业繁荣，见他妈的鬼去吧！比方说，就没

有一个美国佬买我的东西。他们只买柯卡因，买那玩艺儿他们从不吝惜钱。说什么来和共产党人斗，骗谁呀？他们是来玩弄我们哈乌哈的姑娘的。他们之中甚至还有黑人，去她妈的蛋吧！”

虽然我正在聚精会神地听堂·埃塞基耶尔怒气冲冲地讲，但另一方面，没有一分钟我忽视过玛伊塔。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那天一大早，他拎着箱子，箱内装着一支冲锋枪，正在阿尔丰索·乌加特大街上走，那时候的哈乌哈既没有美国海军陆战队，也没有革命者。玛伊塔是不是为那姗姗来迟的卡车担忧呢？肯定是这样。虽然已经预先做了安排，但是，要是卡车迟到该怎么办？在他们的行动计划尚未付诸实践之前遇到这种麻烦事，不能不叫他提心吊胆。尽管那个计划几经推敲，仍有许多不完美之处，但我认为，那天上午所有参加革命的人都应在十点左右到达监狱这一点却是人人都明白无误的，然后离开哈乌哈朝莫里诺斯桥进发。往后他们有什么计划，我是越弄越糊涂了。我逐渐倾向于相信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也许就巴列霍斯和乌维鲁斯，也许再加上玛伊塔，也许只有少尉巴列霍斯一个人——确切地知道那个计划的全部细节。而不让其他人知道全部计划这种做法，给他们带来的危害无法估量。当玛伊塔在他左边看到监狱的砖坯围墙、瓦顶和屋檐时，又作何感想呢？而与此同时，在他的右边，在乌维鲁斯家的透明窗帘后头，有许多人正在那里注视着他。他们有的头一天晚上就到了，有的几个小时前刚到达，他们是矮子乌维鲁斯、奥罗亚的同志、卡萨帕尔卡的同志及莫罗科恰的同志。告不告诉他们说卡车迟迟未到呢？不应该告诉，别用这种话扰乱他们的军心。即使不说，他们一看到他只身一人来了，也就会猜出卡车肯定没到。假如里克兰的

同志们再过半小时能够到达的话，他们还能赶上参加共同行动。如果来不了，那就与所有的人在盖罗会合。玛伊塔来到监狱的石头墙门口，正如少尉说过的那样，门口没有站岗的。铁门一开，巴列霍斯就出来了。他用一个指头放到嘴边，示意不要说话，抓住玛伊塔的胳膊把他拉进门。巴列霍斯惊奇地看了看，确实就玛伊塔一个人单独来了，然后把大门关上。巴列霍斯打了个手势，让玛伊塔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然后立即消失了。玛伊塔看了看门廊，它用柱子撑着，对面的屋子上写着“拘留室”。院子里有不少的欧洲酸樱桃树，叶子细长，果实累累。玛伊塔现在所在的这间办公室里，墙上挂着一个国徽，一块黑板，有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办公室只有一个窗户，面对大街。玛伊塔手里还在拎着箱子，恰巧巴列霍斯回来了。

“我想看看是不是有人发现了你。”巴列霍斯小声说，“卡车没有到吗？”

“看来还没有到。我派费利西奥去等着，并且让他告诉我小组的人，六点半赶到这里。里克兰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吗？”

“没有问题。”巴列霍斯说，“你就藏在那里等着，别出声。”

少尉巴列霍斯所表现出来的沉着坚定，胸有成竹，大大地感染了玛伊塔。巴列霍斯身着军裤，脚蹬皮靴，还套着一件带领的黑色毛衣，没有穿军官服。玛伊塔走进刚才巴列霍斯指给他的屋子，他觉得这里倒像个仓库，墙壁是白色的。那个东西大概是武器架子，步枪就放在架子上的空隙里。一关上门，室内便黑乎乎的。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箱子打开，因为锁有点不大好用了。他取出冲锋枪，又把子弹装进子弹袋内。刚才还以最大音量广播的那个电台，现在鸦雀无声了。里克兰的卡车发生了什么事呢？

“卡车很早就到达了预定的地点——圣伊莎贝尔广场。”堂·埃塞基耶尔大笑起来，仿佛从他嘴里、眼睛里和耳朵里喷出毒药一样，“当监狱出事时，卡车早就走了。不过，卡车没有去盖罗——他们以为卡车应该开到那里——而是去了利马。卡车既没有拉共产党分子，也没有装他们盗窃的武器，压根儿就没拉这类东西。那么卡车拉的什么呢？拉的蚕豆。是的，是蚕豆。真他妈的见鬼：一辆革命的卡车，当革命开始的时候，它倒满载着一车蚕豆向利马开去了。您肯定要问我，拉的那一车蚕豆是谁的呢？”

“我不问您，因为我知道您会对我说是矮子乌维鲁斯的。”我对他说。

“您不问问是谁开的车？”他说着举起拳头，在空中挥舞着，继尔指着广场，“我看到他打这儿开过去的，我认出来了，就是他，那个叛徒。我见他双手把着方向盘，戴着一顶鸡奸分子喜欢戴的蓝帽子。我看到车上拉的蚕豆，出了什么事了？又要发生什么事呀？那个龟儿子欺骗了巴列霍斯，欺骗了那个外乡人玛伊塔，也欺骗了我。”

“堂·埃塞基耶尔，请您再告诉我一件事，然后我就让您安静。为什么那天上午您没有去？为什么您若无其事地待在您的理发店里？至少您应该躲起来呀？为什么不躲一下？”

听了我的问话，他仰起头气愤地瞟了我一眼，我发现他这张皱巴巴的脸更难看了。他抠抠鼻孔，挠挠脖子，又在那里睁着眼睛说：

“干吗我要躲藏起来呢？我对他们什么也没许诺。真他妈的见鬼！”

“堂·埃塞基耶尔，堂·埃塞基耶尔，”我好言相劝，“这

事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秘鲁快完蛋了，人们都在想怎么样才能活下来，这场战争已经不光是在咱们秘鲁人之间进行，你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害死，或者被冷枪打死。事情过去了这么久，谁还往心里去呢？请你告诉我实话，帮助我弄清事实真相，反正早晚咱们也得在这场混战中丧命，秘鲁人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厄运。电话线是您帮着掐断的，出租汽车是您帮着租的，说是要在莫里诺斯烤肉野餐。您还记得当时说好几点钟应该到电话局吗？电话局开门五分钟以后就进去。又说好让出租汽车在阿尔丰索·乌加特街与拉马尔街的十字路口等人，这时玛伊塔小组应赶到那里把出租车劫持下来。可是，您既没有租出租汽车，也没有去电话局，而当圣何塞学校的那个学生来问您出了什么事没有，您对他说：‘啥事也没出。一切都完蛋了。你快去上学吧，把这事忘掉，你就说不认识我。’那个学生叫德莱斯福罗·萨利那斯，他现在是省体育部主任，堂·埃塞基耶尔。”

“一串谎话！这是乌维鲁斯诬蔑我！”他大声吼叫着，气得脖颈上的青筋都粗了起来，“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躲藏起来？为什么要溜掉呢？您滚开吧，我不想见您，滚吧！造谣诽谤！吃您的屎巴巴去！”

玛伊塔此刻正守候在半明半暗的武器库中，双手端着冲锋枪，他什么声响也没有听到，除了从门缝中透进的两束光线而外，什么也看不见。然而他想象得出，现在巴列霍斯正走进那栋住有十四名狱警的营房，他雷鸣似的叫醒他们：“注意！擦洗毛瑟枪！”因为瓦恩卡约军分区的兵器部长刚刚通知他，今天一早来检查他部下的武器。“当心，上面来时，你们要表现好点，别让上面挑出我们的毛病来。”陆军少尉巴列霍

斯没有少挨兵器部长的训斥。狱警们的步枪和他们每人的九十发子弹都将送到武器库。“到院子里集合！”这时玛伊塔看得清巴列霍斯了。队伍已经开步走了，并且武器也上了子弹。开始行动了。对，就这么计划的。里克兰的人到达了没有？玛伊塔从门缝里往外窥视，他正等他们把武器和子弹送到对面的武器库去，他们一个一个地往里走，其中有一名狱警叫安托林·托雷斯。

托雷斯是一名退休的共和国警察，家就在曼科·卡帕克大街上，位于监狱与堂·埃塞基耶尔的商店之间的半道上。我不得不离开他的店堂，要是再待下去的话，他很可能气急了给我几拳，要不也会把他气得中风。我坐在庄严肃穆的哈乌哈广场上（现在它变得很难看，市政府大楼和州政府大楼所在的街角处架起了铁丝网），回想着安托林·托雷斯，今天上午我曾和他谈过话。自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雇他当向导和翻译（他的西班牙语和克丘亚语讲得都很好）以后，他的日子过得很舒坦。他有一个小庄园，但是战争把他的庄园给毁坏了，他那时都快饿死了，美国佬来了后，他才改变了穷困潦倒的状况。他的任务就是陪同美国人到郊区巡逻。他明知这个差事弄不好会丢脑袋的，很多哈乌哈人见了他都把脸背过去，他家房子的墙上写了“叛徒！主持正义的革命者必将处死你！”之类的标语。从安托林对我说的话中以及堂·埃塞基耶尔的那些粗俗的话语中我得知，美国海军陆战队与哈乌哈人的关系很坏，很紧张。甚至那些憎恨起义军的人对这些外国人也怀有敌意，他们不理解连当地那些富户也少吃缺穿，而他们美国人则应有尽有。安托林·托雷斯年近花甲，大腹便便，脖颈又粗又短，像头公牛。他本是阿亚库乔州的坎加约人，大部分时间在哈乌哈居住，他的西班牙语讲得很流利，就像他

的克丘亚语那么自然流畅。他对我说：“共产党人说要把我宰了，宰就宰吧！吃饱了，喝足了，抽够了，死也值得。”他讲起话来语调抑扬顿挫，宛如一位演说家。二十五年前的那一天，八点钟轮到他在门口站岗，接替瓦斯卡尔·托莱多。但是瓦斯卡尔不在门房里，而是和其他人在里面擦洗武器，准备军区兵器部长来视察。陆军少尉巴列霍斯正在那儿督促他们快点擦，安托林·托雷斯感到奇怪，说了句怀疑的话。

“不过，托雷斯先生，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检查武器有什么奇怪的？”

“怪就怪在少尉那时肩上挎着自动步枪。他全副武装干什么？为什么我们必须把武器放到库房里呢？‘这是非常奇怪的，我说，上士。上面来视察武器时，哪一个狱警把他的枪放到过武器库去？打什么时候兴起的这个规矩？’‘别胡思乱想了，阿托林。你这样不利于提升。’上士对我说。我乖乖地服从了，把武器擦好后，连同我那九十发子弹，一起放到库房里去了。然后我到院子里集合。不过，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头，当然不是意识到后来发生的那事。我觉得罪犯们会闹事，那时牢房里关了五十个犯罪分子。他们会不会因此而越狱逃跑呢？我也说不准。”

“到时候了。”玛伊塔想，同时他把门推开。他的腿麻木了，因为坐在那里半天也没动弹。他的心脏如同打鼓似的扑通扑通地跳着，他知道决定性的时刻终于到了。他挎着上满油的冲锋枪来到院子中间，站到狱警面前，挡住了武器库的门。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句他应该说的话：

“希望谁也不要逼我开枪，因为我不想枪杀任何人。”

巴列霍斯也用枪对着他的下属。十四个狱警个个瞪着惺松的睡眼看看少尉，又看看玛伊塔，他们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睡醒了没有？是不是在做梦？这是真的还是虚幻？

“就在那时，少尉也对你们讲话了，对吧？您还记得他对你们说什么了？”

“‘我不想把你们拉进去，我要造反，我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安托林·托雷斯学着少尉的腔调说，他的喉头一上一下很快地移动着，“‘愿意跟我干的，就站出来。我是为穷苦人，为受罪的人民才起来造反的。头头们欺骗了我们。您呢，付款员上士，星期天用我那半个月的工资给所有的人买啤酒喝。’少尉一边讲话，而那个从利马来的家伙用冲锋枪对着我们，他把进武器库的路堵死了。我们就像印第安人那样乖乖地听他摆布。那事之后，上司审查了我们两个星期。”

玛伊塔由于过于激动，没有听清后来巴列霍斯对他们说什么。“像机器一样，像士兵一样。”少尉没等他们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像赶牲口那样把狱警们轰进了营房。玛伊塔看到狱警们进去后，少尉把门锁上了。然后，少尉迅速而准确地把冲锋枪从右手换到左手上，取出一把大钥匙，打开了一扇栅门。乌丘巴木巴的人在那里面吗？里面的人肯定听到并看见刚才发生的一切了。但是，在长满欧洲酸樱桃树的后园里的犯人们却蒙在鼓里，一无所知，他们隔得太远。玛伊塔仍站在武器库那里，他看到有两个人跟在巴列霍斯身后出来了。噢！原来就是他们。玛伊塔到目前为止，还仅仅只知道他们的名字而未曾谋面呢。哪一位是孔多里？哪一位是塞努·贡萨雷斯？玛伊塔还未来得及问，就听到巴列霍斯和

那个留长头发的、年轻一点的白人争论起来。虽然他们曾经对玛伊塔说，东部山区的农民大多数皮肤白净，头发偏黄，可是他感到惊奇的是，这两个领导阿伊娜庄园的印第安农民抢占土地的鼓动家就跟两个白人一模一样，其中一个脚穿凉鞋。

“你这是借口，你是不是要临阵后退？”他看到巴列霍斯把脸贴近其中的一个说，“就在此刻，当我们要点火的时候，你往后缩？”

“我不是往后缩。”那个人一边后退一边咕哝，“我只是因为……因为……”

“是因为你是个胆小鬼，塞努·贡萨雷斯。”巴列霍斯大声说，“你不会有好下场的。滚回囚室去，去让他们判你的罪吧！关你几年，把你关到弗隆东监狱，你会烂死在那里的。我为什么不一枪毙了你？去你妈的蛋！”

“等一等，停一下，我们好好谈谈，但不要吵。”孔多里出面调解。他就是那位穿凉鞋的，玛伊塔见到他很高兴，因为他这时发现孔多里的年龄与自己差不多一样大。“你别发火，巴列霍斯。让我单独和他谈谈。”

陆军少尉三窜两跳地一下子来到玛伊塔身边。

“到底不干了。”巴列霍斯说，但他已不像刚才那么气势汹汹，不过令他失望，“昨天晚上还同意哩，到了此刻他倒说没拿定主意，说什么最好他就待在监狱里，尔后看看再说，这小子是害怕了，并不是拿不定主意。”

什么事情促使这位乌丘巴木巴的年轻领导人临阵退却了呢？是不是当他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门槛时觉得他们人员太少了？是不是他怀疑就凭他和孔多里两人无力发动他们乡的农民群起而造反呢？他预感到必然失败吗？或者他仅仅因为惧怕去屠杀别人抑或自己被杀害？

孔多里和贡萨雷斯两人讲话时声音很低。玛伊塔只能听到片言只语，有时看到他们俩用手比比划划，孔多里还抓着贡萨雷斯的胳膊。孔多里可能还有点威信，虽然年轻的领导人辩白，不过总是显得毕恭毕敬的。不多一会儿，他们俩一起走了过来。

“行了，巴列霍斯。”孔多里说，“行了，他干了，什么原因也没有。”

“塞努·贡萨雷斯，这样就好。”巴列霍斯把手伸给他，“刚才我态度急躁，请你原谅。你不恨我吧？”

年轻人点点头。巴列霍斯握住他的手时又重复说：“不恨就好，这一切都是为了秘鲁。”从他的表情上看，塞努·贡萨雷斯与其说是被说服了毋宁说是他服从他们了。巴列霍斯又转向玛伊塔：

“把枪支都搬到出租车上去。我去看看罪犯们。”

巴列霍斯说完，就朝栽满欧洲酸樱桃树的后院走去。玛伊塔跑向门口，从了望口向外望去，他既没有发现出租车，也没有看到乌维鲁斯，更没有见到奥罗亚的矿工们，仅仅看到圣何塞中学的一帮中学生，走到前头的是科尔德罗·埃斯皮诺萨，他是学生们的头头。

“你们在这时干什么呢？”玛伊塔冲着他们说，“为什么你们不到各自的岗位上去？”

“因为在那些岗位上一个人也没有，因为所有的人都无影无踪，不见了。”科尔德罗·埃斯皮诺萨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无可奈何地哭笑着说，“因为我们等得不耐烦了，叫我们去给谁当联络员呢？我应该到警察局去。很早很早我就到了那里，什么动静也没有。过了一会儿，埃尔南多·瓦萨斯基切过来

对我说，乌维鲁斯先生不在家，哪里也找不到。有人看见他一清早就开着他的车朝中央公路去了。紧接着我们又得知，里克兰的人也没见影，奥罗亚的矿工没有来，或者半路上又返回了。他们都吓破了胆！我们便集中到武装广场上。我们一个个都垂头丧气，只好等着到时间就去上学。他们骗得我们好苦啊！把我们大家都晾起来了。后来费利西奥·塔皮亚来了，他说，那个利马人等里克兰的人没有等着就到监狱来了。因此我们就到监狱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巴列霍斯和玛伊塔把狱警们都关了起来，缴了他们的武器，并且把孔多里和塞努·贡萨雷斯放了出来。您能想象得出，这种情况有多么不可思议？”

科尔德罗·埃斯皮诺萨法学博士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怎么能叫人思议呢？他们占领了监狱，拥有十四支步枪，一千二百发子弹，然而，他们却成了孤家寡人，因为发誓要参加革命的三四十个人中，竟没有一个露面。玛伊塔从了望口处发现了那七个穿军服的中学生以后，是不是就这么想的？

“谁也没有来？一个也没有来？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来了。”那个头顶上留着一半头发的孩子心灰意懒地说。玛伊塔想起乌维鲁斯介绍这个孩子时这样说过：他叫科尔德罗·埃斯皮诺萨，是他们年级的级长，班上的第一名，脑筋灵极了。“不过，别的人看来溜号了。”

是惊愕、恼怒还是预感到大祸临头？他，玛伊塔感到渺茫吗？或者更确切地说，虽然他对眼下发生的这一切还难以证实，但从今天清晨他在广场上没有等到里克兰的人就已经感到惧怕了？或者自从在利马托派革命工人党的同志们决定不与他合作，他去找布拉克盖尔想争取共产党的支持时起，就

已经觉得他将做的一切是毫无结果的？虽然他没有明确说出，但从某一时刻起，他已经预感到将会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吗？革命直到此刻还没有开始吗？不，玛伊塔，革命已经开始了，难道你还没有觉察到已经开始了吗？

“就为这个，我们才在这里呢！就为这个，我们才来到这里。”科尔德罗·埃斯皮诺萨喊叫道，“难道我们不会从头来吗？”

玛伊塔看到圣何塞中学的学生们都围着他们的级长科尔德罗，便点头表示支持他们的话。玛伊塔此刻唯一猜对了的是：过路人以及邻近的居民感到惊奇：为什么在监狱门口聚集着那么多学生？

“我事前并未和我的同伴商量，是我自己想来帮忙的。”科尔德罗·埃斯皮诺萨提醒玛伊塔，“是我忽而想到应该这么做的。”他看到可怜的玛伊塔脸上流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同时又发觉其他的同伴们没有来才这样解释道。

我们俩这时就在胡宁街他的办公室里，这条街上，律师事务所充斥每个角落。虽然最近几年，因为战争和自然灾害，本地的诉讼事件少多了，但是律师业仍然是哈乌哈市最受欢迎的行业。不久前，每当一个小孩出生时，人们还都到律师那儿办理出生公证，然后拿上公证书心满意足地回家。什么事都要通过律师办，这对当地人来说，如同爱好足球，喜欢过狂欢节一样必不可少。在这众多的律师中，那位曾经是圣何塞中学级长以及模范学生的科尔德罗·埃斯皮诺萨算得上一颗明星。（他每周在圣何塞中学作两次有关政治经济学讲座，后来因为战乱停止了。）他是一位潇洒自如而又很风趣的人物。他的办公室挂满了他参加各种会议的证书、奖状，他

是市议会议员、哈乌哈“狮子俱乐部”主任、东部公路筹建委员会主任，还有其它许多头衔。我找过许多人谈话，但谈起往事时，我觉得数他最客观公正又不夹带个人感情色彩。与他那优雅洁净的办公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走廊的地面上有一个凹坑，走廊的一堵墙成了断垣残壁。他领我进去时指着上述两处地方说：“这是恐怖分子炸坏的。我有意留着，以便每天见到时提醒自己，要谨慎小心，因为我还不想让脑袋搬家。”然后又用诙谐的语气说，恐怖分子在他家里扔的那两颗炸弹威力更大：整个房子都炸坏了。“把我的一个六十岁的女厨子炸死了，幸好我妻子和我的孩子们那时不在哈乌哈。”直到现在，他的妻室儿女仍然住在利马，并且准备移居到外国去。他留下来，待处理完事情以后也将到外国去。他说，事情到了现在这种地步，又何必要在此地冒生命危险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到来后，安全问题好点了吧？更糟糕。外国军队待在这里，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居民们出于反抗，倒援助起恐怖分子来：隐藏他们，明明看到他们搞破坏而不告发。“这种情况有点像居民们对秘鲁游击队那样，古巴和玻利维亚的国际纵队打进来时，人们转而同情并支持起游击队来，因为国际纵队与游击队也发生过冲突。民族主义比任何思想都根深蒂固，谁都知道。”我对这位前中学级长感到由衷地钦佩，他讲起这些事情来那么自然，既不矫揉造作，也不趾高气扬，而是略带风趣。

“他们一听我说，我们是自觉自愿地去的，个个都欣喜若狂。”科尔德罗继续说，“那时我们七个人情同手足，亲如骨肉。和现在比起来，那真是儿童们的一场闹剧，是吧？”

“对，对，我们取代他们那些没来的人。”

"给我们开开门，让我们进去。我们能行，真的。"

"是的，我们能行，玛伊塔，我们能行！"

"我们大家都是革命分子，让我们代替他们好了！"

玛伊塔看着他们，听着他们嚷嚷，脑袋嗡嗡作响，思绪纷乱。

"那时你们有多大岁数？"

"我和瓦萨斯基都十七岁，"科尔德罗·埃斯皮诺萨说，"其他几个十五六岁。算是幸运。我们不到法定年龄，宪法无法判刑，把我们送到主管青少年的法官那里，事情就好办多了。像我这样一个人，曾是秘鲁武装斗争的先驱，而现在竟成了恐怖分子袭击的对象，你不觉得矛盾吗？"

说完，他耸耸肩膀。

"我想，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玛伊塔和巴列霍斯已经不可能往后退缩了。"我对他说。

"往后缩还是可能的。巴列霍斯可以把关在营房里的狱警放出来，骂他们一顿：事实证明你们都是些废物，一些拖拖拉拉的娘儿们，要是遇上造反分子袭击监狱，你们屁事不顶。我这是有意考验你们，一个也没经得起考验，都他妈的是些笨蛋。"科尔德罗博士说着递给我一支香烟，然后把他的那一支塞进烟嘴里，"这样，他们都将哑口无言，我敢肯定。他们可以叫我们上学去，再把贡萨雷斯和孔多里送进牢房，然后玛伊塔可以逃之夭夭。即使到了那时，还是可以挽回的。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不论是玛伊塔，不论是巴列霍斯，他们俩都从来不知道退步。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一个是四十多岁，一个是二十多岁，他们还不如我们那些年轻小伙子们呢。"

这就是说，是玛伊塔首先同意那个浪漫而不合情理的建

议的。虽然他曾经犹豫过，不知如何是好，但那就是几秒钟的事，继尔便仓促决定了。玛伊塔给他们打开了大门，并且说：“快，快点进来！”这时，圣何塞那帮学生蜂涌而入。玛伊塔又朝街上看了看：街上既没有汽车也没有行人，所有的房屋都紧闭大门。他喜出望外，血管里的血液沸腾起来，没有理由灰心丧气。最后一个孩子进来后，他马上把门关紧。学生们就在他面前，七张焦急期待、兴奋激动而稚气的脸。孔多里与贡萨雷斯那时每人手中握着一支毛瑟枪，看见那七个学生，感到莫名其妙。说话间，巴列霍斯也从长满欧洲酸樱桃树的后院来了，他把其他在押犯人巡视了一遍。玛伊塔迎上去对他说：

“乌维鲁斯和其他的人都没有来。不过，现在有一些小伙子们志愿跟我们干，他们可以代替那些没来的人。”

巴列霍斯就此住手了没有？玛伊塔看清了他的脸色吗？是哭还是笑？玛伊塔看到那位年轻的陆军少尉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表现得冷静吗？玛伊塔只听到他面对自己惊讶地反问：“乌维鲁斯没来？埃塞基耶尔也没来？‘鹦鹉’也没有来？”

“同志，我们不应后退。”玛伊塔拽着他的一只胳膊摇晃着说，“我不是教过你，我不是提醒过你吗？要防止发生意外。事到如今，不能后退。我们不能后退。收下这些小伙子吧！他们是自发而来的，是革命青年，你还要考验他们什么？老弟，难道我们要后退吗？”

玛伊塔一边说着，自己的信念也更坚定，同时“像一部机器，像一名士兵”的命令声又响在他的耳际。巴列霍斯默不作声地听着，他难道是在犹疑不决？他是不是在考虑玛伊塔说的跟自己的想法是否吻合？然而，当玛伊塔说完时，只

见少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走向正在听他们谈话的那些圣何塞中学的学生。

“这样很好，我很高兴。”他一边说，一边来到他们中间，“我很高兴，因为这样我才知道有的人，比方你们大家，自愿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你们是好样的！小伙子们，欢迎你们参加战斗。我要和你们一个一个地握手，表示欢迎。”

实际上，他开始拥抱他们，并且紧紧地把他们搂在怀里。玛伊塔也走过去拥抱他们，他的眼睛模糊不清，看到塞农·贡萨雷斯和孔多里也夹在里面，他激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有几个小伙子哭了，泪珠沿着面颊往下淌。他们一边拥抱少尉巴列霍斯、玛伊塔、贡萨雷斯和孔多里，一边自己也互相热烈地拥抱。“革命万岁！”一个小伙子喊道，而另一个则跟着喊：“社会主义万岁！”巴列霍斯不让他们喊下去。

“或许我一生中从没有像那次那样幸福激动过。”科尔德罗·埃斯皮诺萨博士说，“那真叫美！又是那么纯真，充满幻想。我们仿佛觉得一下子连胡子也长出来了，我们都长得高大而壮实了。您知道，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一个人去逛过妓院，至少，我还是个童男呢，但就在那时，我觉得自己遗精了。”

“你们当中有人会使用武器吗？”

“只是实行预备役军训时，给我们上了几堂射击课，也说不定有人打过猎枪。不过，他们就在当场弥补了我们的不足。巴列霍斯拥抱了我们以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让我们看看毛瑟枪是什么样子。”

少尉在给学生们讲解怎样使用步枪时，玛伊塔就给孔多里和塞农·贡萨雷斯解释所发生的事。孔多里与塞农得知革命分子就是他们几个人，再加上那几个乳臭未干的男孩子以

后，既没有洗手不干，也没有表示气愤。他们俩很严肃地倾听他说完，连一个问题也没有提。巴列霍斯命令小伙子们去搞出租汽车，费利西奥·塔皮亚和瓦萨斯基切立即动身跑着出去了。这时，巴列霍斯把玛伊塔和那两个农民集中起来，修正了行动计划。兵分两路：一路去夺取警察局，一路去拿下宪警队队部。玛伊塔一边听巴列霍斯说，一边用眼角的余光观察那两个农民有何反应。贡萨雷斯没有反问说：“你看，我犹豫不决不是没有道理吧？”没有，啥也没有说，只是手持武器在那里不可思议地听着。

“出租车来了！”彼利科·特莫切从大门口喊道。

“我从来也不是真正的出租车司机。”尾中先生肯定地对我说，同时忧伤地指指他铺子里那些空荡荡的货架子，以前上面总是摆满了食品及日用百货。“我一直是这个店的主人和管理员。我说出来也许您不相信，我这个店在胡宁州是货物最齐全的百货商店。”

尾中先生脸色蜡黄，一副愁苦相。他的商店不知被造反分子抢劫过多少次，他是他们解馋的一块肉。“抢了我八次。”他对我说，“最后一次就在三个星期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来到此地了。美国佬来了以后，我照样被抢劫。他们六点钟进来的，化装成平民百姓，把门关上，对我说：‘狗东西，你把粮食藏到哪里去了？’‘藏起来了？那你们找吧，找到什么拿什么。正是由于你们的罪孽，我才变得一无所有。’当然喽，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你们不想把我老婆带走？’就剩下她了，他们还没有给我抢走。我已经不害怕他们了。您知道最后一次我对他们说什么吗？‘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也杀死？你们行行好，把我宰了吧！我已经活够了。’‘我们不乐意为宰一

只兀鹫而浪费一颗子弹。’其中一个说。这一切就发生在下午六点钟，哈乌哈大街上还有警察、部队及美国海军陆战队。这一切不正说明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吗？”他喘了一口粗气，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朝他老婆看了一眼，她靠在柜台上，两只眼睛紧贴在报纸上。他们俩都到了耄耋之年。

“她一个人照看店里就够了，我有时候开上我的福特牌小汽车拉几个客。”尾中先生继续说，“就因这个，我倒霉了，陷到巴列霍斯的事情里面，因此，我的车也弄坏了，花了不少的钱修理。因此，我的头也撞坏了，划了一条大口子，把眼眉也划破了。因此，我被捕了，经过调查，他们发现我不是同谋，而是牺牲品。”

我们在他的败落百货店里站着，中间隔着柜台。尾中太太在柜台的另一端，有人进来买蜡烛或者买烟，她就把视线从报纸上挪开，事实上店里也就数这两样东西最多。尾中家族是日本籍，不过，哈乌哈人都叫他“中国人”，他并不在乎这个称呼。他与科尔德罗·埃斯皮诺萨博士截然相反，他对不幸，采取的不是哲人的态度，他显得萎靡不振，怨天尤人。我在哈乌哈找了几十个人了解情况，就他和科尔德罗敢于公开指责“恐怖分子”，而其他的人，虽然有的受到过“恐怖分子”的侵害，但他们对革命分子却保持沉默。

“我刚把店门打开，塔皮亚家的小儿子就闯进来了，就是住在维亚雷阿尔街的塔皮亚。他说：‘快点，有点急活，尾中先生，把一个生病的太太送到医院。’我把车发动起来，塔皮亚那小子就坐在旁边，他演戏似的不断地对我说：‘快点，太太快要咽气了。’在监狱对面有一辆出租汽车，车上装了一些步枪。我把车停在它后面，问巴列霍斯少尉：‘谁是晕过去的太太？’他根本就不理睬我。就在这时，利马来的那人，他叫

玛伊塔，对吧？用枪口对着我的胸口说：‘如果您不想找麻烦的话，就乖乖地服从。’我吓得尿都撒到裤筒里了。请原谅我的粗言俗语，那时，我确实害怕。对，我首先看到的是他们。我多傻呀！那时，我还是有点钱的。我完全可以带上我的老婆，到外国去安度晚年嘛！”

把枪和一部分子弹装上车以后，孔多里、玛伊塔、费利西奥·塔皮亚、科尔德罗·埃斯皮诺萨、特奥菲洛·布埃塔斯都上了车。玛伊塔命令尾中出发：“你要是敢反抗，我就开枪毙了你。”他坐在后排，只见他嘴唇干裂，然而，他的手心在出汗。挤在他旁边的是科尔德罗，而特奥菲洛坐在武器堆上。前排有塔皮亚和孔多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撞车，也没有压死任何人。”尾中先生把声音放低了说，“我认为他们是从狱中跑出的小偷、刽子手、凶手呢！可是，为什么少尉和他们一在起呢？塔皮亚的小儿子以及科尔德罗博士在他们当中做什么呢？他们对我说‘革命’，又说什么我不懂。‘这东西什么样子？怎么样吃？’他们让我把他们拉到曼科·卡巴克的宪警队。利马来的那人、孔多里及塔皮亚那小子在那儿下了车，并吩咐另外两个家伙监视着我。玛伊塔对他俩说：‘他要逃跑，就把他毙了。’到了后来，圣何塞的学生们说那是和我闹着玩的，他们从来也没想到过要开枪打死我。然而，现在谁不知道，小孩子们也用斧头、石头、刀子杀人。我说的不对吗？总之，有好多事情现在我们知道了，而那时没有人知道。‘孩子们，老实点，可别走了火，那不是好玩的。你们了解我，我连个苍蝇也没有打死过，我一向相信你们。’‘他们为什么叫我干那个？另外，里面要发生什么事呢？那些家伙到里面做什么去了？’‘社会主义革命，尾中先生。’科尔德罗对我说，后来他的房

子叫人给烧了，还差点把他的律师事务所炸掉。‘社会主义革命！’‘什么？什么东西？’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到了那时我才明白过来，原来四个大人加上七个中学生劫了我的车，是要去干社会主义革命。唉，我算倒霉了！”

宪警队门口并没有站岗的卫兵，玛伊塔对孔多里和费利西奥·塔皮亚打了个手势：他先进去，他俩作掩护。孔多里看上去还沉着，可是塔皮亚吓得脸色煞白，玛伊塔发现塔皮亚握着枪的双手由于过于用力都变成紫色的了。玛伊塔手持开着保险的冲锋枪，闯进了一个双人房间，喊道：

“举起手来！要不我就开枪了！”

在这个若明若暗的房间里，有一个穿着裤衩和背心的人，玛伊塔进去时，他正在那里打哈欠。听得一声令下，他吓得目瞪口呆，发现玛伊塔身后跟着的两个人，孔多里和塔皮亚正用冲锋枪对着自己时，慌忙举起了双手。

“你们看着他。”玛伊塔说完又跑到后面去了。穿过一个狭窄的过道，来到一座小土院跟前，他看见两个宪警只穿着裤子和鞋子，光着上身，正在一个盆子里打着肥皂洗脸、洗胳膊，其中一个对他笑笑，他把玛伊塔当成自己的同伙了。

“举起手来！要不我就开枪了！”玛伊塔说，但他并没有喊叫，“举起手来！他妈的！”

两个宪警乖乖地举起了双手，其中一个由于慌乱，把盆弄倒了，洒了一地水。“吵什么呀！吃你妈的屎巴巴去！”一个睡意正浓而没有好气地骂道。里面有几个宪警呢？孔多里站在玛伊塔身边，玛伊塔小声对他说：“你把这两个带走！”但眼睛始终警觉地盯着发出声音的屋子里面。他迅速穿过小院，弯着腰从一棵藤萝底下来到屋门口，跨进门槛里，马上停下，

对着室内小声喊道：“举起手来！”这是一间宿舍，里面有两排双层床，紧靠着墙，有三个人：两个还在睡，一个正仰面躺在那儿抽烟，从他身边的半导体收音机里传出一曲民歌。他一见玛伊塔端着冲锋枪站在那里，什么话也没来得及说就一下子跳了起来。

“我还以为这是开玩笑哩。”他结结巴巴地说着把烟扔掉，举起了手。

“把那几个叫醒！”玛伊塔指着正在熟睡的那两个人说，“你别逼我开枪，我可不想杀人。”

宪警两眼紧盯着玛伊塔的冲锋枪，侧着身子爬到另外两个宪警跟前，用手使劲摇晃着说：

“醒醒，快起来，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我以为会开枪打起来，我会看到玛伊塔、孔多里和塔皮亚鲜血淋淋哩；一旦打起来，宪警们准以为我也是去偷袭他们的，肯定会朝我开枪。”尾中先生说，“可是，连一枪也没有放。在我还没有弄清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以前，载着巴列霍斯的那辆出租车也赶到那里了。他们把位于玻利瓦尔街的警察局夺了下来，把警察局长东戈中尉和他的三个警察关进牢房里去了。巴列霍斯问站在门口的那两个小伙子：‘一切顺利吗？’‘我们不知道。’我求他：‘放我走吧，少尉，我老婆病得厉害。’‘您别害怕，尾中先生，我们需要您，因为我们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会开车。’您瞧，事情有多荒唐：他们要干革命，竟连车都不会驾驶。”

当巴列霍斯和塞农进到宪警队里面时，玛伊塔、孔多里和塔皮亚已经把三个宪警捆起来关到宿舍里，他们刚把步枪、

手枪集中到门口。

“一点问题也没有。”玛伊塔看到他们进来，很轻松地道，“警察局那边怎么样？”

“没什么问题。”巴列霍斯回答，“很好，我祝贺你们。我们又弄到十支步枪。”

“这么多枪，该缺人使用它喽。”玛伊塔说。

“不会缺人的。”陆军少尉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一边检查这些新缴获的毛瑟枪，“在乌丘巴木巴有的是人，对吧，孔多里？”

玛伊塔，一切都这么顺利，真叫人不敢相信是真的。

“他们又扛了一些武器放到我的福特牌小汽车上，”尾中先生叹了口气说，“又命令我到电话局去。我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前往。”

“我去上班，走到门口，看到有两部小汽车停在那里，我一眼就认出有一辆是店老板尾中先生的。”阿德莉娅娜·特略太太说，她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妇女，满脸皱纹，讲起话来语气坚定，手上的指关节显得特别突出，“看他脸上的表情，我就知道他运气不佳，就像得了神经官能症的中国人。一看到我来了，立刻从车上跳下几个家伙，跟着我进了办公室。我怎么会为此感到大惊小怪呢？那些年代，在哈乌哈连小偷强盗也没有，更不用说革命了。我怎么会注意那儿呢？‘等一下，还不到时间。’他们就像躲暴雨似的，一下子跳过柜台，一个家伙把阿苏蒂塔·阿西丝的桌子弄翻了（她现在已经在地下安息了）。‘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切断电话电报联系。’‘滚出去，你们这些暴徒！’‘我不就失

业了吗？’嘿嘿，我对您起誓，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也不知为什么看到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我竟如此冷静。您见到过这些美国佬有多么无耻吗？他们说来帮助我们，可他们连西班牙语也不会讲，每天扛着枪在街上东游西逛，还往家里闯。他们有多大权势呀！好像我们是他们的殖民地。现在大家都这样忍气吞声，在咱们秘鲁找不到爱国主义者喽。”

阿德莉娅娜太太看到玛伊塔与巴列霍斯一脚踢开电话间的门，用枪托子把接线板砸坏，用手把线扯断，她想跑到街上去，可是孔多里、塞农紧紧地拉着她，直到少尉和玛伊塔把整个电话间全部破坏完为止。

“现在我们可以放心了。”巴列霍斯说，“警察被我们关起来，电话被我们切断，这就没有直接危险了。我们没有必要分开了。”

“那些骑马的人到盖罗了吗？”玛伊塔忽然想起大声问道。

巴列霍斯耸耸双肩，意思是说：现在能够相信谁呀？

“农民们就可以信赖。”玛伊塔低声说，指指孔多里和塞农·贡萨雷斯。巴列霍斯示意将阿德莉娅娜放开，他们俩一松手，她就惊恐万状地窜到街上去了。“如果我们能够赶到乌丘巴木巴，我敢肯定，我们不会失败。”

“我认为咱们会到达那里。”巴列霍斯笑笑，“当然喽，我们是决不会失败的。”

同志们，要步行到广场去。巴列霍斯命令瓜尔贝托·布拉沃和彼里科·特莫切将出租车押到武装广场与博洛涅西街的拐角处，他们将在那里集中。说完他就站在其他人前头发出口令：“正前方，齐步走！”玛伊塔一听到口令，感到毛骨悚然。他们这一帮人组成的队伍叫人觉得异常奇怪，难以猜测、无法形容、目瞪口呆：四个成人和五个中学生手持武器

行进在大街上。他们会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街上的行人会不会停下来给他们让路？人们会不会打开窗户，走到门口观看他们？

“我正在刮胡子，那天我起晚了。”堂·华金·沙穆迪奥说，他以前卖过帽子，还当过商人，现在在哈乌哈广场旁卖彩票，“我从屋内看见他们走来，我还以为那是在为国庆节游行而排练哩。从现在起就排上了？这么早？我探出头问：‘这是搞什么游行？’少尉并不回答我，只是尖声喊道：‘革命万岁！’其他的人也跟着齐声喊：‘万岁！万岁！’‘这是什么革命？’我又问他，我满以为他是在跟我说着玩呢！这时科尔德罗回答我：‘我们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就这样边走边呼口号，后来我听说，他们又去抢劫了两家银行。”

游行队伍走到武装广场时，玛伊塔发现行人并不多，人们都转过身来漠不关心地看看而已。广场上有一帮印第安人，身搭披肩，腰束彩带，坐在长凳子上，转过头来看着他们穿过广场。那时还不到游行的时候，人们觉得荒唐，没把他们看成是在举行革命游行，倒像是一帮警察在游行。巴列霍斯做出了榜样，圣何塞中学的学生、孔多里、塞农也那么走起来，其他人也只好跟着亦步亦趋了。玛伊塔既感到兴奋，同时又感到焦虑不安，因为虽然警察被他们关了起来，武器亦被他们缴获了，电话、电报这类通讯手段也切断了，他们现在的这个小组是不是很容易被击溃？一次革命能够这样简单地开始吗？他咬紧牙关。能！一定能！

“他们是从广场的大门进去的，还小声地唱着。”堂·埃内斯托·杜兰说，他过去是国际银行的行政管理员，现今由于癌症扩散，躺在奥拉贝戈雅医院的床上动弹不了，“我从窗户里看见他们，当时我想，走的步伐很不整齐，这样的游行

糟透了。尔后，他们径直走向国际银行，我就说，‘又要来骗钱了，该说举行游行、演出、民间汇演什么的！’然而顿时我就恍然大悟了，他们一进门就用枪口指着我们，巴列霍斯喊道：‘我们来收缴本来就属于人民的钱，而不是属于帝国主义分子的！’噢！原来是干这个来的，我可不能拱手送给你们！我就坚决阻止他们。”

“他四条腿爬着钻到写字台底下。”阿德丽塔·次穆波斯说，她是国际银行的退休职员，现在卖起草药来了，“要是训斥起我们来，他倒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而谁要是打他身边过，他准能拽你一把。然而，那天他一看到枪，便嗖地一声钻到桌子底下，一点也不感到羞愧。管理员都吓成那副样子，我们职员怎么办呢？当然喽，我们也很恐慌。比较而言，我们更怕那些孩子们，他们就像种猪一样地喊：‘秘鲁万岁！’‘革命万岁！’一个个激昂慷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走火。在那次抢劫中，最聪明的数出纳员洛萨斯，他那时已经年纪不小了。现在怎么样呢？我估计，可能已经不在人世间了，不是病故就是被人杀死了，因为在现在的哈乌哈，不是自然死亡的人，就有可能被害致死。谁是凶手，永远不得而知。”

“当我看到他们朝我的窗口走来，赶忙把左边的抽屉打开。”老人洛萨斯说，他曾经是国际银行的出纳，现在蜷缩在哈乌哈市办的老人院里，病得奄奄一息，“那里面是上午的存款及一部分零钱，数量不大。我举起双手，口中祈祷着：‘圣母呀，让他们上当吧！’果不其然，他们受骗了，径直朝打开的那个抽屉走去，把里面的钱全收罗去了：五万多索尔。现在五万索尔顶个啥！那时，还是一笔为数不少的钱，但是比起右边那只抽屉里的钱来，那点钱又算不了什么了，右边的抽屉里有一百万索尔，当时还没有往保险柜里锁。他们是初

出茅庐，没有经验，而后来去抢劫的人却精明得很。”

“就这么多？”

“是的，是的，就这么多。”出纳颤抖着说，“时间还早呢，还没有来存款的。”

“这些钱是给革命的，而不是归我们自己。”玛伊塔打断出纳员的话，然后转向其他职员，他们将信将疑，“是为了人民，为了那些受苦的人民，劳动人民。这不叫抢劫，这叫征用。你们大家没有必要担惊受怕，人民的敌人是银行家、垄断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分子，你们也是受他们剥削的。”

“对，当然对。”出纳员还在发抖，“您说的是真的，先生？”

一到广场上，小伙子们又喊起万岁来。玛伊塔带着钱口袋，他走近巴列霍斯说：“咱们先到区银行去，现在集会没有人。”他仅仅看到几个人，好奇地瞅着他们，但并不走近。

“但是，要轻点声。”巴列霍斯同意，“否则，他们就会紧闭大门的。”

巴列霍斯跑起来，其他的人都跟在后面，队列次序与他们来时一致。几秒钟后，玛伊塔跑不动了，也没有心思想下去了。他感到心口憋得慌，太阳穴突突地跳，又感觉很不好受，其实跑得并不快，就像正式比赛之前做准备活动那么点运动量。又过了一两个街区，在区银行的门口停了下来，这时他感到眼前冒金星，张着嘴，呼吸急促。玛伊塔，你可别晕倒呀！他终于跟着队伍走进银行，只觉得恍恍惚惚，如同进入梦境。他靠在柜台上，他看到站在他对面的一个妇女惊恐万状，他听到巴列霍斯解释说：“这是革命行动，我们来收回原本属于人民的钱，它是掠夺来的。”有一个人提出抗议。少尉推了他一下，并且给了他一巴掌。玛伊塔想：应该过去

援助巴列霍斯，应该行动起来。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知道如果不依靠在那个柜台上，就会倒下来。他用臂肘支撑在柜台上，举枪瞄着抗议的那位银行职员。这时有的人喊叫，有的人看来要替那个挨了巴列霍斯一巴掌的人打抱不平。他看到孔多里和塞农把那个家伙的胳膊捆了起来，那人前面是一张特大号的写字台。少尉把冲锋枪的枪口对着他，威胁他，那人慑于武力，同意打开放在他写字台旁边的保险柜。孔多里把钱全都装进袋子时，玛伊塔这才感觉好受些。提前一个星期到就好了，这样身体有个逐渐适应高原的过程，怎么事前没有想到呢？

“你感觉不舒服了？”一出门，巴列霍斯就问他。

“有点高山反应，跑步引起的。咱们搞个群众集会吧！有多少人算多少人。一定得搞个集会。”

“革命万岁！”一个学生欣喜若狂地喊道。

“万岁！”其他圣何塞中学的那几个学生也跟着喊。其中一个把毛瑟枪对准天空，放了一枪。那是今天他们打的第一枪。其他四个学生也模仿他，对着天空开起枪来。他们就这样对走近的人喊着“革命万岁”的口号，不时地对天射击，占领了武装广场。

“人人都说没有群众集会，因为没有任何人愿意去听他们发表演说。他们见了人就喊，（到凉亭上、门廊底下、广场的几个大门那儿去喊）但是没有人去。”安特罗·维尔莫说，他过去是街头流动摄影师，现在眼睛瞎了，卖祈祷书、神像、念珠，在大教堂门口卖，从早晨八点一直到晚上八点，“甚至见了汽车，他们也求人家：‘请停下！’‘下来！’‘来吧！’他们看到人们都不相信，就想草草地搞个集合了事。确实是举行了集会，我在那里，我看见了，也听到了。那是在扔催泪弹

以前，扔了催泪弹，我的脸烧坏了，这是上帝的意旨。现在，我当然看不见，那时候我看得见。事实是，他们那个集会，也就有我一个人参加。”

没有群众参加他们的集会，加之那些发誓与他们一起干的哈乌哈人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这能不能说明他们对形势的估计一开始就错了？举行一次群众集会有很多好处；鼓动街上的行人投身到明天的行动中去，对他们宣讲阶级斗争的社会历史意义；向群众证实起义的决心；可能的话，再向那些最贫穷的人分发点钱。玛伊塔这个想法由来已久。然而，在那里，在玛伊塔刚才去过的对面的凉亭上，仅有一个流动摄影师，在广场凳子上坐着的几个印第安人，也对他们不屑一顾，另外，还有五个圣何塞中学的学生。任他们怎么喊叫，怎么打手势，站在教堂拐角处和卡门中学那一带的人，就是无动于衷。圣何塞学校的学生们走近他们，他们撒腿就跑。是枪声吓得他们如同惊弓之鸟？起义的消息，人们已有所闻，他们怕牵连进去？警察会不期而至吗？有没有必要再等下去？玛伊塔用双手作喇叭，对着他们高声喊：

“我们是起来造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的反的！人民可以起来打碎资产阶级的枷锁！让我们消灭剥削群众的制度吧！耕者有其田！结束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掠夺！”

“你别把嗓子喊裂了，离这儿太远，他们听不见你的声音。”巴列霍斯说，他从凉亭周围的矮墙上面一越而过，“我们这是白浪费时间。”

听他这样说，玛伊塔也就不喊叫了，走到巴列霍斯身边。两人一起朝博洛涅西街角走去，由瓜尔贝托和彼利科两人押着的出租车在那里等着他们。好了，虽然没有开起会来，但是至少玛伊塔的高山反应好了。能够到达盖罗吗？那些应该

牵着骡子和马的农民们会在那里等他们吗？他们俩不约而同地想到一起去了，他听到巴列霍斯说：

“即使里克兰的人不去盖罗，也没有问题。那一带有的是牲畜，是个牧场。”

“那我们就买他们的。”玛伊塔说，一边用左手敲敲右手拎着的鼓鼓囊囊的钱袋。随后，他又回过头问身后的孔多里：“到乌丘巴木巴的路怎么样？”

“不下雨时，很好走，”孔多里回答说，“我走过上千次。只是晚上叫人受不了，太冷。但是一下到热带林区，就容易了。”

瓜尔贝托·布拉沃与彼利科·特莫切挨着汽车司机坐在那儿，见他们走来，下了汽车迎上去。他们俩很羡慕那些去抢劫银行的人，就说：“数数，数数。”然而，巴列霍斯命令立刻出发。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分开。”少尉说着走近玛伊塔，而玛伊塔、孔多里以及三个圣何塞中学的学生已经上了尾中先生的出租车，“没有必要开得太快，一会儿就能到达莫里诺斯。”

巴列霍斯离开他们朝另一辆出租车走去，而玛伊塔则想：“我们到了盖罗以后，用骡子驮着毛瑟枪穿越安第斯山脊，然后下到热带林区，农民们将张开双臂在乌丘巴木巴欢迎我们。我们把他们武装起来，那里将成为我们的第一个根据地。”一定要持乐观主义态度。即使有人开小差，即使里克兰的农民不去盖罗，也不能动摇。今天上午这一切不都很顺利吗？

“我们是那样以为的。”费利西奥·塔皮亚说。他现在是上校军医，结婚了，并且有四个孩子。他是个残疾人，也是个军人，在阿桑加罗区服役时受的伤。他路过哈乌哈，经常

到胡宁州各军医点检查工作。“警察和中尉被关起来了，要耽误一些时候才能出来；通讯联络又被切断，必须得到黄卡约搬援兵，至少要五六个小时。到那时候，我们已经快下到林区。谁会找到我们呢？巴列霍斯选择的那个地方，实在太好了。在那一带，很难开展军事行动，那是个理想的搞伏击的地带，赤色分子藏在那里以逸待劳。唯一可采取的办法，只有狂轰滥炸，把森林夷为平地，或者进去与他们展开肉搏战，这样是要做出很大牺牲的。如果人们知道，光在那个地区我们就牺牲了多少人的话，人们该瞠目结舌了。当然，我想，现在在秘鲁没有人为任何事情瞠目结舌。我们那时在哪里？是的，我们是那么以为的。不过，东戈中尉就在监牢里关了一会儿就出来了。他跑到邮电局，一看什么都给破坏了。他马上跑到火车站，那里的电报机完好无损，他打了电报。载着警察的车从黄卡约出发，那时我们刚离开哈乌哈。这样，不是他们估计的五个小时，至多就两个小时。他们多愚蠢呀！因为捣毁火车站的电报机只要一秒钟就够了。”

“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去把火车站的电报机捣坏呢？”

费利西奥·塔皮亚上校耸耸肩膀，然后吸了口烟，从鼻孔里、嘴里喷出。他是一个未老先衰的人，说起话来呼哧呼哧的，烟抽得很多，连胡子也给熏黄了。我们俩是在哈乌哈军营的军医室里谈话，上校不时朝躺满病号及伤员的大厅望去，女护士在伤病员中间忙忙碌碌。

“您以为我知道吗？大概是想得不周到，我想是这样的。在最初的计划里，共有四十来个人会参加起义——噢，对了，还不包括我们圣何塞的那些中学生——一个小组应该去把火车站攻下。对，我想起来了，至少有四十人。由于匆忙改变

计划，也许巴列霍斯把这个给忽略了，或许根本就没有想起在火车站上还有一台发报机。事实是当时我们认为有充足的时间，因而离开哈乌哈时不慌不忙。”

实际上，他们离开哈乌哈时并非不慌不忙，而是慌里慌张。那时尾中先生哭哭啼啼哀求说：他不能去莫里诺斯，他老婆病了，汽油不够，开不到那里。当汽车刚刚发动起来时，就发生了钟表商阻拦一事。玛伊塔看到钟表商突然冒了出来，他站在写有“彼德罗·巴蒂斯塔钟表手饰店”的玻璃门前，像头公牛那样吼叫着。他是个上了点年纪的人，身材瘦削，戴副眼镜，脸气得通红，手里拿着一支猎枪。玛伊塔把子弹推上膛，但是他的头脑比较冷静，并未开枪，因为他看到虽然钟表商像个疯子般吼叫，但他手中的枪并没有瞄准他们。他把猎枪在手中晃来晃去，仿佛它不是一支枪，而是一根手杖。

“大粪共产党，你们别吓唬我。”彼得罗·巴蒂斯塔站在人行道的边上跌跌撞撞地骂道，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晃来晃去，“共产党臭大粪，你们都他妈的给我滚下来，如果你们是些长蛋子的男子们，他妈的！”

“继续前进！不要停下！”玛伊塔命令司机，同时朝司机肩上击了一掌。算钟表商彼得罗幸运，谁也没有给他一枪。“他是个西班牙人。”费利西奥·塔皮亚笑着说，“他用‘滚’字的命令式复数第二人称①，听起来很别扭。”

“哈乌哈的人都说那时您是世上最和气的人，堂·彼得罗，说您从不干涉别人的事。那天上午您是怎么了？竟口出粗话，出言不逊，侮辱起革命分子来了？”

① 拉美人很少用复数第二人称，故听起来别扭。

“我也不知为什么。”他说起话来鼻音很重，流着口水，满嘴没有一颗牙齿。此时他缩在羊驼毛披肩里，坐在他钟表店里的扶手椅上。从他来到哈乌哈，在这里已经过了四十个年头了。“一见他们闯进了国际银行，并且抢走一些钱，我就火冒三丈。当然，抢走的不是我的钱。后来，我听见他们喊共产党的口号，听到他们开枪了。他们为什么不想想这样会误伤好人呀？他们怎么那样愚蠢？因此我就提着我的猎枪出去了，就是这支枪，现在从不离身，谁要对我不客气，我对他也没有好看的。事后我才发觉，那时枪里根本就没有上子弹。”

他的店内到处是灰尘，没有一件像样的什物，东西杂乱无章，而他本人又老朽得寸步难行，他的这个形象使我想起孩提时代看过的一部电影：《神奇的魔术师》。他的脸干瘪得宛如一粒葡萄干，弯曲而过长的眉毛。他对我说，就一个人独居，自己做自己吃，他认为雇佣人是不道德的。

“堂·彼得罗·巴蒂斯塔，请您再告诉我一件事。后来从黄卡约市派来了警察，中尉东戈找向导带他们去追起义军，您当时拒绝了。难道您不憎恨起义军？或者因为您不熟悉哈乌哈山区的道路？”

“我比谁都熟悉，我是一名好猎手。”他的口水不停地往外流淌，说起话来口齿不清，这会儿眼睛里也流出了泪水，他用袖子擦掉，“不过，虽然我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也不喜欢警察。我是说过去，现在到了我这个年纪，无所谓喜欢不喜欢了。我就剩下几只表，还有这流而不止的口水，人没有牙齿了，连口水也兜不住了。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我自有我的人生哲学。假如谁闯进我的门槛，心怀叵测，不管他是恐怖分子也好，告密分子也好，这支枪会说话的。什么他妈的共产主义，见鬼去吧！至于警察，让他们一个个都死光才好呢！”

两辆小汽车，一前一后地紧跟着从圣伊莎贝尔广场穿过，本来应该在这个广场上，把小汽车上拉的武器（在监狱、警察局及宪警队缴获的）转移到从里克兰来的卡车上。但是，对这种变化，谁也不感到惋惜，他们都紧贴着玛伊塔，挤在车上，几乎连动弹一下也动不得。圣何塞的中学生们不住地相互拥抱，呼口号。唯独孔多里持保留态度，他不动声色。玛伊塔虽然没有说话，但他深深地为其他人的激情所动。在另一辆车上，情况与这辆车很相似。巴列霍斯看到司机很紧张，开起车来笨手笨脚，他自己也很担忧。汽车上下颠簸，左右摇晃，仿佛司机尾中先生故意往土坑里开，有意往石头上撞，对过往的行人，狗、驴、马等，他也无所顾忌，横冲直撞，一往无前。司机是因为惧怕所致？要不，这是他的一种策略？他故意要让车撞坏？结果，汽车离开哈乌哈市区，还没有走几百公尺，突然驶离马路，撞到路边排水沟旁的一个大石头上，把挡泥板撞坏了，把行人撞出几米远，车门玻璃都撞坏了。车上的五个人都以为司机是故意的。他们气得破口大骂，一个劲地推他，孔多里还打了他一拳，把眼睛打坏了一只。尾中哭着说，他不是有意的。下了汽车，玛伊塔闻到一阵桉树香味，这是从山上吹过来的冷风带来的。巴列霍斯他们坐的那辆车见此情景，只好后退回来，掀起一阵纷纷扬扬的红色尘土。

“司机给我们开的那个玩笑，让我们至少耽搁了一刻钟，或许更长点。”胡安·洛萨斯说。他是卡车司机，专门给人拉货，同时他自己也有小庄园，种了蚕豆、块根落葵之类的东西。胡安·洛萨斯不久前动过疝气手术，住在他女婿家，刚刚恢复身体。“我们只好在那里再等一辆车，以便代替‘中国

人’那辆。路上连一头驴也没有，运气太糟了。平常那条路上总是有卡车开往莫里诺斯、盖罗或者布埃娜·维斯塔，可那天，一辆也不见。玛伊塔对巴列霍斯说：‘你们组先走吧，（我就在前面的车上）想办法弄几匹马。’因为到了那时，谁也不相信里克兰的农民会在盖罗等我们。巴列霍斯不愿意。因此，我们就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终于来了一辆卡车。车相当新，汽油箱满满的，四个新轮胎。真不错！我们命令司机停下，让他拉我们，他不干。后来我们威胁他，他还是不干，最后不得不劫持了他。少尉、孔多里和贡萨雷斯坐到了前面，玛伊塔带着没有头衔的人，也就是我们剩下的人，爬到车上，把所有的毛瑟枪都搬到卡车上。在那里耽搁了一些时候，我们确实有点粗心，不过，一爬上卡车，车开动起来，我们就又唱了起来。”

卡车在高低不平的路上颠簸前进。圣何塞的学生们，虽然蓬头垢面，但个个情绪激昂，挥舞着拳头高呼“秘鲁万岁！”“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玛伊塔坐在车篷边上，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们。倏地，他产生了一个想法：

“同志们，为什么不唱《国际歌》呢？”那些带有稚气的脸上，布满了尘土，这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点头同意玛伊塔的提议，有几个人说：“对，对，咱们唱吧！”然而，顷刻间他们恍然大悟，谁也不会《国际歌》的歌词，而且从来也没有听别人唱过。他们头顶万里无云的蓝天，身着皱皱巴巴的军服，看看玛伊塔，又互相看看，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先开口唱。玛伊塔此时感到这些年轻人真是可爱。虽然他们要长成大人还得几年，不过他们已经成为革命家了。虽然他们缺乏政治斗争经验，思想基础也不牢固，但好就好在他们只有

十五六岁或者十七岁，他们都是些初生牛犊——不怕虎，将一往直前，义无返顾。难道他们不远比那些在利马的托派革命工人党的老革命家更有所作为吗？他们不比那个自封的老革命家乌维鲁斯以及他的那些工农军——今天上午他们按规定应到达指定地点——好多了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选择了实干这条路。玛伊塔真想拥抱他们。

“我来教给你们歌词。”玛伊塔说着从颠簸的卡车上站立起来，“让我们唱起来，你们跟我一起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这样，他们尖声细语地喊着，高声唱着，有的唱得对，唱得好，而大部分人不会唱。唱错了词，唱走了调，他们全不在乎，他们激动、兴奋到了极点，不时地高举着左手喊“革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秘鲁万岁！”哈乌哈郊区山上的牧民、农民以及为数不多的进城的人都好奇地看着他们。这些人，有的从瀑布旁，有的穿越枝繁叶茂的硬木树林沿着潮湿而遍是乱石的山谷到州府盖罗。他们学唱了好一会儿国际歌，但由于玛伊塔也不太会唱，他们始终把不准调，最后索性不唱了。唱了国际歌，他们又唱哈乌哈市国立圣何塞中学的校歌。这样，不多时便到达了莫里诺斯桥。司机并未煞车，玛伊塔敲着驾驶室的顶部让他把车停下。

“什么事啊？”巴列霍斯问，把头探出半开着的车门。

“不是说我们要把这座桥炸掉吗？”

陆军少尉做了个滑稽的动作：

“用手去炸吗？炸药放在乌维鲁斯那儿喽。”

玛伊塔记得巴列霍斯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把那座桥炸掉的话，警察要到盖罗去就必须步行或者骑马，而这样他们就争取到好多时间，使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形势下。

“你别担心！”巴列霍斯安慰他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你们继续唱下去，这样走起来才愉快。”

卡车又继续前进，而那些圣何塞的学生们又唱起来，并且不时地夹以说闹。然而，玛伊塔不想与他们同乐了，他靠近驾驶室顶篷坐下，观赏山上林区景色：山涧瀑布哗哗流水声，金翅雀啭鸣不绝于耳，清新的空气沁入肺腑。虽然山这么高，但他并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他被眼前的这些青年们的激情所感染，浮想联翩：几年以后，秘鲁将变成什么样子？那时，全国上下将如一个勤劳的蜂房，它的气氛不亚于现在卡车上的这些青年们，他们受到崇高理想的鼓舞而无比兴奋激动。那时，农民们将成为土地的主人，工人们将成为工厂的主人，官员们将懂得他们不是为帝国主义、百万富翁、酋长或某个地方的党派而工作。上面这些人都将如车上的青年们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那时，种族歧视、剥削现象将被消灭，这样也就打下了平等的基础，同时还将取消财产的继承，将用民兵取代现在的属于统治阶级的军队，私立学校都将国立化，所有的企业、银行、商业、城市的不动产等都将实行国有化；那时，成千上万的秘鲁人都将感到秘鲁确实进步了，当然首先是穷人们。谁最肯努力，谁最有才能而又是革命家，谁就承担最重要的工作，而不是那些最有钱的人，不是那些最会搞关系的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白人和印第安人、黑人、亚洲人，沿海的人与山区的人、林区的人，讲西班牙语的人与讲克丘亚语的人之间的鸿沟将逐日缩小；除了那微不足道的一小撮逃到美国去的人，或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而丧生的人，其他所有的人都将为发展秘鲁，消灭文盲以及令人窒息的中央集权主义而参加伟大的生产劳动。宗教的糊涂思想终将随着科学的高度发达而逐渐消失。工厂、农场以及

中央各部的代表大会，都将限制阻碍革命前进并侵吞革命成果的官僚的产生。假如他还活着，在那个新社会里他将从事什么工作呢？他将不接受任何重要的职务，不在任何部里工作，不当军界领导，不当外交家。也许，他将乐于在基层负责一项政治工作，比方说，在农村或安第斯山上某一个集体农庄，或者投身于开发亚马逊河流域的垦殖计划。到那时，现在的社会、道德、性偏见都将逐渐消失；到那时，人们将在劳动的熔炉中得到锻炼，对秘鲁的未来满怀胜利的信心，谁也不会责怪他与阿纳托里奥生活在一起——肯定他们早就言归于好了——而且肯定他们俩单独地在一起，不怕别人另眼相看，将尽情地相爱，尽情地享受。这时，他偷偷地用枪托碰了碰裤子的门襟。玛伊塔，这一切将是很美的，对吧？很美。不过，又是何等遥远……

第 九 章

盖罗是胡宁一带最古老的一个村镇，同二十五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的人们一直以种植土豆、块根落葵、蚕豆和古柯为生。从哈乌哈沿着一条陡峭的小道可以攀登上几座山顶，村民在那上面放牧。要不是雨水把道路冲得泥泞难行，只需要两个小时的路程就可到达盖罗。卡车在满是水洼的路上行驶，上下颠簸，就像一头难以驾驭的野骡子。不过眼前的风光倒是令人心醉：两座孪生兄弟似的山峰环绕着一条狭谷，一条泛着泡沫的河流沿着山谷跳跃奔流。早先，人们把这河叫水磨。来到这里也就快到盖罗了。在通往那遥远的小村镇的一路上，到处是枝叶繁茂的金冠树，树冠经白天雨水的冲洗，显得格外青翠嫩绿。不到中午我们就进了村镇。

在哈乌哈的时候，我已经听说了一些关于盖罗发生的事情，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哈乌哈地处一个直接受到战争之害的地区。这些年来，不论是叛乱军方面，还是镇压叛乱军方面，袭击、处决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直接连不断。有些人说盖罗控制在革命者手中，他们在广场构筑工事加强设

防；另一些人说军队在那里布置了个炮兵连，甚至有一个由美国人当顾问的训练营地。有人肯定地对我讲，根本就不会允许我进入盖罗，因为这地方是军队的集中营和毒刑拷打中心。“从曼塔罗谷地一带被抓的俘虏都集中在那里，使用最残酷的方法逼他们招供。口供挤干后，用直升飞机把他们活活地扔到原始大森林里。他们认为赤色分子在大森林里活动，让他们在底下看个明白，引以为戒。”说得真够离奇，其实在盖罗既没有暴动者，也没有士兵的踪迹。现实对谣言的又一次戳穿并不使我感到奇怪。在我们国家，新闻已经不是那么客观了，不论报纸、电台和电视还是人们的口头流传，都一味追求怪诞离奇。现在，在我们心目中，“新闻报道”只是根据人们的主观意愿、恐惧心理或个人好恶来解释现实，利用人们对于所发生事件的一无所知，以假乱真，鱼目混珠，而我们也把它作为无可挽回的确凿无疑的事实接受下来。由于不能了解事实真相，秘鲁人就虚构、编造、幻想、逃避现实，凭想当然过日子。对于秘鲁，只有那么极少数人了解秘鲁人在沿着一条神秘莫测的路往下走。秘鲁的生活已经变得文艺化了。我现在所踏上的现实的盖罗，和我听说的臆造中的盖罗是两码事。不论在哪个地方，既看不到战争，也看不到这派和那派的士兵。那为什么村镇竟是一片荒凉呢？我原来想，所有的适龄成人都被军队或游击队捉走了；可是连老人和小孩也看不见啊！人们可能在田里干活，或在自己的家里。毫无疑问，所有外来人到这里，都会感到恐惧。我参观了教堂和广场上的圆形凉亭。教堂是一九四六年建成的，石头塔楼，瓦屋顶。广场成方形，四周是意大利柏树和桉树。在我参观游览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秘的村镇。革命分子进村的那天上午，盖罗就是这个样子吗？

“那一天烈日当空，因为有公益劳动，小广场上挤满了人群。”堂·欧亨尼奥·费尔南德斯·克里斯托瓦尔用手杖指了指彤云密布的天空，肯定地对我说，“我当时就在这里，在这个小凉亭里。他们是从那个拐角地方出现的，差不多也就是现在这个时辰。”

那时，欧亨尼奥先生是盖罗的调解官，现已退休。令人感到不寻常的是，在他完全卷进了那些事件之后——至少可以说，从巴列霍斯、玛伊塔、孔多里、贡萨雷斯以及七个中学生追随者来到这里，他就被卷进去了——他竟官复原职，在盖罗又干了几年，直到退休。他现在住在哈乌哈郊外，尽管该地区流传着骇人听闻的谣言，但他却无所顾忌地愿意陪同我。“我这个人总喜欢冒险。”他对我这样说。对于回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一天，他也无所顾忌。他流利而毫不含糊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而且连那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也不漏过。他从不犹豫，也不颠三倒四，对于因他的回忆可能引起猜疑的悬案也不回避。这对于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来说，真是非同一般。另一方面，我很清楚他有些事瞒着不讲，他也歪曲了许多事实。他参加冒险行动的真相是什么呢？谁也知道得不确切。他本人心里明白。或是他故意编造出一套言词达到自我满足呢？

“我那时没有在意，因为卡车载着哈乌哈人到盖罗并不新奇。他们站在塔德奥·坎奇斯家那里，打听在什么地方可以吃饭，他们是饿着肚子来的。”

“他们都是全副武装，你也不在意吗，欧亨尼奥先生？还有，除了每人一支枪外，在卡车里不是还装了很多武器吗？”

“我问他们是不是来这儿打猎的。”欧亨尼奥先生说，“现在出外打猎可不是时候，我的少尉。”

“我们去搞实弹射击，亲爱的先生，”欧亨尼奥先生说，巴列霍斯当时对他这样讲，“就在山上的草地上。”

“青年小伙子来这里搞演习，这太不正常了吧？”欧亨尼奥心中纳闷，“难道他们入伍前没有上过军训课？我觉得这种解释不能自圆其说。”

“你想要我告诉你一件事吗？少尉到达这里的时候，他还没有丧失信心。”

“你是说里克兰的农民是不是准备好了马匹在等着我们？”巴列霍斯笑了笑。

“对，还有矮子乌维鲁斯和矿工们。”玛伊塔坦白地说，“是的，他当时没有失去信心。”

玛伊塔一次又一次地察看盖罗的绿色小广场，像是要凭自己意志的威力，把没有到场的人全呼唤到这里来。他皱着眉头，嘴角翕动。那一边是孔多里和塞农在同几个村民聊天。中学生们靠在卡车旁边照看着毛瑟枪。

“他们这简直是给我们捅了一刀子。”玛伊塔补充了一句，他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楚。

“要不然就是意外的事情把他们耽搁在路上了。”站在一旁的调解官也插了一句。

“什么意外的事，他们不来是因为不想来。”玛伊塔说，“没有必要再等了，我们何必自找麻烦，浪费时间。他们不来就算了，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就喜欢这样。”巴列霍斯用手拍了玛伊塔一下，“与其是蹩脚的伙伴，还不如自己单枪匹马干。他妈的！”

玛伊塔鼓起了勇气，决心克服消沉情绪。说干就干，去

搞牲口，购买储备粮，继续干下去。玛伊塔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穿过安第斯山脊，赶到乌丘巴木巴。到了那里就进入了安全地带，他们可以加强干部队伍，冷静地检讨战略。在来的路上，他坐在卡车里一动不动，没有感觉到高山反应。但是，现在来到盖罗，他一开始活动，又感到头脑发胀，心跳过速，头晕目眩。当他夹在巴列霍斯和调解官中间走门串户，调查谁家可以借给骡子的时候，他极力掩饰他的不适应。孔多里和塞农同这里的居民比较熟，他们负责弄点吃的和购买储备粮，自然是现金交易喽。

本来应当在这里举行一次群众大会，以便向农民宣讲这次起义行动，可是现在和巴列霍斯谈也没有用了。他打消了这个念头。那天上午，在哈乌哈集会失败之后，他不想向少尉再提及此事。为什么会这样消沉？难道无法从头脑中打掉这种消沉情绪？旅途上的愉快心情使他忘记对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现在他在反复考虑他们的处境：四个成人和七个青少年执意要实行几项步步受挫的计划。这是失败主义，玛伊塔，是一条失败的道路。这好像一部运转不灵的机器，你要切切记住。他笑了笑，并装出一副似乎听懂了调解官和一家女主人在房前用克丘亚语的交谈。早知道这样，你不应当学法语，先学克丘亚语才是。

“他们在这里呆了那么长时间，呆得不耐烦。”欧亨尼奥先生把快要抽完的烟卷头吸了最后一口说，“呆了多长时间？至少两个小时。他们十点钟到这儿，过了晌午才离开的。”

欧亨尼奥应当说：“我们一起离开的。”难道他没有同他们一起走？尽管他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他却从不流露出一点可能被怀疑为暴动分子同谋的破绽。这时候，天空阴云密布，

一场倾盆大雨把我们困在凉亭下面。暴雨过后，出现了一条美丽的彩虹。虽然已经云散天晴，仍然细雨连绵。这种利马特有的毛毛雨，使得盖罗小广场里的绿草晶莹发光。呆在自己家中的村民们慢慢地苏醒过来，从屋里走出，一个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蓬头垢面的印第安女人身上裹着好几层套裙；小孩子们头上戴着小礼帽；年纪大的农民们脚下拖着自制的皮凉鞋。他们走近欧亨尼奥先生，向他问候，拥抱。有些人攀谈了几句话就走开了，有些人却停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他们洗耳恭听欧亨尼奥回忆当年，有时默默点头以示同意，有时也插嘴评论上几句。但是，当我问起有关现在的情况时，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只字不谈，要么就胡编乱扯：他们既没看到当兵的，也没有看到游击队，对于战斗的事一无所知。不出我所料，在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适于作战的青年男女。盖罗的老调解官身着西服背心，头戴耷拉到眼睛的毛料镶边礼帽，西服闪闪发光，垫肩格外宽大，真像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像一位出没于安第斯峰峦之中的仙翁。他声若铜铃，如同从山洞中发出的回鸣。

“他们为什么在盖罗呆了那么长时间呢？”他把两个大拇指插到背心的口袋里，仰视天空，像是答案就在云端。他自问自答：“因为他们搞到骡子不是那么容易，这里的人离不开骡子，它是个好帮手。尽管出好价钱，但没有人愿意把牲口租给他们。最后，终于说服了阿尔玛拉斯的遗孀特奥弗拉西娅·索托太太。”讲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特奥弗拉西娅是什么人呢？只听到人们用克丘亚语在七嘴八舌地议论，其中一个女人在祷告划十字。啊！她死了。是炸死的吗？不过那时游击队已经不在这里了。他们已经走了吗？死了很多人吗？宪警队为什么要处死特奥弗拉西娅的儿子呢？

多亏欧亨尼奥用西班牙语讲解了他同村民的谈话，我连蒙带猜，搞清了他们是张冠李戴，把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掺插到玛伊塔的历史中去了。什么游击队在盖罗的时候，他们“处死”了几个人，其中就有特奥弗拉西娅的儿子。问题是当飞机在村子上空用机枪扫射的时候，游击队已经开拔了。在被炸死的受难者中，特奥弗拉西娅也倒下了。她是听到飞机来了，跑出去观看，结果死在教堂门口的。

“这个可怜的女人命该如此。”欧亨尼奥先生评论说，“她原来就住在那条小街上，听人说，她脾气不大好，挺叫人讨厌。好了，她是接受了游击队的恳求而把骡子租出去的女人。当时她的牲口在田里，她牵回骡子时，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另外，他们吃饭也耽搁了许久。我已经对您说过，他们是饿着肚子来的，在赫特鲁第斯街开的一家客栈包的午饭。”

“这么说，他们当时是很自信的。”

“在他们喝鸡汤的时候，差一点没落到警察的手里。”欧亨尼奥说。

看看时间表便一目了然：在出事前一个小时，一辆公共汽车从黄卡约开到哈乌哈，车上载着一连宪警，由一个叫席尔瓦的少尉和一个叫利图玛的班长指挥。宪警队在城里多停留了些时间，主要为了找向导和等待同东戈少尉率领的宪警队汇合。一切就绪后，就开始出发追赶暴动分子。

“您老先生怎么同他们一起走了呢？”我突如其来地问欧亨尼奥，看他有何反应。

当时少尉巴列霍斯极力想把欧亨尼奥留下来，玛伊塔也随声附和，阐述了他留下的理由：他们需要留下一个人充当城乡联系的交通员，尤其是在举事暴露之后更有必要；他们

需要建立支援网，招兵买马，获取情报。欧亨尼奥是领导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这件事没有达成协议，巴列霍斯的命令和玛伊塔的理由都被那个知识分子顶了回来：不行啊！先生们，傻瓜蛋也不会干的。他不愿意留下来应酬警察和收拾残局。无论如何，他要同他们一起走。开始还是交换意见，最后变成了吵架。巴列霍斯和调解官的嗓门越来越大。在那间满是油腻味和蒜辣味的阴暗房子里，玛伊塔示意孔多里、塞农和中学生先放下饭碗，以便听听争论者的意见。因为争执而伤了和气是不好的，他们面临着一大堆问题，自己内部的人再打架，就实在没有什么人了。

“没有必要再吵下去了，同志们。如果博士硬是要坚持己见，那就同我们一起走好了。”

玛伊塔担心少尉会反驳他，可是巴列霍斯只顾埋头吃饭，一声没吭。调解官也只顾用饭，不言语了。过了不一会儿，气氛缓和下来。在吃饭的时候，巴列霍斯曾指派科尔德罗·埃斯皮诺萨到一个高处监视交通线上的动静。“在盖罗停留时间太长了。”玛伊塔一边啃着烤鸡，一边自言自语说，“这样耽搁下去太可怕了。”

“我们必须马上出发。”

巴列霍斯表示同意，可他看了看表，却又不慌不忙地吃起饭来。玛伊塔心里也是不愿意动的，现在要站起身来，拔腿走路，麻木的肌肉缓过劲来，真是够难受的。又要爬多少个小时的山？要是犯了高山反应，昏过去怎么办？他们也许会把他当作个口袋扶上一头骡子。他觉得高山反应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一种不能接受的享受；但是，这种生理上的病症是客观存在的：发烧，头疼，全身软弱无力，尤其是心脏在胸口嗵嗵地急速跳动更叫人难受。他看到巴列霍斯和调解

官谈得挺起劲，心里觉得轻松了许多。里克兰人临阵逃脱，这怎么解释呢？是他们昨天开了会决定不来的吗？他们事先收到了矮子乌维鲁斯的取消令吗？乌维鲁斯领导的矿工们和里克兰人在互不通气的情况下，各自作出了退缩的决定，这样的巧合非同一般。这对现在影响重大吗？没有什么大影响，以后将有它的重要性，也就是当历史恢复其面目，清算历史总帐的时候是重要的。我本人就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我知道这事不那么简单，因为时间也不总是能鉴别真理的。关于临阵不到场这件事，是没有完全把握搞清楚的，是人们开了小差，还是头面人物把已达成的协议提前了，或是归于日期和时间没有协调好。这些事已无法弄明白，因为连当事人自己都不明白。他吃完最后一口饭，用手绢擦了擦手。房间里的阴暗使他视线模糊，开始时看不到苍蝇，现在看得一清二楚：苍蝇密密麻麻落在墙壁和天花板上，并在饭菜上和吃饭人的手指上飞来飞去，好不恶心。盖罗的每家每户都是这样：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没有洗澡间。苍蝇、虱子和成千上万的小虫子是组成室内摆设的一部分，它们是家中坛坛罐罐和破衣烂衫的主人和老爷；靠在土坯和禾秸筑成的墙壁拐角处放着简陋的床铺，贴在门上的是褪了色的圣母和神灵画像，它们也是这床铺和画像的主人和老爷。人们要是夜间想解小便，没有勇气起床到外边去，就在屋里睡觉的床边和做饭的炉灶旁撒尿。反正是泥土地，土把尿吸收了，不留痕迹。臭气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满屋是垃圾和脏物，各种气味搅和在一起，也就闻不出是个什么味道了。要是半夜里想大便呢？人们有勇气摸着黑、顶着寒冷、冒着风雨出来吗？也是在房间的床铺边和炉灶旁方便。当游击队一进屋的时候，家里的女主人把一些豚鼠轰赶到箱子后面去。她是

一位印第安人老太婆，满脸的皱纹和污垢，走起路来，背后的两根长辫子来回摆动。屋里的那些小动物蜷缩成一团，贴着老太太的身体睡觉，它们是在防寒取暖吧？老太太身上穿的裙子有多少月、多少年没有换洗了？毫无疑问，这些裙子将伴她一直到老、到死。有多少年她没有用肥皂把整个身子洗一下？多少月？多少年？一年当中能洗一次澡吗？高山反应的折磨消失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伤心难过的心情。是的，玛伊塔，成千上万的秘鲁人同这位老太太一样，他们生活在尿屎之中，没有电，没有水，挨饿受冻、愚昧无知，过着那种无人问津、肮脏的、原始的、几乎是牛马一样的生活。玛伊塔想同老太太聊聊；但由于老人只会讲一句半句西班牙语，费了好大劲也只能交谈几句话。要证明他们所干过的和将要干的事业是否正义，睁开眼睛稍看一看不就足够了吗？像这位妇女一样生活的秘鲁人，一旦明白了他们拥有的力量，只要认识到并使用这一力量，整个秘鲁这座剥削、奴役和恐怖的金字塔，就会像腐朽的屋顶一样倒塌下来。当他们懂得了只有起义造反，人类才能结束这非人的生活，革命就会势不可挡。

“准备好，我们出发！”巴列霍斯站起来说，“把枪支弹药装好。”

大家急急忙忙上了街。玛伊塔从阴暗的屋里来到了明亮的街上，精神顿时又振作起来。他走过去给青年学生帮忙，他们正在把枪支从卡车上卸下来，然后捆在骡子背上。在盖罗的小广场上，印第安人在继续做生意，对他们态度冷漠。

“他们没费多少口舌就把我说服了。”欧亨尼奥哭丧着脸，装出一副过于轻信的可怜相。“巴列霍斯对我解释说，他们除

了对青年进行军训外，此去还要把阿伊娜庄园交给乌丘巴木巴的居民。您要知道，孔多里是那里的农民协会主席，而塞农·贡萨雷斯是副主席。我当时怎么会不相信他呢？几个月以来，在阿伊娜就闹纠纷。乌丘巴木巴的农民们曾占领过庄园的土地，并争吵着要求发给土地证。少尉不是省军事当局的人吗？我必须履行我的义务，本人是这方面的仲裁人啊，先生！我当时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尽管走那么长的路不是闹着玩的，我还是出于好心陪他们走了一趟。这不是人生中很正常的事吗？”

他谈吐自然地讲述了这一切。雨过天晴，出太阳了。欧亨尼奥红光满面。

“当枪打响了的时候，您有什么感想？”

“我尊贵的先生，”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出发没多久，一进华依纳山谷就开始打枪了。”

他的眼睛眨巴了几下——眼皮布满皱褶，眉毛有些卷曲——眼圈湿了。这可能是阳光刺激的缘故；不能相信这位盖罗的前调解官是因为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流出了怀念的眼泪，尽管一切往事，尤其是最痛心的事情对于他那样岁数的人容易唤起思念之情。

“他们走得那么急，我手提箱都没来得及带，里面放着我的必要的衣物。”他低声埋怨，“我离开家的时候，就像现在您看到的这副打扮，身上只有领带、背心和礼帽。我们上了路，走了一个小时，或许一个半小时，热闹的场面就开始了。”

他笑了，围在我们周围的人也笑起来了，共有六个人，四男二女，都是上了年纪的。另外，凉亭的破旧栏杆处有几个小孩子。我问岁数大的人，在警察赶到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在场？这些人斜着眼看了看调解官，像是在征得他的许可，然

后点头默认了。我抓住这件事不放，向年纪最大的老农问，革命分子离开后的情况怎么样，发生了些什么事。他指了指广场拐角处的死胡同：载着警察的大公共汽车就在那边出现的，汽车呜呜响，直冒烟。多少人？很多。多少？很多，可能有五十几个人。老农一带头，其他人也胆子大起来，开始讲话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谈论着当年的事情。在这七嘴八舌的嘈杂声中，克丘亚语夹杂着西班牙语，二十五年前的事，很快又同几天或几个星期前的轰炸——这件事也搞不清楚——还有“处死”游击队的事也都搅和在一起了，实在使我难以理出个头绪。在这些农民的头脑里，所谈的事情之间自然相互有联系，然而对我来讲很难找到，在我的同胞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看得出这种联系。最后我弄清楚了，当时人们认为隐藏在盖罗的警察有五六十人。他们在村镇里搜查了大约半个小时，这家进去，那家出来，逢人便问起义者在什么地方。他们问的时候，称革命分子呢，还是称共产党？不，他们不用这些字眼，而是称这些人是“扒手、贼、强盗”。肯定这样叫的吗？

“当然肯定。”欧亨尼奥代表大家说，“您要考虑到，那是在那个年代，有谁会想到是革命？另外，请记住，他们在离开哈乌哈之前抢劫了两家银行。”

他笑了，大家也跟着笑起来。在这停留的半个小时当中，警察和农民发生过冲突吗？没有，没有任何冲突。警察确信“盗贼”已经离开了，盖罗人和那些人没有关系，也不知道在哈乌哈发生的事情。那个年代，有一点不必怀疑：只要不公开表示对抗，警察也就不会认为每一个穿斗篷和家制皮凉鞋的人是叛乱分子的同谋。那时候，安第斯山区的人还没有分化成两个极端。现在的印第安居民，要么是造反的游击队的

同伙，要么是镇压当局的帮手。

“就在那个时候，”调解官说着眼圈又湿了，“我们被大雨浇得够呛。”

离开盖罗一刻钟的工夫就下起雨来，雨下得很大，豆大的雨点就像冰雹一样。他们想找个地方躲一躲雨，但是没有栖身之地。“怎么天气说变就变。”玛伊塔自言自语。也许他是唯一不把下大雨放在心上的人。雨水顺着他的身子流淌，头发全湿了，沿着嘴角往下滴水，活像一棵橡胶树。过了盖罗的田野，一路上全是连绵起伏的高山斜坡，像是一下子换了个天地，换了个国家。这里的风光同哈乌哈和盖罗之间的风光完全不同，茂密的金瓜莱斯树和丛生的野草不见了，飞禽走兽销声匿迹了，瀑布的流响声听不到了，烂漫的山花和路边迎风摆动的芦竹统统无影无踪了。在这荒无人烟的光秃秃的山坡上，不时可以看到的唯一植物，是一些大型的仙人掌，它们伸着一根根布满针刺的粗大手臂，其状如同蜡烛台。这里的泥土变成了黑色，上面覆盖着奇形怪状的大岩石。他们分成三组前进：孔多里和三个中学生赶着驮武器的骡子走在前面；接下去是塞农·贡萨雷斯带着其他的小伙子，离前面的一组约一百米距离；负责断后的是少尉、玛伊塔和调解官。万一后面的人同前面两组失去联系，调解官也熟悉通往阿伊娜的路。在一段时间里，玛伊塔看不到前面山腰高处的两组人。由于地面的高低和下雨的缓急，两组黑影时隐时现。尽管天色灰蒙蒙的，样子像是快天黑了，其实只不过刚下半晌。“现在几点了？”玛伊塔问巴列霍斯。“两点半。”听到这一回答，玛伊塔想起了在萨莱西亚诺教会学校上学期间，询问时间时他们常说的一个笑话。“我的钟停了，你看。”说此话时指指裤裆下。玛伊塔乐了，他这一开心，差一点摔倒在地上。

“枪口朝下，别进了水。”巴列霍斯对他说。雨水把地面冲得泥泞难行，玛伊塔极力想踩着石头走，然而石头被水冲得东一块西一块，而且经常打滑。走在他右边的那位盖罗知识分子却如同走平路一样，他个子小，全神贯注。他的礼帽全泡了汤，皮鞋沾满了泥水，他用一条花手绢捂着鼻子和嘴。巴列霍斯走路也很敏捷，走在前边一点，冲锋枪挂在肩上，歪着脑袋察看着该走什么地方好。一路上，他比玛伊塔和欧亨尼奥先生都领先，后面两人有时要小跑才能跟得上他。自离开盖罗，他们几乎没有交谈过一句话，他们的目的地是到达别纳山谷，那里，山的东坡气候暖和宜人。孔多里和塞农认为，如果快走不停的话，天黑以前可以赶到那里，否则，就要在高原上过夜，冒雪崩和暴风雨的危险，这是要不得的。尽管玛伊塔累得疲惫不堪，而且有时高原使他紧张不安，但总的感觉良好。安第斯山给他吃了那么多苦头之后，最终接受了他吗？洗礼这一关通过了吗？当巴列霍斯下令可以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他感到精疲力尽，身不由主地倒在泥泞的地上。雨过天晴，但却见不到另外两组人了，这三个人垂头丧气，两侧尽是些潮湿的伊初针茅。巴列霍斯走到玛伊塔身边坐下，从他手中要过冲锋枪仔细地检查了一下，把枪拴拉开又推上。他一声没吭地把枪还给玛伊塔，自己点了支烟。这位年轻军官的脸上满是汗珠，玛伊塔透过呼出的一口烟雾，看出了他那担心紧张的表情。

“你以前一直是个乐天派啊。”

“我没有悲观泄气。”巴列霍斯反驳说。他吸了一口烟，从鼻孔和嘴里吐出了烟雾。“只是……”

“只是今天上午的事使你脑袋受不了，”玛伊塔说，“革命不比神话故事，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我的老弟。”

“我不想谈论今天上午的事，”巴列霍斯打断了他的话，“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他俩听到打鼾的声音，原来调解官已经躺在地上，用礼帽盖着脸，看样子是睡着了。

巴列霍斯看了看表。

“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警察应该是刚到哈乌哈。我们比他们早四个小时，我们在这样的荒山野岭上，就像是大草垛里的一根针。我认为我们已经脱离了危险。好了，把博士叫醒，继续赶路。”

巴列霍斯的话音刚落，欧亨尼奥便坐了起来，马上把湿漉漉的礼帽戴在头上。

“准备完毕，我的少尉。”他行了个军礼说，“我像猫头鹰一样，睡觉睁着一只眼。”

“博士先生，您能同我们在一起，真使我吃惊。”玛伊塔说，“以您这么大的年纪和从事的工作，您应该多保重身体。”

“好了，说实在的，如果别人不记恨我，请放心，我是不会往心里去的。”调解官很痛快地坦白说，“你们还不同意我和你们一起走，看不起我。我留下干什么？在那里等警察，让我当替罪羊？毛孩子也不会干的，先生们。”

玛伊塔笑了。正当重新开始赶路，攀登那泥滑的谷洼斜坡时，他发现巴列霍斯留在那里没有动，他隐蔽着身体，这边看看，那边瞅瞅，在听什么声音。

“枪声。”他低声说。

“是打雷吧，伙计？”玛伊塔说，“你能肯定是枪声？”

“我去看看这枪声是从哪里来的，”巴列霍斯边走边说，“你们在这儿别动。”

“警察相信你说的这一套吗，欧亨尼奥先生？”

“当然相信。难道不是事实？不过他们也难为了我好一阵子。”

这时候，在盖罗的凉亭上，已经有二十几个老人和孩子围着我们。欧亨尼奥两个大拇指插在西装背心口袋里，憔悴的面孔转向天空对我说，在盖罗警察局他被关了三天，然后又在黄卡约的宪警队扣押了两个星期。警察要他交待他是革命分子的同伙，他当然是一口咬定自己上当受骗才同他们一起去的，因为他相信了他们要把阿伊娜庄园交给乌丘巴木巴的农民，需要一个仲裁人。至于武器，那是年轻小伙子们入伍前进行军训而用的。警察只好接受了他的辩解。事情就是这样，三个星期之后，他竟然又清白地在盖罗继续当他的调解官，而且还一再向亲朋好友吹嘘炫耀这一经历。他笑了，在他的笑声中，我感到有一种嘲讽的味道。说话间已是风和日丽，村里的农舍、田野和附近的山岭映衬出一幅红黄黑绿、五颜六色的画面。“看着这些半荒芜的田地真叫人痛心。”欧亨尼奥满腹的牢骚，“所有这些土地都是肥沃的耕地。兵荒马乱，实在可恨！盖罗人民惨遭涂炭，天理难容。二十五年前人民就一贫如洗，现在还是一穷再穷，没有尽头的灾难。”我没有让他把话题扯到现在，而是要他回忆过去，讲述当年的故事。在双方交火的时候他干了些什么呢？战斗持续了多长时间？他们逃离了华伊哈科山谷了吗？对于这一切，欧亨尼奥从头至尾，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

听到的是枪声，这已经毫无疑问。玛伊塔一条腿跪在地上，手中紧握冲锋枪，眼睛注视着四面八方，但是，在谷地中他的视野是有限的：视线被几座山峰遮挡。一个黑影一掠

而过，是一只秃鹫？他的记忆中未曾见过秃鹫，只是在照片上见过而已。他发现调解官两眼合闭，双手合掌，开始祷告天地了。他又听到打来一梭子弹，和刚才的枪响来自同一方向。巴列霍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他正想巴列霍斯回转的事，少尉便出现在山坡上，他后面跟的是第二组的一个中学生彼利科 · 特莫切，两人沿着山坡滑到他们面前。特莫切脸色苍白，双手和毛瑟枪枪托上沾满了污泥，像是摔了一交。

“对方的火力是向先行的第一组射击的，”巴列霍斯说，“不过他们已经走远了，第二组的人也看不到他们了。”

“我们怎么办？”

“前进！”巴列霍斯强有力地回答，“第一组至关重要，一定要保住武器。我们要设法把火力引开，以便先头队伍脱离危险。走！马上行动，你们分散开。”

在攀登山谷陡坡的时候，玛伊塔对自己发问，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想到给欧亨尼奥发一支枪，也没有人给他要一支。既然要战斗，调解官手无寸铁将无能为力。玛伊塔能够控制自己，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很是冷静，听到枪响也不惊慌失措。自从他们离开哈乌哈，他就在等待着这枪声的到来。他一直不相信少尉所说的，他们比对手占上风。在盖罗的耽搁实在太愚蠢了。

在谷地的高处，他们隐蔽起来，四处观望，但看不到一个人，所看到的尽是些曲里拐弯的褐色土地，再往上看是荆棘丛生的悬崖峭壁。他想：要是追歼的人出现在山头背面，可就糟了，那里是掩护他们的好地方。

“利用岩石掩护前进！”巴列霍斯下命令说。他左手提着冲锋枪，右手指挥其他人再分散一些。他快步如飞，弯着身子察看着周围，博士跟在他的身后。不一会工夫，玛伊塔和

彼利科·特莫切便落在后面。不再听到枪声，孕育着暴风雨的乌云消散了，天空晴朗，飘动着几片白色的浮云。“倒霉！现在最好是下雨。”玛伊塔心想。他一边前进，一边注意自己的心脏，生怕突然发生憋气、心律不齐和浑身酸软无力。幸好这些病症都没有犯，自我感觉良好，只是有些发冷。他睁大眼睛，极力想看前面的队伍。由于地面高低不平，加上很多的拐弯抹角，他不可能看到什么。刹那间，他似乎觉得有些小点在移动。他向彼利科·特莫切打了个手势。

“那是你们那组的人吧？”

小伙子点了几下头，一句话也不说。他似乎更加孩子气了。瞧他，脸色全变了。紧紧握住武器，像是有人要夺他的枪，像个哑吧似的愣在那里。

“听不到枪响了，”玛伊塔力图给小伙子打气，“也许是一场虚惊。”

“不对，不是虚惊。”特莫切结结巴巴地说，“这是真的。”

他强打精神，有气无力地对玛伊塔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在听到第一阵枪响时，他们看到前面第一组的人迅速分散开，与此同时，可能是孔多里端起枪进行还击。塞农·贡萨雷斯喊道：‘卧倒！卧倒！”直到巴列霍斯赶上来，他们才站起来。巴列霍斯命令别人继续前进，把特莫切留到身边当通讯员。

“我知道为什么留下你，”玛伊塔笑着对他说，“因为你跑得最快。是不是你的胆子也最大？”

特莫切苦笑了一下，没有作声。

他们继续一起赶路，不时地看看这边，望望那边。巴列霍斯和调解官抛下他俩有二十几米远。过了一会儿，又听到枪响。

“真有意思，我在那枪林弹雨之中竟着了凉。”欧亨尼奥继续往下说，“当时下着倾盆大雨，我浑身上下淋得落汤鸡似的，您想象得到吧？”

是的，这位当年身穿坎肩，头戴礼帽，冒着宪警从山顶上射来的子弹，夹在游击队中间的小个子，现在开始打喷嚏了，我想难一难他，问他是什么时候知道那些人是叛乱分子，所谓的军训和移交阿伊娜庄园纯系编造。他没有显出难堪的神情。

“是在枪打响了的时候。”他自信地说，“那是明摆着的事，算我倒霉。您想想我当时的处境，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他停顿了一下，眼里又淌出了泪水。这时候，我想起了在巴黎的那个下午，也就是在起义发生之后的两三天。按宗教习惯，那个时间我停止写作，出门买了份《世界报》，并在我家拐角处一个名叫图尔农的小吃店要了份快餐，边吃边看报。名字有误，把玛伊塔的“y”写成“i”；但是我丝毫都不怀疑他是我萨莱西亚诺教会学校的同学。他的名字是登在关于秘鲁的一条很不显眼的消息中。这条消息差不多有六七行，不到一百个字，写的是“暴动企图没有得逞”之类的话。搞不明白这一举动所产生的影响，也弄不清楚头头们是死了，还是被逮捕了。玛伊塔被抓起来了，还是已经死了呢？这是我首先想到的。高卢香烟从我嘴边掉了下来，我反复看着这则消息。在我那遥远的国家里竟然发生这样的事，令我难以置信，而且主角是与我一起看过《基督山伯爵》的同学。《世界报》中的玛伊塔就是他，从一开始就是真实的。

“俘虏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押到这里的？”欧亨尼奥重复了一遍我的提问，以为我是在问他，其实我是问盖罗的老头们。

既然这些老乡信得过的调解官表示对此问题有兴趣，这也很好。“那已经是在晚上了，不是吗？”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摇头表示否定。当时天还没有黑，是下半晌。宪警队是分两批回来的。第一批把乌丘巴木巴农民协会主席孔多里捆在特奥弗拉西娅太太的骡子上押了回来。孔多里已经死了吗？他气息奄奄，生命垂危。他的身上中了两颗子弹，一处在背上，一处在脖子上，浑身鲜血淋淋，还有几个青年学生也被捆着手押了回来。在那个年代，战败了就当俘虏；现在宁肯战死，也不当俘虏，因为抓了活的，挤完了口供之后，最终还是人头落地。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先生？宪警队把被抓的人的鞋带全解去，为的是打掉俘虏们逃跑的企图。他们小心翼翼地行走，尽管拖着脚走路，有时鞋还往下掉。宪警队把孔多里带到镇长家，给他治疗一番，其实只是随便应付一下而已，因为过不一会儿人就死了。孔多里等人被抓半小时后，巴列霍斯带人赶到，他招呼其他人快速前进。

“快！快！”听巴列霍斯在喊。

玛伊塔欲快不能，特莫切也超过了他几米远。仍然听到零星的枪声，就是弄不清从哪儿打来的，也不知道比前阵枪声来得更近，还是更远。玛伊塔浑身发抖，但这不是由于高山反应，而是冻的。这时候，他见巴列霍斯端起了冲锋枪：枪在他手中打响了。玛伊塔看看少尉射击的那个山头，是蓝天、白云下面的一个坎坷的山顶，那里有岩石、泥土和伊初针茅。他也把枪瞄准了那里，手指扣住了扳机。

“你们怎么又停下了，妈的！”巴列霍斯再次催促快走，“跟上！跟上！”

玛伊塔唯命是从，好大一阵工夫，走得很快。他弯着身子，在乱石上跳跃前进，有时紧步小跑，绊倒了又爬起来。他感到刺骨的寒冷，心里发慌。枪声又响了，刹那间一梭子弹飞来，他确信把离他不远的几块石头击碎了。他向山头上看了又看，没有发现一个打枪的人。他这时简直变成了个机器人，什么也不想，不怀疑，不记忆，全神贯注在一个任务上，那就是跑步跟上，不掉队。突然，他双膝跪倒在地上，停在那里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个不停。他爬起来，摇晃着身子，踉跄了几步，便倒在几块长满苔藓的岩石后面蜷缩起来。调解官、巴列霍斯和特莫切还在继续快速前进。玛伊塔，你不可能赶得上他们了。少尉回过头来，玛伊塔示意叫他们继续前进。就在此刻，他清楚地感觉到一颗子弹打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子弹在地上打了个小洞，还冒出一股烟。他尽可能把身体蜷缩起来，察看并搜寻目标。他清晰地发现了从右边的岩石矮壁探出一个警察脑袋，一支枪的枪口在对着自己。原来他把用来掩护自己的一面搞错了，他赶忙绕岩石爬了几步，又卧倒在地上。这时，他感觉到子弹从头顶上穿过。最后，他尽量按巴列霍斯教给他准星对目标的射击方法，端起了枪。当他瞄准目标开枪时，警察已不在石壁那里了。一梭子弹打出，震得他摇晃了两下，感到发懵。他看到子弹打在警察探头下面一米的地方，把岩石剥了一层皮。

“快跑！快跑！我掩护你。”他听到巴列霍斯在喊。少尉把枪对准了石壁。

玛伊塔爬起来就跑。他冻得浑身发木，好像骨头在皮肤里咯吱咯吱作响。寒风刺骨，身上却出冷汗，像是在发高烧。他一到达巴列霍斯身边，便膝盖跪地，也把枪对准了岩石。

“那边大概有三四个人。”少尉用手指着说，“我们来个分

段跑步前进，不要停住不动，否则他们可能把我们围困起来。你来掩护我。”

没等别人回答，巴列霍斯爬起来就跑。玛伊塔扣住冲锋枪扳机，继续监视着右边大岩石那里，但是连一个人影也没出现。最后，他转动目光寻找巴列霍斯，看到他已在很远处招呼自己前进，由他来掩护。玛伊塔拔脚就跑。跑不几步，又听到了枪响。他顾不得停下，一个劲往前跑。过不了一会儿，他发现原来是少尉在射击。当他赶上来时，特莫切和调解官已经和巴列霍斯在一起了。小伙子从腰上围的子弹带里取出了五发一梭的子弹，把它压进毛瑟枪膛，因为在这之前他也打过枪。

“另外两组的人哪里去了？”玛伊塔问，前面一些层见叠出的岩石挡住了他的视线。

“我们找不到他们了；不过他们知道不能停止前进。”巴列霍斯感情冲动地说，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周围。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如果我们被警察包围，那我们就要完蛋了。一定要继续前进，直到天黑为止。天一黑就不会有危险了，跟踪追击一到晚上就不灵了。”

“直到天黑为止。”玛伊塔心里在想，“还要多少时间？三个、五个，还是六个小时？”他没有问巴列霍斯时间，而是把手伸进子弹袋里摸了摸——他一天摸了十几次——再次证实他还有许多备用子弹。

“两人一组前进！”巴列霍斯下达命令，“我和博士，你同特莫切，我们互相掩护。要注意，不能大意，要伏下身子跑。开始吧！博士。”

他拔腿跑开了。这时候，玛伊塔看到调解官手中已经拿了支左轮枪。他是从哪儿弄来的枪呢？肯定是少尉的那支，因

为少尉只是拿了个空枪套子。

就在这时，玛伊塔发现在他们的头顶上，出现了两个人影，其中一个喊道：“投降吧，妈的！”他和特莫切同时开了枪。

“那天没有把所有的人一网打尽，”欧亨尼奥先生说，“有两个青年学生逃跑了。他们是特奥菲洛·布埃塔斯和费利西奥·塔皮亚。”

我已经从一些参加者的口中了解到了这一段历史，但我并没有打断他的讲话，这是为了听听大家所说的有何异同。有人讲得详细，有人讲得简单，盖罗的这位调解官的讲述同我所听到的基本相同。布埃塔斯和费利西奥是分在孔多里指挥的先行组里，这一组最先被扫荡该地区的一支巡逻队发现。孔多里遵照巴列霍斯的命令，竭尽全力继续前进。与此同时，宪警队多次发起进攻。不多一会儿，孔多里受了伤。这可把小伙子们吓坏了，他们丢下驮武器的骡子，拔腿就跑。布埃塔斯和费利西奥两人躲藏到一个鼲鼠洞里，在那里面呆了整整一夜，冻了个半死。第二天，他俩又冷又饿，精神惶惑，周身冰凉，分头回到了哈乌哈。路上没有被人发现，两人在各自的父母陪同下到警察局投案自首了。

“费利西奥被打得鼻青眼肿，”调解官强调说，“这都是因为想当革命分子，在家里挨了一顿痛打。”

在凉亭下陪伴着我们的老乡大都走了，现在就剩下两个老头了。两位老人回忆了塞农·贡萨雷斯被抓进村子的情景。他是被捆在马背上，光着脚丫子带进村的，衬衣全撕破了，像是同宪警队拼命滚打过。在他的后面是其他中学生，他们也被绑着，解去了鞋带。其中有个小伙子——谁也弄不清是哪一个——还在哭鼻子，听说是个很壮实的小青年。他是被打

哭的？还是因为受了伤吓哭的？天知道，也许是为那可怜的少尉惨遭不幸而哭吧。

就这样，他们两人一组一直朝前爬。爬呀爬呀，爬了好一阵子，玛伊塔以为快到天黑的时候了，可是天根本就没有黑下来，太阳光丝毫没有减弱。他们两人一组，随时变换，有时巴列霍斯和博士，玛伊塔和彼利科；有时候是巴列霍斯和年轻学生，玛伊塔和博士。两个跑，两个作掩护。他们互相加油鼓劲，继续前进。他们不时看得见宪警队的警察与他们交火。但谁也打不中谁。不是巴列霍斯原来想象的只有三四个警察，而是有相当多的人，要不然就是事先把人已经布署在各个不同的地点。围歼的警察最初出现在制高点上，现在又从两翼出现了。最危险的是右边，那里的一块块岩石屏障离他们逃跑的地方非常近。宪警队是沿着山顶追击他们的，尽管有时玛伊塔以为已经把他们甩在后面了，可他们总是又重新出现，他已经换了几梭子子弹了。他没有什么身体不好的感觉，就是太冷了，不过他已经适应了出大力、走长路和高山气候。怎么会没有一个人受伤呢？他在想，宪警队已经向他们射出了很多发子弹。警察只注意保护自己，为了执行命令，他们也不瞄准，一探头就朝岩石开枪，生怕被暴动分子打中。玛伊塔仿佛感到：这是一场儿戏，一幕不伤害人的闹剧。一定要持续到天黑吗？他们能够摆脱掉宪警吗？看来大亮的天不可能马上就黑下来。他并没有灰心，既不乐观，也不忧伤。他想：“不管怎么糟糕，我玛伊塔现在所做的，正是以前所希望的。”

“准备好，欧亨尼奥先生！我们走，他们俩在掩护我们。”

“您走吧，不要管我，我的脚已经不听使唤了。”调解官的话说得很慢，“您把这个也带走吧。”

他没有把左轮枪交到玛伊塔的手里，而是往地上一扔，玛伊塔必须弯下腰把枪捡起来。欧亨尼奥两腿一伸，一屁股坐在那里。他浑身冒汗，歪着个嘴，脸色很难看，像是喘不过气来。他那姿式和表情，如同一个人在垂死挣扎。玛伊塔知道，同他争论也无济于事。

“祝您运气好，欧亨尼奥先生。”说完，撒腿就跑，很快跑过了他同巴列霍斯及彼利科相隔的三四十米，这当中没有听到枪响。当他到了他们那里时，两人正跪在地上开始射击。他想解释一下调解官的情况，但气喘嘘嘘，说不出话来。他趴在地上，想要开枪射击，冲锋枪却卡壳了。他用左轮枪打出了最后三发子弹，他的感觉是随便打出去的。岩石屏障离他们很近，有一排枪口对准了他们，一顶顶军帽时而出现，时而消失。随风传来了清晰的威胁喊叫：“投降吧，他妈的！投降吧，妈的！”“你们的同伙已经投降了。”“求饶吧，狗崽子！”玛伊塔有一种感觉：他们得到的命令是捉活的。正因为这样。才没有一个人受伤，打枪是用来吓唬人的。先行小组真的投降了吗？这时的玛伊塔反而更平静了，他想对巴列霍斯讲一下欧亨尼奥先生的事情，可是少尉用一个用力的手势制止了他，并说：“你们跑吧，我来掩护。”从他那语调和脸色看，玛伊塔察觉到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快跑！这个地方很危险。他们把我们包围了。你们跑吧！快！”

少尉在玛伊塔的膀子上推了一掌。彼利科拔腿跑了，玛伊塔从地上爬起来也跑开了。与此同时，他的周围响起了枪声，但是，他没有停下，一直朝前跑。他上气不接下气，浑身彻骨地冷。他被绊倒了，摔了两跤，左手里的左轮枪也摔丢了。他爬起来，用尽平生之力，继续向前。最后，他体力不支，两腿打绊，双膝跪下，在地上蜷缩成一团。

“我们把他们甩开了。”彼利科对他说。过了一会儿，又听他问：“巴列霍斯哪里去了？你看得见他吗？”过了好一会儿都没有回答，只听到呼哧呼哧的喘气声。“玛伊塔，玛伊塔，我认为那些狗娘养的把他打死了。

汗水顺着玛伊塔的眼睛往下流，他模模糊糊地发现少尉在下面掩护他们——他俩已跑出二百米左右——一些绿色的人影在向着少尉蠕动。

“我们跑，我们跑。”说罢，他极力想爬起来，可他的胳膊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吼叫起来：“你快跑吧，彼利科！我来掩护你。快跑吧！快！”

“他们是在晚上把巴列霍斯押回来的，我亲眼看到的。你们没看到吗？”调解官继续说。凉亭中的两个老头点了点头。欧亨尼奥先生又指了指挂着国徽的那栋小房子（那是区政府所在地）说：“我是从那里看到的，警察把我们这些俘虏都圈在凉台的那个小房间里。巴列霍斯是用一匹马驮回来的，身子用一条被子裹着。把被子拿下来可费了好大的劲，因为伤口流出的血把被子粘在身上了。进盖罗时，他人已经死了。”

调解官信口讲开了关于巴列霍斯是怎么死的，是谁把他杀害的。这个问题，我在哈乌哈和利马不知听了多少遍。我很清楚，谁也不可能给我提供至今我还不知道的材料了，这位盖罗的前任调解官也难以帮我从所有的讹传中搞清哪些是事实真相。有的说，他是死在暴动分子和宪警队的交火之中；有的说，他当时仅仅受了伤，东戈中尉为了报自己受辱的私仇把他杀死了，因为巴列霍斯占领警察局时，曾把他关进了用来关押犯人的牢房；还有人说，他被捉住时，一点儿伤也没有，只是为了教育那些喜欢闹事的警官，上级下令在华伊

哈科高地把他枪决了。调解官在他那独白式回忆中，对上述说法他全提及到。尽管他说话有些谨慎，我理解他是倾向东戈中尉枪杀了年轻少尉的说法。公报私仇，理想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对立，以及暴动分子和当局的对抗，这些是符合我们人民的浪漫主义幻想的。当然了，这并非说这不可能是事实。可以肯定，巴列霍斯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这一历史疑点将永远无法弄清，也不知道他是中了多少发子弹：对尸体没有进行解剖；新闻界也没有提及；证人们都是随心所欲地提供证词：从后颈上中了一颗子弹到全身都是子弹窟窿，各种说法，应有尽有。唯一确凿无疑的是有一匹马把他驮到盖罗时，已是一具尸体。尸体从盖罗又转送到哈乌哈。在那里，他家里的人第二天收了尸，为的是送到利马。他被埋葬在苏尔约老公墓。这个公墓现在已经不用了，废墟中有一些年久的石碑，墓间走道杂草丛生，在少尉的坟墓周围长出了一片野草，墓碑上仅有他的名字和死亡的日期。

“玛伊塔被带来的时候，您也看到他了吗，欧亨尼奥先生？”

玛伊塔没有逃脱聚集在巴列霍斯那边的宪警队的眼睛。他慢慢地缓过气，苏醒过来，趴在地上用他那卡壳的冲锋枪毫无目标地瞎瞄。他竭力控制自己不去想巴列霍斯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是想恢复体力站起来，并赶上彼利科。他深吸了几口气，站立起来，弯下身子就跑。他顾不得警察是否对他开枪，也不管脚下踩在什么地方，一直跑得无力再跑才停了下来。他扑嗵一声倒在地上，紧闭双眼，等待着子弹从他身体里穿过。你要死了，玛伊塔，这就是死。

“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在他旁边的中学生结结巴

巴地问。

“我掩护你。”他气喘嘘嘘并想操起冲锋枪瞄准。

“我们被包围了，”小伙子嚎叫起来，“他们会杀死我们的！”

玛伊塔透过自己额上淌下的汗水，看到四周全是宪警，有的卧倒，有的蹲着，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他们两个。宪警们的嘴巴翕动着，玛伊塔可以听到一些模糊的喊叫声；不过用不着听也知道喊些什么：“放下武器！投降吧！”投降？反正是一死，要不然就要受酷刑。他用全身的力气紧扣枪扳机，可是冲锋枪依然卡壳，他白费了一阵力，这时候，他听到彼利科在抽泣。

“放下武器！举起手来！”一声很近的喊叫，“要不然，就叫你们完蛋。”

“别哭，不要让他们笑话。”玛伊塔对中学生说，“你去吧，彼利科，把枪放下。”

玛伊塔把冲锋枪向远处扔去，两手捂着头站了起来。彼利科也学他的样子把枪扔了。

“利图玛班长，”这声音像是从喇叭里传出来的，“你给我搜，他们要是动一动，就把他们烧死。”

“是，中尉先生！”

全副武装的宪警队员，持枪荷弹从四面八方跑过来。玛伊塔又累又冷，动也不动地呆在那里，等待着宪警队靠近他，他断定要对他拳打脚踢。但在对他进行从头到脚搜身时，他只是感到推推搡搡。警察把他腰上的子弹带扯下来，骂他“小偷”、“扒手”，命令他把鞋带解开，并用根绳子把他反绑起来，把彼利科也同样捆住。玛伊塔听到利图玛班长在教训小伙子，说他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变成了小偷也不感到

羞耻。小偷？警察把他们当成偷鸡摸狗的家伙了。对于这些警察的无知，玛伊塔忍不住要笑出来。由于这一举动，警察朝他背上砸了一枪托，同时命令他走动。他开始迈步，两只脚在松松的鞋子里来回滑动。他已经不是原来的机器人了，他开始思索，怀疑，回想，自问，他感到自己在发抖。与其以后遭罪，现在死了不是更痛快吗？

“拖延了回到哈乌哈的时间，不是因为两个死人的原因，”调解官说，“而是为了钱。钱放在哪里呢？宪警队的人为了找钱简直要急疯了，可是连钱的影子也没有见到。玛伊塔、塞农和中学生都发誓说，除了付给特奥弗拉西娅·索托寡妇的牲口钱和赫特拉第斯的午饭钱以外，全部的钱都放在骡驮子里。捉到孔多里那一组的宪警发誓说，骡驮子里连一个铜板也没有，所有的只是些毛瑟枪、子弹和几个饭锅。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搞清楚钱放在哪里，审问占去了很长时间，因此，赶到哈乌哈时，天已经亮了。”

现在，我们也比原定时间回来晚了。时间大都在盖罗凉亭下消磨掉了。天很快就黑下来，卡车的灯打开了。本来是茂密的树林，现在只能看到一晃即逝的褐色树干和使汽车上下颠簸的大小石块。我茫然地想到，在弯弯曲曲的小道上有遭受伏击的危险，还有踏上地雷的危险，要是在宵禁开始后赶到哈乌哈，就有被抓起来的危险。

“那么，把抢劫的钱弄到哪里去了呢？”滔滔不绝忆当年的欧亨尼奥先生提出疑问，“是宪警队把钱私分了吗？”

这是冒出来的另一个未知数。在这一案件中，至少我有一条可靠的线索。漫天的谎言把水搅混了。叛乱分子从哈乌哈拿的钱能有多少呢？我的感觉是银行职员夸大了钱的数目。

革命分子也不知他们拿了多少钱，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时间点钱。钱是装在几个口袋里放在骡子背上驮着的。有人知道口袋里有多少钱吗？也许谁也不知道，也许其中有几个抢劫者把塞进自己腰包里的那一部分钱花光了，因此，还给银行的钱数几乎不到一万五千索尔。这与暴动分子“征用”的钱数相比，要少得多，比银行所报的失盗数就更少了。

“这可能是这次事件的最可悲之处。”我真想大声疾呼，“暴动是作为一场革命开始的，而最后竟落得以争执抢了多少钱，谁把赃物装进了腰包而告终。”

“万物皆有生死，有始就有终。”欧亨尼奥先生从哲学的观点上作了概括。

玛伊塔当时猜想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利马报刊将要报道的消息，猜想到革命工人党和托派革命工人党的同志们以及共产党内的反对派们，在读到报界对发生事件所作的那种夸张的、虚构的、耸人听闻的和黄色的报道时所要发表的议论；他想象得出托派革命工人党将会召开一次会议，以汲取这一事件的革命经验教训；他仿佛能听到他的老同志们在慷慨陈词，听到每个人的语调。他们在说，实践证明了党所作出的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科学分析，不信任并拒绝参加这次注定要失败的小资产阶级的冒险行动是完全正确的。难道有人会提出正是因为不信任和拒绝参加才导致这次失败吗？恐怕在他们那些人的脑子里根本就未曾想过。如果托派革命工人党的所有干部都坚决地加入这一行动，暴动将会出现另外的局面吗？回答是肯定无疑的。果真如此，他们将会把矿工们，把乌维鲁斯先生，还有里克兰的民众都拉过来，一切都会计划得更好，行动得更有力，说不定现在这个时候正在安全地向阿伊娜方向挺进。玛伊塔，你当时的所

作所为是正确无误的吗？你进行过深思熟虑吗？没有，事情来得太快了，一切都迫在眉睫。在出现那样的局面时，应当从一开始就平心静气地分析一下发生的情况，以冷静的头脑采取行动。要是换种方法考虑问题，使事先约好的人和托派革命工人党的人都加进来一起干，暴动可能有更大希望的成功，或者至少使失败推迟一些，不过这还要流更多的血。他感到悲伤，真想把阿纳托里奥的头贴在自己的胸脯上，倾听那缓慢、和谐、几乎是音乐节奏的呼吸，而到了精疲力尽的时候，就躺在他身体上睡一觉。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发现牙齿上下打架，格格作响。他觉得背上挨了一枪托：“快走！”每当巴列霍斯的形象出现在他的脑际时，他就感到冷不可忍，于是便竭力驱走这一形象。他不愿去想他，也不愿询问自己，巴列霍斯是被俘，还是受伤，或是就义了？是不是警察在拷打他，或是杀害他了？玛伊塔明白，现在要是灰心丧气，他将无力承受以后等待着他的一切。他需要勇气，需要有比抵御刺骨寒风更大的勇气。他们把彼利科带到哪里去了呢？其他的人又在何处？也许有几个人逃出去了？在两列宪警队中间被押解的就他一人：警察把他当成个怪物，有时斜眼看看他。他们忘记了刚刚发生的一切，把手插在口袋里，聊天抽烟，好不自在，简直就像是散步归来一样。

“我再也不会有高山反应了。”他自己这样想。他极力想辨认出他们上来时走过的地方，可是现在已经不下雨了，完全呈现出另一派景象：色调明暗清晰，植物的芒刺不像原来那么锋利，道路泥泞难行。他的鞋总往下掉，必须停下来提一提。每次提鞋，走在他身后的宪警都要推他一下。玛伊塔，你后悔吗？操之过急了吧？你太不负责任了吧？不，不，不，事情完全相反。尽管失败了，犯了错误，失之莽撞，但他感

到自豪。他第一次感到做了点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微不足道，但推进了革命。他没有感到像以前几次被捕那样不值得。他们是失败了，但他们作了尝试。四个下了决心的成人和一帮年轻的学生竟然占据了一座城镇，解除了治安部队的武装，征用了两家银行，并逃进了深山，革命是可能的，这已经得到了证实。今后，左派一定要考虑这一先例：在我们的国家里，有的人不满足于口头宣传革命，而是力图发动革命。“你已经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他心里想。就在这时，他的鞋又掉了下来。在他提鞋的一刻，又挨了一枪托子。

我叫醒了在回程的半路上就睡着了的欧亨尼奥先生，把他送到在哈乌哈郊外的家里，并对他的陪同和他对往事的回忆表示感谢。我住进了芭卡客店。店里的餐厅还开着门，可以吃点东西；不过，我只要喝瓶啤酒就够了。我把啤酒拿到突出在小湖上面的小平台上去喝。布满星斗的天空挂着洁白的圆月，月光洒在湖边的杂草上，湖水光洁而平静。芭卡的夜晚，一般都会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有呼呼的风声，咯咯的青蛙叫声和夜莺宛转的歌声。。今晚非同以往，动物都不声不响了。客店里唯一的顾客是两个经纪人，他俩是啤酒商。我听到他们在餐厅玻璃的另一边聊天。

以上所述是这一历史事件的高潮和结束，总共经历了不到十二个小时，黎明时以占据监狱开始，黄昏之前以巴列霍斯和孔多里之死以及其他人的被捕而告终。他们被带到警察局，在那里关押了一个星期，然后又转送到黄卡约监狱关了一个月。在那里，遵照法院儿童刑事法官的判定，把中学生放了出来，交给家长看管，并对他们的住处进行监视。盖罗调解官“出污泥而不染”，实际上三个星期后就官复原职了。

玛伊塔和塞农·贡萨雷斯被带到利马，关押在第六监狱，

接着又关进弗隆东监狱，然后又再次回到第六监狱。不知过了多少年后，在秘鲁的一位新总统就职之时，他们两人被赦免了——他们的案子从未进行过审理——塞农还是领导乌丘巴木巴农民合作社，该社从一九七一年土地改革起，已经归属于阿伊娜庄园。塞农属于人民行动党，以前也曾是在这一地区的该党负责人。

起初那几天，报刊对暴动事件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报道，而且登在第一版，大标题。社论、文章也随之大出特出。鉴于玛伊塔的履历，这一行动被认为是共产党暴动的一次尝试。在《新闻报》上刊登了他的一张照片，是在一间牢房的铁窗后拍摄的，难以认定是他本人。事实上过了一星期之后，这再也不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了。后来，由于受古巴革命的影响，一九六三年、六四年、六五年和六六年，在山区和丛林里出现了游击队的萌芽。但是，没有一家报刊想起过，把人民武装起来并在秘鲁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就是那一次被人看不起的事件。那个年代，在哈乌哈县也曾轰动一时；而今天，竟没有人记起那次暴动的主要人物。

正当我要去睡觉的时候，终于听到了一种有节奏的声响。不，这不是夜莺的叫声，而是风卷湖水撞击客店平台发出的嗒嗒声。这一柔和的音乐和哈乌哈美丽的星空，象征着一个温和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们是和善而幸福的。骗人的鬼话，这是一种假相。

第　十　章

我第一次来卢里甘乔监狱是在五年以前，那是二号牢房的囚犯们邀请我参加一个图书馆的开幕式，有人还建议用我的名字命名。出于想证实一下我听到的关于利马监狱之事是否真实的好奇心，我接受了邀请。

要到监狱，必须从斗牛场前经过，穿过萨拉特区、贫民窟，最后是堆积如山的垃圾区，那里是放猪的地方，被称为“地下猪场”。道路上的沥青已脱落，到处坑坑洼洼。那是一个气候潮湿的上午，大雾笼罩下的牢房没有任何色彩，和周围的沙地同为一色。从远处望去，会发现无数的窗户。如果说以前窗户上曾有过玻璃，现在全都没了，从那些对称的小方框窗里，露出来的是人们的面庞和向外张望的一双双眼睛。

自第一次访问，这个建筑群就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它是为容纳一千五百个犯人而建的，现在却拥挤着六千名囚犯，其肮脏程度难以形容。表面被掩盖着的暴力气氛，可借着随便什么冲突和犯罪一触即发。这群人的人格被剥夺，与其说是人的集体，还不如说是牲口群或狗群更为恰当。现在我才确切晓得，玛伊塔当时就在这些人当中。上一次我可能还见到

过他，甚至同他打过招呼。他那时在二号牢房吗？他是否也参加了图书馆的开幕式？

牢房分两排，单号在前，双号在后。在铁丝网和锯齿般围墙的斜对面，有一所远离中心、同其它建筑极不相称的牢房，那里是隔离同性恋罪犯的地方。双号牢房里住的是要犯或罪行严重的犯人。第一次入狱还没有判刑的或服轻刑的犯人住在单号牢房。这就是说，玛伊塔在后几年曾是双号牢房的房客。囚犯们来自不同地区：阿古斯蒂诺、比利亚、埃尔萨尔瓦多、维多利亚、波贝尼尔。他们不按地区分住，而是混杂在一起。玛伊塔的名字是在哪一本花名册上呢？

汽车慢慢地行驶，我下意识地把车速放得越来越慢，想尽可能拉长一下这第二次访问卢里甘乔监狱的时间。一年来，我一直在调查、打听、构思和撰写玛伊塔这个主要人物，现在终于要亲眼见见他本人了。是这一心情使我感到有些紧张呢，或是我厌恶这种地方的情绪超出了我要了解玛伊塔的好奇之心？在首次访问结束时，我曾想过：说囚犯的生活如同牛马，这不真实。牛马比起囚犯来，有更多的活动余地，狗窝、鸡窝和牲畜圈要比卢里甘乔监狱干净得多。

牢房与牢房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小通道，人们讽刺地称它“团结街”①。那里，白天阴暗无光，晚上漆黑一团，监狱里的帮伙和寻衅斗殴的人经常发生流血武斗，而在那里叫卖咖啡的人照常招徕顾客。走过那可怕通道的情景，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进入监狱，就像进了牛马群之中，一个个犯人如同梦游患者，有赤身露背的黑人，有身上刺着花纹的印欧混血人，有头发披散到腰部的黑白混血人，有表情痴呆、胡子拉

① 利马老市区的一条商业繁华的小街。

碴的白人，有长着蓝眼睛、伤痕斑斑的外国人，有瘦削的中国人，有靠着墙根、蜷缩着身子的印第安人，还有自言自语的精神病患者。我知道玛伊塔几年前曾在“团结街”经营一个食品饮料铺。尽管我用心回忆，对于在闷热的通道里有个小铺却一点印象也没有。是因当时人多混杂没有注意？或是所谓小铺就是在地上放一块毯子，玛伊塔蹲在那里叫卖果汁、水果、烟卷和汽水？

要到二号牢房，必须绕过单号牢房，从侧翼穿过两道铁丝网。典狱长在第一道铁丝网的地方向我告辞说，如果再往前走，出了危险要由本人负责，因为共和国警察是不进入那个区域的，任何带武器的人都不进到那里面。我刚刚穿过铁栏杆，一大堆人就朝我拥了上来，大家比比划划地同时争着讲话，邀我的代表们把我团团围了起来。我就在这一堆人中间前进，外围是一群犯人，他们把我当成了某一位当权要员，诉说他们的案情，七嘴八舌，抗议滥用职权，大喊大叫，要求审理他们的案子。有几个人讲得有条有理，大部分人东一句西一句，说得杂乱无章。我发现所有的人都焦躁不安，暴跳如雷，心慌意乱。就在我们向前走的时候，有人把左边的那堆肮脏的垃圾指给我看。那里臭气冲天，苍蝇飞舞，垃圾有一米高，是监狱里的废物长年累月堆积起来的结果，一个光着身子、伸着双腿的犯人躺在脏物堆上睡觉，这是一个疯子。对于那些疯人的一般做法，是把他们分配到危险比较少的牢房，也就是单号牢房。我记得在我第一次访问之后有人告诉我，在卢里甘乔监狱，罕见的事不是有没有疯子的问题，而是疯子的多少，如果这鬼地方的六千名犯人没有全都变成精神病、疯子，那就算少。在这些年月里，是不是玛伊塔也变成了疯子？

玛伊塔因为哈乌哈事件被囚禁了四年之后，又几次三番入狱。第一次是在第七个月头上被赦免。要重新建立起他那个时候的历史档案是极为困难的（系指刑警档案），因为除了哈乌哈暴动以外，关于他被告卷入的其它事情几乎没有文字材料，也没有旁证。我在国家图书馆报刊陈列室所能找到的一些零星报道材料是那么简单，实际上不可能知道他在那几起抢劫案中扮演什么角色。然而，从报道中看，他又是个主犯。至于弄清楚哪些行动是政治性的，哪些是一般刑事犯罪，这就更不可能了。熟悉玛伊塔的人可能会想，不可能不是政治性的行动。“熟悉玛伊塔”有什么意义？我所调查的是四十多岁时的玛伊塔，而现在的玛伊塔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是同一个人吗？

这最后十年，他是在哪间牢房度过的呢？是在四号、六号，还是八号？差不多他全住过。这些牢房也许同我所了解的牢房一样：极其低矮，灯光微弱（指不停电的时候），阴冷潮湿，几个窗户的铁棱都生了锈，还有一个像是下水道的洞穴。谈不上一点卫生条件，屋里到处是粪便、虫子和垃圾。在那中间抢占一块能伸开腿睡觉的地方，成为平日经常性的争斗。图书馆开幕仪式期间——所谓图书馆就是在一个油漆的大箱子里放了几本旧书——我曾看到几个东倒西歪的醉汉。当他们把酒盛在小铁罐头筒里为图书馆开幕干杯时，我知道他们喝的是牢房用木薯酿造的烈性“奇查酒”，并常用这种酒把自己灌得大醉。我的那位老同学在消沉或高兴时，也用这种酒把自己灌醉吗？

二十一年前，也就是在哈乌哈事件之后，玛伊塔又被抓进监狱。案件发生在维多利亚区，在该区的那条不光彩的街

道附近。那条街是妓女窝，娼妇街。唯一报道了这一案件的《纪事报》说，三个歹徒占据了一间车库，该车库是特罗多罗·鲁伊斯作为机械车间用的。那是在上午八点，当鲁伊斯走进车间时，里面有三个人手持左轮手枪在等着他，他的徒弟埃利塞·卡拉维亚斯也被束手就擒。劫持人的目标是人民银行。在车库深处，有一个窗户向着一块空地开着，那家银行的暗门也对着那块空地。中午时分，一辆汽车开进空地，通过暗门取出分行存放的钱送往总行，或是存入总行给分行的现金。直到那时，三个歹徒和两个俘虏还呆在那里不动，一边抽烟，一边通过小窗户向外窥探，三个歹徒的脸都是蒙着的。但事过之后，不论是主人还是学徒工都一口咬定其中一个是玛伊塔，更有甚者，还说是他在指挥。

一听到汽车开动的马达响，他们就纵身从窗户跳出，没发一枪一弹。就在银行职员把一袋子封有三百万索尔印记的钞票放上汽车时，抢劫者出其不意地把司机和保镖捉起来，缴了他们的武器。歹徒们逼他们躺在地上，其中一人打开了通向“七·二八”大街的院门，把银行的汽车驶上马路，另两个同伙早已拿着钱上了车，就这样，车很快开走了。由于开车人的紧张和不熟练，汽车撞了一个磨刀人，接着和一辆出租车相撞而爆炸。据《纪事报》报道，在翻车之前，车打了两个转，强盗们跳下了汽车，逃之夭夭。几小时之后，玛伊塔被逮捕了。报道没有说钱找回来了没有，也没有指出另外两个同伙是不是落网了。

玛伊塔是否因抢劫案而判刑，这事我一直没搞清楚。我从维多利亚警察局的档案卷中找到一份材料，基本上是重复《纪事报》的报道（纸张受了潮，字迹难以辩认）。在存有犯人材料和口供的司法部的文件中，有关玛伊塔的案子模糊不

清。有一个日期——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六日——应是他从警察局转到监狱的一天，但接下去写的是：“抢劫银行未遂，故意伤人，拦路绑架，制造交通事故和袭击行人。”最后是负责该案的法官落款。再没有更多的材料了，有可能是判决被拖延了，法官死了或被撤了职，或纯系案卷丢失了。玛伊塔为了此案在卢里甘乔监狱呆了多少年呢？这也不得而知。入狱时有登记。出狱时则没有登记。对于这个问题我也要问他本人。关于他的行踪，我早已一无所知，直到十年前他再次被关进监狱时，我才得知他的消息。这一次他确实受到了应有的审讯，并以“敲诈、绑架和谋财害命罪”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如果文件上的日期确实无误的话，那他在卢里甘乔监狱呆了至少十一年。

我终于到了要到的地方。首先履行了手续：共和国警察把我从头至脚搜摸一遍，把我的证件交到接待室，访问结束后领取。典狱长派人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一个文职助手带着我穿过了铁丝网外的一个院子就到了。从那里望去，整个监狱尽收眼底。这里是监狱最清洁的所在，而且不是那么杂乱无章。

典狱长的办公室是在一栋水泥建筑的二层楼上，房间阴凉，墙皮脱落，仅放了一张铁面桌子和一对椅子，全部墙壁光秃秃的，在办公桌上甚至连一支铅笔和一张纸都看不到。典狱长已经不是五年前的那位了，此人比较年轻。他已经得知我的来意，就打发人把我所要求谈话的犯人带来。典狱长要把他的办公室借我谈话时用，因为这是唯一让我感到安静的地方。“您已经看到了，卢里甘乔监狱里人多得不得了，没有一点空闲地方。”就在等人的时候，他补充说，“尽管做出了

极大的努力，事情总也搞不好。现在，囚犯们大吵大闹，用绝食进行威胁，因为他们以为要对探监的人加以限制。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典狱长向我保证说，这纯属为了对探监更好地加以控制，因为往往有人通过探视而把毒品、酒和武器带进狱中来。现在已经规定把男女分开，一天是妇女探视，一天是男人探视。这样，每次探监的人数将会减少，可以对探视的人挨个仔细搜查。如果能把可卡因的走私制止住，就可以减少很多的死亡，特别是吸毒，上了瘾就难以自拔，还有酗酒、赌钱、同性恋，都是因为吸毒引起的。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制止住毒品的输入。警察和看守不是也搞贩毒的生意吗？典狱长看了看我，像是对我说：“既然知道，还问什么！”

“这也是不可能避免的。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加以控制，他们总有法子对付。一次只要弄进一毫克的烟土，随便一个看守人员的薪金都能翻一番。您知道他们挣多少钱吗？这不必大惊小怪，人们对卢里甘乔监狱的问题议论纷纷，其实没有这么严重，问题出在国家。”

他满不在乎地说了这番话，好像现在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看来典狱长这个人挺直爽，心地不坏。说实在话，我可不羡慕他的这个职位。几下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那我可就把这个人交给您了。”他边去开门，边对我说，“请您抓紧规定的时间。”

进到办公室的人是一个消瘦的白人，头发卷曲，稀疏的络腮胡子，身子裹在宽大的上衣里，浑身不停地抖动。他脚下穿着一双破鞋，惊恐的眼珠子在眼眶里转来转去。他为什么这样地抖动呢？是有病，还是害怕？我不知该说什么好。这

怎么可能是玛伊塔呢？他一点也不像照片上的玛伊塔，可以说比那个玛伊塔要年轻二十岁。

“我想和亚里杭德罗·玛伊塔谈谈。”我含含糊糊地说。

“我就是亚里杭德罗·玛伊塔。”他用微弱的声音回答，他的双手、皮肉以至汗毛孔都紧张不安。

“是在哈乌哈事件中同巴列霍斯在一起的玛伊塔吗？”我疑惑地问。

“啊！不，我不是那个玛伊塔。”他恍然大悟地叫起来，“那个玛伊塔已经不在这里了。”

看来他一块石头落了地，带他到典狱长办公室所预感到的某种危险终于消失。他回转身，使劲地敲门要走。门开了，典狱长由两名助手陪着出现在门前。一直恐慌不安的卷头发犯人解释说，我要找的人不是他，而是另一个玛伊塔。他迈动了拖着破鞋的双脚，不声不响地迅速离去，身体一直不断地抖动。

“你知道玛伊塔在哪里了吗，卡里略？”典狱长询问跟随他的一个人。

“当然知道，当然知道。”一个满头白发的胖子说。他留的是小平头，挺着个大肚子。“另一个玛伊塔，不就是有点政治问题的那一个吗？”

“是的，”我对他说，“我就是要找那个人。”

“您来得不巧，”他马上给我解释，“这个人上个月出狱了。”

我想，这下完了，我将永远也找不到他了。也许这样更好些，要是找到有血有肉的玛伊塔本人，可能不一定有助于我，甚至可能有碍于我正在从事的这项工作。不知道他去哪里吗？谁都没有他的地址？没人知道，也没有人去关心他的

住处。我对典狱长说，不必麻烦来陪我了，卡里略同我一起去就行了。在我们下楼梯时，我问卡里略对玛伊塔是不是记得准确没错。他当然记得玛伊塔，他在这里住了那么长的时间，是犯人中最老的一个。玛伊塔入狱时，他还是一个单纯的小伙子，而现在他是副典狱长，他可见多识广了。

“玛伊塔是个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犯人，从不参加胡闹。”他说，“他在四号牢房包了个食品铺，人很能干，服刑期间，还要养家糊口。最后一次，他在这里至少关了十年。”

“他有家？”

“老婆加三四个孩子。”他补充说，“过去，老婆每星期都来看他。我对玛伊塔这个印欧混血人记得可清楚了，他走起路来左右摇摆，像鸭子，对吧？”

当我们在铁丝网之间穿过院子走向接待室的时候，副典狱长停住了脚步。

“您等一下。阿里斯佩可能有他的地址，是他从玛伊塔手中接下了四号牢房的小食品铺，我认为他们俩是合伙经营。我派人把他叫来，也许您有运气。”

卡里略和我面对铁丝网在院子里等着。为了消磨时间，我就问他关于卢里甘乔监狱的情况。他同监狱长的看法一样，说这里总出问题，因为这里面的人很坏，像是天生的残忍，对别人冷酷无情的劲儿简直没法说。远处那地方是同性恋犯人的范围，那边的牢房孤零零的，和其它牢房不协调。现在还是关押同性恋者吗？是的。尽管单独圈起来，但也管不了多大用；别看有土围墙和铁栏杆，囚犯们也能进去，同性恋者也能出来，那种勾当差不多一直没间断过。但不管怎么说，自从有了他们的单独牢房，问题是少多了。过去把他们和其他犯人混杂在一起的时候，打架和凶杀的事要多得多。我记得

在我第一次访问监狱时，同监狱的一位医生简单地谈过关于新入狱犯人被奸污的问题。医生说：“ 由此而直接引起的病是化脓、毒疮和癌变。 ”我问卡里略是不是奸污的事一直在发生，他笑了笑说：“ 对于这些没有出息的人，这事是免不了的。您不信？他们是想方设法要发泄的。 ”被通知的犯人终于来了，我对他说明了找玛伊塔的来意，问：“ 您知道到哪儿可以找到他吗？ ”

此人相貌堂堂，衣着也较整齐。他不声不响地听我讲话，看得出他存有戒心。我确信他不会告诉我任何消息的，就请求他在下次见到玛伊塔时，把我的电话号码交给他。没想到这个人突然下了决心，“ 他在经营一个冷饮店， ”他对我说，“ 就在观花埠区。 ”

那是在很多年以前就有的一个小冷饮店，坐落在树木成荫的博洛涅西街。我从年轻时起，对那里就很熟悉，因为那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她的芳名与那里的花园名称相同：弗洛拉 · 弗罗雷斯，我肯定这个冷饮店在那个年代就存在，有一次我和美丽的弗罗拉姑娘还进去吃过一次路枯玛蛋卷。店铺的地方很小，就是一个简单的车库，或类似车库的处所，在那条街独此一家。街上没有商店，全是些五十年代典型的赏花小房。房子分两层，门口有个小花园，园内有花有草，如天竺葵、叶子花和其它开红花的草本花卉。在拐过海堤进入博洛涅西街的时候，我不禁产生了一种紧张的心情。是的，这正是我熟悉的地方，几步开外，有一所带凉台的灰房子。在那里，我曾等待过弗罗拉姑娘的出现，看她那甜美的脸蛋和深情的眼睛。我把汽车就停在离小冷饮店几米远的地方。不知怎么搞的，我竟然笨手笨脚起来，差一点没把钥

匙插进车门的锁眼里。

店的铺面确实很小。尽管靠墙放着几张小桌子，上面还铺着油漆花桌布，看上去挺时髦，但店里没有一位顾客。关照顾客的就玛伊塔一个人，他身穿长袖衫，比照片上略有点胖，也有点老；不过，即使他夹在几十人中间，我仍然一眼就能认出他来。

“亚里杭德罗·玛伊塔，”我说着就向他伸出了手，“怎么？您不是？”

他面对我仔细察看片刻，笑了笑，张了张他那没有牙齿的嘴；眨巴着眼睛，极力想认出我来，最后他泄气了。

“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他说，“我拿不准您是不是桑托斯，不过，你，您不是桑托斯，对吧？”

“我很长时间以来就在找你。”我把胳膊放在柜台上对他说，“我敢说您感到很突然。我刚从卢里甘乔监狱来。告诉我怎么找您的人，是您在四号牢房的合伙人阿里斯佩。”

我细心地观察他，看他有什么反应。看来他并不感到突然，也没有觉得不安。他用一种好奇的目光看着我，挂在褐黑色面孔上的一丝微笑也消失了。他穿的是一件粗棉布衬衫，他的手像钳工或农夫的手一样粗糙。最使我注目的是他那滑稽可笑的发型：头发是叫别人胡乱剪的，像狗啃的一般，简直就是一把地板刷子，看上去有点好笑。他的头使我想起我在巴黎的第一年，那时经济上非常困难，我和一个朋友在伯利滋学校教西班牙语。我们俩到巴斯蒂亚附近的一家理发馆去理发，几个小学徒免费为我们服务，结果头被理得像我的这位所谓老同学的头一样。他眯起了疲倦的黑眼睛——眼睛的周围布满了皱纹——用一种刚刚产生的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我。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打听您，同认识您的人交谈。”我对他说，“我对您进行了假想，以至于做梦都梦见您。这是因为我写了部小说，尽管是虚构的，但与哈乌哈那段历史有关联。”

他一声不吭地看着我。他现在确实感到突然，不理解，不相信他的耳朵所听到的，他真的不安起来。

“不过……”他结结巴巴地说，“您怎么如此心血来潮，这事怎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个。不过，这已经花费了我一整年的心血。”我迫不及待地对他说。我被他的恐惧吓住了，我怕他拒绝继续谈话，怕他往其它方面扯。我向他解释说：在一部小说中，编造的部分总比真人真事多；一部小说从来不是一部真实的历史。我做的这一调查，这些会见，不是介绍在哈乌哈发生的真实事情。确切地说，是为了编造而编造。

我发现，这番话不但没有打消他的顾虑，反而把他弄糊涂了，使他更加紧张起来。他一个劲地眨巴眼睛，张口结舌，像哑了似的。

“噢，您是作家。”他明白过来了，“是的，我以前见过您，我相信在几年以前，我甚至读过您写的一部小说。”

就在这时，进来了三个汗流浃背的小伙子。从衣着打扮上判断，是刚刚做过体育活动，他们要汽水和雪糕。在玛伊塔照顾这三位顾客时，我留意观察了他在冷饮店里的动作。他打开放满蛋卷的冰柜，起开汽水瓶盖，递过杯子去。他的动作利索、熟练，看得出是个行家里手。我极力想象他在卢里甘乔监狱四号牢房的情景。十多年来，他每天上午向其他犯人兜售果子汁、水果、饼干、咖啡和烟卷。从他的外表看，他不像是被征服了。他是个坚强的人，他问心无愧地度过了六十多个春秋。

他收起那三个运动员的钱之后，强装笑脸回到我身边。

“好的，”他嘟嘟囔囔地说，“这对我来讲，确实是发生的最后一桩事。怎么？写一部小说？”

他左右摇动他那疑惑不解的脑袋。

“当然不会出现您的真名实姓。”我向他保证说，“毫无疑问，我把时间、地点和人物都改变了，我编造、补充和减去了很多很多的情节。另外，我还虚构了一个恐怖的秘鲁，它遭受到战争、恐怖和外国干涉的破坏。当然了，任何人也识别不出什么，而且所有的人都将会认为这纯粹是虚构的。我还虚构了咱们是中学的同学，年龄一样大，而且是一生中的知心朋友。”

“当然。”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迸着说，同时将信将疑地观察我，仿佛是在猜测我的用意。

“我想同您谈一谈，”我补充说，“向您提几个问题，澄清某些事实，我有很多的未知数在头脑中翻转。当然，只限于您愿意和可以告诉我的。另外，这一次谈话将构成小说的最后一章。您不能把我拒之门外，否则会使这部小说不完整。”

我笑了笑，他也笑了，我们听到那三个运动员也笑了，不过，他们是因为有人讲了个笑话而发笑。就在这当儿，进来个妇女，说要买半磅阿月洋子果和巧克力各一半的冰淇淋带走。玛伊塔关照完女顾客后，又回到我的身边。

“两三年前，革命先锋队的几个小伙子到卢里甘乔监狱看我，”他开口说，“他们想了解哈乌哈的事，叫我写份书面旁证。但是，我拒绝了。”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说，“我感兴趣的不是政治，而是文学，也就是说……”

“是的，这我知道。”他一扬手打断了我的话。“好吧，我

陪您一晚上，就只一个晚上，因为我的时间不多。说实在的，我不愿意谈那些事。定在下星期二，怎么样？这个时间对我合适，因为只有星期三是十一点钟开门，我可以在开门前多睡一会儿觉。其它的时间，我六点钟离开家，到这里路上要换三次车。”

我们商定好星期二晚八点之后我来店门口找他。我正要起身，他把我叫住：

“请吃一个冰淇淋吧！我请客，为的是让您尝尝这冰淇淋有多么好吃，看看您是不是会成为我们的顾客。”

在回巴兰科区前，我在这个区转了一会儿，想把我的思想理出个头绪来。我在美丽的弗罗拉姑娘曾住过的房前凉台下停了一会儿。那时，她肩披粟色的散发，细长身材，一双海蓝宝石般的眼睛。当她去观花埠沙石海滩时，身穿黑色游泳衣，脚蹬一双小白鞋，灼热的太阳高挂天际，到处洒满了阳光，海浪欢快地歌唱。我记忆中，她跟一位飞行员结了婚。婚后几个月，因飞机撞在利马与迭戈·玛丽娅市之间的安第斯山峰上，她丈夫遇难身亡。有人告诉我，几年后，弗罗拉改了嫁，并移居到迈阿密。我漫步走到格拉乌大街。在这条街的拐角处，过去有一帮少年，我们（在观花埠另一边的迭戈·费雷的青少年）常同他们在特拉萨俱乐部举行激烈的小足球赛。我记得小时候是多么焦急地盼望这样的比赛呀！而当我被列入后补队员时，我的心就凉了。半个小时后，当我回到车里时，我已经把同玛伊塔的谈话在脑子里理了一遍。

使玛伊塔重新进入卢里甘乔监狱并在那里呆了十几年的案件，各家报纸和司法档案中都有案可查。事情发生在离人类学博物馆不远的玛格达莱娜老区，时间是一九七三年一月

的一天凌晨。当时，自由人民区信贷银行分行的经理正在给自家的小花园浇水（他每天早晨，在穿西装前浇花）。就在这时，有人按门铃。他原想是提前送奶的送奶工人，就去开了门。四个家伙用套耳帽蒙着面，把手枪顶在他的身上。他们胁迫经理一起到了经理妻子的房间，把夫人捆绑在床上，接着就进了经理的独生女儿的卧室（看来他们对这家了如指掌）。他女儿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学旅游专业的大学生。他们等姑娘穿好衣服，警告经理说，如果他想重见女儿，得带上装有五千万索尔的手提箱到国家体育场附近的卡里福斯公园去认领。说完，他们带着姑娘上了头天晚上偷盗的一辆出租车就不知去向了。

福恩特斯先生报告了警察，按照警察的旨意，他把装满纸张的手提箱带到卡里福斯公园，他的周围布满了便衣警察。但是，没有一个人走近福恩特斯。三天过去了，他没收到任何通知。当他和妻子已经绝望之时，外面打来了电话：绑架者知道他报了警，他们给他最后通谍，令他把钱送到航空大街的一个拐角处。福恩特斯解释说，他不可能凑足五千万，银行从来不会给他这样巨额的现钞。他准备把自己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大约有五百万。绑架分子坚持不让步：要么交出五千万，要么把姑娘杀死。福恩特斯借了钱，签了字，凑了九百万，于当晚送到指定的地点。这一次他没有报告警察。一辆汽车突然停住，坐在司机旁边的人二话没说就把手提箱拿走了。几个小时之后，姑娘回到了父母家。绑架分子先把她送到殖民地大街，是她自己要了辆出租车才回到家。姑娘被扣了三天，眼睛用带子蒙着，绑架分子还用三氯甲烷使她处于半昏迷状态。她的神经已经错乱，父母把她送进职工医院，她和一个动阑尾手术的病人住在一个房间。过了不几天，她

没有和病友打一声招呼，便一个人出了房间，跳楼自杀了。

姑娘的自杀在新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公众舆论为之大哗。几天后，警方宣布已经逮捕了帮伙的头头玛伊塔，他的同伙也即将落入法网。根据警方透露，玛伊塔招认了他的罪行，并交待了所有的细节，但是，同伙和钱一直也没再交待。在审理此案中，玛伊塔矢口否认他参与了抢劫，甚至不知道有这回事。他一口咬定口供是逼供的结果。

这一案件历时几个月，开始的时候，报纸上大作文章，但很快就无声无息了。尽管他提出抗议，声明他是无辜的，但法庭认定他就是绑架、抢劫和间接杀人的罪魁祸首。他反复解释，发生绑架那天，他正在帕斯卡玛约区打听可能会找到的一个工作，结果没有找成。福恩特斯一家的证词，对玛伊塔实在太不公平了，他们老两口一口咬定他的声音和体形同戴耳帽的家伙一模一样。玛伊塔的辩护人是一个平庸之辈，在整个案子中，他的作为是笨拙无力的。他把判决作了上诉，两年后，最高法院仍维持原判。但是，玛伊塔只服了三分之二的刑期就被释放出狱。这无疑证实了卡里略先生在卢里甘乔监狱所讲的话：十年期间，他的表现是个典范。

星期二晚上八点钟，当我到冷饮店找玛伊塔时，他已经在那里等我了。他拿了个手提包，里面可能装着工作服。他刚洗过脸，梳了梳那滑稽的发型；有几滴水珠还在顺着脖子往下流。他穿了件蓝条衬衣，一件褪了色、打着补丁的灰色方格外套，一条满是皱褶的卡叽布裤子，鞋底很厚，看得出是用来走远路的。“您饿吗？”我问他，“我们要不要去找家饭馆？”他对我说他晚上从不吃东西，最好是找个清静的地方去谈。几分钟后，我们来到我的书房，我们俩面对面地坐着喝

汽水。他现在不喜欢喝啤酒，烈性酒更是一滴不沾。他对我说，几年前他就把烟酒全戒了。

开始谈话有点不自然。我问他关于萨莱西亚诺教会学校的事。他不是在那儿读过书吗？但他好像有几百年没再跟他的同学见面了。当在报刊上偶尔出现同学中的专家、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名字时，他甚至弄不清哪个是哪个，也记不清学校的神父了。他告诉我，几天前他在街上碰到路易斯神父。这位神父以前是教小学的，现在变成了小老头，眼睛几乎要瞎了，驼背弯腰，拖着脚步走路，手里还拄着一根扫帚木把。他对玛伊塔说，他是出来在巴西街蹓跶蹓跶的，可认出了他。玛伊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同谁讲话，他真该是个百岁老人了，或者接近一百岁了。

当我把所搜集的有关他和哈乌哈冒险行动的简报、文件拷贝、照片、路线图、主要人物卡片、旁证笔记和会见记录等材料拿给他看的时候，我看到他以一种惊讶和为难的表情对所有那些东西闻闻，翻翻，摸摸。他不止一次地起身上厕所。他向我解释说，他的肾脏有问题，老是感觉要撒尿，多数情况是空紧张，只便出几滴尿。

“从我家到冷饮店，乘坐公共汽车真要命。我对你讲过，要两个小时的时间。尽管上车前我尽量解小便，但在车上还是憋不住，有时不得不像孩子一样尿在裤子里。”

“您在卢里甘乔监狱的这些年很苦吗？”我冒失地问。

他发愣地看着我。外面，巴兰科海堤一片寂静，连海涛的声音都听不见。

“日子不是那么好过。”过了一会儿，他面带羞愧地回答，“开始是受不了，不过，一个人没有习惯不了的东西，不是吗？”

最终他与证明材料中的玛伊塔相一致了：羞怯内向，不

愿谈个人问题，不愿暴露内心世界。玛伊塔突然承认，他永远也不可能习惯的是共和国警察。在没有领略警察对待犯人的残酷无情之前，他不懂什么是仇恨。后来他对警察则是深恶痛绝，这是因为每当犯人闹事或罢工的时候，狱警们总是穿过铁丝网去镇压：他们不顾犯人的死活，不分青红皂白，胡乱用枪扫射和拳打脚踢。

“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去年年底吧？”我问他。

“是十二月三十一号。”他说，“进去了百十人；狱警们要过圣诞节，想快活一番。正像他们所说，捞点圣诞礼物。他们一个个都喝得酩酊大醉。”

这事发生在夜间十点左右，狱警们从牢房门窗外面用枪扫射，抢走了犯人的全部钱、酒、大麻和可卡因等。他们自己饮酒作乐，对囚犯用抢射击，用枪托乱打，直打得犯人们哭叫连天，无处藏身；他们还拳打脚踢，打得犯人头破血流。这事一直持续到凌晨。

“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三十五人，”他说，“实际死了两倍还多。后来，报上说这是为了制止一次未遂的越狱行动。”

他做了一个疲惫不堪的表情，声音也变得微弱了。囚犯们为了保护自己，一个个像打橄榄球一样，摞成堆，形成人山。这还不是在狱中最惨痛的记忆，最惨痛的也许是在开始那几个月。当他从卢里甘乔监狱被带往司法部接受训话的时候，铁壁囚车挤满了犯人，他们必须双腿跪着，脑袋挨地，稍一起身或向车外窥探，就要遭到野蛮的毒打。回程也是如此：从司法部的囚室上囚车，每个囚犯必须从共和国警察排成的人墙间迅速穿过，经受一顿棒打脚踢，遭人唾弃。结果，护住了下身的睾丸，就护不住脑袋，护住了脑袋，便护不住下身。他刚从厕所回来，沉思了片刻，连头也没抬又接着补充

说：

“当我看到别人杀死一个警察时，我就感到特别高兴。”

他是怀着满腔怒火讲这句话的。当我问起另一个卷头发、抖动得出奇的瘦个子玛伊塔时，他的怒火顿时消失了。

“他是一个吸毒成性的小偷，”他说，“此人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当谈起他和阿里斯佩在四号牢房合伙经营的食品铺，他的声音和情绪变得平和起来。

“我们进行了一次真正的革命。”他自豪地说，“我们赢得了大家的尊敬。我们把水烧得滚开，冲水果汁，冲咖啡，什么都是用开水冲，就连餐具、水杯和碟子，我们都在用之前也洗一遍，用完之后再洗一遍，卫生第一嘛。这是一种革命，我们实行了一种信用卡制度。也许我说出来您不会相信，有一次小偷企图向我们行窃，我的腿上挨了一刀，但他们什么东西也没能偷走。我们还创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银行，因为很多人把钱交给我们，让我们替他们存放。”

很明显，由于某种原因，他极不愿意谈我所感兴趣的事情：哈乌哈暴动。每当我想把他引到这方面来，可他刚开始回忆，就很快把话题转移到现实生活中来了。比如他的家庭，他告诉我，最后两次在卢里甘乔监狱服刑时，他利用获释期间结了婚。实际上他是在第一次入狱时，在狱中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的。她那时常去监狱探望她的囚犯哥哥，哥哥把她介绍给玛伊塔。此后，两人书来信往。在玛伊塔获得自由出狱后，两人就结了婚。他们有四个孩子，三男一女。玛伊塔再次下狱后，他妻子的日子非常艰难。刚开始几年，她拼命干活抚养子女，直到玛伊塔租了个食品铺，才能帮妻子一把。起初那些年，他妻子以织毛衣糊口，她走门串户，沿街叫卖。

玛伊塔也千方百计地在监狱里帮她卖，监狱里对毛衣还是有些需求的。

我一边听他讲述，一边观察。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体保养得很好，健康而结实。其实这是假相，他的身体并不好，除了老跑厕所解手，肾脏有问题，另外还出虚汗，面孔不时发红，像是心里有什么不舒服在折磨着他。他不时用手绢擦去额头上的汗，有时全身痉挛，话都说不下去。“您有什么不舒服？是不是想结束我们的谈话？”“不是的，我一切正常，我们继续往下谈吧。”

“我觉得您不愿意谈及巴列霍斯和哈乌哈这个话题。”我冒昧地说，“对那次失败您感到内疚吗？对您一生所造成的后果您感到遗憾吗？”

他连连摇头，表示否认。

“我感到内疚和遗憾的是您比我所知道的还多。”他笑了笑。“是真的，不是开玩笑，很多事我都忘了，还有些事我模模糊糊。我想帮您的忙，给您介绍一番，问题是我自己对发生的事情以及事情怎么发生的已经不甚了了。您想想，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是故意胡言乱语吗？不是的。他的记忆是模糊不清了，而且常常出错，每一桩事我都要给他纠正。这使我感到惊讶，因为我整整一年钻在这个题目里。我天真地主观臆想。他作为事件的主要角色肯定也是记忆犹新，对四分之一个世纪前那几个时辰中发生的事一直铭记心中。为什么呢？因为对玛伊塔来说，那是他一生中的大事，当然，在那之前和以后发生过很多类似或更严重的事件，后者把前者冲淡或使之逊色也是正常的。

“有一件事尤其使我迷惑不解，”我对他说，“有背叛行为

吗？”为什么原来允诺参加暴动的人到时候都无影无踪了？是乌维鲁斯取消了命令？他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是出于害怕？是因他不相信行动计划？还是像乌维鲁斯所说的，巴列霍斯把暴动的日期提前了？玛伊塔默默地思索了几秒钟，他耸了耸肩说：“过去弄不明白，将来也弄不明白。”他说话的声音很轻，“我认为那天有叛变行为。后来问题变得更复杂了。我事先不知道原来商定的暴动日期。出于安全考虑，暴动日期是由巴列霍斯和乌维鲁斯两个人定下的。乌维鲁斯一直说商定的日期是在四天之后，是巴列霍斯把时间提前了，而且还得到消息说，由于两天前同人民党所发生的事件，原定的日子还要推迟。”

同人民党发生过事是真的，当时哈乌哈的小报上有登载。那是人民党为了欢迎阿亚·德拉托雷，在武装广场举行了一次集会，阿亚在大教堂门前发表演说。身穿便衣的巴列霍斯、乌维鲁斯和他们的一帮朋友埋伏在广场的一个角落里。当主要人物依次入场时，他们朝着那些人扔臭鸡蛋。人民党的保镖们赶过去驱散他们。经过一阵冲突后，他们逃到埃塞基耶尔理发店。这是唯一得到证实的。根据乌维鲁斯和哈乌哈其他人的说法，巴列霍斯被人民党的人认了出来，这些人强烈抗议身为监狱头头的现役军官掺入反对已经被当局批准了的政治集会。为此，他们警告巴列霍斯，要去控告他。传说，巴列霍斯被他在黄卡约的顶头上司紧急传讯。这件事促使他把暴动提前了四天，而没有通知其他所有许诺参加举事的人。乌维鲁斯下保证说，他是在少尉已经身亡，暴动者被捕时才获悉这件事的。

“以前我以为传说的这些事不真实，”玛伊塔说，“后来发生的我一概不知。过了些年月之后，一些原来许诺参加暴动

的人相继落入第六监狱、弗隆东监狱和卢里甘乔监狱。关押他们是为其它的事，因为工会或政治上的问题。他们所有的人都发誓说，对暴动感到突然，乌维鲁斯约他们去是在另一天，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什么退缩与变节的问题。对您实说吧，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只有巴列霍斯和乌维鲁斯知道商定好的日期。是巴列霍斯提前了吗？他没有跟我讲过此事。不过，这并不是没有可能，他这个人很容易冲动，即使会落得个孤家寡人的危险，他也完全能干得出来。那时，我们都称他是个一意孤行的人。”

他是在批评少尉吗？不，这是事后的一个不偏不倚的评论。玛伊塔对我讲，就在头一天晚上，当巴列霍斯的家属去收尸时，他爸爸连招呼都不和玛伊塔打。那时警察正在审讯玛伊塔，老人走进来，玛伊塔向他伸出手，但他不予理睬，眼睛里含着泪水，怒目而视，好像一切罪过都归于他似的。

“我是不知道，不过这其中可能有点缘故。”玛伊塔又回到背叛的事，“或许有误会，也就是说巴列霍斯自以为有把握得到支援，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对他做过承诺。在带我参加的在里克兰举行的会上，乌维鲁斯对矿工们谈及了革命，而且看起来大家都一致同意。大家真的答应从第一天开始就拿起武器上山吗？我没听他们讲过这事，对于巴列霍斯来说，支持暴动是不言而喻的，不会有任何问题。也可能他所得到的仅仅是空头许诺，道义上的支持，在每人都能正常生活的情况下，想办法从旁相助。或许他们曾做过承诺，届时出于害怕，或因对行动计划不满而打了退堂鼓。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说真的，我弄不明白。”

他用手指敲打着椅子的扶手，沉默了好长一会儿。

“对加入那一冒险行动，您曾忏悔过吗？”我问他，“我想，

您在监狱那些年，肯定对发生过的事情都回顾过。”

“忏悔是天主教徒干的事；我在很多年前就不是信徒了。革命者是不忏悔的，他们做自我批评，这与忏悔不同。我也做了自我批评，事情就算了结了。”看来也很气恼，但不一会儿，他又笑了。“您有所不知，对我来讲，谈论政治，回顾以往的政治问题是很少见的。这就像一个幽灵，多年之后又返回来了，它让我看到的是一具具尸首，让我想起的是被遗忘的往事。”

“您只是在最近十年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吗？还是在这之前？或是因哈乌哈暴动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他默默不语，陷入深思，极力想把他的记忆理出个头绪来。难道这个他也忘却了吗？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没想过这些事。”他擦了擦头上的汗，说话声音很低。“事实上那不是我本人的决定。可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是有点为形势所迫。您知道，当我去哈乌哈参加起义的时候，我已经同我的同志们，同我的党，同我的过去一刀两断了，我在政治上成了孤家寡人。我与所结识的新同志只有几个小时的交往历史。巴列霍斯死了，孔多里死了，塞农回到了他的农民合作社，年轻的中学生们去上学了。您考虑过吗？这并不是我抛弃了政治，确切地讲，是政治抛弃了我。”

他说这话的样子，使我对他难以置信：语调阴阳怪气，坐在椅子上来回摇晃，总回避我的目光。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断定他在撒谎。“您再没见过您的托派革命工人党的老朋友吗？”

“哈乌哈事件发生后，在我坐牢的时候，他们对我很好。”他感叹地说，“他们去看我，带烟给我抽。为了把我列入新政

府颁布的大赦名单中，他们四处活动。但是，不久之后，托派革命工人党因为代表大会事件和乌戈·布朗科之事而解散了。当我出狱时，托派革命工人党和革命工人党干脆就不复存在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些来自阿根廷的人组织起来的新托派小组。我谁也不认识，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了。”

他说完最后一句话，就起身小便去了。

当他回来时，我看到他把脸也洗了洗。

“您真的不想和我一起出去吃点东西？”他断然谢绝，一再重复说他晚上从不吃饭。有好长一会儿我们陷入沉思，默默无言。这一晚上，巴兰科海堤依然是一片寂静，也许只有一对对恋人在黑夜的掩护下悄悄地相爱。醉汉和大烟鬼们没有露面，因为这些人总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才出来现丑。我对他说，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地下革命者，大半生都在同他的组织一起鼓动革命，进行斗争。他有时在这个组织，有时在那个组织，但都和他的组织一样无足轻重。他置身于哈乌哈的冒险行动，不是因为他对巴列霍斯的计划坚信不移——也许内心深处怀疑有成功的可能——而是因为少尉为他开辟了实干之路，以具体的方式、现实发生的具体而又直接的变化证明革命是可能的，从而激励了他。通过对那位易感情冲动的青年军官的了解，他发现自己所从事的日常革命工作太空洞了，太乏味了，为此，他决心参加起义，尽管他预感到这不比自取灭亡好多少。

“您承认您和小说中的人物有某些相似之处吗？”我问他，“还是跟您毫不相干，跟您追随巴列霍斯的理由毫无关系？”

他盯着我，思索着，眨巴着眼睛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端起水杯，把剩下的汽水一饮而尽。他的犹豫就是回答。

“一旦失败了，就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行的；”他若有所

思地说，“如果成功了，所有的人就会认为完美无缺，计划周密。例如古巴革命，跟随菲德尔乘坐格拉玛号船登陆的有几个人？一小撮，也许比我们在哈乌哈的人还少。人家成功了，而我们却没有成功。”

他思索了一会儿。

“我本人从不认为那是鲁莽之举，更不认为是自取灭亡。”他坚定地说，“事情本来想得很周到，假如我们把莫利诺斯桥炸掉，延误警察追赶我们的时间，我们就翻过了安第斯山脉，下到热带林区，他们就找不到我们了。我们就……”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很明显，他对所讲的事情缺乏信心。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事，要说服我相信，这有什么意思呢？我的所谓同学现在在想什么？半个世纪前，在萨莱西亚诺教会学校，他虔诚地信奉上帝；以后当他心中的上帝死去的时候，他便以同样的热情信仰革命，信仰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再以后是哈乌哈暴动。或许过去常年累月的无谓斗争把他的这一信念削弱并磨灭殆尽，还有什么其它的信念取而代之呢？信念全破灭了。为此，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思想空虚的人，他所讲的事情缺乏发自内心的激情。当他开始抢劫银行和绑架勒索的时候，除了搞钱外，已经没有任何信仰了吗？我自己也觉得这样说服不了我自己，尤其此刻我观察着他那身打扮：脚蹬长途行路鞋，身穿穷苦寒酸衣，就知道他是怎么样混饭糊口。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谈谈另外一个题目吧。”我提醒他说，“不过，我必须对您讲一点，玛伊塔。哈乌哈起义后，您一出狱，就去抢劫银行和绑架，这使我很费解。我们可以谈谈这个吗？”

“不，不谈这些，”他马上回答，话语有点生硬；不过他又自相矛盾地补充说：“这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伪造证据，推出假证人，强迫别人提供反对我的证词。把我判刑是因为找不着真正的罪犯，而我以前又有过前科劣迹。对我的判决是对正义的玷污。”

他收住了话头，好像此时此刻他已心灰意冷，疲惫不堪，疑虑重重。在他看来，事隔多年，一切都既成事实，想说服我也徒劳无益。他说的话是真的吗？他真不是维多利亚抢劫分子之一，也不是在自由人民区那伙绑架分子中的一个吗？我很清楚国家监狱中不乏清白无辜之辈（也许有许多在外面看来是罪人，而实际的为人令人钦佩）。由于玛伊塔有过犯罪历史，法官和警察拿他当替罪羊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从我面前这个人身上，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他是那么冷漠，消沉，甚至恬不知耻。这种状况又不能不引起我的联想，认为他跟那些干坏事的家伙可能是一丘之貉。

“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个同性恋者。”停了一会儿，我对他说。

他像是被马蜂蜇了似的猛然抬起头来，内心的苦衷使他的面部都变了形。他坐在一个宽大低矮的扶手椅上，现在看上去确实像个六十岁的人，甚至比六十还老。我看他伸了伸腿，两手垂放，神色紧张。

“这是为什么？”他终于开口发问。

这使我很突然，难道是他明知故问吗？但我找话搪塞了过去。

“为了强调他与众不同，突出他是个内心充满矛盾心理的人，也为了展示一下一些人对这种事所存在的偏见，他们主观臆想，要把社会从这一弊端中解脱出来。好了，究竟他为

什么搞同性恋，我也糊里糊涂。”

玛伊塔不愉快的表情更加明显了。我看见他伸手拿起放在几本书上的水杯，用手摸弄着，发现杯子是空的，又把它放回原处。

“我对任何事情从来不抱成见，”他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不过，对同性恋者，我认为我是有成见的，尤其是我在第六监狱、弗隆东监狱看到过以后，在卢里甘乔监狱我看到的情况更糟糕。”

他沉默了一会儿，痛苦的表情减少了一些，但并未消失。他对下面所说的情况未流露出丝毫的同情心：

“他们拔眉毛，用烧过的火柴棍把睫毛卷起来，抹口红，穿裙子，戴假发，把自己打扮得跟勾栏院的妓女一模一样。怎么不叫人恶心呢？人类堕落到这等地步，令人难以置信。随便谁，只要给他一点甜头，他就替你吸吸生殖器……”他喘了口粗气，满头冒着大汗。他从牙缝里又挤出了一句话：“听说，在中国，毛泽东把这类人都枪毙了。是真的吗？”

他又起身去上厕所。在等他回来时，我望着窗外。几乎总是阴沉沉的利马天空里，今夜出现了星星，有的星星静止不动，有的把它们的光辉洒在肮脏的黑色大海上。这使我想起，玛伊塔在卢里甘乔监狱时，在这样的夜晚里，他应当观赏闪耀着光亮的星空，这是一种纯洁、宁静而体面的景象。这同他所生活的无耻堕落的环境恰成鲜明的对比。

他从厕所回来后说，他感到遗憾的是他从未出过国。每次出狱，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出国，在其它国家从零开始。他千方百计想达到这个目的，但结果都极为困难：没有钱，没有符合要求的证件，两者都没有。有一次，他乘坐开往委内瑞拉的公共汽车到了边境，但在厄瓜多尔海关就把他赶下了

车，因为他的护照不符合要求。

“不管怎么样，我没有丧失出国的希望。”他嘟嘟哝哝地说，“带着这么一个大口之家困难更多，但我心甘情愿。在这里别希望找到工作，根本就没有希望，不论你到哪里去打听，都说没有工作，因此，我一直没有丧失出国的希望。”

“但是，我想，你对秘鲁却丧失了希望，完全彻底地失去了希望。对不对，玛伊塔？你以前相信，而且是那么坚信你的不幸的国家将来会变好。现在你的希望破灭了，对吧？你现在所考虑的是或者你所干的正是你心里想的，这里的一切永远也不会变好，只能变得更坏，更挨饿，更敌视，更受压迫，更无知，更粗暴，更野蛮。你也像其他很多人一样，想在我们的国家彻底完蛋之前溜之大吉。”

“到委内瑞拉，或者到墨西哥，听说那儿因为有石油，很好找工作。尽管我不会讲英语，到美国去也行。这就是我所希望的。”

由于信心不足，他的声音渐渐放低，以至失声。这时我也失去了点什么：谈话的兴趣。我知道，我从我的所谓同学那里得不到更多的东西，他的消沉情绪已经说明他是一个被折磨和敌意所毁掉了的人，是一个丧失了记忆的人。总而言之，他和我小说中的玛伊塔有本质上的不同。小说中的玛伊塔是一个乐天派，是一个坚强的人。尽管他的生活中充满恐怖和穷苦，但他是一个有信心并热爱生活的人。我勉为其难地把他留在这里（又接近午夜）进行这样一次无实际意义的谈话，实出我的意料之外。这次谈话勾起他不愿回顾的记忆，他从书房到厕所，来回跑了好几次。他的生理机能失调，我想对他说来这是很痛苦的事情。

“我让您熬夜了，太晚了。”我说。

“说实在的，我一般早早就躺下了。”他感到轻松地回答，并用微笑结束了谈话，以向我表示感谢，“我睡觉很少，四五个小时就够了。年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贪睡极了。”

我们站起身走了出来。在街上，他问我到市中心在哪儿乘公共汽车。当我告诉他我送他回家时，他低声说送他一段路程就够了。在里马克他可以乘上小公共汽车。高速公路上没有行人。绵绵不断的毛毛细雨飘洒在汽车玻璃上，直到哈维尔·普拉多大街，我们俩才随便聊起了南旱北涝和世界上的纠纷。走到桥上时，我一眼看出他心烦意乱，他对我小声说，必须下车一会儿。我刹住车让他下去，他背靠车门，在车旁解了手。当他回到车上时，低声说，由于晚上潮湿，他的肾脏毛病加重了。他找大夫看过吗？在接受某种治疗吗？他首先要解决自己的医疗保险问题，现在他就要争取得到保险，以便能到职工医院看病，尽管看来他得的是一种无法治愈的慢性病。

我们一路无话，直到格拉乌广场。到了那里，他突然开了口，像是另外一个人在讲话。

“我有两起抢劫案，这是真的。那是发生在维多利亚区的抢劫之前，然而，我却因为维多利亚那桩抢劫案而被关押。我对您讲的全是实话。我与发生在自由人民区的抢劫案也毫无关系：案情发生的时候，我根本就不在利马，而是在帕卡斯玛的榨糖厂。”

他不作声了，我既不催促他，也不问他。我把车速放慢，等待他下决心继续讲下去，惟恐他就此中止。他那激动的声音和神秘的口气使我大惑不解。市中心的街道一片寂静黑暗，唯一听得到的是汽车的马达声。

“是在我因哈乌哈事件被关了四年出狱之后干的。”他一边说，一边注视着前方，“您记得在库斯科市郊孔本西翁山村所发生的事吗？乌戈·布朗科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农民协会，并几次领导他们抢占土地。这事颇为重要，与左派以往所干的大为不同。一定要支持他们，不允许在他们身上发生我们在哈乌哈所出现的事情。”

我在阿班卡伊大街的一个红灯前停了车，他也停顿了一下。现在坐在我身旁的人仿佛不同于刚才在我书房的那个人，也不同于我小说中的玛伊塔。这是第三个玛伊塔，他有痛苦的经历，不幸的遭遇，对往事记忆犹新。

“就这样，我们极想在资金方面支援他们。”他压低声音说，“我们计划征用两家银行，在那个时候，这是支援的最好方式。”

我来不及问他，是同什么人一起商定抢劫银行的，不知是托派革命工人党，还是革命工人党的老同志，还是在狱中认识的革命分子，或其他什么人。在那个年代——六十年代初——采取直接行动的思想很盛行，有无数的青年人，即使没有用这种方式采取实际行动，至少也在白天或者在夜晚谈论着怎么干。对于玛伊塔来说，同那些青年人接触，使他们想入非非，以征用的名义引诱他们搞一次神圣的行动，不应当是困难的。由于哈乌哈发生的事情，他在一些激进组织中赢得了某种声誉。我并没有问他是否就是那些抢劫活动的主谋。

“计划准确地分两步进行，”他补充说，“既没有人被捉，也没有人受伤。我们在利马不同的地方连续干了两天，征用了差不多……”他在说出大约的数目之前，稍微犹豫了一下。“有几百万。”

他再一次沉默不语了。我发现他在深思，为他那最难开口讲出的事情寻找合适的言词。我们到了阿乔斗牛场的对面，斗牛场的庞大阴影笼罩在浓雾之中。我该往哪儿走？好了，我把您送到家，您给我指一指去萨拉特的路吧。他现在自由了，可是却住在卢里甘乔区这么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穷地方。这里的街道坑坑洼洼，垃圾成堆，汽车上下颠簸，弹跳得厉害。

“因为我是在警察局挂了号的，大家商定不让我带钱去库斯科。在那里，我们应把钱交给乌戈·布朗科的人。为慎重起见，我们决定，我同其他的人分开走，并且由我自己出路费，随后赶到。同志们分两批走的，我亲自帮他们离开，一批人乘坐拉货的卡车，一批人乘坐一辆出租汽车。”

玛伊塔又不作声了，他咳嗽了几下，然后现出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继尔自我解嘲地很快补充说：

“就在那时，我被警察抓了起来，但不是由于征用那件事，而是因为维多利亚区的抢劫案。我没有参与此案，对此案一无所知。我当时想，管他偶然不偶然，管他巧合不巧合，这太妙了，有他好的一面。这样可以迷惑警方，把他们搞得乱了套。我想，我和征用案件毫无牵连了，但是，我又觉得不对头，这不是一场巧合……”

我突然意识到他要对我讲什么，同时我也猜得出他将要如何结尾。

“我完全被蒙在鼓里，几年以后我才明白，以前也许我不愿意搞清楚。”他打了个哈欠，面部肌肉收缩到一起，随之磨了一下牙。“更有甚者，我在卢里甘乔看到一份攻击我的传单，也不知是什么鬼组织印的。他们指控我是盗贼，说我从维多利亚区的银行里抢劫了不计其数的钞票。我没有在意，因为那是政治生活惯用的卑劣伎俩。当维多利亚抢劫案的犯人被

赦免，我出狱的时候，我在卢里甘乔狱中已度过了十八个月。我开始寻找一起参加征用的老同志。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连一封信都不给我写？为什么他们不同我取得联系？最后我找到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于是我们进行了谈话。”

说到这里，他咧开嘴笑了笑，露出一口残缺不全的牙齿。毛毛雨停了，在车灯照射的范围内，可看到无处不是土堆、碎石、垃圾以及破旧不堪的房子的轮廓。

“他告诉您，钱从未到过乌戈·布朗科手中吗？”我问他。

“他对我发誓说，他一度反对并极力劝阻其他人别做这种缺德事。”玛伊塔说，“他向我撒了一大堆谎，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其他人身上。说什么他要求他们就此事先同我商量商量，而他们不同意。‘玛伊塔是一个狂热的革命者，’他说那些人对他说，‘他是不会理解的，他对这种事太一本正经。’从他讲的谎言中可以证实某些事实。”

他喘了口粗气，要我把车停住。我一边看他在车旁解开裤扣小便，尔后又扣上，一边想：作为我的模特儿，玛伊塔是否可以被称为“狂热的革命者”，是不是就是我小说中的玛伊塔？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两者是大相径庭的，当然又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

“说实在的，我真不理解。”他回到我身旁后慢腾腾地说，“说实在的，我要是那时见到他们，准会对他们说：‘花革命的钱要烧手的。’难道他们就没有考虑到，把这笔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他们就不成其为革命者，而变成盗贼了吗？”

他又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沿着一条笼罩着大雾的街道慢速行驶。有时看到马路两边有一些人，身上盖着报纸，在露天睡觉。又脏又瘦的看家狗在车灯照射下迎面跑来，狂吠乱叫。

“我要是当时知道这事，我当然不会放过他们。”继尔他又说，“就因为这个，他们才告发我；就因为这个，他们才把我牵涉到维多利亚的抢劫案中。他们知道，我宁肯枪毙了他们，也不会放过他们。他们告发我是一箭双雕，他们摆脱了我的牵制，警察局也抓到了凶手。他们深知我是不会揭发我的同志们的，因为我认为正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征用来的钱转交给乌戈·布朗科的。在审问过程中，我发现控告我的是什么事。当时我说：好极了，警方没有发现他们。在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保护他们，认为那是一件好事。”

他冷冷地笑了笑，又不作声了。我意识到他不会再讲些什么了，我也不需要他再讲了。假如他讲的这些话是真的，现在我明白了是什么伤透了他的心，我还明白我身边的这个人为什么会变成幽灵。既不是因为哈乌哈的失败，也不是因为那许多年监狱生活的折磨，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代人受过苦，很可能正是因为他发现征用的钱被截留。根据他自己的哲学，发现他“实际上”干了一个刑事犯罪分子所干的事；或者因为发现，面对着那些比自己党龄短、蹲监狱时间亦短的同志们，他自己反倒成了一个天真幼稚、愚蠢无知的人。是这件事使他领略了革命，使他变成现在这副样子？

“有一段时间，我曾想一个一个地找他们，同他们算帐。”

“像基督山伯爵那样。”我打断他，“您看过这本小说吗？”

玛伊塔没有听见我的话。

“后来，我对他们的愤怒和仇恨也就消失了。”他继续说，“也就是说，我原谅了他们。因为，据我所知，他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有的比我还惨，只有一个人例外，他爬上了议员的宝座。”

他勉强地笑了笑，继尔又沉默不语。

我心想：你原谅了他们，这并非真话。这件事，你自己原谅了自己亦非真话。我应该要求他说出那些人的名字和确切的情况吗？我应该设法再套出点什么吗？他向我所做的坦白是破例的，或许日后他对这次谈话会感到后悔。我想，他可能在卢里甘乔监狱的铁窗里，反反复复地思考过他所受的嘲弄，但是，他讲的这些情况是不是过于夸张或者纯粹是谎言呢？这一切，会不会是他为了替自己耻辱的历史辩解而事先想好的呢？我斜着眼看了看他，他像是有点冷，正在打哈欠，伸懒腰。在通往卢里甘乔的岔道上，他指了指，要我继续朝前走。柏油马路到了尽头，延伸出来的是一段土路，到了旷野也就到头了。

“再往那边走一点，就是我住的新村①，”他说，“我平常是步行到这里坐公共汽车的。您就把我送到这里吧。您能记住回去的路吗？”

我对他说，肯定没有问题。我想问一问他在冷饮店挣多少钱，乘公共汽车的费用占他工资的多少，余下的钱如何安排。还想问问他是否想另外找一个工作，是否想叫我帮他一把，经营点什么，但是，所有这些话到了嘴边又吞下去了。

“有一个时期，人们都说在热带森林区好找出路。”他主动对我说，“我也在这方面跑腿活动过。既然到国外去是那么困难，那就到布加尔巴去，到伊基托斯去混混看，然而，这都是传说。热带森林区的情况也与这里一个样。在这个新村里就有人从布加尔巴回来了。哪儿都是一样，只有走私可卡

① 所谓新村，是在利马远郊无人居住的沙漠上或秃山上，由流入利马的农民新建的居民点，实际上它是贫民窟的同义词。

因的人有工作做。”

说话间，我们穿过了旷野。只见一些黑影在夜幕中隐约出现，那是些低矮的房子。从堆放的土坯、瓦板、木料和席子看，给人的印象是房子盖了一半，就又停工了。这儿既没有柏油马路，也没有人行街道，没有电灯，大概也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

“我从未到过这一带，”我对他说，“这儿好大。”

“那边，左面，看到有灯光的地方就是卢里甘乔。”玛伊塔指挥我驾驶着车子拐弯抹角，“我的妻子是这个新村的创建人之一。八年前，大约二百来户人家，建起了这个新村。为了不让人看见，他们在晚上成群结队地到这里。他们打桩子，拉绳子，一直干到天亮。等到第二天警察来到的时候，村子已经既成事实，也就无法拆除了。”

“这么说，当您从卢里甘乔监狱出来的时候，您还不认识您的家？”我问他。

他摇了摇头。他告诉我，在监狱里被关了十一年之后，出狱那天，他一个人步行穿过了我们刚才走过来的那片空旷地带，不断地用石块赶跑追赶着咬他的狗。他到了村头那几家时，便开始打听：“玛伊塔太太住在哪儿？”其实他就站在家门口，全家人都愣住了。

我们来到他家门口，车灯一照，我看得清清楚楚：墙壁是砖头砌的。房顶尚未建完，搭的是没有固定好的石棉瓦，为防止移动，瓦上压了些石块。所谓门，只不过是一块木板，用钉子和龙舌兰纤维搓成的绳子固定在墙上。

“我们正在为争取自来水而斗争。”玛伊塔说，“水是这里很严重的问题，当然，还有垃圾。您肯定能找得到回去的路吗？”

我向他保证说肯定回得去，并且说，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还要再找他聊聊，让他再多提供点关于哈乌哈起义的情况。也许到那时，他又想起了其它的细节。他同意了。我们紧紧地握了握手就告别了。

只要认准了到萨拉特的方向，我返回去没有什么问题。我把车速放得很慢，有时停下来观察一下这个我叫不出名字的新居民点。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副贫寒穷苦、简单丑陋、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景象。街上寂静无人，连个动物也看不到，到处堆着高高的垃圾。我心想，这里的居民明明知道对垃圾无能为力，没有一辆市政府的车会来拉垃圾，他们只能忍受着把垃圾倒在自己的家门口，可谁也没有勇气和邻居商量一下，把垃圾倒到远处的旷野里，或者埋在地下，或者用火烧掉。居民对此无心过问，他们已习以为常了。我想象得出，白天里，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就在房前屋后堆成金字塔的垃圾里又跑又跳。从垃圾里滋生出无数的苍蝇、蟑螂、耗子和虫子。我想，这里臭气冲天，传染病肯定猖獗，人们的寿命都不会长。

我还在想玛伊塔家附近的垃圾的时候，远远地看到左边卢里甘乔监狱的成山的垃圾堆，并且我又想起那个赤身裸体的疯癫犯人在单号牢房前的大垃圾堆上酣睡的情景。不一会儿，我便穿过萨拉特区，从阿乔斗牛场边上绕过去，驶入阿巴卡伊大街，沿着它直奔高速公路，途经圣伊德罗区、观花埠区和巴兰科区。提早驶进我有幸居住的巴兰科区海堤地段，映入眼帘的又是一堆堆垃圾——明天早晨我出来跑步时，将会看见——如果伸长脖子，沿着陡峭的海岸看去，成堆的垃圾一直延伸到大海。于是乎，我想起了一年前我开始虚构的这部小说，那就用日益吞噬秘鲁首都市区的垃圾作为本书的结尾吧。